

赚钱天才，金融游鳄，凶狠的投机者和慷慨的慈善家，这就是乔治·索罗斯！他凭一己之力挑战世界，先后给英国、意大利、墨西哥和东南亚诸国带来巨大的灾难。这灾难还在漫延，那么，索罗斯的手会伸向中国吗？

索罗斯离我们还有多远？

白云峰 著

资本豪赌



摄影艺术出版社

只要索罗斯的幽灵

还在资本市场中阴魂不散

这世界就永无宁日



资本豪赌

白云峰 著

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福建出版中心)

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纺织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 * *

850X1168 毫米 32 开本 11 印张 230 千字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ISBN 7-80562-463-1/F 13 定价:21.8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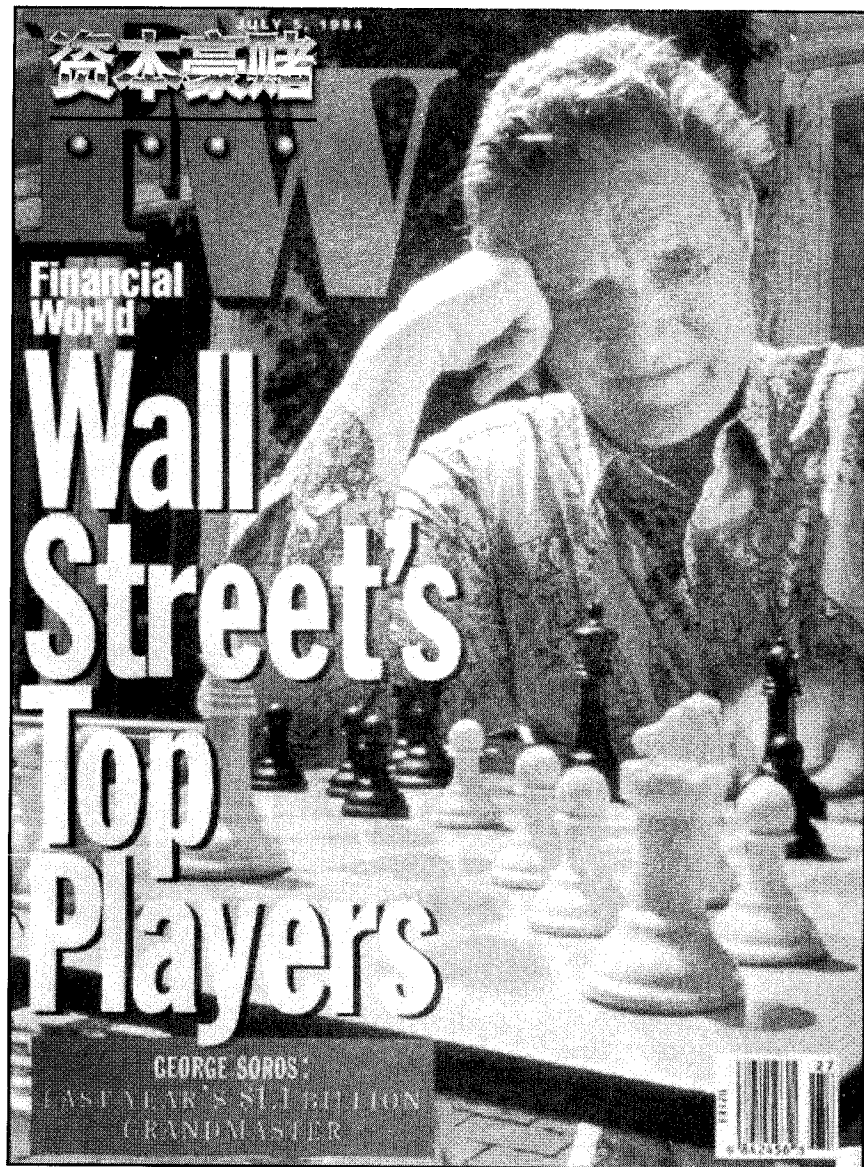
资本豪赌

——索罗斯离我们还有多远？

白云峰 著



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



对乔治·索罗斯而言,金钱世界的角逐一如棋局,变幻莫测却又有机可寻



在莫斯科踌躇满志

窥听或冥想：谁是下一个猎物？



蹩脚的哲学家，伟大的投资人。
所以索罗斯常说：赚钱比花钱容易



同纳尔逊·曼德拉的握手是否能满足他“世界政治家”的幻觉？



是非任人评说,我自怡然自得。索罗斯与妻子苏珊

无论国家或个人间，
利益相同，
才是最牢固的纽带。

修昔底德
雅典历史学家
公元前 460～400 年

前言

可怕的警示： 一个人挑战东南亚

就在不远的十几年前，当我们提到金融这个词的时候，肯定会感觉这是一件离我们很远的事情，一件该国家照管的事情。今天，情况却大不一样了，国际国内的金融风波已经能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已经不可能逃避金融对你的控制作用。你要投资股票，投资期货，要换美元；如果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市场上进口商品的价格肯定会大幅度下调，你就可能在手头并不宽余的情况下享用国际驰名品牌。

做股票的人特别痛恨那些操纵大盘的超级大户，同样的道理，如果有哪位金融投机家操纵金融市场影响了你的生活，你也会怀恨在心。前不久，1997年7月2日的早晨，泰国人一觉醒来，发现自己手里的钱莫名其妙地就少了1/5，会是一种什么心情呢？

本书要向你介绍的就是这次发生在东南亚的金融危机，这个事件的始作俑者之一、被人称为“金融狙击手”、“国际金融界的坏孩子”的美国金融投机家乔治·索罗斯，以及这一事件对世界、对中国可能产生的影响。

在这场恶梦般的危机中，美国金融投机家乔治·索罗斯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人物，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曾不止一次公开指责索罗斯应对此次危机负责，两人你来我往的论战一直延续到今年9月在香港召开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年会上。

索罗斯究竟从这场金融风波中捞到了多少钱？据西方新闻媒体估计，索罗斯属下的量子基金会仅今年7月就靠大量抛售泰铢和其他东南亚货币赚取了20亿美元。

美国《商业周刊》杂志最近一期报道，索罗斯属下的量子基金会去年的业绩令人失望，今年头6个月的业绩也平平。直到7月份，量子基金会才大踏步前进，将头6个月来的盈利翻了一番。

今年上半年，量子基金会利润率为14%，但这一数字与同期的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20.6%相比就十分逊色了。从索罗斯近年来对美国金融的评估来看，他并不看好股市。而量子基金会今年在美国股市的投资动向，也以卖空为主。所以纽约股市的潮涨，只会给他带来亏损，而不是盈利。

然而，从今年6月底到7月底这一个月內，量子基金会的利润率却由14%急剧增加到27.1%，几乎是上半年盈利能力的两倍。据报道，量子基金会在6月底（即东南亚金融动荡前）总资产为150亿美元，到7月底则上升到170亿美元。这表明，自泰铢贬值引起的东南亚金融风波7月初发生以来，量子基金会仅在一个半月时间内就赚了20亿美元。

索罗斯本人也承认，他在今年6月16日抛售了价值相当于

1000 万美元的泰铢。虽然泰铢自 7 月初以来已贬值 25% 以上，但区区价值 1000 万美元的泰铢根本不可能创造出 200 倍的盈利。

《商业周刊》认为，量子基金会所赚的 20 亿美元除来自抛售泰铢外，还来自抛售马来西亚林吉特、菲律宾比索等东南亚货币。

在国际金融界，索罗斯是有名的豪赌之徒。1992 年，索罗斯投下巨额赌注与英镑—马克较量，最终迫使英国政府低头，英镑与马克双双退出欧洲货币汇率机制。索罗斯也凭借此次货币投机赢得了“国际金融界的坏孩子”的头衔和 10 亿美元的进项，从此坏名远扬。两年后，索罗斯在墨西哥金融危机中又结结实实地捞了一把。不过，索罗斯也并非百战百胜，1994 年在对日元的投机活动中他一天之内就损失了 6 亿美元。

冷战结束后，经济优先发展和维护国家经济利益已成为世界性的潮流。在利益的驱动下，超国家的金融资本力量在悄悄地或公开地进行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争夺市场和追逐利润已成为世界金融动荡的直接原因所在。

专家们估计，15 年来世界平均每 5 周爆发一场金融危机，一些国家的经济由此受到影响。90 年代初以来发生的金融动荡无不与资本自由流动和有关国家的金融政策有关。从表面上看，国际金融资本的投机活动是引发金融动荡的直接原因，但从深层次来看，跨国界自由流动的资本像一股无处不在的超级力量，把全球的金融市场变成一个大赌场，黑手就是那些金融投机家。

而危机的本质原因是，金融活动正最大程度地脱离物质经济活动而独立运转，国际资本的流动已演变成为一种虚拟的经济活动，像黑色的幽灵船在世界各地游曳。目前全世界货币的日交易量近 2 亿美元，其中只有 2% 与物质生产、交换有关，98% 变成不直接创造价值的金融自身的活动。

近三年来，世界金融市场发生如此之多的震荡，在金融史上是罕见的。其中原因之一是金融交易网络的增强从而扩大了金融投机活动的范围和能量：“只要在计算机上敲几个键，成百上千亿的资金就可以转到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变成全球性的大恐慌。”

目前，全球外汇市场日交易量超过各国中央银行外汇储备的总和，而 80 年代初期，后者约为前者的 4 倍到 5 倍。由此可见，各国金融管理机构与市场较量时都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这也说明了金融市场的动荡当前为何跌宕起伏。

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我们的金融、经济活动不可避免地要与国际市场接轨。在日益走向世界经济大家庭的今天，经济动荡已与我们息息相关，有谁敢断言索罗斯的黑手就没有企图伸向过我们？面对金融动荡的东南亚，我们不能熟视无睹，漠不关心，被动地等着恶梦降临！

重要的是，我们自己做好准备了吗？在我们的经济、金融体制中，还存在着许多致命的弱点。这些弱点在国内市场的运作中并不十分突出，一旦与国际市场接轨，面对国际资本的强力冲击，这些弱点会暴露无遗，处境会非常艰难。这将直接影响到国家的经济建设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稳定和提高。金融在一个国家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对此有些人并没有深切地认识到。

本书作者在对这次东南亚金融风波的研究中还产生了一些其他的感受，这主要涉及金融力量对全球历史、政治进程的影响，有一点未来学的味道，一并写出，与广大朋友、同行共赏。

作 者

金融台风水洗东南亚

第一部

在装修华丽的银行大楼里，所有工作人员的脸都一片铁青，他们是内行人，知道这种局面是无法逆转的。实际上，人们心里早就在无意识中期待着这场危机的降临了，很长时间以来，一种未知的恐怖一直盘亘在人们心里，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好了，它终于来了，是生是死，都有个结局了。

第一章

一个联盟的痛苦

1997 年 7 月 2 日

【美联社 1997 年 7 月 2 日曼谷电】

金融“厄尔尼诺”降临东南亚。

... ..

【路透社马尼拉 7 月 3 日电，记者：大卫·科斯】

固定汇率酿成惨剧，一房地产商跳楼自杀。

... ..

1997 年 7 月 2 日，对泰国的老百姓来说，无疑是最不幸的。

天。他们一大早醒来，便发现手中的存款和现金已经贬值了 1/5，近几个月来，有关泰铢与美元的汇率的种种传说终于变成了现实：泰国政府在国际金融市场大量抛售泰铢和外国投资者纷纷撤资的压力下，经过几周的犹豫和反思之后，痛下决心，宣布放弃执行了 13 年的汇率管制政策，将泰铢与美元脱钩，实行货币汇率自由浮动机制，以刺激出现颓势的国内经济。消息一出，泰铢随即大幅度贬值，一天之内贬值 20%，整个国家沉浸在一片哀伤之中。

泰国的首都曼谷，17 世纪时还是个小渔村，如今已经发展成一个美丽多姿的现代化大都市，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号称泰国的“华尔街”的夕隆大街，近一公里的大街两旁，银行大楼连成一片，盘谷、亚洲、大城、泰京等泰国银行大厦前的喷泉哗哗地射着水花。门前的广场上，到处是满脸悲伤的人，他们纷纷到这些银行来打听，泰铢与美元的比价还会继续下跌吗？泰国人生活中许多常用的商品都是进口的，泰铢与美元的比价直接关系到人民的生活。许多人拿不定主意，是现在把手里的泰铢换成美元，以防止泰铢进一步下跌造成更大的损失，还是先看一看，也许这只是暂时的现象，过不了多久就会反弹。

泰铢贬值引发了一场金融地震，整个东南亚都在狂风骤雨之中。就在泰铢贬值的当天，菲律宾比索受到有史以来最大的冲击，全国有 30 万人来到各大银行取出存款，去购买一些能保值的物品。菲律宾中央银行宣布对外汇交易实行有限度管制。7 月 11 日，菲律宾政府宣布，放弃相对固定的汇率，允许比索汇率在更大的范围内波动。同一天，缅甸的缅元同美元的比价从几个月来一直保持的 160:1 降到 240:1 的历史最低点。自 7 月 14 日起，幕后投机者联手抛售该地区各种货币，买入美元。马来西亚的林吉特不得不跟着贬值，汇率跌至 16 个月来的最低点。印尼盾汇率波动

幅度从8%放宽至12%，连经济体质良好的新加坡也受到冲击，新元一度下跌，印尼盾在行将贬值的谣言的压力下，因中央银行及早放宽干预区间才使受到的冲击较小。

甚至在大洋彼岸的拉丁美洲，不少国家也如惊弓之鸟，巴西股市7月15日出现自1995年1月墨西哥金融风暴以来单日最大跌幅，巴西政府宣示其外汇政策将不会改变，而且不认为任何投机客可以与其中央银行对抗。巴西7月16日股市大幅反弹1024点，涨幅为8.81%，巴西里拉升值0.01%，一美元可兑换1.0807巴西里拉，外汇市场趋向平静。

同样，在欧洲的罗马尼亚、希腊和捷克，都有投机者趁东南亚金融危机挑起风潮，企图趁机渔利。

东南亚各国中央银行为了渡过这次危机，一般都是先花费数十亿美元捍卫汇率，如菲律宾中央银行总裁辛达曾信誓旦旦要捍卫比索；马来西亚中央银行总裁阿末敦曾扬言“必须铲除这类破坏马来西亚金融市场稳定的活动”，但到了7月14日，马来西亚中央银行突然放手让林吉特滑落，原本受创的投机商趁机反攻；菲律宾中央银行总裁辛达为允许比索对美元的比价在更大范围内自由浮动辩解说：“旨在挫败投机，并逐渐降低利率。”他坚持说这项行动不能被视为政府改变外汇政策，“是市场的情况已经改变，我们的基本原则是保证菲律宾人民得来不易的经济成果。更有弹性的外汇汇率可保持我们的储备金，使利率恢复到经济成长所需的水平”。据透露，菲律宾中央银行动用了国家紧急储备金干预外汇市场，使原本128亿美元的储备金只剩下不足100亿美元。

虽然东南亚各国政府竭尽全力阻止事态的进一步扩大，但事件的冲击波却一波更比一波强烈，大量的国际资本从这一地区撤走，金融投资界对该地区丧失了信心，法国企业家协会的让·德

塞尔对《巴黎竞赛画报》记者发表谈话说，“东南亚的金融风波，是这一地区长期执行一种僵化的金融政策所致，这种僵化是文化的一种表现，就像浪漫是法国人的天性一样，因此，我以为我们应该对在这样的地区投资认真考虑，尤其是对那些长期的投资者来说更是这样。”纽约的标准普尔评级公司也发出文告，将泰国 8 家大金融企业列入因呆账而需特别观察的公司名单。

为了摆脱困境，尽快结束这场金融危机，重新树立经济起飞的形象，在其他东盟国家的支持下，泰国政府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交了请求援助的正式文件。现在已经卸任的泰国中央银行前任行长说，7 月 22 日，泰国中央银行向政府提交了一份报告，要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广泛合作，一方面从该组织取得一笔紧急贷款援助，另外由该组织派出一个专家小组对泰国金融业进行调查，并提出政策性建议。他透露，7 月 30 日，政府内阁会议已经同意了这项计划。他说：“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积极合作，在解决危机的同时，开始为泰国经济的长期复苏和泰国金融体系的重建打下长期的基础。”

7 月 28 日，泰国财政部长宣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调查小组即将到泰国考察情况，他认为调查小组会为泰国带来更有效的解决金融危机的措施，给泰国金融界带来希望。当天，泰国的证券市场出现小幅度回升，其股市的 SET 指数上升了 1.49 点，达到 682.16 点。

尽管作出了不少努力，但这并不能缓和泰国政府内部和社会各界对差瓦立总理和金融部门领导人的指责。泰国中央银行行长被迫辞职，新任行长他农·比达亚立即走马上任，这位新的中央银行行长现年 50 岁，曾获得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此前任中央银行副行长，在中央银行的外汇政策和解决泰国货币出现的

一系列问题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金融界人士普遍认为，他比他的前任更有进取心和责任感。虽然换了人，但泰国金融界更关心的仍然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即将与泰国进行的合作，他们把摆脱危机的希望更多地寄托在这个国际经济组织的政策建议上。一位泰国证券交易商不无讽刺地说：“谁将是泰国的中央银行行长，毫无疑问，应当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泰国经济界人士预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泰国将要做的事情包括，要求泰国政府允许泰国铢可自由兑换，取消泰国铢在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的交易限制。（今年5月份，泰国政府为防止过度套购美元而对泰国外汇市场设定了一系列限制措施。）另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可能推动泰国政府实行更紧缩的财政政策，包括削减预算、增加税收、降低工资增长幅度，以及增大金融政策的透明度等。

8月11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东京宣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若干国际、国家和地区金融机构拟提供160多亿美元贷款救助泰国稳定其经济。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在8月13日晚10时分别致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和泰国中央银行行长，表示中国政府愿意承诺10亿美元的贷款，并将参加在泰国召开的关于具体融资协议的会议。

8月14日，戴相龙在北京宣布，中国政府承诺向泰国提供10亿美元贷款，以帮助泰国稳定经济和金融秩序。

同时，香港特区政府也已经表示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援行动，愿意提供10亿美元的贷款，以帮助泰国政府摆脱困境。戴相龙表示，他相信泰国政府在国际组织和亚洲的援助下，能够克服当前困难，顺利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泰国货币可以保持稳

定。

最终，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持的这次救援一共为泰国政府争取到了 168 亿美元的贷款。

从数额上说，这些贷款并不一定能压倒数以千亿计的国际投机游资，重要的是这笔贷款能在短期内筹集到位。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康德苏的话说：这表明 1995 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后建立的国际金融安全网络已经开始发挥作用。

泰国政府宣布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揽子援助计划，其中包括关闭 42 家金融机构、提高增值税等。但广大的老百姓仍然处在惊恐万状之中，他们纷纷提取存款、囤积粮食，注销信用卡，并认为购买黄金是防范更大灾难的手段。

泰国总理差瓦立·永猜裕发表谈话，敦促泰国人民不要惊慌。他说：“我们要求全体泰国人团结起来，克服困难，不要被谣言搞得惊慌失措。”

就在这天，差瓦立总理和财政部长他农·比达亚会见了 5 家大银行的代表，共同讨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泰国提出的一揽子计划的后果。

他农后来说，政府将采纳银行家们的建议，在泰国银行建立一个特别中心，帮助因提款而面临清偿能力问题的较小机构。他说，政府将支持银行，表明银行部门没有根本性问题。

紧接着，泰国内阁改组，加强了经济工作领导班子。人们从两位负责经济的新部长（由总理任命，以协助财政部长）的嘴中获悉，要经过三年的努力泰国才能再见起色。税收的提高，预算的减少，工资的冻结，明年将直接影响消费者。

负责监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计划执行的新任副总理威拉蓬·拉曼古拉指出：“今后三个月将是非常关键的。”他是 80 年代炳·

廷素拉暖政府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时的财政部长，也是1984年货币贬值的发起者。他是泰国最杰出的宏观经济学家之一。他的想法接近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想法，因此，几个月来，他一直对泰国银行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进行批评，但是在庵雷·威拉旺辞去财政部长一职后，他却拒绝接任此职。当地报界说，是一些军人（人们一直担心他们可能搞政变）说服威拉蓬·拉曼古拉进入内阁的。

这次内阁改组的另一个角色是他信·西那瓦，被选中任命为副总理，这是因为他在商界的影响。这位48岁的商界巨头是西那瓦电信帝国的老板，他被任命专门负责商业和基础设施计划。他主要是同商业部长纳龙猜·阿加萨尼合作，共同对付通货膨胀（今年可能达到7~8%）。同威拉蓬·拉曼古拉的任命相反，他的任命主要是联合政府内政治协调的结果。这些变动影响到一些在位的部长，但是对那些被指控为贪污和无能的显贵们却没有真正的触动。

亡羊补牢，不会是一厢情愿

为克服这次金融危机给国家带来的灾难性打击，泰国政府加大了工作的力度，政府宣布从8月16日将增值税由7%提高到10%，特别增加对高档消费品的税收，这样一方面限制了这类消费品的进口，同时也增加了税收；同时宣布对20几种人民生活必需品免征增值税，公交、水电、煤气等价格维持不变。人们在超级市场看到，泰米售价为19.5泰铢一公斤，而一个月前的价格为17铢。为减轻民众负担，政府与碾米业协商，推出一种“兰牌”廉价大米，待新米上市时价格还会降低。在市中心广场，当局正搭

棚设档，开办“周末廉价国货大集市”，为低收入阶层提供廉价商品。

8月16日晚，很少干预政事的国王要求新内阁要诚信。这一点很关键。在像海关和金融机构的监督部门这样一些容易受影响的领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干预是否有效，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政治领导人把国家利益放在何处，是在部门和个人利益之下还是反之。

为了真正解决金融方面存在的问题，政府接连出台一系列措施，整顿金融秩序，缓解经济顽症。8月22日，泰国中央银行公布了对金融机构及其资金进行有效管理的一揽子方案。主要涉及商业银行、信贷和金融公司改善管理、增加资金，援助被迫停业的金融机构，扩大泰国金融机构发展基金，对金融公司资产和信贷加强监管，以及修改金融业税收，合并规章等。其目的很明确，保护债权人和储户利益，并恢复公众对银行系统的信任。

政府还于8月20日宣布了新的投资政策，重点支持那些有利于增加外汇收入、能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生产替代产品及进口含量低的投资项目，曾经在泰国实行了长达25年的地区优惠投资政策，就此完成历史使命。可以看出，泰国政府已经从根本上着手整治经济问题，如果扩大出口的策略能够见效，外汇储备、就业、通胀等问题就有可能迎刃而解。经济状况几近谷底的泰国，现在开始面临转机。

为尽快摆脱经济困境，差瓦利总理还在处理金融风波的同时，紧急召集280名政府官员和旅游界负责人开会，要求旅游部门必须在1998年至1999年度中取得7000亿泰铢的收入，这意味着一年要吸引1700万游客。旅游业一直是泰国外汇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在泰铢贬值之后，游客来泰国旅游的花费相对要少一些，泰

国政府抓住这个时机，适时提出大力发展旅游业，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为重建人民对政府的信任，泰国政府也做出了自己的姿态，表明政府的决心。政府发言人8月25日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泰国政府将压缩政府官员出国公干的次数和时间，同时大力惩治腐败行为，提高政府的办事效率。针对这次金融危机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泰国政府专门成立了“产业原则研究小组”，负责今后引进境外资本政策的研究工作，定期向政府提出咨询报告。

不过，虽然亡羊补牢未为晚，但金融运作并不是一厢情愿的事情，获利者在没有充分吸取利润之前，不会放弃进攻的策略。泰国金融动荡这恶梦般的日子并没有走到尽头。8月22日，泰铢对美元的比价竟一度跌至34.6:1的历史最低值，所谓的泰国经济形势即将好转的预测似乎再次被笼上阴影。

乔治·索罗斯的滑梯

在这次东南亚金融风波中，美国金融投机商乔治·索罗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曾多次发表谈话，指责乔治·索罗斯是这次危机的始作俑者，是他在幕后操纵了这场灾难。马哈蒂尔指责索罗斯，一方面说要维护人权，另一方面却使东南亚经济遭受破坏性的打击。

马哈蒂尔9月20日到香港参加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举办的研讨会，再次抨击外汇投机：“货币买卖是没有必要、不具生产力和不道德的，应该禁止，使之成为非法。我们不需要货币交易。”马哈蒂尔说，买卖货币用于支付国际贸易是正常的，但将货币单纯作为商品来买卖是不可接受的。国际上货币买卖的交

易比商品与服务贸易额多了 20 倍,但有关交易既没有创造就业机会也没有让一般老百姓享用到什么产品或服务,真正获利的只是外汇炒家,他们一年的平均回报率高达 35%,而且,无论指数升降,这些可以通过巨额买卖影响汇率的炒家都是稳操胜券,而他们是通过使穷人变得更穷而赚取盈利的。

马哈蒂尔说,这些亿万富翁其实并不需要更多的钱,但他们却仅仅因为不愿看到发展中国家的繁荣而进行极不道德的破坏,他称,最近外汇投机者对马来西亚货币的打击使“我们倒退了 10 年,”这是对马来西亚市场的“强暴”。

他还说,东南亚一向以为外资是来帮助他们繁荣起来的,现在看来并非如此。当然,马来西亚将会继续鼓励外资进入本国的金融与股票市场,但将分辨诚恳投资者和热线操纵者,对后者绝不欢迎。他说,他相信,部分媒体及别有用心的人并不希望看到东南亚走向繁荣,他们短浅地认为别国的发展会削弱他们的财富。

在回答听众提问时,马哈蒂尔争辩说,世上没有绝对自由的市场,民选政府有权控管市场,因为如果做得不好,选民将会让政府下台,但他们却没办法赶走外来的金融家,他说:“我在这里连他的名字都不能说出来!”

由于这一段时间东南亚金融动荡,马哈蒂尔多次指名或不指名抨击拥有国际量子基金会的乔治·索罗斯,而凑巧的是,索罗斯也到香港出席世行的另一个研讨会,记者有意无意地期待着他们的直接会面,结果使他们失望。

对于马哈蒂尔对外汇交易和发达国家的猛烈抨击,与会的美国财长鲁宾以没有看到讲话词为由拒绝置评。但鲁宾表示,美国乐于看到发展中国家的成功,因为这些国家的繁荣代表了美国有了更大的市场。

9月21日，被马哈蒂尔选作论战对象的乔治·索罗斯，在世界银行年会的另一场名为“朝着全球性开放社会迈进”的研讨会上反唇相讥，称马哈蒂尔是马亚西亚最大的危险。对于马哈蒂尔表示将限制外汇买卖，索罗斯说，这种言论实在太不恰当，根本不值得认真考虑。若他禁止外汇买卖，马来西亚市场将面临灾难性的后果。

索罗斯说，实际上，近两个月来，他并没有参与抛售林吉特，甚至还在买进，可是林吉特仍在急泄，所以，他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能够左右汇市的升降。他还举了一大堆马来西亚的经济数据来支持他对马币下跌原因的看法（这同时也表明他是有备而来），比如，马来西亚近年来借贷扩展太快等等造成了不少问题，马哈蒂尔及其政府当然要为此负责任。而为了掩盖自己的错误，他需要一只替罪羊，而自己当然地被当成了这只羊。

索罗斯说，这次货币动荡应当让人们注意到东南亚固定汇率制、泡沫经济、银行缺乏监管等问题。

索罗斯说，这次东南亚金融动荡还不足以令亚洲奇迹消失，因为亚洲国家的经济很有活力。相信他们在充分吸取教训之后，一定会复原。

索罗斯还在会上向受东南亚金融风波打击的“穷人”表示同情，但强调他不同情马哈蒂尔，因为他是责任人之一。

在谈到港元成为区内唯一维持固定汇率制的货币时，索罗斯说，相信港元不会有什么风波，因为香港拥有庞大的外汇储备。

目前东南亚股市普遍不振，自7月2日以来，泰铢对美元的比值已下降38%以上，印尼盾下降21%，马来西亚林吉特和菲律宾比索分别下降15%。9月22日，马来西亚林吉特兑换美元的汇率跌至有史以来最低水平，究其原因，有人把这归结为马哈蒂尔

的言论。

设在亚洲的戈德曼·萨克斯经济研究公司公布的一份报告中说，预料亚洲货币市场的动荡至少再持续 3 个月，会使这一地区的经济增长放慢。另一家公司的估计更可怕，它预计这个地区的货币动荡要到 1999 年才能结束。

英国威斯敏斯特银行下属的投资银行说，到 1998 年下半年新加坡元、马来西亚林吉特和印尼盾才有可能取得“一定程度的稳定”，但是菲律宾比索和泰铢则分别要等到 1999 年 6~7 月和 1999 年的年底。9 月，泰国议会中的反对党对差瓦立总理提出不信任案，朝野两派对此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虽然 9 月底在议会对不信任案的表决中，差瓦立总理涉险过关，但他的全民支持率降到历史最低点，仅有百分之十几。在泰国老百姓的心目中，总理及其政府难辞其咎，人们的这种心情早晚要反映到议会中来，会直接影响到这届政府的生命力。

第二章

在悲哀的云层下面

台风扫过，十字街头

金融危机像夏季台风一样横扫过整个东南亚，所到之处，一片凄凉。

危机发生后，众多的问题摆到泰国人面前，这时他们才意识到，产生这许多的失误，实在是一种想疯狂致富的心理在作怪。

8月上旬，笔者应泰华总商会之邀访问泰国，正值该国因货币持续动荡而成为国际金融界关注的焦点。在曼谷，道路两旁有不少空旷无人的楼房，还有一些不见人影的建筑工地，我很奇怪，向陪同我的泰华总商会的廖小姐询问，她的回答让我大吃一惊。

随着泰国对外开放的深入，被高利率吸引的外资大批涌入，资本流动的主要方向是房地产和证券行业。由于经济长期高速增长，

给人们一个错误的导引，从上到下都看不到（或不想看到）金融危机随时都可能爆发。房地产开发商认定房价会持续上涨，故不顾各种原材料价格和人工的实际上涨，从银行和金融公司大量借钱，投入到房地产的开发中去。然而，房地产行情并没有像他们所希望的那样，已经建成的房子卖不出去，新的项目还在不断竣工，致使房地产价格下跌。开发商又不愿赔本，房屋价格不可能降到很低，造成了大量闲置。房地产过热的情况，造成房地产项目占银行总贷款比例高达 20% 到 25%，银行坏账数目剧增，银行和金融公司的贷款收不回来，陷入困境之中。

房地产闲置造成资金流通不畅，盲目建设已成为伴随泰国经济增长而不断膨胀的一颗毒瘤。1997 年初泰国经济已经出现过萎缩，其表现为出口锐减，经济增长率由 1995 年的 8.5% 下降到 1996 年的 6.7%，证券市场陷入 18 年来的低谷；政府财政预算出现了 10 年来的首次赤字；房地产开发商无力偿还贷款而使金融机构面临危机，往来账目中呆帐不断增加，全国人心浮动。为此，上任仅 7 个月的总理差瓦立反复声明政府不会用货币贬值来刺激经济。前不久刚刚出任财政部长的坦农·毕达雅也向投资者许诺政府经济政策不会发生大变化。但泰国财政金融方面的种种迹象表明，泰国经济已经处于十字路口，出现大规模经济震荡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果然，在经历了数周的犹豫之后，泰国政府终于做出了使货币贬值的决定。

这一决定所造成的影响尚难以预料。但可以肯定，处于低迷状态的证券市场将出现转机，而欠有巨额外债的众多泰国公司则将经历一段十分难熬的苦日子。目前泰国的公司和个人共负担着 700 亿美元的债务，泰币每贬值 10%，这些债务就会增加 70 亿美元，这种变化使一些银行和房地产开发公司面临着生与死的考验。

仅 7 个月的泰国新政府也同样面临考验。总理差瓦立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带领他的政府接受挑战。其结果不是使他成为英雄便是罪人。

泰国经济的震荡为同一地区的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提供了“泰国模式”的最新版本——泡沫经济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以过热的房地产投资和过度建设为基础的高速经济增长道路在任何情况下都会使一个国家饱偿痛苦。

泰国采取与美元挂钩的汇率制度，造成汇率长期高估，泰铢的币值已无法反映其国际竞争力与经常项目收支，基本经济结构失衡。据后来陪同笔者的昆沙威先生回忆，今年以来，金融当局心理十分矛盾，怕外资一夜逃空，无力作出果断的反应。然而市场无情，日益增多的贸易赤字和不断显现的房地产不景气给投机商们提供了空当，他们的投机活动使泰国金融业在大约 300 多亿美元“不良债权”的重压下苦苦挣扎。中央银行曾融资 156 亿美元试图力挽狂澜，但一投进去就被投机者卷走 40 亿。5 月份的泰铢兑美元汇率曾跌破 10 年来的最低点。7 月 2 日，政府别无选择，宣布实行浮动汇率，泰铢贬值近 2 成。坏消息——昆沙威形容说——如同一场热带暴风雨铺天盖地而来，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笔者抵达曼谷的前一天，政府宣布暂时关闭 42 家有问题的金融机构。自 6 月份以来，已有 50 多家金融公司被暂时关闭。笔者约定采访一位泰国实业家的日程不得不取消，据说他麾下的一家金融公司也在暂停营业名单之中。到一些仍然营业的银行采访，看到银行业务如常，并没有挤兑的人群。据说前一段时间，市面曾风传将发生挤兑风潮，政府为此做了大量工作，中央银行采取多项措施保障 15 家银行和剩下的 33 家金融公司支票和存款的支付。

不过，局势的平稳并不能掩盖所存在的问题，私下里，人们对泰国金融业的各种失误议论纷纷。1995年，泰国人均收入已达2720美元，工资水平高出所有邻国，出口增长高达22.5%。经济增长速度多年保持在8%以上。应该说，经过近10多年的发展，泰国市场经济有了相当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世界银行和多个国际组织看好泰国，把它树为发展中国家实施市场经济取得成功的典范，那为什么会突然间发生这样天地翻转的巨变呢？对此，很多人理解不了。这其中的原因后面将有专章进行讨论，这里只想说一点，泰国的经济发展靠的是出口拉动，基础性产业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甚至不少日用产品也要靠进口，表面看上去很繁荣，其实基础十分脆弱，经不起大规模的波动。泰国经济发展所需资金，多是靠境外资本投入，而资金流向又极不合理，国家经济的大厦建立在沙子之上，一旦外资溃逃，基础被掏空，大厦随时都有可能倒塌。

目前，在首都曼谷市区，一座设计新颖的体育场已经竣工，这里将是1998年亚运会的主会场。泰国金融危机发生后，不少关心亚洲体育发展的人都十分想了解这场金融风波会不会影响到亚运会正常举行。对于这一点，从官方到民间，所有的回答都是肯定的。虽然泰国政府决定将下一年度开支削减50亿到80亿泰铢，但仍准备拨款118亿泰铢扩建廊曼机场，并确定将进一步扩大交通设施建设，以达到能正常举办亚运会的要求。

不过，虽然泰国举国上下有很大的决心，亚运会组织机构仍表示出强烈的担心。最近，亚洲体育联合会主席法赫德亲王致函泰国政府，敦促泰国政府加紧有关设施的建设，如果进展不能令人满意的话，亚洲体育联合会将考虑把亚运会转移到其它国家举行，口气十分严厉。

泰铢贬值以来，泰政府“扶助投资委员会”成立了一个工作组，负责与中央银行、财政部协调，为出口商提供信息和政策扶持。由于泰国与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的出口商品相类似，而且同中国大陆东南沿海地区、越南等国家和地区的出口产品结构也基本相同，因此竞争十分激烈。此次泰币贬值，将直接导致出口产品的价格下调，有可能赢得大量的商业订单。据泰国投资委员会估算，今年下半年，纺织品、鞋、电器等商品的出口将增加10%。政府计划逐步改变出口制品中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产品居多的结构。最近已拨款200亿铢，同时利用世界银行的贷款来改善、减少出口商品成本，提高产品档次。政府还计划对汽车等14类出口工业实行政策扶助，免收8年的法人所得税。被扶持行业技术改造所需进口的设备减收50%的印花税。泰国组装的汽车，在金融动荡中国内销量大减，但出口仍在增加。泰国的陶瓷业基础较好，目前除继续出口日用瓷、建材瓷外，正增加工业瓷、低压电瓷件的生产和出口。

自尊心里面的沉痛反省

这正是“塞翁失马，安知非福”。

我接触到的各阶层人士都普遍表示，他们热爱自己的家园，体谅政府的困难，相信国王和政府能稳定局势，继续保持国泰民安。在巨大的困难和压力面前，泰国人民表现出了相当程度的承受力，泰国改革仍有潜在的生命力。

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后，在世界各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新闻媒体迅速大量地报道来自东南亚的消息；政府官员、国际金融组织的官员、大型企业的领导人，特别是一些专家学者，纷纷发

表谈话，探讨这次金融风波的原因。下面为大家简略介绍一些已经取得共识的观点。

经济学家分析之一：各国货币危机起因不同

困扰泰国的房地产市场等问题，并不是菲律宾的主要忧虑。在菲律宾，房地产项目占银行贷款总额的比例仅为10%。菲律宾经济健康发展，通货膨胀低，出口强劲。那么比索贬值原因何在？据摩根建富银行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姆斯德朗说，这次比索危机起因于菲国中央银行长期以来保卫本国货币的政策，结果导致比索价值偏高。菲律宾过去数年内经济持续改善，外资大量流入，再加上海外菲劳工大量汇款回国，国内美元充斥，比索成为强币，出口商叫苦连天。现在泰铢贬值，比索若不贬值，出口竞争力更加受挫，因此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比索应该做大幅度调整。但菲律宾大量输入美国货物，比索贬值将使货物价格上涨。国家经济发展署的初步计算为每贬值一比索对整年通胀率增加不到1%，由于目前通胀率低于5%，因此全年通胀率仍可维持在一位数字。

与泰菲两国相比，马来西亚经济财政实力更雄厚，过去8年来，经济增长率均在8%以上，外债额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三成，比泰国的近五成低。林吉特贬值的主要原因是利率上升和出口放缓的压力。

印尼经济及公司盈利周期已走出谷底，年初，当局未雨绸缪，已将美元兑印尼盾干预区间放宽到12%，有助于抵御汇率的冲击。经济观察家郭建义认为，最近印尼盾下跌，主要是心理影响造成的。

新加坡元通常是地区金融危机时的避险货币，外汇储备雄厚及金融制度完善，且货币基本上是自由浮动，受炒作的影响不大。

货币危机表面上是国际投机客的大肆炒作所致，但东南亚国

家，特别是泰菲印尼三国确实存在一些与当年墨西哥金融危机相近似的问题，如货币盯住美元、房地产市价低落、经常账目赤字剧增、外汇存底不足，因此特别容易成为投机商攻击的目标。实行浮动汇率，对东南亚国家来说，应该不是坏事。

经济学家分析之二：货币贬值有利有弊

马来西亚工商界普遍认为林吉特贬值不是坏事，檳城中华总商会执行顾问陈国平认为，林吉特贬值可加强出口竞争力，并减少赤字。马来西亚厂家公会北马分会主席李辉建甚至说：如林吉特从 2.48 兑 1 美元滑落至 1.58，价值一亿林吉特的出口货物就可多赚 400 万林吉特。

理论上，一国货币贬值后，就会发生通胀上升、内需压缩，从而经济增长受到抑制。但稍后就有可能苦尽甘来，出口因货币贬值取得相对优势而上升，利率则随货币稳定而下降，经济遂重新获得增长的动力。但这个模式可能不适用泰国和印尼，因为它们背负高额外债，货币贬值则凭空增加了债务，导致情况更加困难。

经济学家分析之三：中央银行联手作策略性干预

对于各国中央银行联手干预市场，稳定本地金融的作法，新加坡国立大学经济统计学高级讲师陆丁表示，今年五月东南亚各国中央银行联手干预捍卫泰铢，现在回头看，“反映出东盟各国的确有一种默契”。他表示，泰国在与国际炒作集团的较量中，化被动为主动，通过和新加坡、香港、马来西亚的银行联手干预泰铢，成功击退国际炒作集团。事后泰国政府采取积极措施，实施浮动汇率。这是东盟各国中央银行合作默契的突出例子，新加坡则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起了“救火队”的作用。陆丁说：顺应汇率长期走势，作短期策略性干预，应该是未来较好的作法。

国际投机商这次在东南亚获利后，是否会挟大量获利资金再

转战东亚市场，如香港、台湾或韩国？汇兴银行已警告说，这三处都免不了受到影响。最近在上海举行的东亚及太平洋中央银行年会，主要议程就是讨论东南亚货币危机问题以及如何稳定货币，这当然是危机出现后的防御之道。

大参考：当年的英镑风波和墨西哥金融危机

1992年，德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呈强势，马克日趋坚挺。这一年中，国际金融市场突起抛售英镑的狂潮，英镑面临贬值的压力。这背后的主要操纵者就是这次东南亚危机的始作俑者乔治·索罗斯。当时英国是欧洲货币汇率机制的参加国，必须使英镑与德国马克的汇价保持在一定范围，因此，英国展开了英镑保卫战。首先，英国动用外汇储备回购英镑，然而，几十亿美元外汇投入国际金融之海，连个响都没有就沉下去了，根本挡不住抛售英镑的狂潮。其次，英国大幅度提高英镑存款利率，从1.5%到5%地狂涨，这几乎是一种经济自杀行为，索罗斯等金融投机家们不动声色，暗自得意。在金融风波的几十天中，英镑对美元的汇率被迫追随德国马克一路狂飚，从1:1.7，1:1.8，1:1.9，上升不已，最后几乎达到1英镑兑换2美元的高位。在这场金融风波的最后一天，最富戏剧性，上午，英国宣布将英镑存款利率提高50%，下午，又宣布取消一切提高利率的措施，退出欧洲货币汇率机制，英镑对美元汇率跌至1:1.5左右。至此，英镑保卫战宣告失败，其背后，大约是一场几家欢喜几家愁的悲喜剧。国际金融投机家们得陇望蜀，转手进攻法郎，法国大为恐慌，拉上德国一起反击，两国一起又是发声明，又是调头寸，总算把一起欲起风波消弭于无形。

1994年底，墨西哥爆发了一场以货币大幅度贬值、股市狂跌、

外汇储备急剧下降，外资出逃加剧等现象为特征的金融危机。这一年恰好先后发生恰帕斯农民起义，执政党两位领导人遇害和美国提高银行利率等突发事件，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十分紧张，促使证券投资者一年之内从墨西哥抽走了 180 亿美元的资金，资本外逃造成外汇储备急剧下降。这一事件的影响迅速外延，在拉美地区引起了极大的恐慌，美国政府为了保持“后院”的稳定，巩固自己在这块大陆的影响，单独提供了 600 亿美元的金融援助给墨西哥政府，用以摆平局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组织了相应的救援行动。当年墨西哥的局面比东南亚危急得多，墨西哥政府的外债总额有 1600 亿美元之巨，金融危机发生后，整个国家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墨西哥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大致有如下几点：

1. 墨西哥在发展本国经济时，忽视了本国资本的开发和积累。危机爆发之前墨西哥的国内储蓄率只有 15% 左右，大大低于亚洲国家 34% 的水平。储蓄率低下是墨西哥等拉美国家的老问题。在此情况下，墨西哥没有采取适当政策和措施，鼓励居民储蓄，开发本国资本，而片面追求外国资本，单一地依赖外资来弥补国内储蓄的不足。墨西哥的做法违背了发展中国家在为发展本国经济筹集资本时，要以本国资本为主，外资为辅的基本原则，这种过分依赖外资的观念，引发了外资利用问题上的一系列失误。

2. 对投资方式不加区别，以致证券投资等间接投资的比重过高，直接投资所占份额很小。1994 年投入墨西哥的外资总额中，证券投资占 80% 左右，主要用于购买墨西哥的证券和股票，一部分用于购买墨西哥政府发行的国库债券。这种投资一般并不形成新的生产能力，具有鲜明的投机性，一旦受资国的政治、经济形势恶化，或者国外金融市场的回报率攀升，这种资本就可能在短期内外逃。因此，对于受资国来说，这是一种风险极强的资本。墨

西哥实行本国货币自由兑换制度，以外汇储备支撑本国货币，吸收证券投资所得外汇又是国家外汇储备的重要组成部分，发行国库债券所得外汇又主要用于弥补财政赤字和国际收支逆差。这样，墨西哥的外汇储备很不稳定，本国货币比索的地位也就极为脆弱。1994 墨西哥比索受到贬值的巨大压力，而比索的大幅度贬值又引起证券投资者的恐慌，加紧抽逃资本，从而形成恶性循环。墨西哥的经历表明，发展中国家在吸引外国投资时，要严格区别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应把外资引向直接投资。目前，全球有高达数千亿美元的游资，为追逐高额利润，它们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横冲直撞，破坏力极强。因此，对于利用这部分游资，发展中国家要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要充分考虑它们对本国经济可能造成的损害和本国金融市场承受冲击的能力，缓慢而逐步地对外国资本开放本国的证券市场，避免重蹈墨西哥的覆辙。

3. 对外国直接投资也要加以引导。进入墨西哥的外国直接投资，大部分投入了商业、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投入制造业的外国资本，又大都用于开办来料加工、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企业，投入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很少，更不必说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业了。劳动密集型的外资企业，固然可以创造就业机会，提高这些部门的生产效率和管理水平，并可增加出口收入，但它们对于提高受资国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所能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正由于此，作为拉美国家吸收外资最多的墨西哥，不仅经济发展水平并没有明显提高，经济增长率也始终处在 3% 以下的水平。这一切表明，即使是外国直接投资，它们对受资国经济发展所能发挥的作用也是很不相同的。因此，发展中国家在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时，也应该根据本国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所提出的不同需要，采取明确的产业导向政策，以便把外资引向本国经济发展

急需、适合本国资源人才等条件的产业部门，特别是逐步地把外国直接投资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引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业。

第三章

大国风范： 中国融资援助泰国

背景：走出家门的中国

近年来，我国金融业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在华外资金融机构的数量和种类迅速增加，业务规模也逐步扩大。外资金融机构已经成为我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1979年，日本输出入银行设立北京代表处，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家进入我国市场的外资金融机构。此后十余年中，我国金融开放区域不断扩大，并逐渐向内地推进。据统计，目前海南省及北京、上海等23个大中城市已有外资金融机构进入。到今年上半年，在华外资金融机构已达540家，其中外资营业性金融机构162

家。据介绍，在华外资金融机构积极参与我国基础设施建设和国有大中型企业生产的融资，项目涉及能源、钢铁、通讯、汽车、石化等行业，并多次参加重大工程银团贷款。在外资金融机构中，外资银行的发展尤为引人注目。截止到今年6月底，在华外资银行总资产达到329.6亿美元。由于其客户主要是经营业绩较好的三资企业，不少外资银行开业1至2年就开始盈利。

去年底，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了首批获准在上海浦东进行人民币业务试点的外资银行名单，这标志着我国金融业进入了“实质性对外开放”的新阶段。目前，花旗银行上海分行等7家外资银行已开始经营人民币业务。

针对东南亚货币风波的冲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明确表示，中国不会出现类似的危机。戴相龙强调，我国在引进外资的数量和结构上是合理的。据统计，目前我国利用外资为3200亿美元，其中外商投资2000亿美元，国际融资1200亿美元。前者有64%是外商直接投资，后者88%是长期资金。他认为，一定要防止外债过多、过分依赖外债，特别要注意防止房地产、股票上的泡沫经济。他对亚洲国家经济稳定发展充满信心。

戴相龙说，中国人民银行从东南亚货币风波中得到启示，一定要继续执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使通货膨胀率控制在5%左右，经济增长不要过高。他认为，货币的稳定首先决定于国家经济发展的平衡，决定于汇率制度的更加合理，同时有防范投机风险的能力。

针对东南亚国家货币贬值后有利于出口这一问题，戴相龙说，尽管对中国来讲增加了竞争力，但是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在出口的地区与品种上并不完全相同，因此影响不会太大。他预计中国外贸出口下半年会继续保持顺差，外汇储备继续增加。

中国参加援助泰国这一举措，引起了海内外舆论的纷纷评论。

温暖的形象：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8月15日，香港《虎报》。标题：这笔钱很有发言权。

香港决定出资10亿美元参加一项国际一揽子计划，以帮助泰国克服其现存的金融危机。现在中国也照着做了。

中国的决策者们这一最新举措可以被看作一个迹象，表明中国准备负责地对待该地区的问题。

香港也因此而很受鼓舞。既然中国准备以这种方式帮助泰国，那么如果我们陷入金融困境，它肯定也会援助香港。

怀疑论者迫不及待地指出，中国的动机并非完全是利他主义的。他们是对的。这一地区的各国经济若出现动荡，则中国在贸易、采购和投资可能性等方面都肯定会受到不利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的确可以说，中国帮助泰国稳定其货币，就是在帮助自己。

还有政治方面的考虑。对中国富裕程度的不断提高和武力的日益增强，该地区的一些国家以惊恐的心情加以看待。除了显示中国富强了并不一定会成为一个潜在的敌人外，还有什么更好的方式来减轻这种恐惧呢？

现在，香港和祖国大陆携手帮助该地区国家应付对其货币的投机性侵袭。

8月15日，法新社，北京。标题：中国成为地区金融大国。

分析家们说，中国参加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资助的营救泰国的一揽子计划，这标志着该国已成为亚太经济中一个成熟的金融

大国。

这是中国第一次参加一项多边的金融营救工作。一个国际金融组织驻北京的代表说：“中国当然没有仓促作出这一决定。但它深知，要想成为不可忽略的地区金融大国，就必须参加这样的工作。”

他说：“这并不等于中国宣称自己变成了经济上的超级大国。但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表明北京想要参加并占据作为一个地区大国所应得的一席之地。”

他还说，北京的这一决策还可能使它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努力更为顺利。

8月15日，《亚洲华尔街日报》。标题：中国向泰国提供10亿美元紧急援助。

内容说，中国昨天公开宣布了一项向泰国陷入困境的金融系统提供10亿美元紧急援助的计划，分析家们和经济学家们说，这一承诺给中国带来的是“得多失少”。

此举不仅使中国完全有资格在地区事务中以主角的面貌出现，而且还可以通过首次参与对一个外部国家的救援计划来捍卫自身的利益。

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靠出口的增长，但是，其邻国出现的货币贬值和混乱将削弱中国在出口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分析家们说，拥有1200多亿美元外汇储备、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国完全有能力提供10亿美元紧急援助。

香港一家公司的分析家西尔说：“我认为他们与东南亚地区中央银行的合作将对他们十分有利。”

分析家们说，中国的外汇储备并没有受到地区货币不稳的影

响，它总的经济状况比大多数国家都好。

一位驻北京的外交官说，中国通过帮助泰国可能指望泰国支持它采取逐步和谨慎地开放中国经济的政策。在谈判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过程中，有的国家指责中国只想加入后得到好处，而不愿意承担义务。中国这次破例与其他国家一起参加对泰国的紧急援助计划是想消除人们的这种疑虑。

8月15日，美联社，北京。标题：中国决定为泰国陷入困境的财政系统提供10亿美元的紧急援助。

此举不仅反映了中国在亚洲的地位日益提高，而且反映了它有能力应付地区市场出现的不稳定局面。这是人们所知的北京首次参加对一个非共产党国家的一揽子救援计划。中国通过与其它亚洲国家一道参加本周早些时候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撮合的一揽子紧急援助计划，标志着自己已经享有该地区重要大国的地位。由于在今年7月底，中国的外汇储备已达1260亿美元，因此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完全能承担10亿美元的支出。

一位西方经济学家说，中国保证提供的金额之大，反映了其最近强有力的经济增长、巨额外汇储备和经济的庞大。这位经济学家说：“一些人感到奇怪：该地区最穷的国家之一为什么也要捐款。但是我认为，这的确表明中国经济大国的角色。”

第四章

共度难关

政府的决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泰国提供了 168 亿美元的紧急援助之后，对泰国的金融、经济也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为此，泰国政府经过研究，通过了一系列强硬措施对经济进行整顿，这些措施包括勒令 42 家金融公司暂停营业，提高增值税以及执行更严格的货币和财政政策。

加上 6 月底停业的 16 家，泰国停业整顿的金融公司已经达到了 58 家，占金融公司总数（91 家）的一半多。这 42 家金融公司均向中央银行借贷大量资金，它们的停业可以减轻政府帮助其解决清算问题的负担。据透露，金融公司从中央银行的金融机构发展基金贷款的金额约为 4300 亿铢（139 亿美元）。

泰国政府还表示要将年通货膨胀率控制在8%~9%左右,并希望未来两年内的GDP增长率能保持在3%~4%左右。政府还计划今年将经常项目赤字削减到GDP的5%,明年再减到3%,1996年的数字是8%。在从10月份开始的新财政年度里,增值税将从7%提高到10%。另外,外汇储备将保持在250亿美元以上。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总裁康德苏对泰国政府的经济整改措施表示赞赏,并表示相信泰国会在国际上得到支持。康德苏说,对于陷入困境的金融公司进行整顿尤为重要,因为这将为重建健康的金融业打下基础。他希望这些措施能对亚洲金融市场的稳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另外,泰国总理差瓦立在同一天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泰国经济到1999年可望恢复元气。他说,为稳定经济,泰国需要大概150亿美元的贷款。

据报道,泰国中央银行对外公布了它将严格规定“呆帐贷款”的范围,促使各金融机构采取措施对付有严重问题的贷款,以免进一步加重金融机构的负担。

从明年1月1日起,泰国中央银行将要求商业银行和金融公司归类整理出完全呆账:即贷款方已停止支付利息达6个月以上者(原先规定的期限为12个月)。

泰国中央银行金融机构监察部负责人察拉柴先生说:“这个措施将更好地反映我们金融体制中的贷款问题”,它也将促使金融机构意识到问题,并尽早采取措施防止问题进一步恶化。”

分析家们认为泰国目前经济危机是由于呆账贷款迅猛增长造成的。据估计,其呆账贷款占整个金融体系贷款的20%。泰国中央银行今年花了5000亿泰铢(相当于149亿美元)来支持一些困难的金融机构。分析家批评了泰国中央银行的宽松的法规,认为它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呆账贷款问题的滋生。

察拉柴说泰国中央银行亦承认原来的呆账贷款归类系统存在以上弱点，中央银行正在考虑采取其他纠正措施，包括更强硬的政策。他说：“我们正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商如何加强呆账贷款管理的措施要求。我们希望我们的措施更明确、更透明，并与国际惯例接轨。”这位负责人还公布，泰中央银行还将要求目前运行但存在问题的金融机构，包括 33 家金融公司和 13 家商业银行确保能够处理其正在日益增多的坏账贷款。中央银行将根据以下情况决定各金融机构增加的资金投入：中央银行将调查各金融机构的资金平衡表、呆账贷款、投资于股票市场的资金额以及来年经济预算。中央银行称：“我们将逐个调查，如果我们认为哪家机构的金融状况不足以帮助其自身应付经济环境变化，我们将要求它们增加资金投入。”

与此同时，泰国中央银行又向在其国内经营的 21 家外国银行发出了提供紧急信贷帮助的呼吁。泰中央银行是作为政府的发言人提出这一要求的。

大东盟

业界人士认为，“这将存在一些问题”，因为“外国银行提供的紧急信贷将提供给泰国中央银行去资助那些有问题的金融机构。”

如果外国银行接受泰国政府的请求，这些外国银行将与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起的拯救泰国经济的国际性援助配合工作。泰中央银行对外国银行说，外行的信贷将作为流动资金注入泰金融机构顶替被抽逃部分，而且信贷将得到泰国政府的担保。泰国的大银行也被请求对缺乏资金的小型银行提供帮助。

泰国金融机构的关闭受到了一些经济学家的肯定,认为是使泰国经济回到正常轨道上的决定性的一步。但他们认为,对泰国政府来说,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关闭一批金融机构也使泰国一下发了懵,许多私人和公司的钱存在这些机构中。据泰中央银行分析,这些个人及机构恐怕要等上6个月到5年的时间才可能把他们的钱收回去。

在加紧与国际金融机构合作的同时,泰国政府也加紧了在广大人民中间的宣传解释和鼓动工作。据说泰国政府派专人到下面各府,向各府领导人通报目前泰国的政治经济和金融情况,解释政府目前所采取的政策,希望得到地方领导人的理解和支持。

泰国的电视台和电台都开辟了专门的时间请金融专家来讲解目前泰国所面临的困难和希望,鼓励全国人民动员起来,振奋精神,积极工作,共度难关。

在一些专家的建议下,泰国政府成立了“金融检讨委员会”,附属于泰国中央银行,聘请各方面的专家学者讨论应对目前金融危机的办法,并认真分析批判以往金融方面的失误。

另外,泰国政府还联络东南亚各国,在已有的联络热线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些更快速的联络手段,专门用于各国金融机构之间商讨应对目前金融危机的政策之用,这方面由新加坡组织实施,并担任小组主席。

此外,据可靠消息,东盟国家领导人之间的热线电话不断,任何一个国家的国家性决策显然也经过了各成员国的充分讨论。而且,东盟常设机构的工作人员经常保持着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要邻国如中国、日本、韩国等国家中央银行的联系,及时通报情况,争取协调有关行动。

东盟国家在这次危机中一致行动的决心,给了发展中国家极

大的启示。法国《论坛报》1997年11月6日发表文章,介绍了“十五国”集团在这方面的情况。

15国集团想要对“货币投机”所得的利润征税。虽然现在只是处于动口不动手的阶段,但发展中国家希望这能够引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社会的重视。这些国家想要对付今年夏天曾在东南亚引发一场金融动荡的货币投机活动。15国集团第七次首脑会议要求建立一种市场调节机制,以对付国际性的投机活动。

此次首脑会议决定,15国集团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将于12月初在吉隆坡召开会议,起草有关汇兑市场调节机制的计划。首脑会议主席、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在记者招待会上说:“所有的贸易活动都有自己的规章制度和相应的法律。然而,出于种种原因,北方国家一直不愿制订有关外汇交易的规章制度。”

15国集团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将于12月1日至2日在吉隆坡召开。会议起草的计划将提交给各国政府首脑,然后再转交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有关委员会。

15国集团还将向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机构采取类似的行动。马哈蒂尔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能不能落实这些规章制度是另外一回事,但我们应当提出我们的要求。”他认为,外汇交易规章的制订并不会吓退投机者,就像股票交易有规章而炒股的人同样很多一样。

其实,马哈蒂尔所说的“北方国家”也同样在寻找对付类似危机的解决办法,日美两国为了平息亚洲市场的混乱,开始就如下问题进行最后的意见调整:创建向面临货币危机的国家协调提供资金的新的紧急贷款制度

日本等国家所提出的旨在对付货币危机的常设基金问题将被

搁置。提供紧急贷款将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挂钩，该制度将起补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职能的作用。在加强监视该地区的经济动向的同时，日美等 12 个国家和地区的财政部长的代表将于 11 月中旬在马尼拉举行的会议上抓紧研究。

总之，泰国政府以及整个东南亚国家的政府机构在这次金融危机中高速运转，各国之间协调动作，显示了东盟国家的团结和齐心，这对东盟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形象也是一个很好的宣传。

从犹太人到美国人

第一部

少年时代,乔治·索罗斯体味最深的两种痛苦:一是体弱多病,病痛使他深深地感觉到人是有罪才来到世上受惩罚的。二是犹太人血统带来的精神上的压抑和颠簸动荡的生活方式。

卡尔·波普尔的出现改变了乔治·索罗斯的命运,使他从一心想成为一名哲学家的梦想中走出来,走向现实和金钱。

第一章

犹太血统、 哲学以及金钱

两种最深切的痛苦

1930年，乔治·索罗斯出生在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一个犹太人家庭，因早产险些没有来到世上的小乔治似乎对未来的苦难生活有一种先天的预知，他呼吸困难地趴在母亲怀中没有发出一声啼哭。当时，整个欧洲并不知道一个从“潘多拉盒子”跑出来的孩子已来到人间。几十年后，从欧洲到美洲，再到亚洲，这个险些夭折的婴儿不可思议地成长为一名几乎让全世界金融界感到“呼吸困难”的“货币狙击手”。无论是1992年英格兰银行含恨退出欧洲货币机制，还是1997年东南亚金融大危机，这个犹太人后裔似乎已将全

世界金融业玩于股掌之上，在成千上万人对其恨之入骨时，乔治·索罗斯一边大把大把地把钱花在慈善事业上，一边微笑着向世人表示：“我不过是个没有实现当哲学家抱负的人。”

少年时代，乔治·索罗斯体味最深的两种痛苦，一是体弱多病，病痛使他深深地感觉到人是有罪才来到世上受惩罚的；二是犹太人血统带来的精神上的压抑和颠簸动荡的生活方式。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在德国纳粹的种族灭绝政策下，后一种痛苦在小乔治内心所打下的深深烙印，是一生都难以抹去的。

在德国纳粹的种族灭绝政策的阴影下，小乔治几次险些丧命，他想不清自己的血液究竟与其他人的血液有什么不同，犹太人的血统为什么在人类血统中如此特殊，为什么必须在这世界上消失。即使在他成年以后，在他成为威震全球的大富翁后，这个问题对他的困扰依旧清晰可见。在他慷慨解囊的大批慈善事业中，只有一件事，索罗斯一个美分都不会花，那就是有关犹太人的项目。“我保持中立。”这个饱受纳粹蹂躏的犹太人对今天急需帮助的各国犹太人如是说。他像当年不愿向别人提起自己的犹太血统一样，在今天，他回避所有有关犹太人的项目。

颠沛流离、朝夕不保的生活促使威廉·索罗斯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的儿子在战火中生存下去，在东躲西藏的逃亡中，小乔治用他哲学家的小脑瓜对神发出了思考，引导众生的基督教与周围残酷的社会现实在小乔治的内心错位。他利用整整一个春天的时间，详细地学习并思考了《圣经》。这部西方文化源头的经典在他内心的烙印远远比不上社会给他打下的深深烙印。

1947年，乔治全家获准移居英国。晨雾弥漫的伦敦城并不知道未来英格兰货币危机的肇事者当初仅仅是想当个哲学家，如果时间确实可以逆转的话，英伦半岛会倾尽全力让一个梦想成为哲

学家的年轻人当上名副其实的哲学家，因为英国可以在几十年以后避免一场灾难性的经济危机。

17岁的乔治·索罗斯最初想上牛津大学哲学系去实现自己的理想，但遭到父亲威廉·索罗斯的极力反对，饱经沧桑的威廉·索罗斯虽然很欣赏小乔治的哲学头脑，但他不希望儿子一生都沉迷于那些枯燥浮渺的哲学思考，他只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在战后的废墟生活中过一种平静幸福的生活，在精力允许的情况下，再去挣一些钱。小乔治遵循了父亲的意愿选择了伦敦经济学院学习。从内心而言，他并没有放弃哲学，他只是不想让父亲伤心。战乱中，父亲为他的生存耗尽心力，举家移居英国以后，父亲整日更是为衣食奔忙，他渐渐长大成人，应该为父亲分担一份生活的重担。他坚信，学院以外产生的哲学家才会是对人类做出真正贡献的哲学家。

同年年底，乔治·索罗斯正式进入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学习。

在学院的前两年，乔治·索罗斯的时间大部分埋在图书馆里研读历史上伟大哲学家的著作，而经济学院必修的各门经济课程，乔治·索罗斯置于一边不闻不问，偶尔去听一次课也是在哲学思考上受阻后的一次消遣。乔治·索罗斯系统而又谨慎地审视了许多伟大哲学家的哲学体系，深刻地思考了许多历史、政治、社会以及自身的问题。让乔治·索罗斯迷茫的是，随着思考的深入，随着阅读的扩大，自己所要找寻的答案越来越渺茫。在许许多个痛苦的不眠之夜后，乔治·索罗斯萌发了放弃哲学的想法，他想把自己的精力放在改变自身现实和周围现实上。哲学是永恒的，而现实对有限的生命而言也是永恒的。拥有现实永恒的权力比拥有单纯的永恒权力更有意义，就在索罗斯在现实和哲学之间徘徊时，他知道了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

一盏灯：卡尔·波普尔

卡尔·波普尔的哲学理论对乔治·索罗斯产生了巨大影响。卡尔·波普尔所著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犹如暗夜中的一盏灯照亮了索罗斯茫然的内心。从幼年到青年，纳粹专制的阴影遮挡住索罗斯犹太人的内心。《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为索罗斯向世界专制政权宣战提供了合适的理论依据。当时的索罗斯没有任何能力向世界上任何一种专制政权反抗，唯一能反抗和冲破的便是自己的内心。正是卡尔·波普尔的影响，使乔治·索罗斯深刻地认识到要想反抗就需要力量，而思想的力量在现实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只有真正的权力才会对冷酷的现实发挥巨大的作用。

乔治·索罗斯准备离开哲学去从政，但从政对索罗斯而言比登天还难，他仅仅是一个从匈牙利移民英国的犹太人后裔，仅仅是一名伦敦经济学院的未毕业学生，以如此轻贱的身份如何踏进战后英国的政界？乔治·索罗斯在对自身状况进行客观冷静的分析后，思维不能不集中到金钱这个点上。战后的英国满目伤痕，百废待兴，经济处在完全萧条时期，有萧条必然有繁荣，如果自己白手起家干，拼上一二十年，如果上帝怜悯他所遭受的苦难，他一旦拥有了财富，便会以自己的意志来左右这个世界，当时，这个面孔白皙，时常眼含忧郁之色的伦敦经济学院未毕业生在自己的幻想中并没有想到自己当初所想的在若干年后会一一转变成现实。几十年后，乔治·索罗斯以自己的亿万财富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反抗他所认为不合理的政治体制，而且是单枪匹马，以一个人的财力来瓦解一个国家的经济。对于经济政治一体的现代社会，经济危机意味着政治的瓦解。乔治·所索斯以自己的亿万财富已获

得了支配某些国家命运的权力。当时的乔治·索罗斯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在若干年不仅会指责捷克总理瓦茨拉夫·克劳斯是最糟的西方民主制度的化身，而且学会谴责东盟接纳实行独裁政治的缅甸为成员国。这些指责和谴责仅仅是他金钱强化成权力现实中的一部分，对当今的乔治·索罗斯而言，最重要的一部分是，只要他，不论在世界何地，一旦发出声音，全世界不得不谛听。

卡尔·波普尔的出现改变了乔治·索罗斯的命运，使他从一心想成为一名伟大的哲学家的梦想中走出来，走向现实和金钱。卡尔·波普尔的影响还不仅仅是这些，重要的是他使乔治·索罗斯在走向金钱以至最后拥有金钱的时候，也没放弃成为一名哲学家的理想。正因为他最初的哲学志向，才使他在登上人类金钱辉煌宝座的同时，还能对全球化问题发表逻辑性极强的长篇大论。后来，当年教过索罗斯的斯密斯克先生回忆说，在当年伦敦经济学院上课时，他忘不了乔治·索罗斯安安静静地坐在下边，用忧郁的眼睛专注地望着他，那种目光似乎要把他经年累月所思考出的智慧之果一一占为己有。

斯密斯克记忆最深的一次是一天下课后，他走在经济学院的林荫道上，乔治·索罗斯上气不接下气地追赶上来，劈头就问他：“你对犹太人血统怎么想？”教授望着眼前面孔白皙，向他投出殷切盼望目光的索罗斯，不知该如何是好，因为他从他的目光中看出他不是在用理智发问，而是在用情感发问，而哲学是最忌情感渗入的。教授最后还是用一种平淡的声音说：“那是一个不幸的民族。”乔治·索罗斯淡淡地回答：“是吗？”接着他便岔开了话题，问波普尔对金钱，对政治怎么看。教授一一做了回答，但他从他的目光中已经看出，这些回答于他是没有多少影响的，这个下巴方方，眼含忧郁的青年在向他发问之时，似乎已把这个问题思考

过若干遍了，他不是一个从他身上想寻求答案的人，而是一个想急切寻找一种参照系来验证自己思维结果是否正确的人。教授那时就得出结论：乔治·索罗斯是一个善于独立独行的人，一个认定自己思考为上帝的人，一个一旦从参照系中发现上帝错了时，会立刻杀了上帝的人。正是这些结论预示了乔治·索罗斯以后会在金融领域叱咤风云时胜也为王，败也为王的思想内核。

在经济学院的最后两年中，乔治·索罗斯调整了自己的学习方向，他废寝忘食地研究有关经济学的书籍以弥补前两年钻研哲学所造成的经济学课的损失，他偶尔也读读哲学书，不过这次是为了消遣在经济学领域思考所带来的阻碍。在这一时期，他还积极地关心政治，他关心政治的方式是密切关注每一天的世界新闻，并深入系统的分析。乔治·索罗斯在大学养成的这一习惯以后伴随他终生，使他在动荡的世界局势中能敏锐地觉察出国家的决策，使他能更早地采取行动，使自己能够赚得可观利润。后来被报界所称道的索罗斯对股市与国家政治的直觉与这一习惯是不可分割的。

乔治·索罗斯在大学期间还加入了学生自发的政治小组。在小组中对时事政治进行热烈讨论时，乔治·索罗斯会一反他平日的沉默寡言，他抨击最厉害的就是独裁政体的暴政，他认为暴政下的一切是不人道的，是扼杀鲜活生命的刽子手，不论这种政治存在多久，有多合理，只要他扼杀每一个正常的生命。不论是犹太人血统，还是其他血统，只要这种政治含有一种强权毁灭性，那这种政治就应该消失。乔治·索罗斯慷慨激昂的陈词给当年政治小组的成员留下深刻印象，几乎所有成员都认为乔治·索罗斯大学毕业后会步入政界并会成为一名杰出政客。事实上，当乔治·索罗斯走出大学后，他已是一名未来的政客，不过这名政客是一

名披着金钱外衣的政客，是通过金钱这只黑手幕后操纵政治的“隐身人”。

乔治·索罗斯在大学的最后一年对股票产生了浓厚兴趣。这是一种必然，凡在经济学院学习的学生没有不接触股票原理的，乔治·索罗斯在经济学院算是那一批学生中最晚接触的一个，当时的许多经济学院学生已经尝试了投资。虽是最晚的一个，但乔治·索罗斯爆发了最大的热情，他不仅刻苦钻研股票的有关知识，而且迅速地转入实践。当时，他身无分文，根本无法炒股，但他每月仍抽出时间兴冲冲地跑到股票交易所，目不转睛地盯着报价屏，关注那些对他有诱惑力的股票的涨落，因为他知道那些股票意味着无穷无尽的金钱。回到学校，乔治·索罗斯常常动手画股价K线图，观察它的涨跌态势。由于乔治·索罗斯头脑中哲学思想的根深蒂固，他不相信在股民传来传去似乎已成真理的股市原则，他相信靠自己头脑思考，自己眼睛发现的投资诀窍才是唯一的真理。乔治·索罗斯梦想有机会能不顾一切地冲入股市，他认为那是世上最容易赚钱的一种投资。胜败完全在于你自己的头脑。你自己的未来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不是在上帝眼中。

喜欢古典音乐的姑娘

1952年，乔治·索罗斯取得了伦敦经济学院的文凭。毕业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找工作，找了几家公司后，都觉得不太适合。乔治·索罗斯毕业后所设计的一项自身事业，便是冲入股市不使自己所学变成纸上谈兵，而要变成源源不断的金钱。但毕业后的求职使索罗斯认识到自己的想法是如此幼稚，以自己在经济学院所学的有限知识冲入股市是不现实的，自己应该真真正正坐下来，踏

踏实实地学一些知识和经验，以便自己更具有真正的能力。

乔治·索罗斯最后选中了胜家公司，在公司中从事国际股票套利工作。详细计算附有认股权证的债券和股票之间的相对价值，从中找出“内部套利”的机会，并按不同组合项目分别操作。乔治·索罗斯正是从这最基本最精微的计算，从底层工作做起，使他渐渐认识了市场中形形色色的可能性。诸多的可能性并没有导致索罗斯头脑的混乱，相反，通过精微的计算使其能够在众多可能性中找出唯一可能性。在这最底层的工作中，索罗斯还学会了从债券和股票之间的相对价值中得到对其证券价值的客观评判，这种客观评判准确与否，将直接影响操作。这种类似简单的连贯性实际上要求投资者必须客观冷静地做好前期分析工作。如果不能客观地得出准确判断，一旦操作起来，自己必会成为自身的掘墓人。

正当乔治·索罗斯在胜家公司日复一日地计算附有认股权下的债券和股票之间的相对价值时，远在纽约的华尔街股市在经历大危机后，面对未来，不知还会有不会有第二轮灾难降临，所有的华尔街股界人士都忧心忡忡地握着手中的金钱等待着机会杀入股市，在面对道·琼斯指数每年都在某个时刻跌到 200 点以下的残酷事实面前，所有华尔街股界人士都闻到了股票市场上的血腥味道。有趣的是远在伦敦的乔治·索罗斯面对这一切确能心安理得地沉浸在计算之中，他犹如一个正在学走步的孩子，面对众多飞跑起来的孩子，他仍能够从从容容地练习一步一步地走，没有丝毫波澜影响到他的静如止水的心态。正是这种静如止水，选中目标，一往无前的精神决定了乔治·索罗斯未来的命运。当时的华尔街并不知道自己在 1956 年接纳一位匈牙利的犹太人后裔，这个其貌不扬的青年人若干年后在华尔街打个喷嚏，整个华尔街都

要抖上一抖。

乔治·索罗斯在胜家公司工作期间与喜爱古典音乐的姑娘多纳斯利斯恋爱并结婚。多纳斯利斯性情斯文素雅，贤淑端庄，有一种大家闺秀的气质，乔治·索罗斯娶她为妻自然是人生里程一个新的开始，多纳斯利斯偶尔也过问一下乔治·索罗斯的计算工作，她对股票生意不感兴趣，她感兴趣的是当乔治·索罗斯走进胜家公司时必须穿的是她亲手浆洗过的衣服。

1956年，在胜家公司已经工作了几年的乔治·索罗斯觉得自己可以开始新工作后，便携妻前往美国，开始了他进入华尔街的生涯。他与妻子住在小格林威治村，不久便开始在梅尔公司工作，后又到韦第姆公司工作，在两家公司工作期间，他开始卖欧洲证券。乔治·索罗斯卖的是一种普通的没有多少吸引力的欧洲证券，做为一名年轻的销售商，索罗斯的独到之处得力于他在胜家公司工作期间培养起来的分析能力，他从多角度、多方位分析了要销售的欧洲证券，并给顾客以坚实的理论依据指出这种证券的发展前景，索罗斯的努力赢得了一些顾客，但更多的顾客更愿相信自己的脑袋，而不愿相信他精确的分析。由于大危机的恐惧阴影，很多顾客在用眼睛看过，用脑袋思考过后，仍旧谨慎地把钱留在腰包里，索罗斯辛勤努力仍成绩平平，但他依旧信心百倍地工作下去。

这样连续做了几年后，乔治·索罗斯进一步掌握了股市的各种知识并积累下相当多的经验。1963年，乔治·索罗斯跳槽到亚诺公司担任证券分析师，开始了他新一轮的股市生涯。

在亚诺公司工作期间，乔治·索罗斯坚持他一贯独立思考的能力，他相信最好的投资往往是在那些最少人了解，最不被人所知的地方。他的任务就是把这些证券推到投资者面前，让他们尽

早获利。乔治·索罗斯的这些见解与公司其他证券分析师往往意见不一致，但索罗斯坚持己见，因为他相信，一位全能的证券分析师，坚持成功的投资方法就是要比其他人的探讨得更深，并且随时随地检查自己的成果。他鼓励投资者决定投资后，就不要后悔，重要的是保持平静的心态和坚强的意志。他对证券进行分析时，侧重于公司总体业绩下各分公司的经营情况。他强调投资者要把钱投入一些成长中的公司。因为成长是一个公司的重要特性，成长股是投资组合最大的单一股。成长中的公司容易形成有利的买卖机会，投资者很容易赚得可观利润。怎样选择好的投资对象？乔治·索罗斯认为，找寻低本益比的股票，股票市盈率在8~18%之间，销售获利率为9%。另外，公司必须有强大而合理的事业特许。乔治·索罗斯忠告投资者，不要选择最热门产业中最热门股，这种股票特别受到投资人注目，而且人们争相购买，最后定会崩盘。他列举一些热门产业，比如石油、钢铁、食品等，而且，高成长率如同磁源吸引着更多竞争者，使热门公司投下大笔资金扩充规模为的是保证市场占有率。这样一来，毛利率剧跌，公司陷入财务危机，再者，由于这些公司是投资专家与投机客追逐的对象，因此，股价就会下落。

股票的买卖除了对象的选择之外，还有时机的选择。相比较来看，可以说后者的把握较前者更为关键和微妙。因为一般来说，除了极个别的情况，股价总是要升上去的，起码还要分红派息，但是，股票投资的目的就是企图获得高于银行存款利率的利润，因此，对股民来说绝对时间是没有多少意义的。股票没有了买和卖，也就没有多少意义了。这样买卖之间就要十分重视时机。乔治·索罗斯分析说，购买股票有两个最佳时段，其一是一年一度的岁末减税抛售股票，其价位较低，也容易买进；其二是在股市崩溃

或股价出现暴跌、波动和滑坡的时候。这种情况，几年间或更短时间内总会出现一次。

乔治·索罗斯在亚诺公司担任证券分析师期间，以其独特的分析力为公司赚得了可观利润，赢得了公司上下一致的赞扬，但这些远远不能满足乔治·索罗斯的欲望，在他的内心，一个酝酿很久的计划膨胀起来，他不知道这个计划能不能实现，但他要立刻行动起来。正因为乔治·索罗斯果敢行动和坚定的信心，一个庞大无比的金钱帝国在几十年后出现在世人面前。

第二章

量子基金会的魔力

海盗的新船

亚诺公司在 1967 年开始推出一种双鹰海外基金，1969 年，乔治·索罗斯负责管理这个基金。在双鹰海外基金会里，乔治·索罗斯有 6 名属下，亚诺公司的 10 位分析师也提供给乔治·索罗斯必要的资讯。乔治·索罗斯不愿多谈公司给他的报酬，他的生活十分富裕。他的薪水当中有一部分是绩效奖金，若双鹰海外基金表现良好，乔治·索罗斯和他的部属便可获得额外收入。乔治·索罗斯在管理这个基金的同时还为其撰写研究报告。在乔治·索罗斯管理下的双鹰海外基金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景象。

1969 年，39 岁的乔治·索罗斯终于下决心与杰姆·罗杰斯共

创量子基金。这也许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最成功的基金。由于没有向安理会登记，因此在美国不能发行，所有股东都是外国人，大多数是欧洲人。量子基金投资商品、外汇、股票和债券，并大量运用融资，从事全方位的国际性操作。

随着量子基金的建立并开始运作，乔治·索罗斯被一种看似古怪的忧虑所困扰着，他害怕到最后量子基金变得过于庞大，从而金钱将这个基金腐蚀。39岁的乔治·索罗斯有着丰厚的积蓄和稳定的收入。要是其他人对他的尚未挣到的亿万财富如此忧心的话，他一定会遭到别人的暗暗讥讽。但对乔治·索罗斯而言，这可不是在虚张声势。他知道正如别人所做到的一样他一定也会很富有——这并不仅仅是一种显示成功后的富有，而是富有得让人不知如何处理才好。他所担心的是如何花费他的金钱，而并不是如何挣到它们。

乔治·索罗斯没有作为独立管理基金的辉煌业绩，他没有任何明文表达的东西可以说明他值得大家信任。而且他不仅仅要求能自由运用客户的资金，他还想绝对地控制它。他不希望任何人过问他在股票上所做的决策。到目前为止，乔治·索罗斯对基金会所有的股票债券都了如指掌。一行一行地，他把每一份财务报单都记在心；一天一天地，他在心目中建立起了对“华尔街”的整个详细轮廓，就好像能分辨出春天里的每一片新叶，他相信没有任何人的分析能比自己的更好。他会一点一滴地分析那些业绩非凡的共同资金，会对各种债券做出一些建议，当他把所有的才识和智慧都聚焦于一个单一的、始终执著的目标上，量子基金会在众多基金会中又怎能不一天天地鹤立鸡群。

量子基金初创时，400万美元的资本额曾让许多人对之不屑一顾。然而，乔治·索罗斯却并不心急。他以独特的方式来吸引

股东，他以超出一般人的果敢来筹集资金。

1969年冬天，乔治·索罗斯给一个叫菲蒙斯·乔那特的富商打电话，希望他对量子基金能够投资，他们从未见过面，尽管乔那特对投资于这样一个刚刚起步的基金颇感疑虑，但他还是同意与乔治·索罗斯见上一面。在约好的周六下午，在乔那特的郊外别墅中两人见面了。这对乔治·索罗斯而言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时刻，乔那特能够给他充足的资金，如果他同乔那特签约，量子基金的实力将得到前所未有的增强。

两个人在一种友好的氛围中各自阐述自己的见解。乔治·索罗斯的话引起了乔那特的注意。他对他说他不仅会披露资金的投资方向，而且会给他每年度成果总结甚至每个月的进展情况。每年年底，乔那特可以增加或抽回资金，其他情况下，资金都由乔治·索罗斯单独处理。乔那特做为股东，每年可以得到乔治·索罗斯赚得利润中高于4%的所有部分。余下的利润由股东们各自分成。这样乔治·索罗斯就不是让乔那特孤身赌博了，乔治·索罗斯的资金也在其中，如果他业绩平平或更糟，乔治·索罗斯便会什么都没有了，没有工资，没有代理费，什么都没有了。乔治·索罗斯平静地陈述着，不带任何修饰，但内容非常清晰，虽然乔治·索罗斯对乔那特资金的需求很迫切，但他只想以他的条件来得到对方的资金。

乔那特与索罗斯签约了。在短短的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索罗斯又分别与12名富商签约了，量子基金会在悄悄成长。作为基金管理人，他每年可以从基金收益中提取20%作为自己的佣金，然而，索罗斯却总是将其作为股份再次投入到基金的运作中，其他股东见状顿时信心大增。基金资本额迅速增加，从而加大了投资力度。他还在不断地招集新的投资者，比如来自美洲的侯伦斯·

凯早，来自澳大利亚的利强多·琼斯，来自法国的杜白塔。

乔治·索罗斯在股票和债券上做得很出色，他的股东们在1970~1971年的利润率上达到35%以上，到1971年底，股东们的原始资金已被翻了一番。他发挥他的才智游刃于投资业，他们整个精神都倾注在投资业上，就如同他在伦敦经济学院读书时忘情于哲学一样，他一家公司接一家公司地分析着，然后记在脑中。一旦某个公司变得便宜了，他便猛然出击。

纽约商品联合公司是人们所见过的最不起眼的公司，由于经营不善，它的股票在50年代末便被销给了加拉利的农场主们了，此后便被公众遗忘了。现在杰明逊富商出价以65美元一股买回股票。他的出价很低，但是由于这种股票没有公开市场存在，股票持有者们逐渐开始脱手了。乔治·索罗斯意识到它实在太廉价了，但是他找不到股票可供他买进。他和他的好友莫奈跑去参加股东年会，但杰明逊很不礼貌地拒绝让他们看股东名单，乔治·索罗斯抛出常人不能给的条件，杰明逊让他们看了股东名单。下一步行动便是收购这些股票，乔治·索罗斯共收购了纽约商品联合公司50%的控股权，同年年底，乔治·索罗斯在这家公司身上下了1000万美元的赌注，当时的这一决定令其他的股东们目瞪口呆，他们一致认为这是一次非常糟糕的投资。没有人愿意为一家几近破产的公司投资1000万美元，除了乔治·索罗斯。乔治·索罗斯并不是盲目投资，更不是那种固步自封，坚持己见的保守投资者，他当然不会拿1000万美元开玩笑。当他采取这一行动时，实际上已胸有成竹。事情果然像他预料的那样，8个月后，他在这家公司上赚得了惊人的利润。乔治·索罗斯这种起死回生的投资方式令同行们刮目相看。

在投资业上，乔治·索罗斯一直采用严密分析，精于计算的

态度——不同寻常地严密。表面上看来他情感的摆钟没有别人摆得那样远，没有什么力量促使他表现出一种情感，如：愤怒、沮丧、狂笑，或是其他超出于惯常精神的情感。他总是逻辑性很强，而且脾气温和，沉默寡言，总在同一条弧线划定的界限之中。乔治·索罗斯终日忙于阅读年度报表和商业刊物以及在电话上交谈。尽管有越来越多的报表要看，越来越多的股票要分析，他的心情仍十分乐观，在乐观心情的驱动下他忘我地工作，常常一天工作 16 个小时，正是由于乔治·索罗斯超常人的工作，量子基金会的前景愈发地灿烂光明。

投机年代

乔治·索罗斯属于华尔街崛起的年轻一代人，他对大崩溃之前的狂乱岁月没有任何记忆，对他而言，投机是无可厚非的。60 年代牛气冲天的股市对于他就像初恋一样充满新鲜感，甚至连他交易的股票都是新的——电子发行，庞大的集团，规模小的成长股票。越南战争的爆发推动股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首次突破了 1000 点大关，又曾在另外三次又达到了心理大关，但每次都在这个充满魔力的数字下收盘了。然而 1966 年春天，是投资者们不能忘怀的黑暗一年，道·琼斯指数开始走低，并且只达到 700 点左右。但是，更广阔的市场却掀起了泡沫，华尔街交易大厅里出现了令人眩晕的狂乱。对于很多资金持有人来说，这是争先恐后的年月。电子类股票旋起一阵狂风，每一股新发行的股票都被当作第二个西尔若克斯公司。在对高技术蜂拥而上之后，紧接着，在巨大的企业集团推动下，比如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索腾工业集团、莱特维公司等，掀起了一场兼并的

浪潮。华尔街进入了一段更为令人心酸的投机时代。投机时代的雏形源于“业绩基金”，它是传统共同基金的翻版。这种新型的基金并不力图在长期范围内超过市场赢利水平，而是着眼于每一个连续的季度、月、周乃至每个小时内。业绩基金通常是由那些一心想尽快赚钱的虬髯之徒来往营地。随着投机的不断升级，华尔街又洋溢起空前的喜悦，道·琼斯指数又回到了900点左右，华尔街更为迅速地下着越来越多的赌注。1968年，国家陷于一场政治的动荡中，而股票的交易却达到了疯狂的地步。“大屏幕”的一日平均成交量走到了1300万股，比1967年的纪录还要多30%。在1968年6月13日那天，成交量暴增到2100万股。行情机尽快地发出咄咄的声音，随着每一次反战游行者和荷枪实弹的士兵交锋，它显得越来越响亮，就好像逐渐升高的政治温度在华尔街引起了高烧。在那个充满着暴力和对暗杀的震惊的动荡不安的夏天，股票交易所被大量的买卖单据忙得喘不过气来，这在它的历史上是破天荒第一次。而且如此这般持续了许多天。人们可以在寂静中听到求救的呼喊，但是市场还是不断结集，就像一个醉汉想要喝完最后一瓶酒，连天已经大亮都毫不知晓。

1968年12月，道·琼斯指数爬升到990点，而华尔街又把希望的眼光放到了一系列不争实际的目标上：促成越战结束，而且使道·琼斯指数升到1000点。1969年初，道·琼斯指数在1000点附近盘旋不下。在6月份，它下降到900多点上，一个个的高空飞行者都坠落了。李腾工业集团——公司集团时代的标志——从它的极盛点下跌了70%；另一个是莱特维，其股票从169美元跌到25美元。华尔街的证券经纪所纷纷关门甚至倒闭。股票交易厅的标语“在美国商界拥有你的份额”悄无声息地飘落了。业绩基金彻底溃败下场了。

整个 60 年代的后半期可以说是投机年代，正是这种大时代背景将乔治·索罗斯和盘推出，不过他真正显示夺目的魅力却是在 30 年以后。90 年代的各大媒体纷纷指责乔治·索罗斯是金融界的“坏孩子”，他不断故伎重演的投机方式致使十几个国家蒙受惨重的损失，众多的指责集中在乔治·索罗斯的身上，如果溯源而上，不能回避的是索罗斯是地地道道的华尔街 60 年代的产物，正是 60 年代的投机深刻地影响了乔治·索罗斯。当他 1967 年管理双鹰海外基金时，1969 年创办量子基金时，这种影响还没见端貌，但祸根的种子已深深埋下。

当华尔街进入 70 年代的磨练纷纷变得胆小如鼠，基金纷纷聚集到“更安全”的股票上来，但风险却从不专注于这种或那种股票。它在投资者相互盲目模仿的任何地方都会出现。1972 年至 1974 年股票市场大滑坡，甚至可以和 30 年代的大萧条相提并论。股票就像倾盆大雨一样从高空落下。

1972 年各大刊物都以显著标题，描述这场前所未有的恐慌。《商业财刊》：“从墓地呼啸而过”；《福布斯》：“为什么买股票？”《商业周刊》：“可怕的崩盘”；《巴伦》：“弥散的恐慌”；《福布斯》：“悲观正在加剧”；《福布斯》：“一片未知的水域”；《幸福》杂志：“关于股票悲观的一个案例”；《福布斯》：“经济形势失控了吗？”

经济陷入衰退之中，通常采取的用投资刺激经济的方法还没出台。1974 年的通货膨胀率达到了 11%，出现了连 30 年代都没见过的新的症状：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并存。两者之中解决任何一方都必然伴随着另一方的恶化。经济学家们又杜撰出一个丑陋的字眼：“滞胀”，利率升到了 20 世纪以来的最高点。政府正面临亏损等一系列问题，比如说总统对水门事件知道多少，什么时候知道的等等，把它搞得纷乱不堪。尼克松铤而走险，宣布自己并

不是恶棍。整个华尔街都屏住呼吸。政治圈里的话题是关于弹劾，而金融圈里的却是萧条。

“投资犹如吃鲜鱼”

在全球势力范围内，美国的资本主义都处于衰退之中；在欧佩克组织的成功业绩的激励下，第三世界国家正在组建卡特尔。经济学家认为黄金时代的发展到头了，只剩下一块大小固定的馅饼被瓜分成更小的份额，甚至在街角的加油站都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这些证据。华尔街被国家的阴沉气氛所笼罩，道·琼斯指数在7月底以757点收盘，到9月份时，它只有607点。倘若用道·琼斯指数作为衡量的标准的话，40%的美国工业都已经化为一缕青烟了。但是道·琼斯没有着手衡量损失的大小，自1968年以来，股票平均跌了70%，夏季的一个交易日里，有447种股票创下新低，比过去人们念叨的大萧条时期的情况还糟糕。熊市已持续了6年，比1929~1932年的熊市时间长出一倍。

和其他人一样，乔治·索罗斯对通货膨胀充满了恐惧心理。量子基金已经走过了5年历程，如何使量子基金平安地渡过这段黑色岁月，乔治·索罗斯绞尽了脑汁。

1973年，乔治·索罗斯决定放空法人偏好的迪斯尼乐园股票，这一决定遭到了法人人们的反对，他们的理论依据是：股市本身是一个集群，是由在任何给定的时刻跟随价格的人们组成的。这一堆不定形的人群，每天乃至每小时都在重新估计价值。然而一个给定的企业形象——比如沃尔特·迪斯尼——变化起来就要缓慢得多。公众对所有他的热情不太可能从周二到周三就有很大的变化，有时甚至一两个月都没有改变。因而迪斯尼股票上的大多

数波动，来自于这个企业被公众感受程度的改变，而不是来自于企业本身的改变。

乔治·索罗斯也承认迪斯尼是一个好公司，但在这个股市黑色岁月中，量子基金一定也只能面对市场，对未来市场的预测常常会出现差错，在转折点时，事情常常会 and 流行的意见相反，这点并不容易察觉，在熊市到极点的岁月中，量子基金稍有不慎便会被清洗出场，迪斯尼乐园的股价主要动力为公众的基本趋势和市场的主导偏差，即通常称为标准预测的综合结果。而基本趋势和主导偏差都受股价影响，而这种影响会自我增强或自我修正。现在，华尔街的所有股票都在下滑，如果这种趋势继续持续下去，迪斯尼公司再好对量大基金而言也没有更大益处，虽是放空，但可以灵活操作，随时随地找到机会点再度投资。乔治·索罗斯力排众议，于 1973 年全部放空迪斯尼股票，同时放空的股票还有拦立德、多比加纳股票。

4 个月后，乔治·索罗斯决定再度放空，这次放空的是“精选”股雅芳，乔治·索罗斯这一举动令量子基金会所有人瞠目结舌。雅芳股一直是热门股。早在 1968 年，布莱尔公司就将雅芳公司的股票市盈率抬到 56 倍，在这样的赢利水平下，一个将雅芳公司全部买下的购买者需多半个世纪的时间来抽回他的资金，在当时，雅芳股虽然过热，但经过几年的考验，雅芳虽然由“极热”趋向“冷”，但就是这种“冷”仍使雅芳股在众多股票中是“精选”股。放空这支股票无异于把腰包里的钱拱手送给别人，但乔治·索罗斯不顾众人反对，坚持放空“雅芳”股，因为乔治·索罗斯相信自己的思考和预测。后来的事实证明，当乔治·索罗斯以每股 120 美元放空“雅芳”股的举动是极有远见的选择。正是由于“放空”股票才使量子基金不仅渡过了不景气时期，而且还赚了大

把大把的美金。

1977 年夏天，道·琼斯工业股票的指数猛跌到 800 多点，远低于平均水平 1969 点。原因是因为 70 年代中期美国的经济不景气，所有报纸的差别版都登着绝望的消息：美元贬值，日元升值，伊朗的原教旨主义者，尼加拉瓜的红色军团，石油输出国组织活动频繁，国内能源短缺，人们普遍认为美国的作用在削弱。表里不一的尼克松被赶下台了，换上来的吉米·卡特却有德无能。乔治·索罗斯开始关注白宫，并对联邦债务感到震惊。他发誓，如果他当选就要在第一任里实现预算平衡。

5 年前美国经济也面临着相似的情况，但华尔街渡过了难关，随之而来的是历史上最有力的经济复兴，可这安慰不了谁。金融周期只有在回忆时才是清楚的。无人可以预知未来。市场上的任何变化都只有一次。70 年代末最受人痛恨的是通货膨胀，所有物价都涨了 13%。华尔街股票的主要价格却只有两位数，《商业周刊》做出了蛭让人揪心的预言，它 1979 年 8 月的一期刊物的封面题目就是“股票完了”。文章很有创意，它仔细描述了股市的不景气。因此，它说，人们应该投资于货币市场、快速食品或稀有印花，股票当然该让位了。股价太低了，迟迟不见回升就是股市死亡，无论如何，美国经济必须承认股票永远死了这一事实——也许将来会恢复，可决不会太快。

在这种情况下，量子基金首创投资防御性股票有其价值的观念。乔治·索罗斯开始投资那些能防止通货膨胀危害的公司。在华尔街，通货膨胀引发了对企业资产的疯狂购买。公司也和人一样，心急火燎地要把钱换成别的什么，这导致了 80 年代早期的兼并狂潮。老名牌公司如德尔·蒙特、国内航空公司、七喜、史蒂贝克和热带产物都被高价购买。

1979年，乔治·索罗斯又领导了投资高科技股的潮流。1979年拥有M/A通讯公司8%的股份，1980年拥有包特公司23%的股份，化核公司5.3%的股份和计划研究公司3.4%的股份。

乔治·索罗斯早在1978年底就暗暗留心观察M/A通讯公司的动态，这是他计划的目标之一。只是这家公司虽然几年来没有什么大的发展，但却始终保持稳定的收益，大部分股东都把它当作储蓄存款放在那里，所以股票买卖既不太热，在市面上流动的数量也不大，乔治·索罗斯想获得这家公司的股票，但是，假如他不制造一个机会，使这家公司的股票成强烈的卖热，他就无法达到目的。恰巧，M/A公司总裁不满于本公司股份的徘徊不前，有意出手股票，而且还托乔治·索罗斯寻找买主。索罗斯深知商场险恶，一步不慎就会摔跟头。于是他下决心探寻出M/A通讯公司出卖股票的真正原因。通讯公司总裁守口如瓶，不吐半字。但索罗斯自有打算，他相信查明这家公司的实际情况并不难。他一回到家，便迫不及待地走进书房，开始翻阅M/A通讯公司的资料，从这家公司创业到历年来的各期损益表，他都详细地看了一遍，并画了一张简单的曲线表，很清晰地反映出了这家公司的业绩走势。凡是索罗斯认为将来有可能投资的公司，资料剪贴得都十分齐全，甚至于连一条很小的新闻都不放过。M/A通讯公司既然被列入目标范围，当然资料搜集得也很完备了。不过，索罗斯根据这些资料，怎么也研究不出这家公司发生什么问题了。如果根据最近一期的损益表来看，不但销售收入略有增加，就是盈利也比上期好一些。就凭这一业绩，M/A通讯公司股票想脱手也许是实情，但也不至于降价以求。既然在资料本身找不出线索来，那么只有向外在影响因素去寻找答案了。索罗斯认为原因所在是该公司有很好的发展条件，但却始终没有辉煌的业绩。这无疑证明了各部门

的负责人的能力有问题，公司本身并没有问题。于是乔治·索罗斯敢冒天下之先向 M/A 通讯公司投资。乔治·索罗斯向高科技股投资赚取了丰厚的利润也证明了他的远见卓识。高科技股在 90 年代成为热门股，他成为索罗斯金钱帝国里的一个重要角色。

1979 年，量子基金被指控操纵电脑科学公司的股价后，乔治·索罗斯来了个金蝉脱壳之计，签署了一份协议书，表面上要遵守一切规则，实际上仍旧我行我素，经过在量子基金 10 年的锻炼，索罗斯已经完全熟练地学会了为金钱而必须做什么，而哪些又是万万不能做的。索罗斯曾经说过，投资犹如吃鲜鱼。鲜鱼上来，有人吃鱼肚，有人抢鱼尾，有人抢鱼头，而我想要的是整条鱼。正是在这种称之为贪婪也行称之为渴求也行的精神推动下，量子基金会在他的操作下如日升中天，终于在 90 年代达到顶峰。如果哪位投资者在 1969 年时向量子基金投资 1 万美元，那么到 1996 年底，他的这笔资金就会变成了 3 亿美元，即增长了 3 万倍。没有人会做到像乔治·索罗斯那样，使你手中的钱在几十年内翻了几万倍——这正是量子基金会的魔力所在。

第三章

金钱帝国的成长

1982 年的春天

1982 年，华尔街就像沉闷了一冬的人终于迎来了春天一样。经纪人和银行家又充满自信地回到自己的岗位。1982 年夏天，利率不断下降。6 月份国库券的利率还是 13.32%，到 8 月就成了 8.66%。股票开始时对这种刺激没什么反应。8 月份股市连跌 8 天，道·琼斯指数跌到 15 年来的最低点 777 点。到了周五，它开始回升了 11 点，到下星期一又上升了几点。星期二上午 10 点 41 分，亨利·考夫曼，这位永远忧郁的带着水晶球的所罗门经济学家使情况顿时扭转。素有宿命博士之称的考夫曼说，与过去安慰人的情况不同，他现在真的认为利率会继续下跌。这个消息使买股者大为振奋。股票指数猛长了 38.81 点，是历史上一日内升得

最快的一次。第二天《华尔街日报》预言说：“有人认为这是 80 年代经济腾飞的征兆。”人们轰动了。

到第二年 5 月 1 日，股票又长了 100 点；到 10 月又是 100 点。到 1983 年，经济增长恢复到正常水平，通货膨胀率降到了 3%。全世界的人都发现，石油不是太少，而多得卖不出去了。债券市场仍然兴旺，长期利率从两年前的 15% 降到了 11%。股市也出现 60 年代以来从未见过的稳定。新股发行到处都是，这在投机时期是不可能的。华尔街的信托交易也恢复了。到 5 月份，指数达到 1232 点，比《商业周刊》说它完了时还高出 66 点。这家杂志现在又赶紧声称股市复活了，但它的订量少了 42%。“华尔街到处传说着这家杂志重新发现了股票价值的惊人消息”，阿兰·阿尔本恨恨地说，“它当时的报道引起了一片恐慌。寡妇们在哭，孤儿们在泣，交易场地板上扔满了预售的单子。”

80 年代的金融界不是普通时期。美国到处都有恶意接管、垃圾债券和杠杆收购。企业家也不再是财大气粗的奥利弗·察思，他们成了华尔街的操刀人和赌棍。那时的特点就是“流动性”，不仅股票，就连整个公司都被转手、肢解、重组、再分配。这段时期的信仰也反复无常，信誉只是诱饵，动荡则是必然结果。如果察思复活，我们可以想象他会吓成什么样。如果他再读读他公司的报告，他会不会认为一切都完了呢？

乔治·索罗斯的量子基金会在 80 年代的第一年就遭到了大挫折。当时许多购买他基金的投资人追求优异的欧洲股票，担心赶不上这波涨势，纷纷撤资，造成基金规模缩小了一半。索罗斯绞尽脑汁，惨淡经营，力挽狂澜，1983 年他的基金价值上涨 57%，优异的操作绩效，使得基金规模在该年年底前更加扩大。在渡过难关以后，索罗斯更是调动起自己全部才能和智慧在国际金融界

中跑来跑去，以弥补挫折所带来的经济损失。1985年到1986年，是量子基金在80年代的巅峰时期，其基金的每股净资产价值增加了一倍多。

1985年8月，是里根连任总统没多久，接着是减税和增加国防建设，造成美元与股市汇率双双上涨，外国投资人也乐其所见。在外国人眼中，美国人情况非常特殊，几乎全球所有其他国家如果不被当时苏联势力控制，就是因为内部因素引不起投资人的兴趣。因此，美国看起来前景光明，而吸引全世界各国投资者，直接投资或利用瑞士、卢森堡或纳塞的金融中介机构投入美国。索罗斯把这种情况称为“里根大循环”。这种泡沫经济自然会有一天崩溃，即当负债成本大于新资金来源的成本时。甚至在此之前，许多因素都得以刺破泡沫，也许美元下滑以及资金迅速撤出美国资本市场。这些都会导致经济衰退，整个经济总体严重萎缩。

索罗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记载自己交易日记。1986年8月18日，量子基金总值为6.47亿美元。当时，大家都担心货币供给增加可能引起经济过热，怕利率走高导致经济爆炸，怕尽升的经济突然迫降。循环股景气表现虽不错，但靠低利率的股票则相当疲软。索罗斯对此情景并不抱乐观态度，他认为大循环前景坎坷，并预测美元会下跌，利率会上升，进而导致经济衰退。故此，他不买受景气影响的循环股，而是选择了将来可能被收购的企业，以及地产保险公司股票，结果操作表现极为乐观。对于货币，他看贬美元，而买入德国马克和日元，他还认为油国组织会分裂，并放空石油。可是到了1985年9月6日，索罗斯预测的都没有成真，马克和日元双双下跌，而他投入7亿美元持有这两种货币，比其基金的总值还高，他因此而赔了钱。

9月6日之前，索罗斯增加了马克和日元的仓位，持有近8亿

美元，比基金总值还高出两亿美元。美国财长就与五国财政要员及中央银行官员共同召开了高峰会议。当晚纽约还是星期日，索罗斯便进汇市买进大批日元。日元后来强劲升值，他的日元仓位涨了10%，高值4.58亿美元。

索罗斯“生平之最，在外币交易上一周的获利比过去4年的累积亏损还多。”这说明操作外汇是很不容易的。从运作图中，可能看到9月6日基金上马克的持有数目为4.91亿美元，日元为3.08亿美元，总共7.99亿美元，比基金的总值还多。

9月27日之前，马克升值9%，美元汇率从2.92跌到2.68，日元升值11.5%。结果基金中这两种货币持有值立刻从7.99亿美元升到10亿美元，然而，由于美国股市和石油的表现不佳，基金每股只涨7.6%。

股市下跌使索罗斯更确信，他应该进一步减少美元仓位。他认为，疲软的股市会降低消费及企业支出。股价的下跌也会使抵押价值下滑，经济衰退会更趋严重。

索罗斯针对这种现象，加码放空美元。1985年11月的前一周，他放空美元达到了顶峰，马克和日元持有总值14.6亿美元。几乎是基金总值的一倍。这表示他不断地顺势增加操作。这种作法叫做“金字塔型操作”。这种操作在作保证金交易时，可能会造成更大危险，因为趋势反转的话，即使只是暂时的，也会有大的损失。

他的这段经历对外汇投机客而言是个非常重要的经验。观察到其他投机客还不了解随着汇率制度而来的改变法则，索罗斯坦诚地认为，当时，他也不完全了解这一法则，否则他会投放更多的钱，利用美元下跌好好大赚一笔。索罗斯进一步指出，如果市场上所有参与者都作调整时，游戏规划就会又改变。如果行政当

局能好好处理情况，外汇投机报酬率就会和风险相当。最后，因为没有超额利润，大家就会停止投机，当局也就能达到其目标。索罗斯的这个经验之谈，实质上是投机者所要掌握的正确法则。所有利用系统从事投机的致命弱点，就是他们都利用过于简化公式，只利用记分的资料描述过去一小段经验而已。如果这小段的经验不能完全反应未来形势，或者有其他资讯更加适用，那样的分析就毫无价值了。投机客会遇到许多可以完美解释过去的操作公式，但是对预测未来却一点帮助都没有。因为那些公式都存在着共同的问题，那就是过于片面和简单化，而索罗斯的改变法则，却能指点投机客应该如何在固定的游戏规则下作出最佳选择，不过要首先了解市场，就要先了解这些规则是如何变化的。

“我坚信事情的发展将朝我所预测的方向走”

1985年11月，索罗斯注意到国际锡会议的崩溃，接下来是油国组织可能会分裂。于是他放空石油，投入至少1.8亿美元。同时，买进许多炼油工业股，原因很简单，原料价格下跌，就等于降低成本，会使这些行业获利，改变目前状况。而通过删减政府支出法案，以及里根和戈尔巴乔夫的会谈，会迫使国防预算减少，他预测股市将上涨，就买了股价指数期货。

再有，日本因为中国利率升高，债券市场滑跌。索罗斯认为五国会议一定刺激世界经济，那么，日本利率将会下跌。另外，他还发现买进长期债券的最佳时机，就是短期债券利率高于长期债券，即收益率曲线反转时。因此，索罗斯买进了3亿多美元的日本债券期货。

索罗斯当时的基金总值约为8.5亿美元，但持有15亿日元及

马克，并且放空 8700 万英镑；他用超过他所管理基金约 6 亿美元的数目赌美元贬值。

同时，他也有约 10 亿美元在游动，包括在不同市场做多和放空的资本约有 8 亿美元，所以比率约 5：1。

12 月 8 日他指出，“我坚信事情的发展将朝我所预测的方向走，这将从我愿意承担的风险程度得到证实。”的确如此。不过他这次的观测却与 8 月不同，那时他认为大循环是信用扩张刺激经济和融资扩充军备的尾声，泡沫经济一旦破灭，所有一切都会随之崩溃。

11 月时，他了解到这些预测已经成真，而且他更认定：政府会组织一个国际联盟来阻止美元下跌，虽然行动可能相当温和，而且股市及债券市场扬升也是可预测的，而强势债券价格有助于联邦准备理事会降低利率。

索罗斯还指出，“我们可能要目睹股市大涨了。”许多公司已经被收购，产品过剩的情况减少。其他的公司也纷纷降低成本。美元价位走低缓解了美国企业的定价压力。这些因素与国际经济政策的共同行动综合起来，使他认为情势相当乐观，股价很快又会以超过其资产价值的溢价出售了。

然而究竟美国的预算赤字如何削减，或是债务国的经济要如何刺激都不明确。但是所有措施应足以振奋市场人心。

至于油田组织，多数产油国的经营却像索罗斯所说的荒唐供给曲线：即油价跌得越低，它们的石油产量越多，目的虽然是为了达成收入的目标，却迫使油价进一步下挫。所以他一直看空油价。

1986 年元月初，索罗斯大幅改变其投资组合的组成。为了反映他的偏多心态，他在美国股票和股价指数期货方面增加了 6.43

亿美元的持有，外国股价的投资金额也从 4700 万美元增加到 3.18 亿美元，总投资金额增加了约 20 亿美元。他的美国债券持有金额也增加 2700 万美元。他也将押在美元上的赌注从 5 亿美元降为零，即他的美元浮头寸减少到只等于基金的金额。他也将石油空仓扩增到 2.24 亿美元。多有成就的一个月！他表示，一般的多头市场要成功地度过一连串考验才能视为无懈可击，这也是崩落时刻的来临；这总要发生，但是走到这样的地步还有一段长路。

2 月份，他将股票仓位减少约 12 亿美元，但在 3 月 26 日之前，他认定股市多头的看法无误，油价下跌更支持了他的看法，因此他重新增加美国和欧洲股票的投资，达到 18 亿美元。他的基金则从元月初的 9.42 亿美元增加到 13 亿美元。

他股票持有中的 40%，外国股票持有中 2/3，是由三个观点撮合而成：芬兰股市，日本铁路和房地产股票、以及香港房地产股。芬兰股市是一个鲜为人知而且股价被低估的市场，但是其中不乏若干好公司。后两者只是同一个观念下的不同型态：资金泛滥造成日本和香港土地价格暴涨。以日本铁路来说，这些公司的股票将近十年没涨，市场和本身的价值之间颇有差异，再者，这些公司发现它们可能融资投资商业不动产而获利，毕竟融资利率要比购买不动产的投资报酬要低。因此日本铁路公司的股票变成了不动产融资的游戏，而且正以高折价出售。

7 月底前，索罗斯惑于以下两种说法：一、我们属于主要多头市场；二、油价下跌终究会加剧通货紧缩，反而阻止市场蓬勃发展。投机者在这两种不同的前提下将如何从事操作，事实上在许多情况下参与人类行为的反应大有意义。在两国军事谈判上，常有所谓的“双轨”动作，也就是说，如果对方不撤除飞弹，我方会装设自己的飞弹，如果对方撤除飞弹我方就不会装设飞弹。除

非一切明朗化，否则我方会坚持装设飞弹的前提，但是我方会设计对相反的前提保持公正的态度。

当有利和不利的两种主要压力同时出现时，股市不会显现平衡的中庸趋势，而经常会在不同的时间反映这两种因素，因此你必需牢记这两项因素，随时准备反应。

比方说，战争会毁灭一个国家因此不利股市，另一方面，战争又意味着支出增加，具有通货膨胀的涵意，因此在战时投资人应避开贬值的货币而争购实物。战争的威胁往往会造成股价先暴跌，后大涨，也就是先反映其中一项因素，接着再反映另一项因素。

因此要渡过这种情况，投机客应谨记两种反应会依次序发生，并要有所反应。

无论如何，7月底索罗斯再一次被偏空的想法所惑。他认为油价下跌同时会带来正、负面影响。它抑制了美国的石油勘探和其他石油相关行业的支出，对德克萨斯州等产油地造成极大打击，而且最新的赋税改革法案取消房地产税负优惠，对商业不动产市场也造成打击。农业一蹶不振，国防开支大幅度删减。只有消费者是支持经济的强力因素。

再者，美元的下滑意味着政府越来越难用调低利率的手段刺激经济，因为高利率是吸引外资流入美国的必要手段。

所以，与“一生所仅见的多头市场”的索罗斯预见的情形完全相反。他的笑容“以常理而言，我不会在原前题仍然有效的情况下出清仓位，相反，我也会根据新理论，建立相反的仓位。”同一个基金如果有两位以上经理人意见不容时也会发生这种事，即使他们的策略要点十分成功。他举了一个大多数投资人会觉得不解的例子。他说“如果我一开始投资100%，然后等额放空，市场

下跌了 20%，即使它同时影响多头仓与空头仓，我多头的仓位只剩下 80%。如果我在正确时机回补，我还是能全身而退，就算我回补引起部分损失，仍会比不适时出清多头仓位来得好。”

他说实际运作比上述例子要复杂得多，因为他同时在好几个市场操作。他在 7 月中旬的日记写到：星期一，7 月 14 日，基于技术面市场应会收红的考虑，我事实上买进一些史坦普股价指数期货。上星期一，7 月 7 日，道·琼斯股价指数跌了 63 点，空头都期待这星期一跌得更深造成大空头市场的印象。当天收盘真的下跌，第二天我立刻改变操作方向，一周内我的空仓已经超过多头仓。我同时放空一些长期债券，但多作国库券期货。然后我投入日本债券期货市场，加倍放空美国公债，这些操作的理念，是我认为各国联手降低利率，美元会下跌，美国债券会下滑，而日本债券会上升。

80 年代中期，乔治·索罗斯把投资重点放在日本市场上，这与整个世界的经济格局是密不可分的。80 年代，日本的对外投资迅速增长，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曾一度超过美国，日本芯片制造设备和半导体在世界市场上的比重都超过了美国，日本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而美国从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转变为最大的债务国，美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产品竞争下降，一系列重要产品的市场不断为日本所抢占。由于美国经济增长慢于日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逐渐为日本赶上，这一阶段，尽管美国的整体经济实力仍是最强的，但它的优势地位进一步削弱，日本和德国与美国的差距进一步缩小。乔治·索罗斯对日趋复杂的世界格局有着灵敏的嗅觉，因为他清醒地认识到，当地球小到一个村子的时候，不论哪个微小的环节上出现波动，都会直接影响到整条链子的颤动，所以他分散在世界各地的金钱在他理性大脑的指挥下，

随时随地等待从一个地方跑到另一个地方，唯一的原则是赚得更多的金钱。

第一次大失败

乔治·索罗斯于1987年开始聘用一批新经理人，他安排一个小组专门负责风险套利，一个负责选择权套利，其中还有一个助理和他一起预测总体经济。美国投资和欧洲投资各有一个小组负责。同时，他还成立了日本小组。还有一个小组负责放空，即一个公司经理人，与其他几位半独立的经理人一起工作。每个经理人可以独立操作自己的小额账户。乔治·索罗斯自己则决定要放多少资金在其喜欢的交易项目中，乔治·索罗斯说，他的目的，是让在第一线工作人能决定每笔交易，他自己却在幕后操纵大局。

乔治·索罗斯每年与新经理们去度假一次，他很喜欢他们，因为他们能为他赚取大量的金钱，而他们也同样喜欢他，不仅仅因为他们从他那里可得到丰厚的报酬，重要的是给这样温和谦逊的老板做事令他们很愉快。每年的聚会都有一种神圣的气氛，有点儿像年度会议，尽管这些经理们都有“呼风唤雨”的能力，但他们都愿意听索罗斯安排，因为只有他才是真正的神。一个经理说：“我们都期望与他坐在一张桌子旁，总是忍不住想，他会坐我这张桌子吗？”在度假时，他们谈论最多的也是量子基金如何做好下一步的工作，每个经理都把这次度假理解为直接向索罗斯学习的珍贵机会，索罗斯并不喜欢对他人指手划脚侃侃而谈，但往往不经意说出的一句话就被下属们当作神明珍藏在内心。

乔治·索罗斯在1987年专门成立一个放空小组是因为他在放空上摔过大跟头。虽然每个人在投资上都不愿有所过错，但索

罗斯毕竟也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真正的金钱之神。索罗斯继1973~1974年放空迪斯尼乐园股票，“雅芳”精选股以及多比加纳等股票成功后，于1978年~1979年再度放空当时最大的热门股国际度假胜地股。乔治·索罗斯喜欢反向思考，不喜欢人云亦云，他认为只有猴子才人云亦云，看似精明，实质蠢到极点，索罗斯认为，在投资时，投资人必须确立自己的立场，是进是退，是站着还是跪着，由你自己决定，千万不能犹犹豫豫，他喜欢果敢而又直接的行动。索罗斯与众人不同的思维方式给他赢得了大量的金钱，但同时也让他损失了很多财富。索罗斯放空国际度假胜地股后，其股价由5美元直升到60美元，这时如果被迫回补，便会赔一大笔，索罗斯开始看出这种趋势后并意识到自己所犯的错误后，立刻改变主意，停止作空，买进股票，使自己免于惨重损失。索罗斯就是这样，发现错误会及时纠正。向前冲时他坚决而果敢，向回跑时也是雷厉风行，正是这前后一致的工作作风，才使乔治·索罗斯无往而不胜，胜也为王，败也为王，乔治·索罗斯继1978~1979年放空失误后，对待放空变得谨小慎微，1987年成立的放空小组正是这一转变的明证。索罗斯不再轻易放空，而是在放空小组详细地分析研究后，上报给他，他才决定是否放空。但就是这样，索罗斯在放空小组成立一周年后，在1988年又摔了一跤，放空似乎已成了打他膝盖的一根棍子。1988年12月，乔治·索罗斯指出美国10年期债券利率偏低，或许是年底调整的短暂异常现象。而英国出现收益率曲线反转则可能是经济衰退的前兆。那么，经济衰退必然导致美元贬值。乔治·索罗斯在慎重考虑后决定放空美元。在国际投资上，这次放空美元是索罗斯重大经济损失。此后，索罗斯变得比以前投资更加保守，他持有的一大部分美国股票，大多属于道琼工业股票中的债优股。

1987年，对乔治·索罗斯而言是个灾年，他在这一年损失了近9亿美元。

1987年10月14日，索罗斯预言日本市场会崩溃。当时，他的预言是对的。日本股价直线下降10%左右，东京日经指数成了灾难的象征。日本政府投入大量日元进场干预，才使得日经指数像个受了惊吓的孩子终于找到父母一样渐渐安静下来，日本股市不仅稳定下来而且创下新高记录。乔治·索罗斯对此曾解释道，我认为泡沫经济还会破灭，不过政府会安排经济平稳发展。乔治·索罗斯准备放空日本股票，但是在10月17日，华尔街率先大幅崩盘，整个华尔街陷入一片混乱，投机商们像吐唾沫一样把股票大量抛出。在大混乱面前，索罗斯保持着镇定，他仍旧逆向思考，他抱着希望坚信华尔街股市能够反弹，索罗斯将他的美国股票持有增加为两倍，买进了10亿美元以上的股价指数期货。华尔街果然如索罗斯希望的那样，在崩盘之后开始反弹，索罗斯绷紧的脸上露出了笑容，就在他刚刚绽开一丝微笑时，股市再度崩盘。索罗斯这一次只好承认完全失败，他痛苦地认赔杀出。但当他的股票经济商协利公司开始抛售他的史坦普500种股价指数期货时，交易商此时却像成群结队的秃鹰，虽然价格由230坠落到200，而且已经比组成指数的股票平均股价低20%，他们仍不肯买进。协利公司只好忍痛杀价。索罗斯也拼命在现货市场抛售股票以最低限度地减少自己的损失。

1987年华尔街股市大崩盘对索罗斯而言是个惨痛的教训，索罗斯不同于一般人的是他不会因教训而沮丧，相反，正因为教训他反而更斗志昂扬。索罗斯认为，在投资市场上，绝没有百战百胜者，在理论上都不存在这种可能性，更不用说实际操作了。所以他说：“我的预测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我持续不断地预测不会成

真的事，或许是因为市场会影响他们所预期的事件，而反射过程使得预定的结果不能发生。其实结果是在过程中就决定了。”索罗斯坚信反向思考。他认为大多数基金经理人通常犯错误，他们的地位越有影响，就越没有能力作出正确决定。索罗斯在1987年成立各种小组正是对这一见解的肯定。在金融界，索罗斯的地位已举足轻重，正因为如此，他才不想使自己高高在上嗅不到金钱的味道，他要真正沉下来，像大地一样发出引力，好让金钱雨点一样落在自己的怀抱之中。

索罗斯认为，1987年崩盘的历史意义在于，它代表了美国经济和金融实力转移给日本，美元在任何价位都不合理了，金融资产持有者寻求最好的价值来源，而美元已经不再够格了，然而，众多投资者所担心的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却不至于落到几十年前的悲剧下场。索罗斯还预言80年代末，德国马克相当具有吸引力，因为德国的经济正在迅速崛起，德国中央银行使马克更具有魅力了。黄金市场会在进入90年代初萎缩，因为高科技的发展会一直增加黄金供给量，黄金正在由主角变成配角。

对量子基金会而言，1985年至1986年，他是站在悬崖顶峰的伟大巨人，面对灿烂的阳光俯瞰世界，而1987年，他从悬崖下摔得鼻青脸肿，1988年至1990年，他趴在山底下开始反思自己，重新蓄积力量，以使自己在90年代再次登上辉煌。

1989年，乔治·索罗斯从日常交易中脱身而出，隐在幕后，开始深刻地反思踌躇满志的计划，只要他活着，不论在幕前幕后，只要他打一个哈欠，整个金融界都要感冒，唯一不同的是，他隐在幕后打哈欠，世界就要忧心忡忡，因为你看不到索罗斯打的哈欠是大是小。

乔治·索罗斯认为，整个80年代，世界股市处于一个渐趋渐

热的过程，这与世界各国都玩命增强自己国家的经济实力是分不开的。投资者们都不能抑制经济过热，虽然他们都很清楚这场景气经济将崩溃。想要完全置身事外几乎是不可能的。例如 1987 年道·琼斯指数从 1 月 1 日到 8 月达到最高点 2722.4 点时，道·琼斯已经惊人地增长了 44%。人人都被冲昏了头脑，根本谈不上置身事外，谁不想趁着千载难逢的时机大捞上一把。现代经济彼此环环相扣，藏身之处决打不到。所以乔治·索罗斯认为对投机而言最正确的策略就是搭上列车赚取利润，而在它崩溃之前脱身，使损失降到最低限度。至于繁荣崩溃循环发展的程序如何，相信趋势的人都会顺着方向而行，直到趋势反转。问题在于要尽量准确抓对这个时点。经济萎缩的副作用，包括失业和生活水准下降，是非常痛苦的事，所以行政当局会想尽办法在经济扩张中避免萎缩。信用扩张时依然。乔治·索罗斯相信纳比斯科公司的购并和垃圾债券大王麦可米肯的衰落可以代表一种高潮，类似沙尔公司试着接手华友银行所引发一串连锁反应，最新的流行趋势是将股票分割成好几个不同的组成单位，这也是交发症状之一。繁荣崩溃的循环究竟会不会照一般情形发展。80 年代的趋势，虽然还有逻辑上可推测的结果，但行政当局的责任就是避免这种情形发生。乔治·索罗斯从进入金融界那一天起，就把行政当局的态度与金钱联系在一起，因为他知道一个国家的政治可以左右其经济，这是他所讨厌的但又不能不承认的，但经济反过来完全可以影响政治甚至瓦解政治。进入 90 年代的高经济时代，乔治·索罗斯的看法不仅得到印证而且运用于实践。

到 80 年末，量子基金会在乔治·索罗斯的控制下走过了 21 年的路，他已长得又高又大，阴影已开始遮住华尔街甚至欧洲、亚洲。80 年代的量子基金与 90 年代的不同在于，80 年代的量子基

金会性情很温和地数着手中赚来的金钱，结果发现不尽如人意，结果在 90 年代，他性情变得暴烈起来，他挥拳砸向自己的目标，结果灾难降临了，先是英格兰，后是墨西哥，再到东南亚，谁知道他下一个目标会是在哪里，也许在日本，也许在北美，也许在纽约，或许再把英格兰戏弄一遍，总之，他可以为所欲为了，只要他愿意，一个人的财力瓦解一个国家的现实不再是天方夜谭，而是全世界人都可以眼睁睁看到的。

第四章

打垮英格兰， 摧毁东南亚

把英国国家银行踢倒在地

90年代是本世纪最后的10年，似乎一切都显示这最后10年是极为特殊的10年，世界格局风云变幻，其经济形势更是一日三变。

进入90年，苏联解体后，世界进入冷战后时期，超级大国军备竞赛已停止，美国在削减军费开支，从而有可能使财政赤字减少，可以以更大的财力投入高科技方面。西方各国都在制订和实施兴建“信息高速公路”计划。这一计划的实行，标志着西方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克林顿政府上台后，摒弃了过去12

年来美共和党执政时期所推行的新保守主义政策，以缩小财政赤字和外贸逆差为中心目标，对内削减政府行政开支和军事开支，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统一后的德国虽然带着沉重的财政负担，但雄心勃勃。日本虽然患上“泡沫经济”的“后遗症”，但也在开拓新的领域。第三世界国家经济稳步增长，尤以中国格外突出。世界格局正在以经济这支杠杆在悄悄重新划分。

80年代末，投资人虽然经过一些磨难但仍旧人人意气风发，到了90年代，华尔街再次陷入恐慌，北美市场和日本市场也是险象叠生。1990年8月伊位克侵占科威特后，美国企业纷纷倒闭，大额债券不履约频频发生，满是大额债券的费雷德·卡尔的保险公司成了历史上倒闭的最大的一家保险公司，而刚刚从国外债务危机中恢复过来的各大银行发现自己不得不面临着国内的许多致命打击。比如LBD和商业房地产。银行倒闭像传染病一样从德克萨斯席卷佛罗里达、新英格兰和大西洲中部各洲。忧心如焚的人聚集在投资研讨会上讨论花旗银行或大通·曼哈顿银行是否会倒闭。

正当所有的投资者都忧心忡忡时，乔治·索罗斯却异常镇定，他掀开窗帘的一角，仔细地窥探着世界，他在世界各地的资金等待着他发号命令。他认为这是冒点风险的好时机，他手中的股票和其他股票一样也下降了，但索罗斯在这种情况下的状态总是最好的。在世界一片黯淡时，他却看到了自己手中金钱的光明。

在最坏的1990年，索罗斯买了欧洲的石油股票及日本的高科技股，他相信他的决策是正确的，索罗斯投资后不久，股票开始进水下沉了。索罗斯镇定地等待着股票下降，但美国政府镇定不住了。1991年初美国和伊位克开战，股市重振了。战争虽然只持续了6个星期，但股市复兴不止。到7月，道·琼斯指数突破了

3000 点，索罗斯手中的股票翻了两翻。幼年时对战争的痛苦记忆丝毫没有阻止索罗斯发战争财，毕竟是几十年前的事了，索罗斯手中的钱变成更多的钱是最重要的事，虽然索罗斯信奉自由的开放性社会，但金钱的开放性对索罗斯而言更具魅力。

量子基金会在 90 年代初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索罗斯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他总是那么理性，那么冷静。正由于索罗斯那个智慧的头脑，对金钱的贪婪以及金融界拱手奉献的经验。英伦三岛的灾难降临了，索罗斯下一个目标选中了英镑。

早在 1989 年，柏林墙拆除，东西德统一，由德国马克领衔的欧洲货币机制如日中天，大有势如破竹之势，欧洲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之中，然而索罗斯经过细心的审视分析后，有一种不祥的预感。1992 年的英国，经济步履维艰，财政赤字巨大，利率走高，国家的产业结构中传统产业比重大，高技术产业发展较慢，工资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都在很大程度上不适应经济的发展。英国政府无奈中寄望德国降低自身利率，以从侧面减少英镑的压力。老牌帝国英镑价格过高，而且由于其经济衰退，不可能用提高利率（当时英国利率已高达 15%）的方法来吸引国际资金而保卫英镑的汇率。德国由于经济发展过热，不敢冒然行事降低自身利率。四面楚歌中的英镑，尽管有英、德两国中央银行大力购进，却无法止住下跌之势。

不久，德国中央银行行长在《华尔街日报》发表谈话，提到欧洲货币机制的不稳，只有通过货币的贬值才能实现。这篇并不引人注目的谈话却使索罗斯浮想联翩：德国人很可能准备从英镑防线上撤退了。

乔治·索罗斯 70 年代进行投机时认为市场是没有灵性的，更不存在思维。投资人以有限智慧与有限资产从事投资，他们无须

谨慎太多，只要了解两者之间有一个较好，他们就占有优势，索罗斯还认为开始小投入，即为投石问路，如果行得通，再投入大资本。

这一次他清晰地认识到英镑好，因为他将会贬值，他符合了索罗斯投机的第一个条件。而第二个条件，索罗斯并没有依据 70 年代版本如法炮制，90 年代的索罗斯一改 80 年代末期的谨小慎微，这一次一开局，他就倾注了大投入，犹如一个背着十袋黄金的淘金者把所有金子一下子全部展现在妻子儿女面前。

索罗斯瞅准了英、德两国政府面临两国的经济情况各怀心思，他当机立断，全面卖空英镑，同时买进马克。索罗斯意识到他的这一举动必然会引起英国政府的强烈反应，但他已做好了应付各种情况的思想准备，因他手中有无数的美元。索罗斯无所畏惧，虽然他一个人面对的是一个老牌的英国，他不再是伦敦经济学院的一个思考哲学的学生了，也不再是一个刚刚懂得经济理论的金融界的婴儿了。伦敦经济学院无法想到自己的学生最终把英国国家银行踢得跪倒在地。

英国也许已经意识到一名刽子手已向英国货币挥起了寒光闪闪的大砍刀。英格兰银行被逼到了墙角，百般无奈穷途末路之时想出了一个看似高明实际上愚蠢之极的一招，这一招无异于用自己的手把自己的脖子拽得更长一些，好让砍刀更能一下砍下英国中央银行的头颅。英国中央银行宣布提高利率。这一招适得其反，导致了马克的再次下跌。英格兰银行目睹英镑的颓势，不得不作困兽之斗，咬牙收进，索罗斯毫不容情，投入整整 10 亿美元，与其展开世纪决斗。他以四两拨千斤的保证金，获得了 1:20 的借贷。借贷来的几十亿美元，索罗斯一次性地全部投进去。他一方在大量卖空英镑，一方面无止境地吃进马克。虽然英国花费了上

百亿美元，但到底抵挡不住这位“金融狙击手”的攻击，最终只有将英镑贬值。

一场堪称惊心动魄的世纪混战过去了，索罗斯以罕见的魄力和胆识，总共卖空了相当于70亿美元的英镑，买进了相当于60亿美元的马克，使英镑不仅贬值，而且含恨退出了欧洲货币篮子统一汇率机制，使欧洲统一货币的进程遭到最严重的挫折。而索罗斯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净赚了15亿美元。至今，英国人和欧洲人对他还恨之入骨，提起索罗斯就骂他是“夏洛克”（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中的犹太商人）。

反射理论的实质是“系紧鞋带”

乔治·索罗斯1992年以一个人的财力和胆识打败一个国家的银行致使他在整个西方名声大震，他这一仗也被金融界纳入运用资金赚取更多财富的经典之作。索罗斯把自己的投资理论称为“反射理论”。

反射理论的本质，按索罗斯的解释是认识改变事件，而事件又回过头来改变认识。这一现象叫做“回馈”。

如果投机者认为美元会上扬，他们拼命买进就会推它上涨。这样就会回头来造成利率走低而刺激经济，使得美元价格走高变得合理。

同样的，如果许多投机者确信ITT或海湾公司或其他公司股价会上涨，他们就会抢购股票，管理阶层就可以作为交易象征而以更佳的条件收购其他公司，使得股价更高。

索罗斯称这种认识与事实间的互动次序为“鞋带”型态。

反射理论的重点是市场参与者不完全的理解。索罗斯说：“就

我经常所观察的，这也是军事决策问题的本质：‘战争烟雾’使你无法取得所有想要的资讯，当你确实拿到资讯时，情势已经改变了。”

索罗斯曾经希望把这套反射理论发展成为可以解释 80 年代经济景气的理论，就好像凯因斯的“就业、利率和货币一般理论”可以解释 30 年代的大萧条一样。他现在承认自己并没有形成一套经济理论，不过他还是认为这个想法非常具体而且有趣，它也的确如此，投机者都了解，不过一般大众就不一定了。

索罗斯对反射理论运作的两个金融领域相当有兴趣：放款和抵押品之间的关系，以及司法者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投机的加速效果并不能以古典经济学的均衡理论来解释，古典经济学假定大多数能从事交易的事物都有一个自然形成的价格，而且市场在此价格上供给量会等于需求量。投机性市场和其他冲动情况相似，比如战争等多是社会学家所分析的课题，要么就是被其他学科用数学方法加以说明，比如竞争理论和一般系统理论。索罗斯引入反射和均衡，却批评古典经济学的均衡理论以及许多不切实际的经济政府的假证。如完全竞争、充分资讯、同质性和可分割的产品、供求曲线等无异是天方夜谭。现实中，买进和卖出的决策是基于对市场的预期。如果一个制造商预期其产品价格会下跌，他就会像商品投机商那样，在市场价格开始下跌前多卖一些。反之，价格上涨，人们会预知供给量增加，需求量减少，就会抑制价格上涨的趋势，然而，在某些情况下，却会发生相反的情况。汇率上扬、通货膨胀和其他因素会使得价格自行发展。如果市场是随机的，那么投机就是一种碰运气的游戏。索罗斯是一个走运的人。索罗斯不遵循任何法则而建立起自己的法则。他事业上的成功似乎是对搞经济理论的学者专家们的嘲弄，好像在问：“你们研究那么

多年，那么聪明，你们倒是说说一个人打败一个国家货币是怎么回事。”

吃掉了“比索”，还有胃口

乔治·索罗斯 1992 年的巨大成功使他信心百倍地率领量子基金数以亿计的美金向 1993 年 1994 年昂首阔步地挺进。

从 1990 年到 1993 年，西方国家前后历时 4 年的经济不景气。美国在 1991 年陷入了经济困境。日本、德国和法国发生经济衰退比美国整整迟了两年，它们在 1993 年才出现了经济负增长。美国 1993 年财政年度的联邦财政赤字仍然在 2400 亿美元以上，对外贸易赤字已达到 1200 亿美元以上。日本的结构性问题集中反映在“泡沫经济”问题上。西欧突出的结构性高失业卡着自己的脖子。从 1994 年起，西方国家普遍摆脱经济衰退而进入了新一轮的经济回升阶段，1994 年世界平均的经济增长率约为 3.0%。美国的经济增长率为 3.8% 左右，日本为 1.0%，东南亚、东亚为 8.0%，非洲地区约为 2.5%~3.0%，而拉丁美洲为 3.5%。拉丁美洲有些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已大大高于平均水平，如阿根廷，可达 7.0%，墨西哥达 5.0%。

距离华尔街遥远的墨西哥在经济增长率良好的状况下，举国上下一片欣欣向荣景色。乔治·索罗斯略含忧郁的目光穿过夜空注意到这个国家的货币——“比索”有下跌之患。一有机会，索罗斯是绝不会放过的。永远要想着利润，这是索罗斯时常告诫自己的。索罗斯开始行动了，于是灾难降临到墨西哥，他象一年半前一样如法炮制。他虽然果敢行动了，但心存犹疑，不知自己第二次的行动会不会象第一次那样大获全胜。墨西哥当然要反抗，这

种反抗激起了索罗斯的斗志。他相信自己击败英国后同样会让墨西哥成为俘虏。90年代似乎已成了索罗斯的年代，墨西哥的货币——比索在索罗斯的不停攻击下，终于败下阵来。比索成了暴跌之后的废纸。索罗斯再一次成功，他的量子基金会似乎已被赚来的美元压得走不动路了，但量子基金仍旧在领头羊——索罗斯的带领下贪婪地向前冲击。

索罗斯选中了下一目标——东南亚。在继第二次大捷以后的3年，索罗斯把魔手在1997年伸向了东南亚的泰国。

泰国是出口主导型经济，出口品资本、技术含量低，主要是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从1995年开始，泰国出口则停滞不前，再则泰国泡沫经济过热，金融制度不健全，银行及金融机构大量贷款给房地产，造成大量坏账，而且泰国又过度依赖海外资金，其金融自由化的历史很短，本土外资银行不多，泰国很多钱庄借“泡沫经济”之势扩大规模成为银行，良莠不齐，财政状况及管理欠佳。很多外汇交易都是在离岸金融市场进行，这样泰国中央银行难以察觉，给投机者造成了机会。1995年末，泰国的“地产泡沫”破裂，银行呆账、坏账大量增加，而其出口增长率下降，国际收支失衡。从1997年2月份开始“赋闲在家”的索罗斯嗅到了这个与他相隔万里的小国的汇率即将贬值的气味后，即筹划攻击泰铢，开始大量出卖泰铢。为了保护泰铢，泰国实行了对资本流动的管制，不让国际投机者得到泰铢。所以，索罗斯的两次投机无功而返。损失了好几亿美元。但索罗斯不是一个轻易认输的人。他认定，由于一段时期以来美元不断升值，与美元挂钩的泰铢迟早会贬值，而他的“任务”只不过是让这一天早点到来。

索罗斯开始行动了，他的做法很简单：他开始散布谣言。他的话对全世界投机倒把分子就是金科玉律。谣言在全世界不径而

走。6月27日的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写道：“像索罗斯这样的大投机家不排除使泰铢贬值20个或者更多个百分点的可能性。”这等于对泰铢判了死刑，现在全世界投机家都知道这一点：卖掉泰铢，卖掉泰国股票。

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泰国政府无能为力，最后的出路是自7月2日泰国官方实行浮动管理，放开泰铢汇价（过去是同美元挂钩），其后果是泰铢贬值15%（一美元折30泰铢），泰国政府市场价是1美元兑换32泰铢。商界人士称1美元兑换35泰铢已是情理之中。泰国通货膨胀由5%左右现已上升到10%甚至更高，泰国政府在7月2日放弃固定汇率制的同时，中央银行宣称其将支持除16家麻烦最大的金融公司，后来迫于外交压力，中央银行重对这16家金融公司予以支持。泰铢的大幅贬值导致了金融动荡，大批外资撤离泰国，通货膨胀导致社会混乱，泰国政府又没有拿出什么有效抑制通货膨胀和泰铢进一步贬值的举措。在这种情况下，泰国也许会发生军事政变。公众渴望政治改革。军方高级官员正努力使军变的危险性得以缓和。泰国此次金融危机已开始在东南亚国家引起连锁反应，印尼盾受波及首当其冲，7月初，每美元兑印尼盾为2450左右，8月19日曾跌穿3000关口，贬值达20%以上。其次，马来西亚受到冲击，1美元兑换2.2马来西亚元，菲律宾比索，韩国也成了新的受害者，新加坡元、台币都难以幸免。整个东南亚陷入一片的经济危机中。

远在曼哈顿的乔治·索罗斯乐观地看待着东南亚危机，事情正像他所预料的那样一步一步向前发展。索罗斯在耐心地等待泰铢落到最低点，然后便大量买进泰铢和泰国股票，全世界投机倒把分子都在等待泰铢和泰国股票，全世界投机倒把分子都在等待索罗斯发出信号。他一购买，大家都跟着购买，泰铢和股票也跟

着上涨。行市上升，交易所的交易赢利便源源不断地流入他的私囊。

乔治·索罗斯以他以往的两次经验知道泰国及整个东南亚会对他的行动采取反击，他已经准备了足够的美元与之抗衡。

泰国政府做出了积极的反击。8月11日，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领导下，主要亚洲国家提供给泰国168亿美元以帮助泰国偿还金融债务，平衡外汇储备，稳定泰铢。泰国政府于6月份关闭了16家金融公司，8月份再次关闭42家。这些公司被要求与银行或其他公司合并，或者服从别的重组计划，泰国政府决定削减1998年度财政预算开支，由9500亿泰铢减为8500~8900亿泰铢。

面临经济危机的泰国大骂索罗斯并说要抓住他判刑。对此，索罗斯表示沉默，而量子基金的经理斯坦利·德鲁肯米勒在泰铢贬值之后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承认：“我们赢利了。”

乔治·索罗斯攻击东南亚的金融游戏成功了。他迎来了90年代量子基金的第三个胜利。这个站在经济危机之上赚钱的世纪黑手正沉浸在自己的成功之中，同时，他还要对自己的金融投机理论侃侃而谈。索罗斯相信，金融市场由不合理的心理所推动。1992年英镑危机后，他接受《时代》杂志社访问时表示，任何外汇系统都会有瑕疵，存在越久，瑕疵就越多。欧洲如果要避免这些瑕疵，就要消除外汇系统，采取单一货币。当他一手制造了泰国及整个东南亚经济危机后，他就像一块石头一样沉默着，而石头的背后是数不清的属于他的美元。90年代末期的最后三年，整个世界都在担心索罗斯下一个目标会是谁。

犹太人：血里的声音

从 1969 年开始，乔治·索罗斯以 400 万美元起家，经过 28 年的经营，其个人及量子基金会在当代世界发生了重要作用。我们不妨再来重新回顾一下他的整个发迹史及荣誉史。

1969 年 创建量子基金会。

1979 年 领导投资高科技股。

1979 年 创立开放社会基金组织（纽约）。

1980 年 获牛津大学社会研究学院博士学位。

1984 年 建立索罗斯基金组织（匈牙利）。

1987 年 撰写《金融炼金术》一书。

1987 年 建立索罗斯基金组织（前苏联）

1988 年 设立了覆盖 25 个国家的基金网络体系。

1990 年 成为设在布达佩斯和华沙的中央欧洲大学创始人。

1990 年 撰写《苏联体制的开放》一书。

1992 年 击垮英格兰银行。

1993 年 建立布达佩斯开放社会协会。

1994 年 导致墨西哥比索贬值四成。

1995 年 波洛尼亚大学授予他最高荣誉。

1996 年 撰写《索罗斯看索罗斯》一书

1997 年 制造东南亚经济危机。

1997 年，67 岁的索罗斯设立的基金会在全世界有 50 多家分支机构，其市价总值达 70 亿美元。目前，他拥有的个人资产已高达 25 亿美元以上，他所控制的财产有 180 亿美元，而受他影响的国际资金更是一个天文数字，据最保守的估计也有上千亿美元，这

相当于一个中等发达国家的全部外汇储备。

全世界对这个亿万富翁褒贬不一。有人骂他是金融疯子，有人称赞他是体面的慈善家，有人说他是本世纪最表里不一的君子，有人钦佩他是史无前例的伟大的基金管理人等等。索罗斯多年老友——摩根·斯坦利资产管理公司老板巴顿·比格斯称赞他对市场有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直觉。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痛斥索罗斯的投机毁掉了他们几十年的努力，是真正的幕后黑手，泰国前财政部长指责他为金融强盗，欧洲人对他恨之入骨，美洲人对他晃动拳头，而亚洲人尤其泰国人恨不得抓住他送进大牢。在遭到如此之多的痛斥指责后，乔治·索罗斯丝毫没有停滞自己的金融游戏进程，同时对世界格局侃侃而谈，这一次是一窝端，从经济到政治再到文化及历史，所言所谈无所不包，他自信这个对世界指手划脚的位置非他索罗斯不可。在进行制造经济危机的同时，他还不可思议地出巨资用于慈善事业。

乔治·索罗斯尽管完全有财力享受世界上任何一种奢华的生活，但索罗斯对此却很少有兴趣，他真正的爱好是为别人花钱。如果他对某个慈善项目感兴趣，索罗斯就会慷慨解囊向其资助。为此他可以一天之内掏出1亿美元。例如，波黑战争期间，他捐资5000万美金以上，用以在受战争破坏的波黑采取援助措施和在萨拉热窝建造一个紧急供水系统。为了防止俄罗斯科学家在苏联解体之后为中东的某些极端主义者服务，索罗斯承担了他们接近1/3的年薪。

乔治·索罗斯也许是世界上最大的慈善家。他出巨资设立的基金会即“开放社会研究所”在全世界有50多家分支机构，雇员超过1000人。索罗斯自认自己是个神，他想拯救整个世界，他对极端政权不遗余力的反对，他对世界充满改良的愿望，在政治中，

他奉“开放社会”为圭臬的政治主张。他每年拨出3~4亿美元用于他的开放社会研究所。

纽约开放社会基金组织成立于1979年，在世界各地都有营运。其宗旨是采取各种方法来推动金融的发展，提供文化、教育、社会的合法改革。纽约开放社会基金组织是索罗斯基开放社会基金网络组织的一部分。

索罗斯基金网络组织是他建立的无数非营利基金和组织联系在一起组成的一个非正式的网络机构。这个网络机构的中心是一些自治组织，其名为国家基金，涵盖31个国家，包括中欧、东欧、欧亚大陆中心、南非以及美国。这些基金组织都有一个共同的使命，那就是支持自由经济世界的发展。为了这个目的，他们支持和实行了一系列的计划和教育项目，国民社会，独立的媒体宣传，国际互联网以及电子邮件通讯等。在索罗斯基金网络组织之外，他还建立了诸如中央欧洲大学、国际科学基金和开放宣传研究协会等机构。1996年，这些机构组织共计花费3.6亿美金用于慈善项目。

乔治·索罗斯于1984年创立的匈牙利开放社会基金组织，常任理事包括里昂惕夫、凯瑟沙宾和索罗斯本人。其目的是“支持匈牙利社会的进步，支持文化—教育的创新。”它提供奖助学金，捐助图书馆和其他机构，支持研究社会变迁以及经济学和心理学。它同时也资助教育、艺术及其他领域。索罗斯说它已经成为匈牙利的“另一个文化部”了。

苏联开放社会基金组织在经济文化领域上支持戈尔巴乔夫的“新思潮”。它曾经与戈尔巴乔夫文化基金会合资过，不过苏联解体后变成独立的基金会，叫作“文化创新”基金会，他最初成立的目的是鼓励科学家和学生出国进修访问。

索罗斯幼年时在纳粹的高压统治下饱受摧残,因此在他成年之后,他渴望建立一种开放社会,他的基金会就称为开放社会基金会,他在政治上对极权主义的竭力反对者。他致立于实现开放社会,促进批评性思考,他于1994年设立的“缅甸计划”,目的是为了促进国际社会对缅甸政治形势的关注,该计划的主要受益人是缅甸难民,尤其是那些表示将来要返回缅甸从事社会活动的青年学生。

索罗斯在1997年2月号《大西洋月刊》上刊登题为“资本主义的威胁”的长文指出,开放社会的最大敌人是来自资本主义的威胁,对成功的崇拜已取代了对原则的执着,社会失去了稳定的力量。许多人都认为,索罗斯是一个令人难以捉摸的双重性格者。他在放任的资本主义世界赚大钱,却对它作出批评。美国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经济学教授代克认为,索罗斯是最佳基金经理,但其所谓的投资理论是一团糟的理论。但索罗斯就是在“一团糟理论”的指导下,于1992年击垮英格兰银行,1994年导致墨西哥比索灾难性贬值,1997年制造了东南亚金融危机。

索罗斯的投资理论认为市场变幻无穷,无法测定,正因为如此,才有机会出奇不意赚大钱。1969年,索罗斯为自己事业的开端

量子基金取名时,灵感来自于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量子力学粒子的行为是不可能精确测定的)。海森堡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的“测不准原理”竟会成为一名投机家投机理论的灵感来源。正是因为有了索罗斯的投资理论,才有了当今世界金融界的灾难。

今天的索罗斯一边侃侃而谈自己的投资理论,一边积极倡导建设开放性社会,一边不动声色地制造金融界危机,当全世界的人对这个风云人物褒贬不一时,索罗斯“赋闲在家”,打着心爱的网

球，享受着生命的欢乐。1979年，他的第一任太太苏珊·韦伯结识他时，他住在纽约曼哈顿一处陈设简单的狭窄公寓里，屋里只有几箱满满的书与若干衣物。六年后，他们结婚并有了第一个孩子，苏珊才说服索罗斯搬到更宽敞的房子，由于他对身外物兴趣不大，他的衣服、鞋子甚至眼镜都是太太为他打点。除了爱好网球外，他只收集一些东欧的小艺术品，但没有什么昂贵的嗜好。

不过，他虽然自奉甚俭，对别人可慷慨得很。只要他钟意某项计划，他可以在几天内奉上一亿美元。索罗斯最大的心愿是拯救全世界，他承认有时候甚至会视自己为上帝。他曾经捐助5千万美元以上救济战乱中的波斯尼亚，同时，他又支付全俄罗斯科学家将近1/3的年薪，以免他们在苏联瓦解后投入一些危险国家的怀抱中。

索罗斯是位受挫的哲学家，他改善世界的志向，和他个人的历史颇有关系。然而，他的苦行与他的主张或作为却存在着难以解释的矛盾。例如，他认为过度的资本主义已成为自由人性的最大威胁。他说：“我必须不断警告盲目信任市场的危险，政府的谬误在于听任市场存在着投机空间。

根据索罗斯自己的评估，他自己离疯狂也不会太远。他的祖父是个偏执狂，他自己也常有发疯的幻觉，他曾幻想自己得了心脏病，实际他的心脏很好。对身体的顾虑使他开始思考人生，于是创立开放社会基金会。1970年，他的第一次婚姻破裂，但这并不影响他对家庭生活的信念，有时，心血来潮他会携上第二任妻子到世界各地旅游。索罗斯去过世界许多地方，也遗忘了许多地方，但有一个地方就像他的生命本身一样跟随着他，那就是他的出生地匈牙利的布达佩斯。索罗斯今天对世界上各种血统的人发表自己的声音，但他只对一种血统的人沉默，那就是犹太血统，他的血管里流淌的正是犹太人的血。

不论今后的索罗斯对世界金融界还会有什么“胡作非为”，也不论他的开放社会理想能否实现，也不论他的个人生活将如何延续下去，那只是今后的索罗斯了，而在 67 年前的一个普通夜晚，如果没有索罗斯母亲来自腹部的阵阵剧痛，今天的世界将完全是另一番景象。

索罗斯与我们这个时代

第三部

应该促使金融交易像水一样流动，
流动才有机会，聪明的人应该在对手犯
错误时，在他不知不觉中取胜。

乔治·索罗斯

第一章

老虎是可以伤害的

随着亚洲“四小龙”的成功,带动了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等四个国家的经济起飞,它们被称为“亚洲四小虎”。以泰国为例,从 1971 年到 1996 年,泰国经济年增长率高达 8% 以上。这样的一种繁荣局面,既鼓舞人心,也可以使人丧失清醒的头脑。泰国历届政府和经济界人士,没能利用这样的大好局面,结合本国资源情况,适时调整产业结构,而一味地在最初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形成泡沫化经济,尤其是在金融领域的失误。

德国《经济周刊》在谈到这次泰国金融市场动荡的成因时更为直接,1997 年 7 月 10 日一期刊登署名文章说:“亚洲的崛起似乎是不可阻挡的,但泰铢大幅度贬值的情况表明,老虎并不是不可伤害的。有一个人被认为对此负有责任,这个人就是索罗斯。他和其他一些大投机者自 2 月份以来一直对泰铢发起进攻,直到政府终于屈服,使泰铢与美元脱钩”。

点火就着的空中楼阁

泰国及东南亚国家此次遭受重大打击的根本原因是其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主要靠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拉动。为了适应这种情况，制定了一些风险很大的金融政策。近年来中国、越南等国家的经济发展，从它们手里抢走了很大一部分订单，东盟国家经济基础的脆弱性暴露无疑。反观我们自己，特别是南部、东部沿海地区，一时间变得似乎很繁荣，发了财的人洋洋自得。兴奋之余切切不可忘记，这些地区是在走东南亚国家的老路，别人今天遇到的，明天也可能就降临到我们的头上。因此，认真分析一下泰国及东南亚国家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对我们的经济发展大有好处。

在过去的几年中，由于看好泰国的经济发展，泰国的房地产开发商们从银行和金融公司大举借款，投入到房地产开发中去。泰国首都曼谷以旅游业驰名世界，它吸引了几乎全部的泰国新生资本和大部分海外投资。各式各样的西式酒吧和新型汽车展示中心如雨后春笋遍布曼谷街头，高层建筑林立，整个城市成了一个巨大的建筑工地。但是，对房屋（特别是办公楼、公寓）的需求并未像房地产商们所预期的那样迅速增长。到目前为止，泰国办公楼的空置率已高达 21%，位于曼谷商业区的房屋价格下跌了 22%，由于经济运转的惯性，过去开工的建筑面积仍在不断竣工，使目前的这种局面愈加严厉。

人们都知道，各国房地产业的运转没有银行和金融机构的支持是不可能的。泰国有 91 家财务公司，其资产的 30% 都借给了房地产行业做为贷款。房地产商们的发财计划是以房地产价格会持

续上涨为基础的，因此才容忍了劳动力价格上涨（实际后面是一连串的上涨，如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因素。现在，售房发财的计划遭到重创，房地产商又不愿将价格降下来（他不愿为此蒙受巨大损失），出路只有一条，拖欠银行贷款，经济学上称之为“不良债权”。

不良债权现象并没有逃过有识之士的眼睛，他们早就意识到泰国金融问题的严重性。从1995年起，投资者就已开始抛售不动产股票，造成泰国股市下跌。1997年以来一再出现严重的金融机构挤兑现象。3月3日到3月5日，短短3天内，泰国储户就从银行和财务公司提走了300亿铢存款，一些重要的财务公司面临倒闭的危险。

更大的危险还在于，泰国的政界、经济界人士只把眼睛盯在出口增长上（实际上这几年泰国的出口量已经发生锐减），而忘记了泰国还是进口商品的大国，庞大的外贸逆差把出口的增长抵消殆尽。以1995年为例，当年的出口总额为13890亿泰铢，比上年增长24.3%；而当年的进口总额为17680亿泰铢，比上年增长31.5%，贸易逆差3790亿泰铢，贸易逆差额占出口总额的27%。表面上看，繁荣的景象依旧，泰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比之战火连天的邻国柬埔寨不知要高出多少倍，但实际上经济形势已开始发生根本性的逆转，危机一触即发。房地产业这个经济发展的晴雨表上的指示非常明确地说明了这一点，可大多数人还蒙在鼓里，沉醉在灯红酒绿之中。

1997年7月2日，泰国的老百姓们一觉醒来，发现自己手中的存款和现金贬值了1/5。为了控制日益恶化的金融形势，泰国政府痛下决心，汇率与美元脱钩，实行浮动汇率，泰铢一夜之间贬值20%。对于很大一部分商品依赖进口的泰国来说，人民生活遭

受重大打击。

恶梦醒来是早晨。1997年7月28日出版的美国《商业周刊》载文说：“像拉美人一样，亚洲人曾经花钱大手大脚。现在像欧洲人、墨西哥人甚至日本人一样，亚洲人正在为此付出代价。”吉隆坡国家招商银行执行董事甘朋说：“吃一堑长一智，今后要量入为出，否则金融市场也会强迫你这样做。”

自由就是许进也许出

造成这次泰国及东南亚国家金融动荡的原因，除去产业结构不合理外，过分依赖外资流入推动其经济发展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据统计，1986~1989年，东盟国家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累计为700亿美元，占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总额2000亿美元的1/3。泰国在1960年开始执行第一个5年计划，投资总额为212.6亿铢，其中国家投资138.8亿铢，占65.25%，外国资本为69.2亿铢，占32.35%。1960~1980这30年间，泰国的人均外债额为39.4美元。而到了1996年，人均外债高达1562美元，这样多的外债，随时都可能成为国家经济发展中的定时炸弹。

说到外债给人民生活造成的痛苦，中国人的感受是非常深的。60年代初，为了偿还前苏联的债务，全国人民节衣缩食，度过了一段十分惨淡的日子。治大国如烹小鲜，管理国家就好比当家过日子，寅吃卯粮早晚要出事。你允许人家进来也要允许人家出去，靠花别人的钱过日子，早晚要受制于人。我们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不良债权也同样困扰着日本，泡沫经济的崩溃造成了日本经济长达6年在低谷徘徊。但日本与泰国不同，泰国是一个资本输入国，而日本是一个资本输出国，不良债权问题对各自货币稳

定性的影响是不一样的。为了处理好不良债权，日本金融海外（特别是从美国）抽调回大量资金（把美元资产换成日元），结果从1994年到1995上半年，日元对美元非但没有贬值，还不断升值，呈坚挺之态。泰国的情况则根本不同，经济情况的恶化造成大量资金外流，这时可以选择的处理方法之一是泰铢贬值，降低出口产品成本以期望增加出口，挽救败势。但泰国为了吸引外资，维持较高的利率，长期以来一直实行泰铢汇率与美元挂钩，一同波动。近年来美元坚挺直接造成泰国进口商品价格升高，从而使劳动力价格等一系列的价格也随之升高，造成出口商品价格升高，出口量锐减，外贸逆差加大，经济形势恶化，大量资金外流，形成了恶性循环。原想留住人家，没成想反倒把人家请了出去。

为了吸引外资，泰国一直实行高利率政策。1996年泰国优惠利率一直在13.25%的高水平上，是亚太地区利率最高的国家之一。1996年2月流入的外国资本比1995年同期增长了10亿美元，达到387亿美元。这些流入的外国资本大部分流入房地产业、股票证券等领域，不能直接产生生产力。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其他东南亚国家。菲律宾1962年宣布取消外汇管制，1970年开始对外国资本实行更优惠的政策，到1986年，为了刺激经济增长，采取了税收优惠，允许外资利润自由汇出等政策。菲律宾3个月期的银行利率为9.9%，高出美国银行利率一倍。但大量外资流入后都转向了风险大收益高的证券业，这种短期资本一遇风吹草动，就会立即退场，给菲律宾的货币稳定带来极大的威胁。

对外资敞开大门，肆意借贷的行为虽然在短期内刺激了借款国某些经济领域的蓬勃发展，但同时也把另一些重要的经济领域推入了艰难之中。肆意借贷和流入外资的去向，直接刺激了整个社会的消费欲望，其直接结果就是储蓄率降低，劳动力成本增高，

这就使那些急需得到资金帮助的经济部门，如基础产业部门的日子更如雪上加霜，同时整个国家的金融形势、经济形势也更加风雨飘摇。连泰国总理也承认，肆意借贷是产生泰国金融危机的根源。

从金融的角度看，人为地维持固定汇率是东南亚各国货币管理体系中的重大缺陷。80年代起，这些国家为了扩大出口，吸引外国资本，都将本国货币与美元挂在一起，实行固定汇率。本来，一个国家的货币与国际通行的结算货币（如美元或瑞士法郎）之间的比价，应该真实反映这个国家的经济情况，也就是说汇率是应该随着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情况上下浮动的。从实践的角度看，有时出于某种考虑，可以将汇率固定在一个范围内，但有两点应该明白，一是这种办法只能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不能把它作为一种长期的政策来应用；二是要有相应的准备来应付突发事件。以泰国为例，泰国中央银行采取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的主要考虑是：首先稳定的汇率能加强外国投资者的信心，使他们不至于在泰铢实际价值升高时蒙受损失；其次想以此来防止进口商品价格的上升而导致通货膨胀；三是有助于出口商的成本核算，有利于出口稳定。抱着这样的目的，泰国从1984年至1997年7月坚持13年泰铢与美元挂钩，实行固定汇率。在这13年中，泰国经济发展经历了从上升到下降的过程，而美元则从长期的疲软逐步走向坚挺，这种错位使得泰国经济蒙受了巨大损失。初期，以实际的经济形势为依据，泰铢本应坚挺，出口商品应该获得比较高的利润（当然，出口商品价格上升也有可能造成出口量减少，这二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实际情况是泰铢同美元一起疲软，损失了一部分出口商品的利润，同时在进口商品时，又要多付出一部分钱。这一出一进，一多一少，损失不小。到了后期，泰国经济形势不好，

出口量锐减，本应利用其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增长出口，扩大市场占有率，实际情况是泰铢与美元一道虚假坚挺，为本来就已经萎缩的出口贸易又设置了一道障碍。同时，泰铢这种虚假坚挺还为那些富可敌国、随时准备出击的西方金融投资机构提供了攻击的最好时机。这些投机者趁泰铢坚挺与实际情况脱节的机会，先从国际金融市场大量借入泰铢，然后在外汇市场上大量抛售，买进美元，待泰铢贬值后再用低价（即较少美元）买回相应数额的泰铢，以偿还借款，其余所剩美元即为投机之利润。转眼之间，大发横财。

历史总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这小节的标题可以这样理解：泰国政府没有吸取当年墨西哥金融危机的教训；或者说，乔治·索罗斯轻易地两次渡过同一条河流。

如果你不是十分健忘的话，一定还记得1994年底、1995年初在墨西哥发生的金融危机，从危机的严重程度或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来说，墨西哥的危机要严重得多。当时美国宣布提供500亿美元的紧急援助计划，而泰国危机发生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制定的援助计划是160亿美元。墨西哥当年1600亿之巨的外债也比泰国多得多。加之1994年先后发生了恰帕斯农民起义、执政党两位领导人遇害及美国银行提高利率等一系列突发事件，墨西哥所经历的社会、经济、金融动荡是前所未有的。

认真回顾一下在墨西哥发生的事情，会发现许多与泰国金融危机相似的地方，乔治·索罗斯也同样插手过墨西哥的事情。而在这之后，1995~1996年，世界金融领域还爆发了巴林银行倒闭

事件，阿尔巴尼亚集资风波等恶性事件。人们不禁要问，泰国及东南亚的有关人士，为什么没有及早采取措施呢？

当年，发生在墨西哥的那场金融危机，以货币大幅度贬值、股市狂跌、外汇储备急剧下降、外资出逃为主要特点。很短的时间内，有180亿美元的外资被抽走，整个国家的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不少上市公司面临破产，各种金融机构之间相互拖欠，通货膨胀率回升到二位数，失业率大幅度提高，外贸逆差加剧，人民怨声载道。

墨西哥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它所走的道路很有代表性。实行经济调整 and 改革以来，墨西哥先后加入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北美自由贸易区，急速地、大幅度地降低进口关税和减少非关税贸易保护，对外国商品敞开大门，仅存的一点税收措施根本无法抵挡蜂涌而来的外贸商品，外贸逆差高达280亿美元（1994），相当于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8%~10%，大开国门的严重后果是，本国的农业和传统工业受到极大冲击，粮食产量连年下降，近50%（7000家）中小企业破产倒闭，社会矛盾日益激化。

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墨西哥采取了高利率的政策，吸引外国游资，想以此来平衡国际收支，加强外汇储备。这种做法无异于把绞索往自己的脖子上套。当时的墨西哥，日后的泰国在做出经济决策时都没有把自己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这个因素充分考虑进去，盲目照搬西方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这个理论主张经济自由、市场自由、贸易自由，实质是只有资本拥有者才拥有自由，资本越多自由越大。而私人资本为了追求高额利润，纷纷投入到股票证券市场，即使是直接投资，也多投向能短期见效的第三产业，传统工业和农业领域投资大、周期长、回报率低的项目无人问津。

投资结构不合理，造成整个国家的经济畸型发展、基础产业日益萎缩，经济发展泡沫化严重。

发展中国家在为发展本国经济筹措资本时，应该以本国资本为主、外国资本为辅，这是个基本原则。危机暴发前，墨西哥国内的储蓄率只有15%，大大低于亚洲国家34%的水平，做为政府和金融管理部门，没有采取适当的措施和政策来鼓励人民储蓄、开发本国资本，而把解决资金缺口的希望放在了外资上。虽然通过提高利率等手段，大批外资引进来了，但这些外资中，直接投资所占份额很小，1994年进入墨西哥的外资总额中，证券投资占80%左右，主要用于购买墨西哥政府发行的国库债券。这种间接投资一般并不形成新的生产力，具有鲜明的投机性，一旦受资国政治、经济形势恶化，或者国外金融市场的回报率升高，这种资本就会在短期内外逃，如果数额巨大，就会严重影响受资国金融市场的稳定。目前，以索罗斯和量子基金会为代表的这类国际游资有数千亿美元，为了追逐高额利润，犹如幽灵般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横冲直撞，破坏力极强，利用这部分游资要有充分的准备，慎之又慎。

实际上，如果对引进的外资不加以引导，即便是直接投资，也不一定就能对受资国经济产生良好的推动作用。以墨西哥为例，进入墨西哥的外国直接投资，大部分投入了商业、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投入制造业的外国资本，又大都用于开办来料加工、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企业，投入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很少，更不必说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业了。劳动密集型的外资企业，固然可以创造出一定数量的就业机会，提高这些部门的生产效率和管理水平，并可增加出口收入，但它们对于提高受资国经济发展的持续动力的作用有限。虽然墨西哥是拉美地区吸收外资最多的

国家，但它的经济发展水平并没有明显的提高，经济增长率始终处于3%以下的水平线。再来看看泰国，虽然泰国经济这些年来维持了一个比较高的增长速度，但投入泰国的外国资本并没有象预期的那样起到很大的作用。1996年进入泰国房地产业的直接外资为188.1亿泰铢，占外资总额的1/3，经由前面的阐述我们已经知道，泰国房地产业已经4年严重过剩，陷入低潮，银行的不良债务大幅度上升，到1997年7月已达200亿美元。这些外资非但没有起到促进泰国经济健康发展的效果，反而打乱了金融市场的正常运作，并且泰国还为这些外资付出了高额的利息。

墨西哥、泰国的经验告诉我们，吸引外资不是目的，而只是发展本国经济的手段之一，筹措资金应以提高国内储蓄率为主要手段，吸引外资只是为了弥补本国资本的不足，不能为主，只能为辅。对证券投资的风险要有高度的警惕，对外开放证券市场要慎之又慎，对外国直接投资也要有明确的产业导向政策，要把有利于提高本国的工业化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做为引导外国直接投资的方向。

泰国经济在近十几年来一直受世界各国羡慕，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为发展中国家树立的榜样。墨西哥的经济起飞，也曾被誉为拉美经济的奇迹。为什么两三年的时间里，它们都相继走到崩溃的边缘呢？讨论起来，固然可以从经济、金融方面找到原因，问题是：经济、金融方面的危险在这两个国家展现得非常充分，稍有经济学常识的人都能看到，那些制定政策的人不可能看不见，他们为什么执迷不悟。

法国《回声报》8月22日刊登了一篇访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康德苏的文章，康德苏在谈到泰国金融危机时说：“我希望泰国的危机能够证明，对于每一个国家和涉及到的国家来说，当一

种危机正在酝酿发展的时候，过多地等待观望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没有在1996年6月而是拖到了1997年7月才采取行动，这使泰国人在预算努力、银行地位和货币储备等方面都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对于其他那些为保护环境和市场躁动所害的国家来说，代价也是很大的。在当今的整体化市场上，每一个国家都应当考虑随时堵塞那些在宏观经济平衡方面显露出的缺口，并且行动要快。这种责任意识是团结互助法典中的第一条。资助别的国家，这是不错的，但自己做得好，那就更好了。我还要在今年在香港举行的年会上再次重申这一点。”

康德苏谈到了经济金融原因背后的原因：

“拿泰国的问题来说，我们就遇到了好多的困难。其中之一纯粹是文化方面的：当一个国家正在坚持努力并正执行着一项在10多年中已经带来了很大成绩的政策的时候，那是很难让它相信情况已经有了变化，很难让它相信现在已经到了采取调整措施的时候了。此外，危机也正好发生在这个国家难于管理的时候。再说，泰国政府当时的重点也不放在维持良好的金融秩序上。它不否认要处理财政平衡和银行的呆账，但没有把问题看得那么严重。在它看来，最重要的是要维持其经济增长，那怕是采取凯恩斯主义措施也罢。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来说服它要把重点颠倒过来。但如同我们在前面所说的那样，我们不是万能的，我们只能在他们的政府同意的情况下才能采取行动。如果在1996年夏天就着手处理的话，这场危机本来是可以在不影响到其邻国的情况下就得到解决的。而后来它却终于成了一场地区性的严重危机。”

东南亚的经济还会有奇迹吗

1994年，美国的经济学家克鲁格曼针对东亚的经济形势提出了一个命题：“东亚无奇迹”。这一命题的核心思想是，东亚地区经济的高速增长并非什么奇迹。所谓的“奇迹”不过是依靠资本和劳动力的持续投入带来产出扩大效果时，呈现出来的一种现象。一旦投入告一段落，增长也将随之停止。由于劳动力投入无法再增长，教育水平无法再提高，资本积累也很难维持在高水平上，而外国资本的投资目前也多是投到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投入也以拉美国家为主，并不是东亚。所以他断言，一方面不存在什么“东亚经济增长奇迹”，另一方面东亚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不久就会慢下来，追不上西方国家，下一世纪世界经济增长的重心不在东亚，而仍在西方（编者注：克鲁格曼的东亚概念是东亚、西亚之一，包括东南亚）。

显然，克鲁格曼的理论同当今流行的一些说法，如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中国将是21世纪发展最快的国家、将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下一个世纪世界的重心将从环大西洋转变成环太平洋等等背道而驰。有关中国的经济发展应该从这次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吸取什么样的经验教训，我们将有专门的章节讨论，这里重心只着眼于东南亚国家。

不可否认，克鲁格曼命题在理论上有真实的一面，有可取之处。东亚地区的经济，无论是高出口增长率还是高经济增长率都是靠低工资和高储蓄率来支撑的。即使像起步较早的韩国、台湾在世界市场上所依赖的仍然是它们的价格优势。在价格优势完全丧失之前，企业缺乏技术创新的动力。不过，什么事情都不是绝

对的，虽然东亚经济区近一两年呈现增长减缓的趋势，但它仍然是世界上经济最活跃最有希望的地区之一。相比之下，西方经济虽然是以技术领先带动的，但各种因素综合的结果，它整体的面貌已经呈现步履维艰之相。反观东亚，虽然走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经济还需一段时间，但是已经有一些企业通过自身的努力开始以技术领先的面貌出现在各自的生产领域。像台湾的宏基公司，它开发生产的微机以其优异的性能，引人注目的外型设计跻身于世界名牌微机之列；韩国的电子工业以生产计算机显示器和存储芯片闻名，前不久，韩国最大的电子公司三星公司收购了美国的AST公司，这意味着三星公司可以得到AST多年来从事微机制造的经验，深入了解美国微机制造业的发展情况。这样的例子还很少，还不足以说明东亚地区的经济类型已经有了改变。但它至少说明，东亚人并没有盲目沉浸在自己的经济成就之中，它已经在寻求更高层次的突破。

应该说，克鲁格曼在建立“东亚无奇迹”这个命题时就犯了一个概念上的错误：所谓“奇迹”必须是打破了常规，而东亚的经济增长方式并未打破经济增长的常规，因此所谓“奇迹”的说法更多的是一个宣传上的结论而不是经济学的严肃结论。经济增长的减速并不等于停滞，它只是不会以现有的速度继续增长下去，但仍然会保持一个较高或中等的发展速度，可以说，某些发展较早的国家和地区，如韩国、台湾从理论上讲已经进入了所谓经济成熟状态。

克鲁格曼命题的另一个核心观点是：如果东亚经济不能以目前这种高速度增长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它就无法缩小乃至消除与经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平心而论，这个观点存在着很强的西方人的偏见和盲目自信。首先，种种迹象表明，西方经济的问题

越来越多，就是在领头羊美国，也暴露出了很多致命的问题，制造了泰国、墨西哥金融风暴的索罗斯也曾与英镑和里拉长期为难，造就了欧洲汇率危机，终于迫使这两种货币相继退出了欧洲货币机制。谁也不能保证，西方经济会在一片“经济衰退”（其实是患病已久）的经济衰退的传染病中起死回生，里拉如此。

由于东亚国家（中国大陆地区除外）的产品结构受时间限制，有很大一部分是电子产品，因此它的经济增长率在很大程度上受电子产品需求影响，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目前东亚的情况，只是一次世界电子产品需求周期波动的结果，仅仅以此为依据来断言东亚经济已丧失活力还为时过早。

“克鲁格曼命题”为东亚经济敲响了警钟，现在的确是东亚国家调整生产结构、改变增长方式的时候了，否则一旦“克鲁格曼命题”成为现实，那将是整个东亚人的悲哀。对中国大陆地区来说，能从克鲁格曼的理论中吸引有益的警告，对于指导这一地区经济的发展有不言自明的好处。中国大陆地区的经济总的说来属于混和形态，这些年经济增长的确有很大一部分靠的是东南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拉动，但这些地区的经济形态并不能代表整个中国大陆地区的形势，由于内陆地区发展的相对滞后，为选择发展模式提供了相当大的空间。同时，虽然就总体而言，中国大陆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但它与东亚其他国家相比也有许多意义重大的优势，例如它有一个相对完整的工业基础和框架，有综合实力比较强大的科技力量，同时它本身就是一个大市场，它的经济增长并不依靠出口拉动。如果我们能够适时根据世界和自己国家的形势，根据自己的资源情况，选择好适合这一地区发展的模式，中国将成为东亚经济新的持续增长点，中国的市场发育还处于初期，还有着极大的成长空间。

第二章

国际金融的 八卦阵和游击军团

1995 年 2 月 27 日，英格兰银行宣布，巴林银行因从事金融期货交易失败损失 9 亿英镑。这一损失已经超过了巴林银行的资产总值，使得这家有着 200 年历史的银行最终不得不宣布破产。同年 3 月 14 日，法国政府宣布，法国第二大银行——里昂信贷银行 1994 年亏损 120 亿法郎，负债额达 1000 亿法郎（约合 200 亿美元）。更令人震惊的是，在对该银行的账目审查中发现有约 500 亿美元的“空洞”。这一“空洞”可能是由于里昂银行大规模收购企业时有人舞弊，中饱私囊所致。同年 9 月 26 日，日本的大和银行宣布，由于该行纽约分行对证券买卖管理不善，主管证券交易的井口像英从 1984 年起的 11 年中，擅自出售该行持有的有价证券来填补因从事美国政府债券投资失策而造成的损失，同时伪造有

价券余额证书及隐藏交易确认证书，以掩盖损失。由此而造成的损失总额 1100 亿日元（约合 11 亿美元）。

这些案例只是发生在今日金融体系中众多事件的几个，算不上“大案、要案”，结合前面我们讨论过的东南亚、墨西哥金融危机，足以让我们对现存金融体制的安全性、稳定性产生怀疑：一个小小的交易员能搞垮有 200 年历史的银行，金融投机家的运作已经能威胁到一个国家的安全与稳定。1995 年阿尔巴尼亚发生了恶性集资案，从墨索里尼时代就一直对阿尔巴尼亚怀有浓厚兴趣的意大利人最先举着维和部队的旗帜进来，这样的场面总让我们联想到前些年的阿尔巴尼亚电影、游击队员们与墨索里尼的军队浴血奋战，他们常说的一句话是：“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当然，今日世界与那时不同，法西斯主义早已没有了市场，维和部队也是应阿尔巴尼亚政府的请求才进来的。我们只是感叹，金融风波竟能给我们如此丰富的联想。在现存的金融制度里，即使你非最高决策者，只要把握时机，也能致一家世界级的金融机构于死地，也正是由于现存金融制度的这个特点，给投机者提供了大赌豪赌的机会。以墨西哥、泰国这些金融危机为例，从表面上看，国际金融资本的投机活动是引发危机的直接原因。如果深入研究后就会发现，跨国界的自由流动资本已经衍变成一种无处不在的超经济力量（目前我们还不能说它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力量）。泰国危机发生后，新闻媒介指出，这可能是索罗斯本人对东盟接纳缅甸为其成员的一种蓄意报复，因为当年从匈牙利出逃到美国的索罗斯，一直对所谓极权政府怀有深深的敌意，缅甸政府就在这个名单内。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速，今天的金融运作方式已经越来越简单，越来越直接，越来越适宜赌博。你只要打开计算机，在

键盘上敲出一些数字,就能把大笔的资金从大西洋调到太平洋,从一个国家调到另一个国家,整个运作时间只是数据在国际互联网上奔跑的时间。一个掌握着大笔金融资本的人,比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还要八面威风,他可以捣乱一个国家,使之混乱不堪,这样的效果比搞一次海湾战争有过之而无不及。君不见西方国家耗费了巨大的财力物力,想给萨达姆致命一击,结果事与愿违,伊拉克虽然艰难,却没有倒下。

贪婪地追求利润正把全球金融市场变成一个大赌场,动荡背后的黑手是流动金融资本。金融活动正在最大程度地脱离物质经济活动而独立运转,国际资本成为经济活动中的虚拟资本,像黑色幽灵在世界各地游荡。它不是同产品、产量、贸易顺差或逆差联系在一起,而是与人的心理状态,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内幕、国际国内的风云等等形影不离。目前全世界日货币交易量近2亿美元,其中只有2%与物质生产、交换有关,98%变成了不直接创造价值的金融自身的活动。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索罗斯才能使自己闻名全球,成为黑色幽默式的英雄。全球的经济生活面貌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还会有更多我们闻所未闻的事情发生。

一体化道路还是陷阱

1996年2月1日至6日,在瑞士名城达沃斯,第26届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围绕着“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这一主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与会者包括100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余名政界、企业界和学术界的领导人及专家学者。论坛主席施瓦布和教授在致开幕词时说:“目前世界经济一体化已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进程。”法国中央银行行长特利歇在大会发言时断言:“没有任何国家能脱离

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

当年，纳粹德国的宣传喉舌戈培尔有一句名言：谎言重复一千遍就变成了真理。我们不去考虑所要重复的内容，单就“重复”这个动作而言，戈培尔的话确实道出了人性中的弱点，即人们往往相信媒介的宣传，而不愿去认真研究思考问题。

有关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宣传甚嚣尘上，我们不能说这种宣传是谎言，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各国经济相互渗透相互补充，有利于世界经济长期稳定持续发展。问题是不能盲目地追赶潮流，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做出决定。不结盟运动主席、哥伦比亚总统桑佩尔在谈到世界经济一体化时沉重地指出：“在分配经济利益的蛋糕时，仍然是大块蛋糕分给少数人，其他人只得到蛋糕屑。”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50 年了，这期间世界的财富增加了 7 倍。到 1994 年，世界总产值已经达到了 26 万亿美元。这样巨大的财富是怎样分配的呢？美国《外交》季刊 1995 年冬季号载文指出：“在这个世界上，有 20 多个富国，有 10 多个国家同富国的差距在缩小，还有 140 个国家同富国的差距继续拉大。”文章指出：“30 年前，世界最富的 20% 人口的收入是最穷的 20% 人口收入的 30 倍，而今天这一差距已扩大为 60 倍，而且最富的 20% 人口的收入在世界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从 70% 增加到 85%。”为什么会这样，英国《情报文摘》1996 年 4 月 26 日一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独立于联合国的一些相互连结的超国家决策组织，包括世界贸易组织以及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这种国际体系是西方政界和工业界精英一手建立起来的，目的是保护和追求他们眼中的西方利益。‘西方’就是美国及其盟国。自苏联解体以来，它的权威已经达到近乎极权的程度。”

世界金融市场的进一步自由化和一体化，与上述的世界经济一体化是同步的，金融本身就是经济的一部分。现在，我们再回顾一下泰国、墨西哥金融风波产生的原因，还可以再加上一条，那就是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和金融界人士对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缺乏充分的理解，想尽快穿戴整齐、体体面面去赴富国的宴会，结果适得其反。泰国金融危机发生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组织了大规模的救援活动，中国 and 香港地区各拿出了 10 亿美元参与这一行动。在给予救助的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向泰国政府提出了改革金融制度的要求，当年墨西哥事件的情形也是一样的，墨西哥政府也被要求改革金融制度。当然，从学术的角度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也许并无不好，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富国的角度讲，也不希望发生泰国、墨西哥式的金融风波，因为这会影响全球经济秩序的稳定。但是请不要忘记，现存的全球经济秩序是西方工业国家制定的，每次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就像是划分势力范围的瓜分会。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将自己国家的经济发展完全纳入到这个经济秩序中去，其结果就像桑佩尔总统所说的那样，“只得到蛋糕屑。”

比起西方工业国家相互默契的八卦阵来说，“金融狙击手”索罗斯搞的，只能算游击队式的偷袭。索罗斯一干人所以能为所欲为，并非他们有超人的能力，而在于他们找到了那个可以兴风作浪，乱中取胜的“支点”。他们深知，被他们攻击的国家，早已被现存的经济、金融框架捆住了手脚。从这个意义上讲，索罗斯也算是做了件好事，他把过去许多发展中国家视而不见的东西染黑了展示给大家，把发展后面的黑暗留给我们去思考。

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中指出：“只要我们注意考察英国的自由贸易的性质，我们几乎可以处处看到，它的‘自由’的基础

就是垄断。”马克思的这段话，可以用来指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本质所在。一体化的口号大家都在喊，每个国家的心思却不同，大家都希望自己能够利用这个大框架达到发展自己国家的目的。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是，既然一体化的框架是西方工业大国提出来的，肯定它首先有利于这些国家发展自己，弱国穷国小国要想从这个框架中得到利益，有时愿望和结果出入很大。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一体化进程的一个产物，签约国中，墨西哥的经济实力、承受能力和竞争力都远不如美国和加拿大。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实施两年多来，美国以强凌弱，频频挑起同墨西哥的贸易争端，损害了墨西哥的经济利益。墨西哥人气愤地指责说：“美国不讲理，只搞强权。”

做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一部分，全球金融的一体化也显现出了它的偏颇之处。工业大国同时也是金融大国，游戏的规则是由它们制定的，其他国家要想参与，只有同意并遵守这一规则，也就是说，必须做出一定的牺牲来忍受那些不适合本国情况的某些规则。泰国、墨西哥的金融危机，直接的原因之一是本国货币汇率与美元挂钩，不能迅速做出反应。当初选择这一办法的时候，也并非不知道其中的危险，只是为了另外一些大的发展目标“咽下这口气”，是一种无奈的选择。1996年5月在美国的新奥尔良举行了西半球国家财长会议上，委内瑞拉财政部长在会上发表了一份声明，声明指出：西半球金融市场一体化需要两个条件：一是美洲地区各国能充分地协调好经济发展进程，二是实现金融一体化必须同各国的社会和政治特点结合起来。显然，这反映了拉美国家在一体化的进程中要求维护本国发展道路和国家利益的共同要求。

一个发展中国家在振兴本国经济、提高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

走全世界共同富裕的道路要遇到各种挑战。很明显，起步之初处于弱者的位置，在弱肉强食的世界里生存，已经是很艰难的事情了。站稳脚根之后，要想求得发展，又必须在维护本国利益的基础上与现存的经济、金融秩序取得妥协，这样才能争取到有利于自己发展的条件。在起飞的进程中，还有随时调整自己的状态，严防索罗斯这类“杀手”的攻击。

偌大一个世界，由所谓的“西方七星”来制定规则与秩序，这不符合全世界人民的愿望。发展中国家要想求得真正意义上的发展，还应该联合起来，向现存的经济、金融秩序发起挑战，改良其中不合理的部分，使之成为对每一个国家都有利，能促进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的大框架。不做到这一点，想在别人划好的球场里比赛，你不可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明天，政治家会沦为附庸吗

量子基金自成立以来平均每年的投资回报率高达 35%，其掌管人索罗斯的投资理论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你只要掌握了其中的契机，运用自己的力量，就有可能使事物朝你所希望的方向发展。索罗斯在国际间建立了庞大的人际关系网络。他通过投资与慈善活动与各国政界要人建立起良好的关系，然后利用这些关系获得一般渠道无从得到的消息，在市场上进行金融炒作。因此，国际金融界有些人指责索罗斯所从事的根本就是内线交易。指责归指责，谁也无法否认索罗斯的力量。

马来西亚《新海峡日报》最近一期刊登一组二幅的漫画，其中第一幅是一名军官从坦克炮塔上探出身来，举手前指，口吐狂言：“进攻，并控制它的经济”，炮塔上有 U. S. A 字样，坦克后面

跟着一队全副武装的士兵。第二幅是现在的情景，金融投机家索罗斯提着装满美元的箱子，带领一批投机商向某国的股票交易市场和外汇交易市场进发，他高喊着同样的口号：“进攻，并控制它的经济。”

很显然，由于索罗斯和他的量子基金会参与一连串重大的金融风波，在一些人眼里，索罗斯和量子基金会的含义已经超出了金融和经济的领域，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称，马来西亚政府已经掌握了确实的证据，证明索罗斯确实参与了炒作泰铢的风波，虽然他不是唯一的投机者，却是始作俑者。马哈蒂尔认为，索罗斯有意透过泰国及马来西亚施加压力，以达到阻止缅甸加入东盟的目的。

今天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有一股妖魔化中国的风潮。其实把那些加在中国身上的形容词用到金融投机家身上更合适，这些投机家和他们所操纵的投机机构，已经具有了一种超经济、超金融的力量，也许用不了多久还会形成超政治的力量，这种超级力量在西方工业化国家默默无闻却极其迅速地生长着。跨国公司就是这种力量的直接产物（量子基金会可以看成是一个跨国的大型金融公司）。这些巨人般的公司，已经在某种程序上脱离开产生它的母体国家独自运转，它的声音无国籍却极具威力。索罗斯直接挑起了泰铢风波，如果与索罗斯和量子基金具有相同能量的跨国公司都企图在这一方面有所作为的话，世界将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在西方的学者中间，有一种深深的忧虑：跨国公司——这些经济恐龙终有一日会自行其事，组织它们的团体与现行的以政治家为主体的各国政府相抗衡。那个时候，如果谁敢于向他们的规则挑战，遭遇的将是灭顶之灾。从政治乃至军事上打击一个国家，

总体说来是间接的，作用有限的；而要从经济上致一个国家于死地，则是致命的，无可挽回的。人们不难想象，这些经济恐龙处理事物的原则，肯定比政治家更冷酷无情，悲观的西方学者认为，自由市场经济的理论已经养育出了它的掘墓人——跨国公司。

1997年，最重要的公司兼并案也许要数美国的波音公司兼并麦道公司这件事。为了同欧洲的空中客车集团相抗衡，扩大在世界民用航空业的市场占有率，波音和麦道选择了兼并、重组和联合的道路。如果说10年前，人们把巨型跨国公司称为“10亿美元俱乐部”的话，时至今日，这些跨国公司已经成为百亿美元，甚至千亿美元的庞大实体。1993年，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资产总额已达1674亿美元，而它的年销售额高达1336亿美元。跨国界的大型兼并屡见不鲜，如澳大利亚报业大王默多克收购了一系列的欧洲和美国的媒体，韩国三星公司以控股方式控制了著名的美国计算机公司AST，1990年，日本松下公司以74亿美元买下美国MCA公司，创下了日本企业兼并的最高记录……。

从80年代末开始，大型的跨国公司之间开始广泛缔结国际性的战略同盟，这种同盟与一般意义上的国际合作不同，它以技术分享为核心，打破了以往高科技企业主要从自行研究开发中取得相关知识的陈规，从而大大缩短了研究、开发、应用的周期。未来的经济竞争实际上是技术的竞争，谁掌握了先进的技术，谁就能抢先占有市场，获得超额利润。在利益趋近的基础上，巨型跨国公司（尤其是同一行业里的几个巨头）之间的战略同盟的形成，实际上是把其他参与竞争的企业置于非常艰难的境地。以中国的彩色胶卷市场为例，现在几乎成了柯达和富士两家的天下，虽然它们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合作协议，但在排挤中国本土产品这一点上是相互默契的。柯达进入中国之初，我们还能看到一种名叫

“福达”的合资产品，与它的老父亲“公元”一道，帮助中国人遮起一部分羞辱。如今，经常能看到唯一国产品牌只“乐凯”一家，它的日子极其艰难。而“柯达”、“富士”固然在攻击对方、算计着怎样扩大市场占有率，但从难易程度上讲，“乐凯”是它们首选的攻击目标。

在金融领域，金融机构间的兼并重组已经是家常便饭了，金融资本的流动非常活跃，相互投资的现象也不少见。当前，美国的国债市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日本投资者支撑着，更为有意思的是，据可靠消息，中国已经成为日本之后的美国国债的第二大外国买主。这一事实充分说明金融全球化的日益深入。

金融全球化的推动力量主要来自于“信息革命”和“解除管制”（金融交易自由化）。随着通讯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如通讯卫星、计算机编程交易、图文传真机、自动转账支付机、电子销售点、电话银行、对谈通讯屏幕、国际互联网，金融交易的速度极剧加快，十几秒钟的差别往往就意味着数以百万计的美元交易的成败。到80年代中期，60%的跨太平洋外汇交易，50%的跨大西洋外汇交易就已经是通过通讯卫星在进行了，今天的百分比更是大大提高。卫星技术的应用大大增强了资金的全球性流动，使得“现货交易”的概念已经需要重新定义。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金融家们获取信息相对容易，速度加快，时差减小，谁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掌握信息，抓住转瞬即逝的机会，谁就能在竞争中获取。同时，由于技术上的进步，也使得那些靠投机吃饭的人获取了较大的生存空间，他们抓住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疏漏之处猛烈攻击，获取暴利。

金融机构间的合并和兼并，使得超巨型的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不断涌现。美国大通银行与化学银行的合并，日本三菱银行和

东京银行的合并，就是这方面的例子。各种巨型投资银行和机构投资者在国际资本全球流动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些超大型金融机构的经营战略完全是全球性的，它们的目标是在全球范围内追求最大可能的利润，民族的概念、国家的边界对这些金融巨头来说已经不重要了，甚至可以说不屑一顾。就像我们在前面讨论过的那样，这些全球性的利益集团已经具备了一种超经济、超政治的力量，成为最大的“黑手党”，如果他们愿意（利益需要），他们可以同时在诸如美国和中国这样相互极不一样并且时有冲突的国家内搞同样的捣乱活动。乔治·索罗斯与东南亚金融风波给了我们一个警告。

在这种情势下，一个国家的经济、金融的安全问题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发展是硬道理，安全是发展的基础保障，没有国家经济、金融的安全，发展便无从谈起。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既要面对由西方大国制定的世界经济秩序，在又遵守又斗争中求得自身的发展，又要防止索罗斯这种大投机家随时发动的游击偷袭。

金融领域的风险固然重要，但更大的危险存在于那些巨型跨国公司对某个国家经济的控制。设想一下，如果我们中国的电子信息产业被美国、日本的公司所控制，汽车制造业完全交给德国人来领导，石油生产交给壳牌石油公司，彩色胶卷只认柯达与富士两家，不再吃稀饭包子，而改吃麦当劳和肯德基，听美国流行音乐，与好莱坞名星在电影院里见面，如果真成了这个样子，我们能够生产原子弹又有何意义呢？如果在我们国家上空飞行的永远都是波音公司或空中客车公司生产的民航飞机，那么我们的空军岂不成了陪衬。

巨型跨国公司之间的联系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向现有的经济

理论提出了挑战。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巴兰森教授认为，跨国战略联盟的兴起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缩短从设计新产品到正式投产的时间，二是分摊高昂的开发投资费用。虽然到目前为止，跨国公司之间的联盟基本上还是经济性质的，跨国公司的母公司所在国对它的影响还十分强大，但有识之士早已指出，自由市场经济这个“潘多拉盒子”放出来的不仅仅是天使，跨国公司这类经济恐龙的出现使我们看见了另外一些东西。

也许，我们能从社会发展史中获得一些有益的启示：在奴隶社会，奴隶和奴隶主是一对生死的手，奴隶社会消亡时，并没有哪一方出现在欢呼的人群中，而是双双躺在坟墓里。封建社会的地主和农民，也同样由于只顾浴血搏杀而忽略了资本主义的萌芽。显然，能够置一个社会于死地的往往不是那些明显的敌人。当今世界，苏联解体，冷战的格局不复存在，虽然失去了对手的美国人极力想把中国拉上擂台，以此来填补其内心的失落感，但中国人并不冲动，不把自己摆在美国对手的位置上。从古代到今天，我们看到的都是国家间、民族间、阶级间的斗争，参加斗争的双方都有很明显的界限，到了下一个世纪，这种斗争模式可能会消失，在世界上称霸和斗争的，可能会是几个世界性的利益集团。

第三章

下一个将轮到谁

据专家们统计,最近 15 年来世界上平均每 5 周爆发一次金融危机。乔治·索罗斯在经历过对英镑—马克、墨西哥比索和泰铢的胜利之后,他的下一个目标是谁呢?

最近一段时间,在美国的新闻媒介上,索罗斯的名字频频亮相,在一个重视金钱和成功的社会里,索罗斯显然可以归入英雄的行列。据可靠信息,量子基金会的总资产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前为 150 亿美元,而到了 7 月底,其总资产已经上升到 170 亿美元。这表明自泰铢贬值引起的东南亚金融风波 7 月初发生以来,量子基金会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就赚了 20 亿美元。这 20 亿美元只是量子基金会一个月的盈利,东南亚金融风波已持续了两个月之久,至今还没有完全结束,在这之中索罗斯究竟赚了多少钱;人们不得而知。

现在人们十分关注索罗斯的下一个目标是谁，据美国《时代》周刊报道，索罗斯本人对他下一步的计划做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明。他在7月29日证实了俄罗斯报界的消息，这些消息说，索罗斯向俄罗斯电信投资公司投资39.8亿美元（约合61.5亿法郎）。这家公司是穆斯特财团的成员，它以18.7亿美元赢得了拍卖，获得了穆斯特财团25%的股份。

俄罗斯《圣彼得堡》杂志最近一期透露，索罗斯还有可能在俄罗斯石油领域投资，他可能出资10亿美元控制俄罗斯石油公司。该公司是目前俄罗斯第9大石油公司，仍属国家所有。

在西半球阿根廷，索罗斯已经成为当地第一大地产主。他在农业和不动产方面投资4亿美元，买下了潘帕斯草原40万公顷的土地和1.7万头牲畜。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富有地区，他购买了一些商业中心和办公大楼。原属美国人斯威夫特·阿穆尔的5万公顷土地，也在最近到了索罗斯手中。索罗斯的如意算盘是，如果布宜诺斯艾利斯能够赢得2004年奥运会的主办权，将在这里修建奥运村。很可惜，这个小算盘没有如意，在国际奥委会的表决中，希腊的雅典赢得了2004年奥运会的主办权。不过这点小挫折不会扰乱索罗斯的心境，他依然满面春风地说，他要成为阿根廷最大的银行家之一，他希望在阿根廷国家抵押银行实行私有化时成为购买的竞争者，如果他能顺利地买下这家银行（银行资产总额为43亿美元）的话，这将是他在阿根廷最大的一笔投资。

索罗斯的新动向引起了人们的纷纷议论，有人就此断言俄罗斯或阿根廷将成为他金融攻击的新对象。其实，索罗斯是个喜欢在消息面上做文章的人，他的决策经常是取决于一些可靠的内部消息。为获得这些消息，索罗斯花大价钱在世界各国布下了内线。他在俄罗斯和阿根廷的新动向，也许只是些烟幕，因为你完全可

以把它们看成是正常的金融投资。

索罗斯在一连串的金融风波中频频得手，肯定会大大增加其他金融投资家的信心和勇气，在人们关注索罗斯一举一动的同时，也许另一个金融阴谋已经在世界的某个角落开始策划实施了，那个家伙也许会对电视屏幕上索罗斯的微笑，心里暗暗说，下一回该看我的了。这个“下一回”将要发生的地点，也许会出乎人们的意料，它是索罗斯的老巢所在地——美国。

无缝的鸡蛋苍蝇也要叮

泰国金融危机发生后，引起了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先是菲律宾比索，以后是印尼盾、马来西亚林吉特和新加坡元，都遭到不同程度的重创。这次金融地震的冲击波还漂洋过海，冲击到巴西证券市场和波兰货币兹罗提。希腊货币也引起了波动，希腊政府不得不从国库中拿出 8 亿美元来对付国际金融投机商。

经济学家的统一认识是：泰国及东南亚金融风波的根本原因是这些国家的经济结构和金融政策出了问题，那为什么远在他乡的巴西和希腊情况与东南亚国家大不同，也要一同受牵连呢？答案只有一个，只要有机可乘，金融投机家们决不会放过赚钱的机会，我们常说“苍蝇不叮无缝的鸡蛋”，现在金融投机家可没有那样迂腐，他们是“无缝的鸡蛋也要叮”，没有缝就敲出一个缝来。

以这样一种认识来看美国的情况，虽然近年来美国经济形势不错，失业人数减少，通货膨胀率下降，美元坚挺，股市稳中有升，但它决非“无缝的鸡蛋”，更何况“无缝的鸡蛋也要叮。”美元是整个西方金融的代名词，一旦出了问题，影响将是全球范围的，因此，有识之士指出，要注意美国的情况。前不久，中国部

分金融专家谈了一些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专家们认为不能否定在美国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1995年，美国的许多金融专家认为美国股市会下跌，牛市将转为熊市，他们的理由是当时美国股票市场的价格过高了。结果并非他们所预料的那样，美国的股市并没有大幅度下跌，这些学者低估了美国经济的增长对美国股市的支撑作用。这样，敢于做出预测的人少了，广大的投资者觉得股市不会下跌，不少金融媒体的宣传也起了误导的作用。

专家们认为，实际上现在美国的金融情况处在一个比较敏感、充满了危险的时期，目前的形势与80年代末期的日本极其相似。日本在80年代末期，股票指数上升到近40000点，人气高昂，没有人敢说日本股市会下跌，也没有人明确指出日本经济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当危机终于来到时，一夜之间股票指数下跌到13000左右，转瞬间就有许多人倾家荡产，今天的美国也许会走当年日本的老路。

专家们指出，在股市大涨时，投资者往往忽略它下跌的必然性，而这种乐观的心理又会影响股市朝着非理性的方向发展。但无论怎样，股市还是要回到经济所允许的水平上来。由于股市的特点，狂升的股票市场下跌时也一样会狂跌，一旦美国股市下跌，对美国和世界经济的影响不是泰国金融危机所能比拟的。如果有机会，金融投机家们一定会兴风作浪，一场危机很有可能就是由他们挑起。

专家们给了我们一个逆向思维的警告：经济危机的策源地不一定是发展中国家，危机的始作俑者也未必就能保住他的老窝。金融交易的冷酷还在于：如果美国发生股市狂跌，索罗斯一类人大概不会拿出自己的钱来制止这种败势，相反，他会及时跳出圈

外。也许，他会把手里的美元换成至今与世界货币体系相隔离，因而比较安全的中国的人民币。这并非没有可能，据可靠消息，索罗斯已经在中国的某家地方性航空公司持有股份。

从历史上看，美国的股市经历过几次大的波动，最近的一次大波动发生在1987年。在1987年10月10日股市崩溃之前，美国的股要市场已经维持了长达5年之久的牛市，从1982年的776.92点开始攀升，到1987年8月达到2722点的最高值，此后开始小幅下降，到10月10日，纽约股市出人预料地突然崩溃，道·琼斯指数一天内狂泻508点，降幅高达22.6%。数以千亿的美元资产瞬间化为乌有。纽约股市的狂跌震撼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东京、伦敦、香港等地的股市也相继暴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一片恐慌。1987年10月10日被新闻媒体称为“恐怖的黑色星期一”。

从那时起，一直到今天，道·琼斯工业指数开始了持续上升的进程，到1996年10月14日首次突破了6000点大关，到了1997年更疯狂，8月股指一度突破8000点大关（1987年10月13日止跌后的道·琼斯指数为1738点）。在这一涨势的推动下，英国和德国的主要股票指数纷纷创新高，法国的40种股票指数也上升到1994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到目前为止，这个大牛市还没有明显的结束信号。

对于美国股市今后的走向，经济界人士和金融分析家们纷纷发表看法，意见不一。持乐观态度的人认为这次股市的牛市，带动其攀升的主要力量是美国公司企业相互兼并与收购带来的经营业绩上升，利润率增大，使得股票升值。目前，这种收购与兼并的浪潮并没有降温，因此股市的牛市还会继续下去，虽然不排除短期小幅震荡的可能。中国经济界人士中也有不少人持相同的看

法，1997年1~2月号《世界经济评论》发表署名文章指出，“目前，美国经济正处在一个特殊的多种周期重叠之中：经济增长周期、股市繁荣周期与企业兼并与收购同期……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相互渗透，与经济高速增长、股市持续攀升交织在一起……基于这一点，我们认为美国这次股市景气真正结束之时也将是企业兼并与收购繁荣与经济增长的结束之日。”即然这些繁荣与增长还没有结束，股市就不会出现大幅度下跌。

另一种意见以为，企业兼并与收购活动无降温迹象，并不意味着股价可以无限制地增长下去。美国股市虚假繁荣的原因是来自市场对企业价值的过高估计。有识人士指出，经过兼并和重组后的企业，虽然从经营效率等方面有了提高，但这种改进并不意味着它真正具有被社会承认的价值。拿最近发生的波音、麦道两家大飞机制造企业兼并的事件来说，兼并的主要动力来自于国际市场竞争的严峻形势，要对抗由多个欧洲工业大国组成的空中客车公司，与之竞争市场占有率，兼并势在必行，但这种兼并不一定就创造出了价值。因此，如果以一种高估的企业价值为股价继续攀升的基础，这种攀升只能是一种泡沫行为，而这种泡沫究竟什么时候崩溃取决于人的心理预期及其他偶然因素，就像我们从泰国及东南亚金融危机中所看到的那样。美国著名的金融评论家里德·库克在谈到世界金融交易的现状时悲哀地说：“今天的人们越来越懒得思考，宁肯接受现成的结论，并在已经开始的道路上按照惯性继续走下去。专家们分析股市会下跌，结果事件没发生，于是人们就把专家的意见放在脑后，而宁愿相信满街跑的新闻记者的只言片语。殊不知专家预言的危险并没有消失，而是继续增强了，美国股市继续在企业价值高估的状态下攀升。人们把联邦储备委员会看成是一架神秘的机器，以为任何金融风险都可以由

联邦储备委员会调整利率来化解，这让我想起了中国人的一句至理名言：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无可救药的世纪病

这个世纪，是从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世界，大搞殖民统治开始的，一个世纪快过去了，整个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家独立、民族自决、反对战争、发展经济、共同富裕已成为世界的潮流。在 20 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除去美国外，其余列强的威风早已不在，帝国主义的思想正在走向穷途末路，但作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还存在，美国作为这一制度最杰出的代表，将资本主义所具有的最大活力充分发掘了出来，把自己的国家带上了世界最强国的讲台。同时，自由市场经济思想对人类善良纯朴本性的毒害，也在美国这块试验田里扩散，并把其影响散播到全世界。新加坡前总理、老资格的政治家李光耀尖锐地提出：“谁愿意在这样一个社会（美国）生活？孩子们持枪自相残杀，邻里没有安全感，老人遭遗弃，家庭分裂。传播媒体把所有权威拉下马，肆无忌惮地攻击领袖的人格，指责一切人，惟独不指责自己。”欧洲委员会前主席德国洛尔批评说：“美国的错误在于把社会抛给了市场，造成了一个连家庭生活、社会凝聚力和文化都服从于资本主义强大力量的市场社会。人们禁不住羡慕美国社会的弹性、适应性和活力，但也会对犯罪、暴力和不断加剧的收入不均感到惊骇。”马来西亚《星州日报》一篇报道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文章指出：“只有赤裸裸的所谓美国精神，才能造就出像乔治·索罗斯这样厚颜无耻的人物，他可以置别国人民的冷暖于不顾，一意孤行。成功加金钱，索罗斯是典型的美国梦的样板。”

应该看到，暴力犯罪，无家可归，家庭解体，道德沦丧，海淫海盗，吸毒贩毒，种族不平等，贫富差距悬殊这些社会弊病，在几乎所有的国家都不同程度存在。由于美国的国际地位特殊，舆论界独立性强，社会开放程度高，秩序混乱的大都市多等种种原因，社会的病态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严重，更引人注目。20 世纪是资本主义占主流的世纪，20 世纪的这些社会弊病，都可以追根到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思想基础上，因此说，这些社会弊病不单单是“美国病”，它更是“世纪病”。

近年来，美国导演奥利佛·斯通拍摄了一系列反映美国社会问题的影片，其中有一部叫《天生杀人狂》。这部被誉为“20 世纪暴力经典”的影片讲述了一个荒诞而真实的故事，一个生活在底层的男青年，因为不能忍受其女友的父亲对女友的性骚扰，与女友一道杀死了她的全家之后，开始了四处逃亡的生活，逃亡中唯一的乐趣就是杀人，仿佛只有杀人才能使他们感觉到自身的存在。随着杀人数量的增加，他们的名字（我们姑且称他们为约翰和安妮）上了报纸，上了电视台，越来越出名，越来越受到重视，一些疯狂的美国青年甚至高喊“我爱约翰和安妮！”，而警察也疯狂地说：“抓住他俩可以使我一夜成名。”他们被抓住后，一段时间被这对情侣紧紧抓住了灵魂的美国人突然不知干什么好了，街头上开始出现支持他俩的横幅标语，他们肖像也出现在大街小巷和崇拜者的衬衫上。有一个做梦都想出名的电视台记者决定采访他们并最终进行了监狱见面。随着被采访者的煽动语言经媒体到处传播，人们变得极其疯狂，砸汽车、烧商店，美国成了暴力的天堂。而杀人狂情侣也抓住机会，劫持了记者，逃出监狱开始了又一次逃亡。精彩的一幕出现了，随着目睹杀人次数的增多，电视台记者终于按捺不住内心野性的冲动，他将镜头对准自己大声喊

道：“我受不了啦，我也要像他们一样杀人啦！”最终，杀人狂情侣在一片树林里杀死了心甘情愿被他们杀死的电视台记者，唯一的理由是：他们被这种真正的崇拜深深打动了。

在这部影片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暴力、性、成功的欲望、野性的冲动、集体无意识、媒介的无耻、基本道德的沦丧等等是如何交织在一起渗透进美国人的生活的。当我们理解了这一切之后，也就不难看出美国社会是怎样培育出乔治·索罗斯这类人物的。

美国著名的政治评论家加德尔斯说：“那些曾经羡慕美国社会并憧憬其未来的亚洲和欧洲精英们，现在却拒绝美国的自由放任模式，而把它视为加剧社会和道德混乱的处方。在他们眼里，美国成了半个霸主，部分是大棒，部分是脆弱的芦杆。”

1996年5月，一本名叫《中国可以说不》的书红遍了整个中国的图书市场，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5位青年学人以他们特有的胆识，站在时代的前列，平静而坚决地对着整个世界说：“中国说不，不是为了寻求对抗，而是为了更平等的对话。”在书中，他们详细谈到了每个人崇尚“西化”到终于“说不”的过程。

存在决定意识，无论是中国人认识美国人，还是美国人决定自己要怎么干，都无法脱离具体的社会环境和人文因素的制约。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看起来被赋予了很多的自由，包括拥有枪支的自由，但有一种东西他们没得到：生活的安全感。无论是早期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还是发展到跨国公司时代的各种社会弊病，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人们并没有比生活在其他国家的人获得更多安全感，在住宅电子报警器的后面，是一颗颗孤独的心。在经济领域，对利润的贪得无厌的追求严重腐蚀了整个社会健康发展的基础，基本的道德系统已经崩溃，有的时候对金

钱的追求只是人们放纵自己欲望的一个借口，而非目的，所以才有了索罗斯这样的人物。

这样一种人欲横流的局面，固然是资本主义制度发展至今的结果，但同时它与那些创立和精心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人的初衷也大不一样。马克斯·韦伯说过一句名言：“贪得无厌绝对不等于资本主义，更不等于资本主义精神。”在韦伯看来，赚钱也必须受一定的道德规范约束，而不能是不择手段的。理想抱负，人尽天职，勤俭致富等等，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的工作伦理和道德基础，完全不同于诸如损人利己、损公肥私、欺诈等“贱民资本主义”的营利欲。在这种贱民精神泛滥的社会是不可能建立一个具有创造力、生机勃勃的市场经济的。显然，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景象，已经离这种理想相差很远了。

残酷的竞争使得生活在资本主义世界里的人在获得很多自由的同时也获得了一种孤立主义的情结，美国政府至今仍以世界警察自居，动不动就以国内立法的形式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减少对联合国的支持、削减对外援助、限制美国公司的资本外流，在与各国的贸易谈判中强辞夺理，实行更多的贸易保护措施。由于新闻媒介的误导，美国人对美国以外事物知之甚少，得不到正确的知识，他们习惯以美国人的标准来评判国际事物，盲目地认为在各个方面美国都是世界上最好的，这种孤立主义的情绪筑成了美国政府在国际舞台上蛮横无理的基础。

再见了，日本人

1995年，索罗斯在一次午餐会上谈到日本的经济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话，“日本人是搞金融的天才，也是蠢才。金融

交易应该像水一样流动，流动才有机会，才有钱可赚。日本人的做法是把自己的利润扩大至最后一美分，叫对方产生一种因自身的短处而受制于人的感觉，这样就等于造就了一个十分精明的敌人，早晚有一天，他会把日本人掀翻在地。聪明的人应该在对手不知不觉中取胜。”

索罗斯的这段话首先可以成为他自己一连串“杰作”的一个最佳注解，同时还给人一个感觉，当他称日本是蠢才的时候，也会有一天他会再次拿日本人开刀。虽然日本人精明过人，但比起犹太人索罗斯来，还是小狐狸见老狐狸。

在这次援助泰铢的国际协调行动中，日本人表现得异常积极，它拿出了 60 亿美元做为援助资金，表现了日本人企图趁机入主东南亚地区，扩大它在该地区乃至整个亚洲的影响。有报刊认为，若日本在这次拯救行动中取得佳绩，日元可望取代美元成为东南亚地区的主导货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康德苏最近接受记者采访时回答了有关日元的问题。

记者问：“在经过长时间的与美元挂钩之后，这些国家（指东南亚国家）会不会建立一个坚固的日元区呢？”

康德苏回答：“我不这样认为，我不能肯定说日本人会关心这件事，我只知道这一地区的大多数国家对进入任何的货币区都不感兴趣。”

记者问：“但它们现在却都在一个美元区里。”

康德苏回答：“它们都在一个事实上的美元区里，但也都跟别的国家一样，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相反，它们都从这次危机中得出了一个教训，为了保持宏观经济的平衡，它们都希望它们的外汇能灵活地浮动以便不要引入危险的严厉措施。我似乎感到这像是在建立一种相互支持的地区性合作。这正是刚刚发生过的

事。它们都来支持泰国了，因为这与它们自己的利益有关。下一阶段就是要通过一种相互监督来维护这种支持，而这种相互维护的体制中，日元仅仅是一种可能的考虑而已。”

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日本给人一种“小阴谋家”的印象，自己没有大声讲话的能力，还喜欢装出一副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的样子。在经济、金融领域，日本人的贪婪、小气、虚伪，在穷国面前摆架子等等一系列的臭毛病暴露无遗。

以日本在中国市场的经营情况为例。前些年，所有有关外资、外商、外国产品的话题几乎都与日本有关。日本的汽车、电子产品独步中国市场。如此一个大好局面，日本人本应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经济的千丝万缕的联系，通过技术转让、合作开发等方式进一步巩固已经占领的地盘。结果它不是这样，它对中国市场的定义是三等产品的倾销地（日本的产品同一品牌、同一规格的质量分三等，一等质量销往美国，二等质量卖到西欧，三等质量倾销到中国这样的欠发达地区），最后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日本的家电产品在中国已经丧失了独占鳌头的威信，正在走下坡路；汽车领域如今是德国人的乐园，新兴的计算机信息产业到处可见美国人的影子，日本人正在逐步被排挤出中国市场。

在中国市场是这样，在世界其他市场也是这样或将会这样，日本人那种“敲骨吸髓”式的贸易，早晚会被全世界人民所熟悉，最终被逐出国际大市场。在日本的保护人美国，美日经济摩擦已经从汽车、半导体商品这些具体商品交易中的冲突发展到贸易制度和规则的摩擦，日美两国在市场经济制度和种种经营方式、规则等方面的矛盾越来越深。在美日贸易中，美国进口的多出口的少，贸易逆差额巨大，长期下来美国人终于沉不住气了，对日本政府施加压力，要它实施市场开放。虽然日本人装出一副谈判、论战

的样子，但美国人心里清楚，不管你怎样喊屈叫冤，最后你还是要同意我们的条件，这就是日本政府的尊严。

1996年3月，日本兴业银行首次按美国市场规则公布了当时这家银行的不良债权的总额为1兆1524亿日元，熟悉经济学的人都知道，美国人执行的是国家会计基础标准（IAS），按照这个标准，企业以账面价格与市场价格一致的“时价主义”原则为准绳进行经营，而日本企业一直是抵制IAS的，它们采用的是“进货原价主义”的规则。在当今世界经济区域化、集团化、一体化的浪潮中，日本是西方发达国家中唯一没有组建并参加区域经济集团的国家。如今，日本再也不能无视由于它的无知、短视所造成的巨大损失了，兴业银行采用IAS标准就是一个信号，一个适时的口号是：再见，日本规则。日本经济学家神崎伦一在评价这件事情时指出，日本尽管实现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但其银行制度却落后了半个世纪之久，这与现代发达的产业界的现实极不适应。”

最近，《国际经济评论》上发表署名文章，专门探讨了百年前因甲午战争的惨败清政府向日本赔偿白银二亿两，这笔钱对日本工业化起了何等作用的问题。作者从日本经济史学家那里听到了一个骇人听闻的决定：日本从中国得到的战争赔款，是当年日本财政收入的八倍，这些钱除了少量地用于伤亡官员的抚恤金外，全部用在了工业建设上，毫无疑问，这笔赔款对日本工业化的作用是决定性的！

我们读到有关日本近代历史的书籍时，人们总是把日本工业化的成功归结为明治维新的制度创新，归结为有了明治天皇这样一个顺应历史潮流的“明君”，熟悉经济学的人都知道，这些理由都是不能完全站稳脚根的。在一个同时起飞的时代，一个国家经

济实力如何最终将决定这个国家的命运，当今世界有 140 个国家与富国的差距在逐年拉大，虽然与它们自己相比也在进步。

这篇文章的作者写道：“现在我弄清楚了，日本迅速且顺利地工业化，是靠了来自中国的战争赔款的决定性支持的结果。要是中国能够突然拥有一笔从天而降的财富，比如说仅为 10 万亿人民币（约为 1995 年我国国民收入的两倍），恐怕中国目前所面临的一切经济、社会及政治难题（如就业、通货膨胀、腐败乃至国际争端）就全都迎刃而解了。”该作者的研究和结论是骇人听闻的，如果没有那二亿两白银，中日两国的历史就要重写，中日两国在今日世界上的地位也会大不相同。

该文作者最后极其伤感地写道：“没有哪一个中国人不会想起那意味深长的段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款要求。……日本方面对过去日本通过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失，痛感责任，并深深自省。’它发表于 1972 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时的中日联合声明之中。对此，日本前驻华大使中江要介补充说：‘日本所持战争责任及对战争的认识，与中国之间具有很大的距离。不拉平这种距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中日友好。’”

历史已经过去，辛酸也罢，失误也罢，毕竟今天中国真正站起来了。回顾中日交往的历史，无论是日本人的子弹还是索尼彩电，都应该远离我们了，中日两国的交往应该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

从心情上（不是从实际状况上）我们要说一声：再见了，日本人！

中国做好准备了吗

第四部

包围不会从中间地带开始，往往是在人们不知不觉时从四周围形成。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日益进步的发展中国家，象东南亚诸国，象中国，存在的一种危险是：当你满足于自己现状与过去的强烈对比时，往往忘记看一看在你周围还发生了哪些事情。

第一章

金融游戏机

1997年9月25日，传来了中国再次降低进口关税的消息，同一天的新闻报道，欧盟代表布里坦到华盛顿访问，话题之一是讨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问题。一切迹象表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日子不会太远了。

一个国家加入世贸组织，会得到很多好处，同时它也要承担一系列的责任和义务。一个国家把它的国门打开，利益和危险会同时进来。此时此刻，东南亚金融风波还没有完全结束，中国的一些媒介却开始做高枕无忧的文章了。一家经济报刊上有这样的语言“目前，国际资本进入中国的金融领域还受到限制，外国资本的基本流向是生产领域，因此在中国不太可能出现泰国或墨西哥式的金融风波。”

加入了世贸组织，外国商品肯定会大量涌来，中国的生产企业要受到极大冲击，能不能在这些冲击面前站住脚，求生存求发

展，是对这些企业的生死考验。这种冲击丝毫不亚于东南亚国家发生的金融地震。如果一大批企业在进口商品的冲击下倒闭了，工人失业，社会负担加重，人人都有不安全感，这样的一种社会局面是任何人都不愿看到的。

中国的金融业面临着一个严峻的态势，一方面金融机构要为整个国家的改革开放提供充足的资金，包括引进国际资本，因此它须与国际金融市场接触，遵循通行的原则。另一方面我们的金融体制还存在着许多致命的弱点，对即将到来的危险还没有强有力的对付手段，完全有可能受到某种不怀好意、唯利是图的国际金融势力的攻击，从而波及到整个国家的经济运作。

大人的头脑和孩子的胃口

专家们的研究表明，我国企业固定资产投资主要来自 5 个方面：国家预算内投资、国内贷款、利用外资、自筹资金和其他投资。其中“国家预算内投资”可直接形成企业的资本金；“国内贷款”形成的是负债；“利用外资”中属于外商投资部分的可以形成企业资本金，属于外商借款部分的形成负债，“自筹资金”和“其他投资”两项真正能形成企业资本金的部分很小，绝大部分还是负债。1982 年～1994 年这 13 年间，我国企业增加的固定资产投资大部分来源于借款，形成负债。据统计，负债已经达到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 70% 以上，虽然这还不足以说明某个企业就处于危险状态，但企业债务剧增，加之流通环节的不畅，互相拖欠贷款，企业原有的本金已不能维持正常的生产，只好陷于新一轮的借贷之中。

我们换一种算法，若想企业资本金及净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

达到 50% 以上，负债金额以目前的水平来计算，那么各类企业需要补充资本金 26000 亿人民币。这样大的一个数额，国家显然是无力支付的。发展金融市场，多渠道引入境外资金已经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事情。

但事情并非那么简单，引进外资的数量在整个固定资产投资中比例过大，会有很大的风险，这一点已为墨西哥和东南亚金融危机所证实。尤其是通过金融市场引入的外资，它不直接用于生产领域，一有风波就会逃跑，造成市场波动。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对外开放金融市场，也是出于这种担心。这种进退两难的局面就好比一个人有成年的头脑，胃口却是小孩子的，吃不下那么多，吃多了就要出事情，因而身体也无法强壮起来。

与此同时，国内金融市场的情况也令人担心，违规违纪问题和恶性案件时有发生。深圳发展银行在 1996 年 3 月到 1997 年 4 月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先后动用了 3.11 亿元巨额资金直接炒作本公司股票，非法获利 9304 万元。这一行为违反了商业银行法中关于商业银行不得从事股票业务的规定，也违反了国家上市公司不得买卖本公司股票的规定。

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分行于 1996 年 9 月至 12 月，给一些证券公司拆借和透支巨额资金用于炒股票，在 1996 年 12 月 16 日《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之后，还给有关证券经营机构透支，12 月 25 日一天即达 3.95 亿元。工商银行上海分行的这种行为，严重违背了国家关于金融机构不得为股票交易拆借资金和透支的规定，这一行为助长了股票市场的投机活动，对股票市场的规范和稳定产生了恶劣影响，更给银行资金带来了极大的风险。

最近，国家有关金融管理部门做出了清理整顿股票市场的决定，勒令那些从事股票炒作的金融机构和准金融机构立即停止其

非法活动，否则将严惩不怠。几十亿元的“机构资金”退场，直接引发了股市大幅度下跌，深市从6月底的将近6000点跌至9月底的3900点左右，人气低迷，成交量萎缩。为了吸引更多的股民，各证券经营机构纷纷降低开户金额。在北京，有的证券营业所开户的标准已从十几万跌至400元人民币，充分说明了金融机构的恐慌。这种强力打压的做法固然使股票的市值回到了一个比较合理的价位，但对占总人数95%以上的中、小散户来说，这种打压太严厉了，他们仅有的那点资金均被套住，心情压抑。从长远的观点看，这种情况不利于股票市场的健康发展，欲进场者见此情景，肯定是望而却步。

与上面的这些问题相比，我们将要提出的是一个更重要更能决定中国金融市场命运的命题，即我们的金融决策常常表现得并不能真正能适应现实的情况。以中国的股票市场为例，进入90年代以来，国际资本对中国金融市场投资兴趣日渐增大，中国也适时发行了B种股票（外资股票），本来B股市场可能会迎来一个繁荣的局面，但我们金融机构在对外发行B股不久又开始推动优秀大中型国有企业到海外直接上市，带走了原来对B股感兴趣的海外投资者，无论是在海外第二次上市还是直接上市，都对发展中国本地B股市场形成了抑制。海外投资者既然可以在自己本地市场买到中国最优秀企业的股票，又何必千里迢迢到中国市场上来买他们认为尚未充分规范化的B股呢？这种“杀鸡取卵”式的做法，没有立足于建立健全和激活国内证券市场的深谋远虑，只着眼于一次性的海外资金收入，既没有起到在海外树立中国板块的优秀示范作用，又窒息了国内相关市场的活力。如果不改变这种现状，就有可能在事实上逐渐造成国内证券市场成为次等市场，甚至在一定条件下被国际投资人称之为垃圾股市场。我们常说的一

句格言是：“酒好不怕巷子深”，如果我们不能造就一个出色的规范运作的具有深远影响力的股票市场、证券市场、金融市场，又怎么能吸引足够的外资来满足国内建设的需要呢？

应当看到，西方各国积极开拓亚太市场，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针对本国投资者平淡的投资欲望而希冀制造新兴市场概念和题材，从而激活本国或本地市场。西方发达国家的证券市场经过几十年、上百年的发展，已进入稳定发展阶段，充分成熟的投资者理性化的参与使得市场活力与新兴市场相形见绌，通过吸引中国等快速发展国家的优秀企业到自己市场去上市可以制造新的投资概念，创造新的投资题材，吸引更多的投资者进入自己的市场，激发起更大的投资欲望来活跃自己的市场，吸收更多的资金涌入自己的国家。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海外市场在向我们的企业招手时，他们的标准是相对降低的，他们的规制是相对放松的，降格以求肯定另有目的。千万不能以为我国的优秀企业就已具备与国际接轨的能力，千万不能认为我们的企业就此已可以持续不断地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吸收外资，千万不能因为我国的优秀企业在海外第一次发行上市时大受追捧就得出我们的企业已能够与国际资本市场上的巨型公司平起平坐的结论。在实际发展中，我们输出的优秀企业充其量是为海外证券市场制造了一个新投资概念。我们所推出的优秀企业所收入的美元是一次性的，我们在海外上市的企业从国内来讲绝大多数是顶尖企业，而放入国际资本市场的大海就成了不起眼的小水珠。

总而言之，利益，是全球投资者、市场组织者和政府最根本的行为出发点与归宿。个人投资者可以将赚钱作为自己最直接的行为目标，而机构投资者和市场组织者就应该具有更为深远的企业理念和行为目标。作为政府，无论是中央政府或是地方政府，则

必须制定更广泛、更高层次的发展政策和行动准则。降低自己的目标就意味着放弃竞争、毁坏自己的生存环境甚至窒息自己的生存空间。

中国政府和金融管理机构在对外开放金融市场方面小心亦亦，安全是第一要考虑的因素。证券市场稳步发展的基调相信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不会改变。

值得欣慰的是，有关部门已经在最近决定在 A 股市场进行引进外国金融资本的尝试，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

你往银行里送炸药

设想一下吧，如果某天一大早，你赶到银行取钱，发现全国人民几乎都动起来了，像得了传染病似的，要把存在银行里的钱全部取走（1996 年 1 月全国居民存款超过 28000 亿人民币），会是一种什么局面？肯定有人取不到钱，流言蜚语像瘟疫一样蔓延，人山人海，像海一样波动，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谁能控制这个局面？

事实上，中国目前居民储蓄存款之所以能直线上升，其中因素之一是存款利息率（加上保值）的较高。由于资金成本越来越高，银行必须千方百计提高资金运用的收益，否则就无法为 25000 亿到 30000 亿储蓄存款支付利息。以中国目前企业的低效率（利润率 10% 以下），银行贷款何以能取得百分之十几的利息收入？中国银行系统资产的质量之低是可想而知的。大家知道，日本经历了一场因不良债权引起的严重金融危机。日本所谓的不良债权是指这样的贷款：借款者已破产、借款者已有 6 个月以上未曾支付利息或虽然支付了利息但利息率低于官方贴现率。以此为标准

(破产一项除外，因为我们基本不允许破产)，中国银行系统的不良债权在其资产中的比重又该有多高呢？中国银行系统的王牌在于中国银行基本上是国有的，银行信用等于国家信用。此外，存款者没有其他选择也是中国金融体系尚能维持稳定的重要原因。如果没有这两条，金融危机恐怕早就发生了。如果中国的高成本资金与不良资产的矛盾长期得不到解决，国家就必须向银行系统注入资金，以维持银行信用。在存在严重财政赤字的情况下，政府只能靠大量发行国债筹措资金。但在高利率条件下，发行国债是十分困难的，除非国债利息率更高。而这又意味着把银行危机转化为财政危机。如果大量发行国债也不行那就只好“印票子”。银行固然应努力改善资产质量以增加收入，但进一步改善的余地似乎并不大。

细心观察一下目前中国经济、金融的运作过程，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现象，我们把它称为“曲线构图现象”。银行里数目巨大的存款本应投放给十分缺乏资金的大中型企业，但由于这些企业生产效率低，产品结构不合理，银行不敢给他们贷款。国家为了解开这个“死结”曾经想了很多方法，例如前些年的解开“三角债”，由国家预先投入一部分启动资金，以松动已经僵死的债务链，从而使整个相互拖欠的现象得到解决，现在看来这个动作收效不大，因为它没有涉及到根本问题。

党的“十五大”胜利召开后，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造的决策出台了。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战略性重组无疑需要一个宽松的金融环境，这对金融业提出了一道难题，但同时也为中国的金融家提供了一个显身手的机会。

你好，香港

站在中国经济应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的高度来谈论中国证券市场在 21 世纪发展基点和改变中国证券市场先天不足的现状问题，最根本的一条是政府要改变敛资聚财的资本市场初级目标。变着眼于一次性资金收入为着眼于长期的日常的收入，变把企业推向国内外市场为自己站在市场中营造好的市场环境吸收国内外企业进入。因此，树立形成亚太乃至世界最大资本市场的气魄和目标，使中国证券市场成为支撑世界资本市场除欧洲、北美之外的第三极，应该是政府为之奋斗的目标。“两头在外，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是前些年很时髦的一个口号，且不谈这口号有着根本决策上的失误，其立论基础也是错误的。中国与东亚其它经济起飞国家不同，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大市场，有条件的企业固然应该在国际市场上为国家赚取外汇，但中国的经济发展不能也不可能全部靠出口推动。因此，不能将中国证券市场游离于国际资本市场的发展变化之外，不能以中国证券市场尚处于起步阶段，而长期将国际资本市场发展变化的因素排除在中国证券市场的长远目标定位之外。

目前，在全球证券市场上，欧洲相同和相近时区里，最大、历史最悠久、最具竞争力的是伦敦证券交易所；北美相同和相近时区里，认同的是纽约证券交易所；而在亚太地区，由于种种原因东京要成为国际性的股票市场是有很多困难的。这就是所谓的国际金融中心的东京的形象往后退的现状，即海外的商品和海外的投资人由日本转向其他国家和地区。此外，在亚太地区有竞争力的是澳大利亚、新加坡和香港，其他如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只有

区域性市场的能力。对澳大利亚如果以地域距离问题暂时忽略的话，那目前咄咄逼人并虎视眈眈、准备取代现在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就是新加坡。

要认真对待这种竞争的态势，在下一世纪国际资本市场格局中，完全有理由将香港考虑在整个中国市场之内来对中国明确定位。

香港金融管理局主席任志刚预计，1997年，内地和香港的外汇储备总额将会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连同跨境贸易计算在内，两地将成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系；中国将拥有全球第五大外汇市场；第七大衍生工具市场；第八大股票市场和亚洲最活跃的债券市场。以中国目前的金融开放步伐来衡量，中国更有可能拥有全球最大的证券市场。

香港联合交易所主席郑维健说：“必须进一步提高香港从业人员和监督者对内地市场的专业认识。中国是决定香港联交所下世纪定位的重要因素，联交所期待提高与内地合作的等级，制定合适并且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策略。”

香港证券市场在中国证券市场中的位置这一问题的提出，应该说为解决目前中国金融领域存在的种种难题找到了一个可以使用的办法。

首先，它为中国国有企业募集海外资金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地点。由于香港特殊的政治地位和实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它能很好地与西方工业国家接洽；同时它又是中国的领土，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中国人，与内地的经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其次，由于香港和内地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它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起到缓冲和隔离的作用，避免由于内地的企业以及相关的经济、金融政策直接面对国际市场，从而减缓对中国内地经济

的直接冲击。

第三，内地企业集中在香港上市，利用世界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关注，扩大香港金融市场的影响，也有利于香港的经济繁荣和稳定。

以这个判断来规划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既可以因为香港这个具有深厚基础的市场的回归而有理由乐观，同时也必须看到，由此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整个日程表将要来个彻底的变化，对证券市场规模、指导、管理的出发点和指导思想都要有个极大的改变。

基于以上的定位，从目前开始就必须着手进行研究，规划组建中国联合证券交易所，英国在 1973 年，由伦敦证券交易所统一了 20 个交易所；澳大利亚国内 6 个证券交易所是在 1987 年统一组成了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ASX）；而中国也只有走到这一步，才能将三个市场组成合力共同对外，才能维护市场的统一，避免可能出现的市场的人为分裂，才能解决由于存在地方利益造成的国内市场之间的内耗和恶性竞争，才有可能真正实现中国证券市场成为世界证券市场第三极的目标。

对于中国来说，香港的金融市场拥有远胜于其他市场的比较优势。香港有着可以与世界其他主要金融市场相兼容的法律制度和市场规模，有着世界最先进的通讯条件和信息手段。香港毗邻大陆，可以迅速获取有关国内的丰富信息；已经拥有一支庞大的专门针对中国企业中国经济的专业化研究分析队伍；各国主要的投资银行在香港都设有分支机构，集聚了国际上大多数专业机构投资者。

当然，内地的经济发展，也需要形成新的金融中心。特别是随着改革的深入，资金的分配要更多地通过市场来完成，这样就

需要建立以市场为基础的金融中心。上海作为中国内地的最大的经济中心，深圳作为经济发展速度最快地区的代表，成为金融中心合乎自然选择。但是，这种变化，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取代香港，这几个地区的关系应是一种互补关系。这种互补性表现在，上海可能发展成为内地最大的人民币中心，而香港将继续作为外资进入内地融资中心。这种互补的关系不是人为划分的，而是经济上的客观需要。首先，虽然我国在经常项目下已经实现人民币可自由兑换，但在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将需要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过快地放开国内资本市场，将使国内经济随国际资本市场波动，而这将不利于国内经济的稳定。这样，就存在着在国内将人民币与外币隔离的需要，而不能实行资本完全自由流动。而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前提条件之一是资本的自由流动。其次，从国际投资者的角度看，国内的商业法律标准与国际标准还有相当的距离，而这一差距的消除是需要相当长的过程的；第三，上海、深圳还缺乏国际金融中心的专业人才以及尚不具有国际金融中心所必备的信息公开的条件。当然，深、沪两地作为金融中心，外币业务也会迅速增加；同时，香港市场上，人民币业务也必然会发展。所以，不可能排除深、沪与香港在一定程度上的竞争，但这种竞争将会提高两地的效率，例如，目前B股与H股事实上就存在着竞争，这种竞争将会提高两地的效率，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利于中国企业的发展。上海、深圳与香港的既互为补充又适当竞争的格局是符合各方面利益的，会更加促进三地金融中心的发展。

值得引起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内地企业在香港上市，会遇到如何遵守香港法律和国际金融准则的问题，内地企业不能因为香港回归了，香港再大也是弹丸之地，就恣意妄为。这方面国家金融监管部门有必要经常提出警告。比如，内地的一些H股公司，在

上市之后，违反上市公司说明书的规定，挪用上市集资从事高风险的房地产与放债活动。这是违背香港市场监管条例的。如果任其发展，就会形成双重监管标准，必然会造成对香港金融市场的不利的影响。在这方面，应当坚持一个监管标准，而不能搞两个监管标准。内地企业在港上市，不仅是为了取得资金，同时，也要通过上市的形式促进国营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

前面谈到，由于内地的银行和个人投资者对国有大中型企业怀有深深的疑虑，很难在短短时间内激发他们对这些企业投资的热情，这些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将遇到很大的难题。当然银行和个人投资者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但也存在着心胸狭窄、目光短浅的问题。

如果能够促使这些企业在香港上市，相信经验丰富、目光老到的境外投资者会看到这些企业发展的远景，会勇敢地拿出钱来，这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可以说是一剂十全大补汤。也许能因此解开上述的那个死结。因此，保证上市公司遵守香港金融法律和通行的国际金融准则，从某种意义上说，也许会成为这些企业股份制改造的关键。这不单单是个解决资金来源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这些企业的领导人能不能借这种上市的契机，彻底根除头脑中那些不适应当前经济发展形势的旧观念、旧思想、旧习惯，真正成为一个具有现代管理思想的经营者。国有大中型企业所以举步艰难，固然有产业结构上、政策上、体制上的原因，企业领导素质不高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1997年9月22日，到香港参加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的世界银行副行长、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施蒂格利茨对法新社记者发表谈话，敦促中国政府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银行业的健康发展上，其中主要谈到了国有大中型企业问题。这位首

席经济学家说：“中国必须从东南亚的货币危机中吸取教训，把主要精力放在银行业的健康发展上。中国之所以没有出现类似的危机是因为它的经常项目盈利，资本流入是以直接投资形式，以及中国的货币还没有成为完全可兑换的货币。”

施蒂格利茨警告说：“中国一些大规模的国家商业银行的资产正面临危险，已引起一些人的担心。资产价格泡沫可能任何地方都会有，但是，对银行系统的控制，可以把利用过剩流动资金来提高资产价格的可能性减少到最低限度。”

他表示：“中国的国有企业问题和由政府控制的银行业之间是互相有关的。应该把银行系统当作一个私有企业来加以管理，这一点十分重要。如果不这样，国有公司就有可能为了得到贷款而向银行施压，而其中许多贷款根本不可能偿还。这就会削弱银行系统和削弱整个经济。中国就有可能出现这样的危险。”

施蒂格利茨说：“中国为了使它的金融系统能有效发挥作用，必须草拟一份适时的法律文本，其中包括证券法，必须分开财务事项和银行内部人员交易的条例，增加透明度是中国在未来10年面临的最大挑战，因为只有在这样一个开放的环境下，企业才能作出合理的投资决定”。

“洗脑”是关键之关键

让我们再回到中国证券市场的话题上。

经过认真的讨论之后，我们以为：中国证券市场在认识、监管及发展战略的制订方面存在着种种问题，而这些问题已经成为或正在成为中国证券市场未来发展的制约。和改革开放初期农村改革所带来的连动效应一样，股份制改革和证券市场的发展带来

的是企业制度的超前演进，投资者群体的超速度发展以及证券市场没有配合的单兵突进等等成了令政府猝不及防并需要长期消化的全新课题。它对于仍处在原有状态的大部分经济体制给以巨大冲击并产生严重摩擦。和中国的改革长期具有的困难一样，它是一种戴着镣铐的舞蹈。中国的改革是一个向现代市场经济过渡的阶段过程，从开始的初期伴随到现在，甚至到可以看得见的将来，双轨制一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背景。

80年代进入股份制改革的企业，明显地带有一种迫切和自觉，公司性质也以非国有企业为主；进入90年代后继上海的老八股和深圳的老股份公司之后大量、快速进入上市公司行列的，大部分都是原来的国有企业。1992年一级市场的超常规发展，形成了“敲锣打鼓进入股份制”的状况。除了进入资本市场的不自觉以外，企业行为没有充分市场化造成了不断增资配股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在这其中，国有股东又往往放弃配股，转配给个人投资者，在市场形成“圈钱一族”的恶劣形象，致使市场形成反弹，1994年相当多的上市公司增资配股无法完成就是这个因素造成的。这就给世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政策管理层急于解决企业资金不足的问题，在证券市场的发展上采取的就是短视的一次性捞钱的政策。对证券市场的认识没有跨越对内对外敛资聚财的浮浅阶段。

另一个难堪的问题，行政计划的阴影始终伴随在对证券市场的调控、发展的出发点和全过程。

证券市场作为最充分的市场经济的东西，在中国，对它进行管理和调控的却是计划经济的手段，如股票的发行，不是市场需求决定时间和规模，而是政府计划在决定发行额度和发行时间；公司的上市与否是由公司所在地政府向中央有关部门攻关的结果，

是“跑步前进”的结果，上市公司时时刻刻都无法绕过上级主管单位计划手段的掌心，甚至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的任免、调动，上级主管部门的决定权都比股东大会有效得多。

在证券市场的管理方面，中央和地方政府带有各自出发点，形成矛盾。

中央的考虑是如何集中财力，而地方政府的出发点更多的是满足地方利益。两者在面对市场时往往是统一的；而在两者之间，往往又有矛盾，随着市场的发展壮大，证券市场带来的利益越来越大，这种矛盾已经并会更加突出。表现在对市场的管理上就出现了多头管理、政出多门的问题，使市场无所适从，甚至造成不同地方间的恶性竞争，破坏了现代证券场所必须的统一性。

新一轮矛盾的结果是，由于“机构资金”违法参与炒作股票，造成沪深两地股票市场大幅度波动，严重影响了股票市场的健康发展。国家有关部门决定，将沪深两地的股票交易所收归中国证监会管理。这个决定的出发点无可挑剔，但它毕竟又是一次行政命令，并没有解决产生矛盾的根本原因。

由于有关部门决策不果断，以上问题已经造成了一些可以看得见的后果：

第一，没有将证券市场作为经济市场化的重要而已经可行的推动力加以重视，仍然停留在欲行而又止的试点阶段，无论国家股东，机构股东还是个人股东，都无法建立长远的预期。国家股东无力投资却不断圈线的短视行为，同时也促使国内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在无奈中将短期投机作为市场行为准则。

第二，在一个完全市场化的证券市场中，股票的发行是计划的、公司的上市是计划的、已经市场化的上市公司面对的上级管理部门是行政手段的、在无奈中有时对股价的上下波动也采取行

政手段加以调控，这就使得市场规律无法真正在市场中发挥作用，对政府的预期和政策的预期超过了对市场的预期，消息市、政策市成为现阶段中国股市的基本特征。

第三，没有形成统一的市场，中央的管理要么太集权，无法对市场形成真正高效敏感的反应；要么太放权，无形中鼓励地方为一地利益而争发行额度、争上市额度、争建证券交易所或交易中心，甚至为满足地方利益而进行市场间的恶性竞争，埋下了市场崩溃隐患。

中国金融领域的改革，从实质的意义上讲刚刚开始，有很多急待解决的问题。在这个时候，需要的是坦率——不回避问题，求实——不搞先入为主的框架，从宏观的角度实事求是地解决具体问题，以及责任感——不随波逐流，有严谨的学问和工作作风。

但是很可惜，我们经常看到一些与这个严肃的进程不和谐的东西。比如，某家报纸发表了一篇题为“金融调控渐趋成熟”的文章，文章通篇都是类似下面这个段落的语言：

“在金融监管、规范金融机构的市场活动方面，力度不断加强。主要是禁止商业银行挪用流动资金搞固定资产贷款，实行银行与证券、保险、信托分业经营管理，禁止银行资金注入股市，严厉查处金融机构的各种违规行为，有力地改善了货币政策运营环境。

三年来，我国货币市场的发展有了长足进步。同业拆借市场、国债回购市场和票据贴现市场不断发展，逐步走向规范。尤其是同业拆借市场，随着市场的全国统一联网运营和市场拆借限制的逐步取消，为利率市场化和中央银行实施间接调控方式的改革奠定了良好的发展基础。”

类似这种不实事求是的文章，对于金融领域的改革究竟有何益？

金融领域的改革与别的领域有所不同，风险大，问题多，多种因素互相牵扯，直接影响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健康发展，任务复杂而艰巨。对正在紧张工作的金融从业者来说，他们需要的也许下面这类的警示文章。

1995年10月6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从即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对中银信托投资公司（以下简称“中银信”）实施全面接管。此前，“中银信”因存在严重违规经营，内部管理混乱，资产质量差，不能支付到期债务等问题，亏损达25亿元，已濒临破产境地，为了避免该公司财务状况的进一步恶化，最大限度地维护债权人的利益，中央银行不得不向“中银信”出示了红牌。1996年10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再度发布公告，宣布结束对“中银信”为期一年的接管，收回“中银信”象征金融市场“入场券”的《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同时，批准广东发展银行收购“中银信”。广东发展银行为此还创建了广发控股投资有限公司，专门承接原“中银信”在我国境内所有非金融机构及投资收益，此举一出，立即轰动整个金融界，它不仅爆出了我国首例金融机构兼并案，开创了股份制商业银行收购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先河，而且适逢《中国人民银行法》和《商业银行法》颁布实施之际，社会各界为之瞩目，广发行收购“中银信”一案因此被《金融时报》评为1996年中国十大金融事件之一。

余波未平，一波又起。1997年新年伊始，中国人民银行又一次发布公告：鉴于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以下简称“中农信”）严重违法违规经营，造成巨额亏损，加之最近又发现新的严重问题，不能支付到期债务，为了维护金融秩序，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依据《中国人民银行法》和《公司法》等有关条款，决

定自 1997 年 1 月 4 日关闭“中农信”，吊销其总公司及其所属金融分支机构的《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同时指定中国建设银行承接、管理“中农信”的债权债务，曾风光一时的“中农信”被划上“休止符”。

第二章

国有企业， 你不是弃儿

1997年9月11日，香港的《亚洲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及对策》的文章，文章指出：

“东南亚较为疲软的货币可能使得它们对外国投资者和出口商具有较大的吸引力，但是中国可能牺牲它的利益。

因北京的货币只有部分可以自由兑换，也因它的股票市场禁止外国人参与而与外界隔绝，所以它大体上没有受到困扰它的亚洲邻国的金融混乱的影响。但是，一些地区经济学家说，这场危机可能对这个国家产生比较长期的头疼问题。他们告诫说，由于货币疲软使得东南亚按美元计算的生产成本至少是暂时地下降了，中国在外国投资和出口市场方面可能面临更加严峻的竞争。”

乔治·索罗斯创建的“改革基金会”的一位人士说：“中国出

口的情况不仅取决于这个地区的货币今后的流动，而且还取决于北京如何处理它对效率低下的国有公司的改革。”

国有大中型企业经营不善，利润率低一直困扰着中国的改革者们。国有企业大面积持续亏损已经使部分职工的生存都成了问题，以往我们得到的教育是，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劳动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工人阶级是老大哥领导阶级，如果工人生产和生活的基本条件都得不到保障，企业开不了工，职工收入大幅度下降，医疗费无法报销，住房改善更像天方夜谭……，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的话，社会的稳定性和合法性就受到了挑战。

有一个著名的悖论，一个人若是背对阳光，跟自己的影子赛跑，无论他跑得多快，也无法追上他的影子。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不单单是调整产品结构，提高生产效率，盘活资金，引进外资，适应市场变化，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的问题，这些都是单向性的、二维的，就算你前进的速度比别人快，你也有可能经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后还是追不上人家，为什么会这样？

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有快有慢，有均速也有变速，这就好比两个人骑自行车赛跑，一个上坡，一个下坡，虽然两人使了同样大的力气，结果却是距离越拉越远。中国的国有大中型企业，要想摆脱困境，尽快赶上世界工业技术发展的水平，除了苦练内功外，优选前进的方向，掌握先进的发展理论也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是生死悠关的。人只有转过身来，向着阳光跑，才能离光明越来越近，企业的发展也是同一个道理。

重新组装时间

著名的未来学家，《第三次浪潮》的作者，美国的阿尔温·托

托夫勒博士最近接受了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的采访，记者请他谈一谈东南亚金融危机、乔治·索罗斯在未来学上的意义，托夫勒博士的答话有一段发人深醒。

他谈到：“进步的原则可以简化为一个几何学的问题，一个关于圆的问题。所谓螺旋式上升的理论完全可以简化为圆的理论，所不同的是圆上的每个点的含义并不是固定的，它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发展中国家追赶工业化国家的旅行，经常演变成被工业化国家追赶的逃跑，在圆周上就是这样，你离前边的目标越远，前边的目标离你就越近，如果它从后面超过了你，就意味着你彻底完蛋。”

托夫勒博士进一步分析说：“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其形式不是铺开一条无限延伸的红地毯，它不是对时间的占有，而是对高度的占有。以美国为例，哥伦布登上美洲大陆之初这里还是一片不毛之地，只有土著的印第安人。这里既没有埃及的金字塔，也没有中国的四大发明，没有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和萨福，也没有孔子和塞万提斯，这里的一切都是在 200 多年里完成的。美国用了 200 年时间搬来了一座经济的高山，它从山上开始建设之旅，200 年后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希腊、埃及和中国，当权者需要考虑的问题之一却是如何保护好他们的古迹。”

这位未来学家告诫发展中国家说：“千万不能跟在西方工业国家的屁股后面跑，为求得暂时的经济利益甘愿沦为别国的‘出口加工区’，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自食恶果的例子。应该抢占高度，当今世界可以认为是‘高度’的经济增长点很多，你抓住了一个就等于抓住了圣母玛丽亚的衣角。”

托夫勒博士的话大可用来指导一个国家的发展，小可成为一

个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指南针，如果一个企业的领导人能够利用现有的资金抢到一个企业经济发展的“高度”，就等于你把自己的位置移到了圆心的位置，无论先进水平的位置在哪儿，你离它都只有半径的距离，是一个常数。托夫勒大而化之地把他上面的一席话称之为“ π ”理论。

列宁曾说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我们把这句话套用过来，严重的问题是你何时才能脱尽农民习气。一个企业的领导人，如果没有广阔的胸怀和一定的抽象思维的能力，企业的发展就会受到局限。

把家常饭变成一块大蛋糕

公有制经济是我们国家的基础，国有大中型企业显然不景气，仍支撑着整个国家的工业框架。在计划经济的年代，国家控制着企业的一切，从出口贸易到幼儿园老师的工资，都在周密的计划之中。

怎样改革公有制经济，搞活大中型企业，各界人士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在世界范围内这也是一个热门课题：转轨国家的经济变革。

前苏联——俄罗斯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做了率先大胆的尝试，采取休克疗法，全面私有化。由于前苏联在计划经济（他们称之为集约经济）体制内做过深入的探索和改良、最大限度地调动了这种经济体制的内在能量，使得前苏联成了两个超级大国之一，经济容量超过德国和日本，仅次于美国位居第二。它的石油、钢铁、小麦等产量居世界首位，建立起庞大的国内市场和包括交通、通讯、大专院校和研究机构在内的一系列完善的基础设施。

90%的人口是受过教育的城镇居民，有熟练的劳动力和管理人员，有大批世界上最优秀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民生活水平居中游，人数众多的中产阶级阶层（例如知名的学者、体育和艺术明星等等）有不断增长的收入和巨大的资产，个人储蓄居世界前列。前苏联——俄罗斯的自然资源十分丰富，特别是西伯利亚，堪称世界宝库，位于东欧的内陆地区是俄国资源和市场的保障。可以说，当时前苏联——俄罗斯实行转轨经济有着十分有利的条件。

相比之下，中国人均收入低，国内市场小，工业化程度低，基础设施也很差。80%的人口是没有受过教育的农业人口。劳动力大多没能受过专业培训，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也很少，中国的自然资源相对贫乏，国内市场主要是农副产品和轻工业品市场。因此，当中国提出改革开放的口号，世界上冷眼旁观说怪话的人不少。

两国改革的结果是人所共知的，比较之下中国的改革获得了更大的成功，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在国际上的地位也越来越受重视，以至于美国人开始把中国视为最大的潜在敌人。

大家都知道，中国改革的成功是从农业改革开始的，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又完成了一些更深入的改革。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基本着眼点是把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农民真正拥有用于生产的全部“资本”，国家与农民的经济联系主要是行业指导和税收。

当初也有人企图把农村改革的经验试着移植到企业经济中来，实行承包制、划小结算单位，实行细致的内部核算制度。这些措施虽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国有企业所面临的问题。

十五大以后，党中央提出了用股份制改造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办法，是一个有远见的决策。掌握好股份制改造的步骤和方法，就有可能使国有大中型企业走上起飞的轨道。

改造国有企业的一个难点是国有资产的所有权问题，国家不可能把国有资产转变成个人资产（像俄罗斯那样），其结果是国力大为削弱。在俄罗斯，军队由于得不到国家财政的有力支持，其战斗能力已经大大削弱了。

我们试想，可以用这样的办法来解决股份制改造中国有资产的归属问题：当一个企业的资产股份化后，国家作为这个企业的主体投资者，显然应该拥有大多数的股份，其余的股份由企业的劳动者和债权人所有。其中企业职工拥有适量的股份是天经地义的，同时可以用增加这部分股东表决权的办法使企业在过渡期内的经营策略得到全体从业人员的认可，当然国家股份仍应该有指导性的作用。这样避免了计划经济体制带给企业的种种弊病。企业可以在主要由企业从业人员组成的董事会的领导下聘请有经验的经理人员来领导企业的生产。在这个阶段，企业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股份制，它只是一个利益共同体。

随着企业的生产经营走上正轨，国家可以向企业职工、经理人员和社会上的其他经济实体出售自己所掌握的股份，也可以适量向境外资金出售股份，经过这种股权再分配后，就可完成真正意义上的股份制改造，而国有资产也不会流失。

对于那些在国家经济构架中意义重大的企业和具有战略意义的企业，国家可以通过少出售或不出售的股份的办法一直掌握着这些企业的控制权。这就是“十五大”报告中所讲的国家重点关注 1000 家对国家经济有重要意义的企业的含义。

通过这样的方法，能够顺利完成国有大中型企业股份制改造

的任务，改造的过程会很平稳，一切都在有效的控制之中，不至于发生盲目冒进，引发恶性事件。

怎样向别人借钱

由于国有大中型企业大部分经营不善，亏损严重，经济效益低，使得大多数投资者望而却步。生产停滞会导致企业技术水平下降，跟不上前进的步伐，从而引起恶性循环。因此，尽快解决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资金来源问题，是股份制改造的方向确定后的第一个首要任务。

“项目融资”(Project Financing)，作为一种国际通行的融资方式，已经在世界各国成功地运用了多年，并已形成了国际惯例。但是，在中国，在地方政府层次上，利用“项目融资”于基础设施项目，却刚刚被提上议事日程。

利用“项目融资”必须克服面对的各种困难。首先，“项目融资”是对基础设施项目作直接投资，这在实质上乃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贷款。因而，外商进行“项目融资”时就会要求有银行担保。这样，国际“项目融资”就会列入中央外债管理的范围之内而无法在计划外进行，从而受到限制，甚至无法加以利用。这是一个死结，一个陷阱；西方的金融界的专家们把这个死结叫作“玻璃墙”，或称之为“国际金融困惑”。

在操作层次上的另外两个难题是：

1. 基础设施项目在建设期间（比如 3 年），无分文回报。那末，担保方能提供什么样的利益作为 3 年建设期间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回报？

2. 投资的项目在建成后，由于价格低，回报也低，那末，担

保方又提供什么样的综合补偿，以保证外商有较高回报？

这又是一个死结，一个陷阱。我们必须面对难以逾越的双重陷阱。

由此可见，引进国际“项目融资”，首先要解决的困难是“项目融资”的国际惯例如何与中国的国内体制接轨的问题。就是说，如何使国际“项目融资”中国化。

这里所说的国际“项目融资”中国化，是指既要能吸引外商投资，又要能得到中国中央政府的批准与支持，而不与中央对外汇的计划管理相抵触。

国际“项目融资”中国化，表面上的困难是价格问题，即投资的回报率有多高？比如电力投资，回报率是中国政府官定的15%还是14%？抑是外商要求的18%？此外，还有一个外汇平衡问题，即利润能否以外汇汇出？又如何汇出？但实质上，深层次的困难，则是要破译制度性的困惑，化解体制上的障碍。

市场经济，哪里有需求，哪里就有供给。各大跨国银行，为了占领中国基建项目市场，不但在北京、上海、广州开设分行，前年，中国政府应他们的申请，又批准了在武汉、大连、成都等地设立办事处。到明年，二年期满，这些办事处将一律升级为分行。哪里有国际金融交易，哪里就有国际资本市场。可以说，国际资本市场就在大连，就在武汉，就在成都……。

国际金融资本的服务已经深入到了中国地方政府的层次，而中国内地政府也已到境外服务上门。赴港澳的地方政府官员既运去了整车的项目资料，又背去了成捆的项目文件。此不可谓双方不诚，交易成本双方不可谓不高，为对方服务双方也不可谓不体贴入微。然而，“项目融资”却依然是没有接轨，难以成功。

问题究竟在哪里呢？

问题依然是那句话：各地政府运去境外的项目资料，究竟解决了稳定的担保没有？携去港澳的项目文件，究竟提供了较高的回报没有？项目在国内，只要解决了担保，就有滚滚而来的外资，只要落实了较高的回报，就有蜂拥而至的国际资本。

对境外投资人而言，有担保，有丰裕的回报，投资于沙漠也是好项目。

为了消除横亘在中国与国际金融资本之间一堵又一堵的“玻璃墙”，寻找“项目融资”中国化的有效实现形式，第一流的全球大公司和中国各地政府都已开始投入相当大的力量。目前，在中国，从北京到广州，从上海到香港，探索“项目融资”中国化的公司已不在少数。其中，有代表性的，按操作主体分类，主要有三种模式：

1. 外资中资式：

A. 美国“AIG”基金与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合作，主要操作者为AIG方。因此，也可以叫“AIG式”。

B.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与美国斯坦利摩根银行合资共办的“中国国际金融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控股方虽为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但操作者实为斯坦利·摩根方。因此，又可以叫“斯坦利·摩根式”。

2. 国企国企式：

（北京）大地桥基础设施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与广西来宾电厂（第二期工程60万千瓦），按BOT方式引资的合作；组织实施者，是北京大地桥公司，因此，又可以叫“大地桥式”。

3. 政府民营式：

海南三家民营公司与四川省政府之间的合作，由于操作主体不是“四川南方市场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而是其“领导小组”，因

而，我们将其称之为“政府民营式”，或者叫“四川模式”。

我们粗线条地介绍了项目融资的概念，由于中国政府以外汇的借贷和使用实施严格的管理，真正意义上的“项目融资”中国化还处在探索和发展之中。

如果企业的经营者的脑筋稍微转一个弯，把从国际上“项目融资”改做从国内“项目融资”，充分利用各种国内流动资金（甚至可以包括私人投资），“项目融资”会很快搞起来。关键是企业要有好的项目，好的计划，还要放下国有企业的架子，尊重投资者。

在你自己的口袋里找钱

北京郊区有一个叫韩村河的村子，在北京地区赫赫有名，原因是它富得可以。韩村河的领头人是当了几十年党支部书记的仇振亮，一个很有心计的老人。他在接受电视台记者的采访时谈到一点，韩村河村能有今天这样的成就，完全是集体经济的力量，韩村河的土地没分，公有财产没分，全村人团结一心，大搞多种经营，其中尤以韩村河的建筑队伍最为出名。出外的挣大钱，在家种地也不错，承包村里土地经营农场，一年也有5~6万元的收入。

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全国闻名的老富裕村，江苏的华西村。

这两个例子至少说明，我们已经放弃的计划经济其实还有许多潜力没有发掘出来。由于建国以来国家一直处于政治运动的波峰浪谷之中，发展经济的美好愿望总是被煮成夹生饭。改革开放以来，从上到下热衷于探索新理论，新道路，谁还有心去深入钻研计划经济的理论呢？这种理论研究上的偏颇直接影响到改革开放的深入，当人们终于把目光投到国有大中型企业上时，却发现自己一点好办法都没有，追问起来会发现许多参与讨论者对计划

经济的了解知之甚浅，所想出的解决办法根本不切合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实际情况。

国有企业的起源和演变都在国家的控制之下。国家的目标和行为结果决定着国有企业的约束条件，国有企业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只能在这种已经限定的约束条件范围内。无论是私有企业，还是国有企业，都会在约束条件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但它们表现出来的行为却极不相同，其原因就在于它们所面对的约束条件不同。

市场经济中私有企业的约束条件是产品市场上的需求和要素市场上的供给。根据产品需求量和要素供给量的变化，企业可以自发地调整产量和要素雇佣量。专家指出，企业 and 市场是两种可以互相替代的资源配置机制。利用市场机制也是需要付出成本的，即交易成本，也就是搜寻信息、谈判、签约和履约等活动引起的成本。人们之所以要用企业替代市场，是因为企业这种组织形式能节约市场活动引起的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建立和运转企业也会带来组织成本，因此，企业的边界最终将由市场机制的边际交易成本和企业组织的边际组织成本相等的那一点决定。综上所述，无论我们是从企业规模的角度，还是从企业产权的角度来定义企业的边界，都能看出，私有企业的边界是完全弹性的。

计划体制下的国有企业与此恰恰相反，可以说，国有企业的边界是不变或是刚性的。国有企业边界刚性的性质，完全是由于国家对企业的控制而形成的。首先，从产权角度来看，国有企业的产权结构是由国家行为施加的外部变量，所以，从企业立场变更这种正式的产权结构是不可能的。这种产权结构的特征是：企业最多只能拥有内部配置资源和内部分配收益的部分权利，超过本企业范围自由调配资源和按企业意愿自由调整收益分配的权利

却是受到严格限制的。其次，从企业规模来看，国有企业不仅难以调整其资本存量，也不可以变动劳动力数量。这是因为，国家要控制国内资源的配置，就不能放松对生产要素的管制；其次，就业目标的实现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稳定和政治计划的实施，是硬指标。在计划体制下，国家可以把就业创造的任务交给国有企业，以此减轻自身的负担。正是由于计划体制下国有企业边界刚性的约束条件，决定了其行为既不同于市场经济中的私有企业，又不同于市场经济中的国有企业，所以我们认为，计划体制下国有企业的性质就是边界刚性。

在传统的计划体制中，边界刚性几乎表现为边界不变。国有企业初期的改革是以放权让利为特征的。这一改革虽然扩大了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权，但国有企业边界性质的格局基本上并未改变。首先，在要素供给方面（尤其是资金供给），国家仍保持高度的垄断。另外，由于劳动力市场和社会保障体系改革相对滞后，国家仍然要依靠国有企业解决社会就业问题。从而，我们可以看出，国有企业在过渡时期遇到的主要问题，如企业冗员过多、社会负担过重以及企业负债过度等，都是边界刚性在新时期的表现。

国有企业虽然是国家推行计划体制的产物，并且一直受到国家的严格控制，但是，从经济学的逻辑来看，国有企业也是在约束条件下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行为者。在社会稳定的条件下，随着时间的推移，国有企业的自身利益及其自利行为也表现得日益明显，它将做为一种组织和利益集团在经济体制运行和制度变迁中发挥作用。我们还发现，正是企业的这种自利动机，促使其在边界刚性条件下，发现了一种可以有效减少交易费用的组织创新。这种组织创新，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减少计划体制的浪费和无效率。

在边界刚性的条件下，如果企业部分地获得了在企业内部组织生产活动的权利，企业就会放松或部分放弃垂直行政控制方式，而代之以在企业内部扩大分工，并让分工的各生产活动单位在企业内部模拟市场交易。我们把这种趋势称为国有企业的内部市场化创新。

从国有企业的利益来看，这种组织创新有助于提高企业效益，从国家利益来看，这种组织创新并不改变国有企业边界刚性的格局，而且可能增加国家收入，因此，企业有实行这种创新的动力，国家也默许甚至鼓励这种创新。

由国有企业内部市场化创新所带来的收益包括：首先，企业高层领导将日常决策权下放给拥有更完备信息的各生产活动单位，并由此从对生产经营的直接干预中脱身出来，集中力量提供企业内部管理章程等“公共产品”，监督和维持企业内部交易秩序，并协调它们的利益冲突，这将有助于深化企业领导和管理层与生产单位之间的分工。其次，在计划体制的国有企业内部存在着一些有利因素，比如企业各生产活动单位之间利益紧密相连，企业内部的行政领导权能创造性地转化为维持企业内部交易关系平等、互利的权威，企业内部交易规模较小而易于监督、协调，在边界不变的封闭单位中易于产生一种人际间平衡和合作的非正式规则等，这些因素将使企业内部的交易成本较低，有助于形成一种类似市场的内部机制。在这种内部市场中，各生产活动单位有较适宜的环境使自身职能专业化。最后，在这种专业化过程中，企业内部各生产活动单位的自身利益日益独立，从专业化中可望获得的收益也越来越多，它们在利益驱动下便有可能通过各种方式（合法的或非法的）绕过边界刚性的限制，寻求更为广泛的交换关系，这将使分工和专业化生产在单个企业的规模之外有进一步的

扩大。在我们看来，这种由各专业单位自发形成的类市场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行政控制导致的效率损失，并增加了社会经济制度的灵活性和应变力。

另外，企业内部市场化的收益还可能包括由内部市场的竞争关系带来的监督成本减少和工作积极性的提高。企业内部各生产活动单位之间的效益不相等，工人收入也就不相等。在习惯了分配均等的环境中，这种细微的差异也会引起密切的关注。一方面，人员和要素在企业内的流动倾向效益更好的部门，由此使部门经理人员和职工必须在竞争中为求更大生存而提高努力程度。另一方面，由于部门之间非常关心这种相互差异的形成和来源，因此在它们之间也有着互相监督的动力，这无形中减少了自上而上监督的成本。

最后，我们必须申明一点：虽然国有企业的自发创新最终会形成某种均衡，但这种均衡在经济效率上只处在次优状态。

回顾国有企业的改革过程，可以得出一个基本判断：至今为止，国有企业改革的成就主要来自企业内部边界的调整。体制改革之后，国有企业的外部边界仍然保持着刚性的格局。这是因为在改革过程中，尤其是在改革的初期，国家仍然需要从国有企业那里获得相对稳定的收入以支付改革成本。所以，由国家实施的国有企业改革方案，仍然无法改变边界刚性的格局，只能以放权让利的形式，赋予国有企业更多的自由以调整企业内部边界。在国家相应政策的推动下，国有企业，尤其是国有大中型企业，从过去的实践中发掘已有的经验，把计划体制时期内部市场化的做法加以改造和推广，很容易走出一条适合国情的改革之路。我们所看到的一些成功例子，如邯钢、山西平朔煤矿、中原油田等，借鉴的都是这条思路。

既然国有企业边界刚性带来的问题如此之多，那么，为什么到了要改革这一局面时，却如此困难呢？国家在财政上长期依赖国有企业，恐怕是国家对国有企业改革一直持谨慎态度的一个原因。此外，国有企业职工在改革之后，仍不愿失去传统体制下的充分就业和高福利水平，这也是改革的一个很大的阻力。

但是，从现在开始，也许是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最好时机。主要原因在于：非国有经济的崛起已使国有企业对国家的重要性相对下降。改革之后，非国有部门在中国经济中比重的迅速上升，其产值和财政上缴的比重均有很大的提高。而在这期间，国有企业的生产率虽在增长，利润率却在下降，由此引起国家对国有企业财政补贴的增加和国有企业财政上缴的减少。除此之外，非国有经济还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基本上吸纳了从农业部门分化出来的剩余劳动力。所以在解决就业方面，非国有企业相对于国有企业的重要性也在上升之中。总之，国有企业对改革的贡献在下降，国有企业改革的成本也在减少，国有企业改革的时机已经到来。

根据我们的分析，国有企业改革中后期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是边界刚性条件的限制。各种改革方案的最后落脚点一定是如何打破边界刚性的格局。最优的改革方案应该是能以最小的成本，尽可能地使企业边界调整到最优规模，或者说，尽可能地使企业边界调整具有完全弹性。

国有企业的边界调整方式有两种，即由国家调整国有企业边界和由国有企业自身调整边界。在传统计划体制下，国家按行政命令调整企业边界，其成本相对较低，而国有企业受边界刚性的限制，其调整边界的成本几乎为无穷大。在改革过程中，国家必须兼顾经济效益与政治稳定，其调整成本随着时间的推迟将越来越高。而国有企业在改革之后逐步适应市场机制，由其自身依靠

市场机制调整边界的成本日益下降。因此，国家靠行政干预调整企业边界的成本很高，且结果未必能达到最优均衡，国有企业改革应主要依靠企业自身调整边界。而且，国家从直接干预中脱身之后，能集中力量提供制度安排等公共产品，这将进一步降低企业自身调整边界的成本。

我们认为，国有企业实现改革可以采取的一个方法是，在国有企业的内部培育市场，同时，要引导新兴的体制外部门加快发展，减轻国有企业改革的负担；最后得出这一思路的意义在于，国家可以从国有企业的自发创新中得到启示，并在改革过程中顺应、引导这种制度创新活动，由此可能探索出一条从企业内部入手、充分发挥国有企业的潜在优势，引导企业通过自利行为完成体制过渡的改革之路。

上面的这一篇大论，有些人读后会不以为然，认为这都是熟知的东西，没有什么意义。其实我们的想法只是一条，通过我们的分析，让大家了解国有大中型企业陷入困境的真正原因所在，难点不是在结构和体制，而在于企业的“边界问题”。其实，韩村河和华西这样的例子，就很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虽然结构体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但由于集体经济的性质，它的边界非常富有弹性，因而这两个村子的经济也取得了惊人的发展，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村子的居民，生活更平稳，更少焦虑。

改革没有一定之规，否则就不能称为改革，计划经济也好，股份制也好，关键要适合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企业、一定时期内的具体情况，能够促进其健康发展。黑格尔说过，“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名言也是人所共知：“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伟大人物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们决不被理论或实际的情况所局限。

一个国有企业的领导者，在今天的形势下，也许还要多学一点哲学的知识，才能不被舆论的误导所迷惑。

第三章

经济恐龙 与经济安全

经济领域里的安全问题，也不是一个新话题了。对于乔治·索罗斯和量子基金会来说，安全的概念可能会使他们想起另外有些事，譬如说艾伦·巴菲特。这个名列今年《福布斯》杂志公布的 200 个大亿万富翁排行榜第二名的老家伙，守财奴一样精明，他主张投资股票的最终目的是拥有企业，让这些企业为自己创造财富。因此他不大看重股市一时的波动，他认为投资人应该做的是选择任何经济形势下都有获利空间的企业。对于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来说，经济安全的概念更像是一场生死悠关的政治斗争，他指责索罗斯之类的投机家在东南亚操纵金融、终于酿成危机，使马来西亚的经济倒退了 10 年（这是他 9 月 18 日的最新结论，以前的结论是 20 年）。他说：“我会以我自己的方式反击。但我知道

我的能力已经受到某些人的破坏。我们的情况一直很好。我的预测我们今年的增长率仍能达到 8%。”

恐龙来了

20 世纪下半叶，世界经济进入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一国拥有的跨国大公司的数量和水平，已成为衡量该国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标志。从《幸福》杂志公布的 1995 年世界 500 家大企业的国别分析，一国大公司在世界大公司中占有的份额和名次，与该国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和世界贸易总额中占有的份额和名次大抵相当。只有我国，虽然国民生产总值已居世界第 7 位，在世界贸易额中居第 11 位，但在 500 家大公司中只有 3 家，居 16 位。

跨国公司的产生，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时期的结果，首先是结构上的需要，其次是竞争的需要。一个跨国公司，就像是武侠小说里的一代大侠，“业余选手”根本无法与之较量。

这一两年，西方跨国公司一改长期以来的徘徊、犹豫和观望的态度，纷纷瞄准中国这一世界上最大的新兴大市场抢滩、登陆。不少国际著名跨国公司捷足先登，再追加投资，热衷于搞伞型控股公司，有的跨国公司甚至打算将其地区总部迁来。跨国公司大举进军中国市场已蔚成风气，巨额资本注入使中国连续 3 年得以稳坐世界各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第二把交椅。由此可见，跨国公司“入侵”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

根据经济学原理，市场的竞争程度越高，资源的配置和利用效率就越高；市场的垄断程度越高，市场遭到的扭曲程度越大，资源配置损失的效率就越大。市场的结构依其竞争和垄断程度的高低可分为完全竞争、垄断竞争、寡头垄断和完全垄断 4 种类型。一

个市场越是趋向于完全竞争状态，有效竞争程度就越高，越是趋向完全垄断状态，竞争不足程度就越大。

显然，跨国公司这样的庞然大物进到中国来，首先会令人想到安全问题，它会对中国经济领域的竞争带来哪些不安定的因素——这一点我们将在下面讨论。但问题还有另一面，另一层含义，显然我们可以将跨国公司对中国的投资额增长，看成是自 80 年代以来跨国公司进一步扩张和全球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可以将此作为衡量中国开放政策所取得绩效的依据之一，但是，由于中国的经济运行正处于一个过渡性的转轨时期，中国具有世界市场上唯一的、最大的市场潜力（中国拥有 13 亿人口，以人口密度、人口的绝对量和收入水平估计等同于整个欧洲市场），在开发这样潜在的、巨大的市场潜力的过程中，跨国公司是否会与中国的企业通力合作？显然，即使存在着多种类型的合作（通过股权安排或是非股权安排），这种合作也肯定是竞争性的。这种竞争合作的后果又将如何？过去搞计划经济时，一、二家或少数几家国有企业垄断某一行业屡见不鲜，毋庸讳言，此为“第一次垄断”。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大批“三资”企业来华投资后，国企一统天下的独家垄断局面幡然改观，各行各业以往那种“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的风景不再。这是一个长足的进步。现在，西方跨国公司来了，这些“巨无霸”与中国企业显然不在同一个等量级，市场竞争胜负的天平不免会向跨国公司倾斜。我们倒不怕跨国公司来抢占市场，市场从来就是抢来的，天下没有不抢就能占领的市场，抢市场是所有企业的本能，更是跨国公司的拿手好戏。真正可怕的是跨国公司可能会垄断市场。因此，需要警惕跨国公司的垄断行为，防范跨国公司之间的串谋行为，决不允许在中国出现跨国公司“第二次垄断”的问题。

正是由于考虑到这些因素，中国在跨国公司“准入”方面实施了一定层次上的控制，“准入”的基本原则是有利于本国相关产业的发展，控制得好，就会促进中国企业的发展。以生产电视机、电冰箱等的家电行业为例，虽然在引进外资初期犯过一些错误，如政出多门，重复引进，生产能力远远大于消费能力，造成浪费等，但激烈竞争的结果是这个行业健康发展起来，我们能够生产国际一流的产品，并有了像“海尔”这样的国际名牌，以长虹集团为代表的一大批生产企业在度过了最初的艰难日子之后，终于走上了大踏步前进的轨道。

需要说明的是，简单的“市场不准入”虽然能暂时挡住跨国公司抢占市场的攻势，然而却为世界贸易组织所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所不容。不如让它进来，用各国均可采用的国内竞争政策或反垄断政策对其实行制约。即使是关键产业，也不是一概拒用外资，关键产业利用外资得当的话，不见得会沦入别人之手，反而会有助于关键产业的发展。以国防工业为例，一国的国防工业通常是不容他人染指的，但长期保护的结果势必会丧失效率，付出代价，若允许跨国公司进入某些经过选择的军、民两用部门或与军工相匹配的部门，当能提高效率，提升技术，何乐而不为呢！

中国工业的落是由历史因素造成的，我们不能因此而迁就历史。面对中国市场巨大的潜力、面对中国工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改革和调整，面对中国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面对中国消费水平的提升，面对跨国公司对中国工业和经济的渗透及其在中国市场占有率的提高，我们应明确对跨国公司的政策。在致力于改造中国的传统工业和经济结构的同时，我们必须正视跨国公司的进入。

要参加职业联赛

中国列入世界 500 家的，一是中国银行，一是中国粮油进出口总公司，中国银行确实已办成名副其实的跨国大金融公司，但粮油进出口总公司主要是进口粮食多，并不值得自豪。

我国不少工业产品如钢铁、煤炭、水泥、电视机、自行车产量居世界第一，还有不少居二、三、四名，但是却没有一家工业公司进入世界 500 家，这表明我们的企业还处在较低的水平上。一个企业要想求发展，生产出具有世界水平的产品，在科技方面应该有很大的投入。如果是单个企业，它不可能产出很高的比例，但对于大企业集团、跨国公司就不同了，虽然比例可能与单个企业一样，甚至还少一点，但由于它的基数大，数额是非常可观的。

大企业集团的科研成果可以在集团内部的所在企业应用，相对的科研费用反而降低，这是一个明显的悖论。

江泽民同志一再指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工业化的实现，经济整体素质的提高，主要依靠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要以资本为纽带，通过市场组建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的生产力较强的大企业集团。”

当今世界，经济的竞争已越出国界，主要是国与国、跨国集团与跨国集团之间的竞争。为了提高国际竞争力，必须有一批大公司作后盾。据 1993 年的统计，全球 500 家大工业公司的销售额已占世界总产值的 20% 以上。其中在 500 家中的日本、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的大公司销售额分别占本国国民经济总值的 25% 至 32%。而我国国内 500 家大企业销售额总和，只占我国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的 16%。

一个更为严峻的现实已摆在我们面前，世界 500 家跨国大公司中的 230 家已纷纷进入我国，经济发达程度与我国相仿的发展中国家的大公司也虎视眈眈，企图抢占我国市场。已有不少行业的市场主导权落入外国公司手中，不少名牌为外国名牌所吞没。外国公司的加油站已建到我国炼油厂的门口。进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外国公司享有“国民待遇”，竞争将更激烈。我国经济与跨国公司的竞争，已不是在国际上进行，而是在我国市场上进行。在这种情况下，再回头闭关锁国当然是不行的，单纯的保护政策也不能长期奏效，唯一的办法是组建和扶持自己有强大经济实力的公司，与外国跨国公司针锋相对，以竞争对付竞争，以垄断对付垄断，学会在国际竞争中取胜。

其实，当我们由于境外跨国公司进入中国而担心我们的经济安全时，一个很明显的道理是：要想获得真正的经济安全，你必须变得与它一样强大。

近几年来欧美日掀起的新一轮兼并、合并的浪潮就足以说明这些国家已有的大型企业正在朝超大型企业发展。1996 年全世界企业的兼并收购超过两万家，交易总额达 1.14 万亿美元，超过 1995 年的 31%。其中美国一国的兼并即达 6658 亿美元，超过 30 亿美元有 31 起，超过 100 亿美元的就有 7 起，震惊世界的波音公司与麦道公司的合并达 133 亿美元。这些兼并不仅没有受《反垄断法》的限制，反而受政府的支持。发展中国家为了保护民族工业，大都建立本国的垄断公司或控股公司，以对付跨国公司的倾销。世界最大的十大炼油公司，有 7 家如委内瑞拉、巴西、墨西哥、英国等国的石油公司都是垄断性的国有控股公司。

在激烈的竞争面前，我国的经济主管部门也已经开始在某些行业搞企业联合、合并、兼并的试点，但目前试点的企业集团存

在着明显的不足，即：1. 经济实力不强；2. 内部管理不规范；3. 集团缺乏凝聚力；4. 政府职能转换迟缓。我国试点的全部 55 个企业集团的销售额总和，只相当于日本新日铁一家的销售额，只有通用汽车的 1/6。排大企业首位的大庆石油管理局一年的销售额才 36 亿美元，不到世界 500 家末位的巴西利亚电信公司 88 亿美元的一半，宝钢集团的销售额达不到日本新日铁的 1/10。

现代化企业是现代化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没有科技先进、规模经营、能生产畅销的名牌产品并且占有一定市场份额的大企业，不能称为现代企业；没有一套“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制度，也就不能称为现代企业制度。

目前我们的经济体制有三方面不适应大公司的发展：一是大公司由多家政府部门齐抓共管，政出多门，又都不负最终经济责任。二是下属企业是多级法人，都有经营权，都要“自我发展”，不利于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效益提高。三是大公司本身兼有部分行政职能，没有完全摆脱行政性公司的框框。

因此，要实行大公司战略，首先必须在经济体制上深化改革，使之变得有利于大公司的发展。

首先，彻底实行政企分开，变行政管理为经济管理，建立起最终所有者（全民）、经济管理机构、授权经营者（大公司）之间权责利统一的契约关系。

其次，跨行业、跨部门、跨地区实施企业兼并，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大公司。

第三，总公司、分公司（子公司）、生产厂三级划分所有权、经营权、管理权的权责利界限，优化资金、资源、设备、人力的配置，建立高效率、高效能、高效益的营运体系。

此外，要实行大公司战略，就必须首先充实大公司的资本金，

授予大公司以资金、资产、资源自主使用权，授予大公司投资权和生产计划调整权和销售权及自营进出口权，让大公司在国际上与跨国公司竞争，增强竞争能力。

同时，大公司本身也要进行重大的结构改革。

下决心调整经济结构，加强技术更新改造，逐步克服散、小、乱、差的问题，实行集中布局、规模经营、科学管理、提高效益的方针。要改革工厂设计模式，实行新体制、新机制、新模式，向国外先进的大公司看齐。

我国已有一批全国性的，甚至世界级的大公司。但是过去由于种种原因，受各种条件的限制，使这些公司不能充分发挥大公司的优越性及其在国民经济中应起的作用。

既然我国需要建立一批国家级、世界级的大公司，就应当肯定这些现有的大公司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 and 支柱作用，给予充分的支持与扶植。

有一批行业性大公司是从原行政部门改组过来的，如有色金属总公司、航空工业总公司、石油天然气总公司、船舶工业总公司等等，他们已经从行政职能转变为企业职能，从生产管理转变为资产经营，我们应当欢迎这种转变，不能简单地称之为“翻牌公司”或“婆婆加老板”，而将其拒之现代企业制度的门外，应该鼓励它们积极改组，使之逐步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化。

有的大公司是在大企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如一汽、二汽集团公司，它灵活性、自主权有余，但力量相对较弱，对全国产业的领导作用、调控能力不强，应通过兼并、重组，使之发展成国家以至世界级的大公司。

总之，应在以下几方面更加明确大公司应有的地位和作用：①大公司享有《公司法》、《企业法》赋予的一切权利、义务及责任。

所有分公司、子公司、直属工厂、企事业单位受其管辖；②大公司是国家授权的投资主体，大公司的董事会或经理班子是委任经营授权资产的独立法人，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③大公司以其全部法人财产，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

安全的“菜谱”

何谓经济安全？这里面有个双重理解的问题。我们经常听到的是第一种理解，即我们不能被进入中国的跨国公司骗了、坑了、挤跨了。我们个人、企业、乃至国家的安全要有保障。很显然，这种理解更多是的一个心理问题，即有多大胆子的问题。说到胆子问题，笔者想起了一个中学同学当时与他父亲的对话，这位同学喜欢听流行歌曲，当时流行歌曲刚刚流行，最流行的曲目是《张帝问答》。当时也没有今天这样的环境，没有发行的磁带，大家互相翻录调频电台里播放的港台歌曲，或者干脆就整晚上坐在收音机面前，我的这位同学就是这样，一直听到深夜12点。他父亲不愿看到孩子如此“堕落”下去，耐心细致的给他讲道理，讲千万小心“资产阶段的腐蚀”，这位同学听了就跟父亲吵起来，“你怎么老想着它来腐蚀我，我就不能腐蚀腐蚀他？”当然，我的这位同学的这番话还显得很幼稚，但他却道出了一个检验谎言的标准，当一个人反复说他并不拒绝某种东西，只是担心这种东西会造成什么样的不好影响时，他实际上是在拒绝。对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的讨论也是同理，你没有充分的信心来面对这件事，自然会昼夜不安。

有信心面对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光靠精神胜利法是不行的，要对这件事有个“度”的把握，这就是安全的第二重含义。我们不

能阻止它，但能把它放在合适的位置上，给它是一些规则。

这些“度”是什么？

（一）市场结构准则

市场结构准则有4大要点：其一，从单一的特定市场来看，要考察跨国公司在该市场上的市场占有份额，看前3名或前5名跨国公司在全行业所占的生产和销售比率（或曰产业集中度），这一比率偏高则说明外国公司对本国企业的挤压效应和对市场的抢占效应甚强，需要政府出面进行反垄断干预；其二，从全面的市场体系来看，要考察跨国公司对有关国计民生的关键性产业的进入情况，看跨国公司在国民经济重要部门的布局态势、投资力度和深入程度，防止我国的经济命脉和战略要津被跨国公司尽握手中；其三，从新兴的幼稚产业市场来看，要考察跨国公司的进入是否压抑甚至窒息本国幼稚产业的成长，即使跨国公司尚未进入（市场占有率为零）或初涉该行业（市场份额还不大），在市场准入上也要从长计议，审慎考虑；其四，从产品外销率来看，要考察全部“三资”企业年出口额占其总销售额的比率，以此判断“三资”企业是以中国作为出口基地还是出口目标市场的战略意图和倾向性。

（二）获利分配比率

经济利益或经济盈利原则是经济学的最高原则之一，在吸引跨国公司来华投资时也不例外，考察合资、合营企业里中方的获利程度是经济安全的题中应有之义。对外商独资企业，股权和利润全归外方，我方无从分肥，只能在税收减免期满后得到一块税收，故不宜多搞。对股权式中外合资企业，中方的利润分配率与股权比率相一致。而对契约式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方的权益是由合同本身规定的，中方占有一定的利润分配比率。中方在合资、

合营企业中的利润分配比率越高，说明中方获利程度越大，反之则越小，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有一点需要注意，纸面上规定的利润分肥，常常被跨国公司逃避税收的惯用伎俩——转移定价化为空文，账面上出现的虚假亏损往往使中方无红可分。

在外商投资企业中，国产化比率或当地含量比率也是中方获利的重要考核指标，这一比率高，一方面表明，“三资”企业产品的零部件、原材料等中间投入物的进口替代程度高，本国技术提升速率快，另一方面则表明，外来投资的产业连锁效应强，带动本国配套产业发展的辐射力度大。反之则相反。“三资”企业初创期，由于技术、设备的大量引进，其进口比例一般会高于出口比例，但若其进口增长率长期高于出口增长率就有问题了，这两个比例的动态比较似可间接地反映“三资”企业实行当地化战略的态度和力度，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实际获利程度。

（三）要素转移效应

跨国公司作了资本投入，是否还同时将其拥有的生产技术、管理经验、营销技能、名牌商标等无形资产一并转让过来，即是否将其一揽子先进、有效的生产资源转移到东道国（东道国是否有能耐对一揽子要素实行“分解”择优引进另当别论），从而填补东道国的稀缺要素缺口，这对当地经济增长和发展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不过，这一因素实难计算。如果说跨国公司转移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有助于东道国的经济安全，那么，其消极作用则构成经济不安全因素。例如，跨国公司对当地市场的垄断会压抑本土企业家的成长，会冲销本国企业长期积累的无形资产的价值。跨国公司常用的限制性商业惯例也对东道国企业发展有潜在的影响。

（四）社会收益效应

跨国公司群落在中国的客观存在必然会对全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影响，其正面的积极影响就是社会收益效应，负面的消极影响则是社会成本效应。社会收益应主要包括产业连锁效应、主业乘数效应、技术外溢效应、营销示范效应和区域辐射效应。社会成本效应则包括反向的产业连锁效应、失业乘数效应、再就业的社会调整成本、“孤岛”、“飞地”效应等等。这些效应错综交织在一起，有的相互冲抵，委实难以量化。例如，十余万“三资”企业带来了1400万工人的就业，这些工人的生计、就业自然是安全的，但一个铜板有两个侧面，那些被“三资”企业挤压、挤垮的国内企业的工人就得下岗待业，这两者孰多孰少，确实不易统计，众多下岗工人生活质量下降，缺乏安全感，往往蕴藏着造成社会不安定乃至动荡的因素。而对下岗工人进行再培训、再就业的费用，则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不堪负担的巨额数字。

（五）动态优势可得性

当代跨国公司的组织结构战略和经营管理战略发生了新的嬗变，诸多跨国公司的多国当地战略已经或正在为地区和全球战略所取代，它们对公司拥有的一揽子生产资源及其价值增殖经营链各个环节的活动进行跨国界配置、协调和管理，那些能够抓住跨国公司一体化国际生产新战略带来的历史机遇，将跨国公司的高技术、高附加价值的经济活动吸收到本国来的国家，就可能脱颖而出，开发出动态比较优势。而那些关起门独立发展本国工业的传统战略大失其效，在许多时候，许多场合都不再适用于动态比较优势的开发。如果我们自我封闭或被排除在一体化国际生产体系之外，我们会游离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就会陷入低水平、低层次的贸易、投资和生产活动，就会与许多新形式和新来源的

贸易利益与投资利益失之交臂，就会无缘与明天的经济腾飞相会。应当指出，动态优势的获得有时需要以牺牲静态优势为代价，取得长期优势的道路须放弃若干短期优势作为铺路石，如果动态优势更重要，那就要毫不犹豫地割舍眼前利益，“舍不得孩子，就打不着狼”。即使某些行业暂时失控，市场天平向跨国公司倾斜，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君不见那些最早开放的彩电、冰箱、洗衣机、电扇、制鞋业不是经历了一个先衰后盛、后发制人的过程吗？曾几何时，这些产品不是大量出口，打入国际市场了吗？

（六）对外依存度

目前，跨国公司是推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主导力量，公司内贸易和投资则扮演着串联各国经济的纽带与桥梁，吸收跨国公司投资较多的国家自然与世界经济“战车”拴得比较紧，不免会与世界经济周期同步共舞，这就为跨国公司传递外部世界的经济繁荣和衰退同时创造了条件。作为吸收跨国直接投资最大的东道国之一，中国与世界经济的相互依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般广泛，这般紧密，这般深刻。4.5 万家跨国公司分支机构在中国的经济存在（据《1993 年世界投资报告》），每年近千亿美元的对外贸易和数百亿美元的直接投资流量，足以说明我国经由跨国公司途径纳入世界经济网络的深度和广度，说明跨国公司特有的公司内部市场嵌入中国市场腹地的纵深程度。从经济安全的角度来看，这种相互依存，利弊共生、瑕瑜互见。中国这样的大国经济虽不像小型开放经济国家那样容易被世界经济大潮挟裹而去，难主沉浮，但我们对抗外部政治、经济风险侵袭的能力仍然有限，对外部商业性机遇、风险的传导机制和阻断机制尚不完善的中国经济，亟待大大提高自身捕捉外部机遇、抗御外部风险的能力。

小诸葛的八个锦囊

这里的“小诸葛”是集体智囊，他是相对于“刘备”——政府主管部门而言，同时他也不敢冒犯那位三国活神仙，所以自称“小”。

毋庸讳言，西方跨国公司的活动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外壳下进行的，它的“天性”就是追求垄断地位，谋求垄断特权，它一旦控制市场就可能压抑竞争，降低市场效率，扭曲市场结构，这会妨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造成某些行业、某些部门的垄断局面。如果出现这种情形，自然有悖于我们吸纳和利用跨国公司投资的初衷，也是我们不愿看到的。防范跨国公司可能采取的垄断行为，削弱跨国公司业已夺取的垄断权力，不仅可以提高我国的经济安全，也有助于我们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

（一）引进防御性对外直接投资

针对跨国公司的寡占反应特性引进“防御性对外直接投资”，利用来自不同国家或不同集团的跨国公司为争夺生存和发展空间的竞争来削弱垄断。在某些寡头垄断行业中，如果有一家企业率先到国外投资，其他企业往往会效仿和追随先行者前往该国投资，从而导致短期内向同一东道国竞相投资的“蜂拥效应”。寡头垄断企业主要出于担心原有的竞争均势被打破，自己的市场份额受到竞争对手的威胁，因而采取相同的投资方式，以防竞争对手超越自己，即使达不到足具效应的规模而遭受亏损也在所不惜。这种带有防御性质的对外投资是寡头垄断企业特有的一种反应方式。在中国广阔的大市场背景下，我们完全可以利用这一点，既能吸

引到大量国际寡占反应式的防御性投资，又能利用欧美和日本等国跨国公司基于全球战略的相互竞争削弱某一国跨国公司的垄断。“利用矛盾，各个击破”这种军事辩证法可在经济战中加以运用。如果某一行业、某一部门出现一家跨国公司日益庞大的局面，而本国企业又暂时缺乏对抗能力，这时，不妨有意识地引入另一家或两家跨国公司与之竞争，以毒攻毒，“以夷制夷”。

（二）制定新的竞争政策

将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结合起来，鼓励本国厂商联手以企业集团形式参与竞争，抗衡外企垄断。在这方面可以效仿欧盟在竞争政策上采用的双重政策，即对国际竞争比较激烈的产业（如新材料、化学和医药、计算机、远程通讯、电子、汽车及航空等）里的国内企业的兼并、联合放宽限制或鼓励合作，而对受外来竞争压力不大的传统产业则施以比较严格的反垄断管制，因为这些行业中多已实现规模经济，企业间联合的积极作用不太大，且容易形成市场垄断和价格串谋行为。与其他政策相比，制定并运用竞争政策来对付国内或外企垄断行为针对性更强，矫正市场扭曲的作用更大，因而更为有效。值得指出的是，竞争政策现已成为国际上讨论的一大热点，各种竞争政策的运用及其协调将是下一轮多边贸易谈判的一个重要的新议题。

（三）具体分析服务业的市场准入

对服务业跨国公司的市场准入不是简单地一概排斥，而是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可以对进入某一服务行业的跨国公司的经济实力、技术优势和本行业国内企业的状况进行分析，找出外商“排挤”本国企业可能性的大小，再采取相应的国家政策。例如，如果某行业因传统垄断缺少有效供给，可以让跨国服务公司介入并注入适当的竞争，同时对其业务范围和经营方式加以限制，使

之与本国公司的竞争保持在一定水平上，既能促进本国企业迎头赶上，又能避免被竞争挤垮，达到适度保护民族产业的目的。如果跨国服务公司只是在自我技术优势的范围内活动，不至于与国内公司争夺市场和顾客，则无必要施以政策束缚，因为限制过严将使本国企业与国际竞争隔绝，无以挖掘整个服务行业的潜力和提高整个服务行业的质量，国内幼稚产业虽然得到充分保护，但代价太高。应该看到，跨国服务公司全面进入中国的服务市场，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留给我们的服务企业的时间确实不多了，惟有急起直追，改进服务质量，才能避免被淘汰出局。

（四）建立国家经济安全评价系统

建立国家经济安全评价系统，把跨国公司市场占有率等指标纳入该系统，作为监测和预警的一个重要内容。在中国市场经济尚未充分发育，中国企业巨人刚刚翘首崛起之际，政府有关部门要经常对关键产业的产销情况进行评估，警惕跨国公司获取垄断地位，同时，在竞争不足和过度竞争的行业中及时调整平衡，以保持健康有序、公平公正的竞争秩序。建立国家经济安全评价系统最好与建设国家利用外资数据库（尤其是外商直接投资数据库）衔接相连，若无全面、系统、连续的数据，评价经济安全的量化分析殊难进行。这种国家级的利用外资数据库可设在某一有关的政府部门或某一大学研究机构，数据资料的搜集、整理、分类分项输入和检索、调用程序应统一、规范，并实现电子计算机化。“三资”企业的数据搜集纵向上宜分国别（投资来源国）、分行业（外资的部门流向）、分地区（国内各省市吸收外资分布）、分年度；从横向上应包括企业性质、注册资本及追加投资额、产出和销售额、年盈利或亏损额、纳税额、雇佣职工人数等项指标。凡投资项目逾一亿美元的大项目，世界排名前1000家的大企业再另

设子数据库，因为这些数据对评价、判断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的战略类型、布局和发展态势十分有用。除个别涉及企业商业秘密的数据外，绝大多数数据信息应公开化，交于社会各界无偿或有偿享用。中国利用外资数据库必须由国家投入投资来建立，这项软件形式的基础设施工程，其意义决不亚于其他硬件形式的基础设施建设，应尽快提到议事日程上并付诸实施。

（五）扶植大型国有企业集团

实行扶持大型国有企业集团的战略，加速兼并，扩大规模，增强实力，与跨国公司相抗衡。西方跨国公司抢占我国市场咄咄逼人，风头正盛，面对这种情况，“诸侯割据”和无序化小生产是根本无法与之抗争的，中国急需像宝钢、长虹这样能与之分庭抗礼的“航空母舰”。若每个关键行业、新兴产业都有一二个中国的“超级巨人”企业，就不怕跨国公司了，因此，扶持大型国企成长是外来竞争压力加剧下的必然选择。目前当务之急是增强本国企业的资产所有权优势，有效遏制跨国公司的攻势，而有意识地通过兼并来提升企业数量级和扩大市场占有率不失为一条捷径。在外来竞争压力下，解决工贸结合、“强强”结合这类长期困扰我们的“老大难”问题也许有了新的动力和契机，大型国企与经过选择的跨国公司结成战略联盟的伙伴关系也有了现实的需要和可能。这种兼并、联合、结盟完全可以与国企正在进行的现代企业制度试点结合起来。需要注意的问题有三：一是鼓励国有企业联手抗衡跨国公司并不是要恢复往昔国企“第一次垄断”的“辉煌”，因为无论国有企业垄断抑或跨国公司垄断都会损害社会经济效率和消费者权益；二是我们希望各行各业都能形成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以求建立一种国内外大企业之间相生相克的平衡、制约机制（如“乐凯”抵制“柯达”、“富士”胶卷公司联合提价的

图谋);三是注意防止新的条件下国有大企业与跨国公司可能发生的串谋行为。

(六) 修正利用外资的战略模式

重新修正利用外资的战略模式,适当增加借用外债来发展本国的关键性战略产业和扶持大型国有企业集团。外商来华直接投资无还本付息的问题,故长期以来成为我们利用外资的优先选择,这一点今后仍需支持。但借用外债这一传统外资形式近来在国际上大有复兴之势,国际上也有从未陷入债务危机的成功典范(如韩国)和走出债务危机恢复生机的国家(如墨西哥、巴西)的经验可资借鉴,我们能不能开启和转换一下思路,打破不宜借用外债(尤其是商业银行贷款)的“禁区”,通过均衡利用外资来克服偏重利用跨国公司直接投资潜伏的弊端呢?我国目前的宏观借用外债战略要进一步加以中观化和微观化,即在产业层次和企业层次上重新调整利用外债模式。从发展本国关键产业来看,巴西、韩国利用外资的战略各有特色,很耐人寻味。巴西侧重引进跨国汽车公司的直接投资,虽无还本付息问题,但产权大多归于外人,而韩国侧重运用外债来源的资本注入本国大企业,主要供其设备购入、技术升级之用,产权和技术尽握于国人之手,如今两国均已成为汽车生产和出口“强国”,但“巴西奇迹”和“汉江奇迹”在产权内涵及其归属上是不同的,其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和战略也就有了分野。从扶持本土企业来看,对善于经营管理且效益甚佳的企业网开一面,赋予对外融资权或给予借贷担保,并非不可行,那些著名的韩国企业大宇、现代、三星公司难道不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吗?中国的国有大企业若能吸纳外债形式的相当数量的资金,引进技术设备,实现规模经营,从而成为行业“龙头”,达到进口替代或跨国公司内部销替代之目的。若能进一步延伸、拓展为出口

企业，便能以出口创汇还贷，而无还本付息之虞。中国的企业不是不想利用外债，也不是没有能力利用外债，不断增长、屡禁不绝的环流投资或“假洋鬼子”投资，其实就是国内严格控制外债规模条件下企业“发明”的一种变相的外债，既然如此，何不让其公开化呢！如果有一批经过资格审查的中国企业被许可在一定额度内向外国商业银行借款并自行负责偿还，我们利用外资的渠道、规模、方式便会大大拓展，利用外资这篇文章可以做得更活更好。

（七）修正外商直接投资政策

重塑外商直接投资市场，逐步取消任何扭曲性外商直接投资政策。利用外资的安全防范措施要与国际接轨，既不能用歧视政策来对付跨国公司垄断，也不能靠优惠政策去吸引跨国公司投资。限制、歧视也好，鼓励、优惠也好，其本质上都在增加市场的扭曲程度，严重的甚至会导致市场失败。正确的做法应当是创造条件，逐步朝公平公正、国民待遇、充分开放、非歧视非优惠的方向来减少和纠正市场扭曲，规范外商直接投资市场建设。矫正歧视性政策，就不能再搞乌拉圭回合“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禁用的名堂，不能抱住经济民族主义色彩极浓的某些不正当做法不放，不能不分部门、场合地误导滥用所谓的“战略性投资政策”。我国既然在乌拉圭回合框架协议上签了字，焉能不守承诺，自食其言，失我泱泱大国风度？今后，我们只能依据国内制定的“反垄断法”合理合法地限制或惩戒违法的跨国公司，自觉顺应全球投资自由化潮流而动；矫正优惠性政策，就不能再搞竞争性的“优惠政策大战”，因为过度的优惠政策竞争会带来一系列社会成本和扭曲效应；政出多门，政策内含的不稳定等人为因素增多，优惠政策效用就会递减，肥水外流让跨国公司坐收渔利；变相歧视

国内企业，刺激“假合资”企业衍生和缩短“三资”企业的生产周期：低效率的外国投资者趋利而动，捷足先登，产生“劣币驱逐良币”效应。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优惠政策国际竞争也越演越烈，以至于最近召开的联合国第九次贸发会议大声疾呼各东道国政府在国家、双边、区域和多边层次上采取“休战”行动。我们不妨借机逐步取消开始为外国投资者提供的“超国民待遇”（同时取消本国企业享有的某些特殊待遇），让国内企业与跨国公司真正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公平竞争。

（八）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两手并用

拓展跨国经营，在世界范围内适时开发中国企业自己的国际生产和服务的网络系统。“来而不往非礼也”。投资自由化从来不是单行道。既然跨国公司可以来中国抢占市场，中国的企业为什么就不能打出国门，来一个“千里跃进大别山”，主动打向“敌占区”市场呢？中国的企业为什么就不能成为遏制、抗衡国际垄断势力的中流砥柱呢？现代跨国公司实行内部化经营确实有着种种潜在的利益和好处，不要白不要，弃之太可惜。鉴于中国正在逼近“投资——发展周期”中的国际投资专业化阶段，政府应从战略高度不失时机地制定我国企业的国际化政策，加强服务，宏观协调，统一管理。目前以首钢为代表的工业跨国公司和中化为代表的外贸综合商社试点，展露了未来我国海外直接投资事业的一线曙光。今后，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要两手并用、协调发展，试想，在国际投资竞技场上，缺一条胳膊如何打得漂亮“组合拳”？如果我们有了这两只手，国际投资这步棋就活了，投资主导、牵动的国际贸易也就活了，整个中国开放经济这盘棋就会下得有声有色，波澜壮阔，我们就会有更多的依托和更大的周旋空间，就这一意义来讲，我国的经济安全系数岂不是因此而更加提高了吗？

顶天立地，成长为巨人，成为中国造的经济恐龙，这是立身世界，保持国家经济发展平稳，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唯一可行的选择。

毛泽东同志有关于战争的著名的三段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段论的核心是“战略”二字，不纠缠于一时一地的具体事物。那么，中国与国外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到了哪一段呢？战略防御，还是战略相持？显然，今天还不是战略反攻的时机，那是明天的辉煌。

突破早晨的迷雾

第五部

我们正在一步步走向一个充满危险的地带，一方面金融机构要为整个国家的改革开放提供充沛的资金来源，包括引进国际资本，因此它须与国际金融市场接触，遵循通行的原则。另一方面我们的金融体制还存在着许多致命的弱点，对即将到来的危险还没有强有力的对付手段，完全有可能受到某种不怀好意，唯利是图的国际金融势力的攻击，从而波及到整个国家的经济运作。

第一章

足球是 最深奥的哲学问题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个世界不一定是越变越美好。从某种意义上说，世界政治经济风云的变化，使发展中国家越来越感到自己置身于一个危险的环境之中。

参与国际经济的竞争，经常见诸中国报刊的讨论是如何防止外来经济要素对我们的“入侵”及防范措施，一句话，要让外来的东西慢慢适应中国的情况。面对问题的另一面，中国如何攻到国际经济社会中去，则很少讨论。下面摘自《参考消息》的一则报道，也许能在某种程度上说明这个问题：

【埃菲社哥伦比亚麦德林 9 月 3 日电】不结盟国家运动认为，经济的全球化、单极世界和富国与穷国在技术上的差距正威胁着

传统的文化，并且将许多国家的生存置于危险之中。

这是不结盟国家运动的一份文件所讲的。目前，54 个不结盟国家的代表正在哥伦比亚城市麦德林讨论这份文件。

不结盟国家指出：“消极的全球化意味着丧失自己的身份、社团观念、个人价值和自我文化的归属感。”为此，应当发展和促进“‘积极的全球化’观念，以此作为南方国家丰富人类文化财产的唯一选择，而不致堕落为其他地方文化产品的被动消费者”。

为了增加在信息和通讯领域里的技术转让，使知识产权不致成为欠发达国家在贸易和投资上的障碍，文件要求不结盟国家行动起来加强南南合作。

在现代足球理论中，攻击和防守不再像以往的认识那样，是一对矛盾；相反，攻与守被认为是一个统一体，攻即是守，守即是攻。在比赛中，白色的足球同时代表着双方的形势以及暗藏在表象之下的骤变基础。一次激动人心的门前保卫战同时也是一次成功的快速反击的第一个环节。

多年来，我们经济决策中某些热烈讨论的问题，都集中在类似“攻与守”和“快速攻防转换”这种范畴里，很多人不是动态地看问题，完全“以我为主”，以平静稳定为主，酿成了一些无法挽回的失误。

譬如，在以下这些方面：

证券市场

中国证券市场的形成，以 1990 年上海和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的成立为标志。经过 5 年发展，到 1996 年 4 月底，形成了具有

1300 万投资者, 352 个上市挂牌公司以及 6000 多个准上市公司(定向募集公司); 发行 A 股面值 120 亿元人民币, 上市总股本 818 亿元人民币, 市价总值 4727 亿元人民币, 年成交金额 4018 亿元人民币; 境外上市企业 23 家, B 股上市企业 70 家, 筹集资金共约 67.5 亿美元; 国债年成交额 2024 亿元人民币; 共有证券公司 97 家, 证券兼营机构 333 家, 证券营业部 2000 多家; 证券从业人员约 10 万人。整个中国证券市场市价总值达到 5925.3 亿元人民币, 占 GDP 的 7%。据统计, “八五”期间, 通过证券市场发行股票筹集的资金达 318 亿元人民币和 67.5 亿美元, 发行国债 3798 亿元, 发行企业债券 1416 亿元, 总共通过证券市场筹集了 5579 亿元人民币和 67.5 亿美元。可以这么说, 中国证券市场 5 年走过了国外上百年的初期发展阶段。

然而, 中国证券市场的产生, 在当时并不是一种自觉的行为, 而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1982~1994 年的 13 年间, 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资金大量来自借贷。从全社会说, 这一时期累计的固定资产投资量达 68881.6 亿元, 即便假定 1994 年我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 17941.64 亿元资本金总量都在这个时期内形成, 两者差距也达 50000 亿元以上。由此可见, 缓解企业的债务负担、提高其资本金比例, 是深化企业改革,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必须解决的难题。降低资产负债率, 若使资本金及净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达到 50%, 在负债金总量不变的条件下, 全社会各企业需补充资本金 26000 多亿元(其中国有企业需补充资本金 18000 多亿元); 如将负债金转化为资本金, 则需使 13000 多亿元的负债金转化为资本金(其中国有企业需转化的资金达 9000 多亿元)。据此, 实际所需补充的资本金在 13000 亿元到 26000 亿元之间。

因此，可以直观地说，股份制改革和证券市场的发展是政府在计划经济走到了顶头后，再也无力对所有企业提供财政支持，而希望由国内外民间财力来解决国内企业固定资产投资中外债比例过大这一时刻都会成为定时炸弹的问题的一种被动的选择。一旦情况不那么紧张，在当初那种“不惬意”的心情下面掩藏的许多问题就暴露了出来。

应该说，到目前为止，大多数人对证券市场的理解都还停留在解燃眉之急，拾遗补缺，“不用还本的集资”这类很狭隘、功利性极强的水平，而没有认识到证券市场是现代经济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是企业发展的最得力的手段之一。

在正确认识证券市场，引导入市者树立正确的投资观念，企业在股份制改造后应该对股东负有哪些责任等一系列问题上，有关媒介应该有一些正确的引导、灌输和教育，可惜我们没有看到这种情况。

究其原因，也许跟上市企业的早期资本金大多是国家固定资产投资有关，因而有意无意之中形成了一种微妙的感觉：在证券市场上市，并不意味着“我求你”，相反，股东们与证券市场的关系是“你求我”。

由于中国证券市场的发育和发展，中国经济得以越过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低谷，并使得中国开始于80年代的经济改革顺利地过渡到90年代的全新阶段，由此启动并带动了相关领域的改革进程。近几年金融领域的改革，如国债和企业债券的市场化、利率的市场化、公开市场的形成、外汇市场的形成、商品期货市场的发育、专业银行的商业化以及特别重要的企业制度的市场化和资本化等等，各类要素市场和经济微观层面的改革进程，都或多或少地得益于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中国理论界在80年代许多梦

寐以求的理论设想都在 90 年代通过证券市场以及由此带动的相关改革而进入实际操作过程,甚至大喜过望地实现了预期的目标。

实践的结果深化了人们的认识,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股票证券市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问题的关键是,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政府的思想意识如何像对企业所提出的要求那样,从产品经营的层面转变到资本经营的层面上来;在规划和发展中国证券市场的目标时,如何站在 21 世纪世界证券市场格局演变中从占有有利地位的高度去确定中国的发展基点,使中国的证券市场乃至资本市场的发展符合中国快速发展的经济规模,能够成为世界证券市场中举足轻重的一部分。

开发银行

目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已发展到了一个关键阶段,运用金融体制改革带动企业体制的改革是推动改革进展的一个主要思路。银行的商业化分业经营已成必然,通过银行的商业化断开企业对国家的依赖关系是改革的一个重大步骤。在这种背景下,以世界银行为模式,我国组建了国家开发银行以弥补银行商业化所带来的真空,两年来的运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由于对这类金融机构认识的不同,在中国对其特征是财政行为还是金融行为的问题引起了广泛的争论。

世界各国在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过程中,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或早或迟地结合本国国情建立了各具特色的开发银行。从国际经验来看,开发银行就是在财政或政策手段的支持下,按照银行的经营活动原理与方式实现政策或财政目标的一

类特殊金融机构。国际上开发银行均遵循银行的安全性、流动性与效益性相统一的经营原则，都竭尽全力运用各种金融工具和政策手段使其投融资在期限、利率及规模等方面实现银行管理的匹配原则，在资产负债管理方面形成低贷款利率、低融资成本和低呆账、坏账的良性循环机制。在全部的经营活动中，又体现了较强的对财政或政策的依赖性。

借鉴国际上成功的经验，顺应经济体制改革的客观要求，我国在两年前成立了开发银行。两年来，开发银行的运作已显出成效，在支持国家重点项目建设，支持中西部地区发展，控制信贷规模方面起到了较大作用，从一开始就显示了这种金融工具的作用和潜力。但如何使用这种金融工具，解决长期以来企业尤其是基础产业领域对国家投资形成的依赖状况，变输血机制为造血机制，应该说是改革所面临的难点，这个问题如果能够真正得到解决，改革的各个方面都可以搞活了。

关于我国开发银行的地位与作用，从其一成立就有争论，有人认为它应作为第二财政补充财政不足部分，以完成无力偿债的基础建设，也有人认为开发银行只是金融中介机构，对政策性项目难以承担责任，也无权监管。这两种认识把开发银行财政及金融两种特性对立起来，没有认识到开发银行在体制改革中的特殊地位。

这牵扯到许多金融从业人员和一部分金融界、经济界的决策人士，缺乏对开发银行理论的理解，一个没有理论指导的决策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即使决策正确仍然会出现一定的问题。

其实，认真比较一下，国际上开发银行与财政部门、商业银行在运行机制上的不同，很多困惑就不难解释。

国际上开发银行在目标模式上实现了财政特性和金融特性的

融合，使之不仅仅作为银行，更作为一类发展机构来体现财政目标和产业政策，有别于商业银行追求盈利最大化的目标模式。其活动的领域往往是商业银行不愿涉足的长期限、低收益、高违约风险的基础性项目和落后地区的工业领域。

国际上开发银行在资金来源上体现政府和财政的有力支持。各国开发银行在创立的初期几乎无一例外地由政府或国际组织直接拨付资本金，各国财政还采取提供贴息资金的方式弥补投融资的负利差。

国际上开发银行在手段上更多地依存于财政或政府的信用，有别于商业银行运用自身信用的市场化融资机制。包括由政府直接担保或以政府信用支持在国内外资本市场发行金融债券。例如，世界银行能在发达国家金融市场上持续筹集低成本资金的重要保障，在于世行具有除成员国缴纳的股本金之外，各成员国的主权国家信用承诺缴纳但实际上未缴纳的巨额股本金（约 1700 多亿美元）作为后盾。日本开发银行则主要通过财政投融资系统筹集的邮政储蓄、退休金等获得低成本、长期限的资金。

国际上的开发银行往往充分利用财政或政策特性，建立比商业银行更安全可靠的贷款回收安全保障体系和具有威慑力的贷款逾期制裁制度。以此保证贷款如期回收，减少呆账、坏账损失。例如，世行贷款从来不直接对项目开发商，而是对主权国家，由主权国家财政部或成员国担保的机构转贷给具体项目单位，由国家财政负担风险。世行对逾期贷款实行严格的管理，采取连坐制，一笔贷款逾期超过三个月即停止所有给该国的贷款项目，并打入信用不佳之列。旧债未消，难获新债，这一点与商业银行相似，但由于世行在国际金融界中具有“领头羊”的作用与地位，拖欠或赖账会使债务国政府国家主权信用等级大大降低，很难在国际金

融市场上筹资，违约赖账的代价非常高昂。因此，即使成员国发生政权更迭，如果还想从世行借款，新政权就得还前政府所欠旧债。商业银行显然没有此杀手锏。正因为如此，世界银行号称成立 48 年来没有吃过一笔倒账，这是任何一家商业银行梦寐以求但又难以实现的。

吸引外资与利率

在通过正常渠道流入我国的外资当中，只有一小部分结汇成人民币资金。其原因如下：第一，我国一直坚持借外汇、用外汇的原则，未经批准，所借外国贷款和通过发行国际债券所筹措的外资不允许结成人民币资金使用。第二，由于大多数外国直接投资采用了实物投资形式，并且外国直接投资企业可通过银行贷款和（或）外汇调剂市场解决其所需人民币资金，因此只有极少数外国直接投资款结算成人民币资金。第三，由于我国通过发行国际股票筹集的外资很少（在 1994 年仅为 8 亿美元），因此其结汇成人民币资金的数量更少。

在通过不正常渠道流入我国的境外投机性资本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我国的外逃资本。根据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的估计，最近几年来，我国私自外流的外汇每年大约为 100 亿美元，这些私自外流的外汇主要是通过出口不收外汇或少收外汇，以及进口多付外汇等方式滞留在外国。

这几年，大量境外投机性资本（包括我国外逃资本和外国资本）流入我国的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我国存款、贷款利率与外国存款、贷款利率的差额巨大。我国短期存款和贷款的年利率都在 10% 以上，而同期的国际货币市场的存款和贷款年利率不到

6%。从债券市场看,我国国债的平均年收益率达到12%,并且还有保值贴补率。而西方主要工业化国家国债的平均年收益率不到6%,我国国债的平均年收益率与西方主要工业化国家国债的平均年收益率的差额超过了6%。再来看股票市场,我国股票市场(不包括B股市场)的平均年收益率高达33%以上,而美国股票市场的平均年收益率不过9.6%。因此,我国股票市场(不包括B股市场)的平均年收益率与美国股票市场的平均年收益率的差额超过了23.4%。上述如此之大的国内外存款、贷款利率差额对大量境外投机性资本具有极大的吸引力。第二,我国在1994年初进行了以建立单一的,以市场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下有条件可兑换。我国把稳定汇率作为政策目标,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以及经常项目在最近几年一直保持顺差,因此,境外投机者预计,人民币汇率将稳中有升,在我国进行套利活动将不会遭受人民币贬值带来的损失。这也是大量境外投机性资本流入我国的一个重要原因。

境外投机资本进入中国途径有以下几种:

一、通过混入经常项目办理结售汇。

通过国内企业或外国直接投资企业的假出口文件到国内银行结汇,然后,通过这些企业的假进口文件到国内银行购汇并汇出外汇,或者以在外国的投资收入(利息或利润)或侨汇的名义到国内银行结汇。然后,以外国投资者在我国的投资收入(利息或利润)或侨汇的名义到国内银行购汇并汇出外汇。

二、通过混入资本项目和经常项目结售汇。

以外债或外国直接投资款的名义到国内银行结汇,然后,以外国投资者在我国的投资收入(利息或利润)的名义,通过经常项目到国内银行购汇并汇出外汇,或者以外国直接投资企业的外

汇抵押人民币贷款的方式套取人民币。然后，以外国直接投资企业外方利润的名义，通过经常项目到国内银行购汇并汇出外汇。通过以上人民币与外币兑换的方法，境外投机者能够在我国进行套利活动。

流入我国外汇市场的大量外资极大地增加了我国的外汇供给，因此人民币面临了大幅度升值的压力，为了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人民银行直接在外汇市场上买卖外汇，并通过“外汇占款”科目反映由此引起的基础货币变化。据估计，在1994年净流入我国外汇市场的外资当中，大约120亿美元被人民银行购入。按照1994年初和年底的平均人民币汇率（1美元=8.58元人民币）计算，人民银行因在外汇市场收购以外资形式流入的外汇而投放的基础货币约为1030亿元人民币。而人民银行在1994年计划的基础货币投放量为1500亿元人民币。因此，大量外资流入极大地增加了我国的基础货币投放量，从而大幅度地增加了我国的货币供应量，导致了我国货币供应量严重失控。

吸引外资的方式、结汇的方式、利率及境外投机资本流入境内等问题，反映了金融管理部门和决策者在认识上的误区，没有从宏观的角度、从发展的角度、从“攻守平衡”的角度来看待引进外资领域的诸多问题，采取的方法是“门前密集防守，我不进球，你也别想进球”的平庸策略。这不利于引进外资的开展和深化。

没有什么是不能理解的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经济飞速发展，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在西方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今天你想获得

成功，要学懂三种语言，即流利的英语、深奥的汉语和一天不学就不会的电脑语言。”

这句话告诉我们，世界上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距离日渐缩小，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就是后面的动力。无论我们喜欢不喜欢，参与不参与，怎样结合自己的情况决定参与的方式和时间表，经济一体化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即使日后发现这是一次倒退，在目前它仍是不可逆转的。

中国人要制造一台计算机，CPU 芯片来自美国，主板来自台湾，内存来自韩国，光驱用日本的 SONY，多媒体套件来自新加坡，然后出口到俄罗斯。——现代企业的生产经常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一个现代企业的领导人考虑问题时就不能只计算市场上粮油蛋肉菜涨了多少，该给职工发多少补贴，更要关注市场的最新动态、技术进步的最新成果，有贸易往来地区的政治经济形势以及外汇牌价、汇率表，世界各主要证券市场的股市行情等等。

作为宏观社会学的研究人员，我们不想在经济学的问题上下很多的功夫，那不是我们的专长，当我们涉及到一些经济、金融方面的理论时，主要是采用权威专家的意见。我们更关心的是一个人，一个“经济人”在这种经济一体化浪潮中的状态和心理。

如果一个“经济人”乃至一个国家的领导者，一个行业的决策人，不能从宏观的角度、从“快速攻防转换”的角度来分析问题，制定政策和策略，就有可能由于决策的失误给一个国家、一个部门、一个企业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

第二章

宴会上的 祝酒词：公平

总是一厢情愿

如果说 20 世纪是一个追赶的世纪，那么 21 世纪将是一个竞争的世纪。赛场的胜负既取决于各位选手的实力，也要看竞赛的规则。

过去制订的一切国际规则，其基本原则是“规则面前人人平等”。对于从殖民地国家脱胎出来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争得一个人人平等的地位已属不易，而且规则的平等是公平竞争所必要，舍此也没有更能为各方所接受的替代办法。

然而，规则的平等必定引起事实上的不平等。如果是因为竞

争过程中不努力，自暴自弃，规则平等引起结果的不平等并不足虑。但是，因为竞争的起点不同，虽然竞争过程中作了充分的努力仍可能导致结果的不平等。不是鼓励弱者而是打击弱者，这种规则面前人人平等的合理性便值得怀疑。

就贸易投资等经济活动而言，发达国家技术、资金、体制、人才等方面原先的基础比发展中国家好得多。按规则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来竞赛，发展中国家肯定处于不利地位。正像百米赛跑规则是公平的，但发展中国家的起跑点落在后面，他们要多跑一段距离才能达到终点。

平等的愿望在大多数情况下总是一厢情愿。因为不存在一个世界政府，能像一国政府那样制订鼓励公平发展的政策。相反，倒是规则公平的原则一再被发达国家所强调。在世界贸易组织的贸易条款中原本有关于对发展中国家婴儿工业的照顾。但是要争取到这种照顾，非常不容易。在中国进入世贸组织的谈判中，中国这个人均国民收入不足 1000 美元的穷国，在某些方面被当作发达国家来对待。

这种讨论可以延伸到国内，人们在研究国有大中型企业长期经营不善，发展缓慢的原因时，常提到一点，即在政策面上国有大中型企业与集体企业、私营企业、乡镇企业、三资企业不平等，相对别人国有大中型企业受的限制太多。当人们谈论一种事实的时候，容易忽略另一些事实，那就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经国家多年投资，在流动资金总额、设备和技术水平、管理经验、工人素质等方面都比上述企业略强或很强。经常看见的一些事实是，同一种产品在国营企业就做不了，做不好，无利可图，换到乡镇企业就干得很好。这里面的原因当然很多，人的因素也肯定是其中之一。

一种政策的制定，是宏观平衡（请注意，不是平等，也不是公平）的结果，如果过于考虑细则上的平等，那必然会将处于弱势起点处的企业置于“必死无疑”之地，又怎么能求得全社会的发展。当发展中国家在世界上对规则面前人人平等提出质疑时，国有大中型企业是否也应该检讨一下自己思维的出发点是否太偏颇，不平等是长期存在的现实，不是你觉得不平等，就是他觉得不平等；不平等是前进的动力。

让我们把讨论再回到国际社会。

很早以前，国际上就有许多学者认为，自由贸易只利于先进国家而损害落后国家的利益。二战以后，普雷维会等人的“发展中国家贸易打件恶化论”和“中心—外围论”把这种理论推向了顶峰。

自由贸易的基本原则是对自己有利就做，对自己不利的就不做。当我们比较穷国和富国进出口商品的结构时可以发现，如穷国出口的商品中，大多数是富国同样有能力生产的，如服装、鞋、玩具；而富国向穷国出口的商品中大多数是穷国本身不能生产的，如核电站设备、民用客机、大型计算机。穷国在进口这些商品时成为价格的接受者，他们自己不能生产，因而很少有讨价的余地。富国在进口穷国生产的商品时却有国内市场的参照，因而有强有力的杀价能力。微观经济学可以证明，出口国出口商品的可选集合扩大后，它的外贸收益可以增加。穷国和富国之间的国际贸易之所以不平等，是因为穷国出口商品的可选集合小于富国出口商品的可选集合；前者的选择余地远比后者小。再加上穷国在贸易中缺乏人才和信息，谈判能力弱，在操作中吃亏上当的机会比富国吃亏上当的机会多，所以虽然自由贸易可以使双方受益，但受益的程度是不同的，富国受益大而穷国受益小。这种不平等也是

因为规则平等而起点不平等引起的事实上的不平等，这是当今一切国际规则中帶根本性的原则问题。

另一个与历史有关的当今国际的热门话题是关于温室气体的排放。由于人类大量地使用矿物燃料，燃烧时排出大量二氧化碳，改变了空气的成分。虽然从绝对量似乎微不足道（从工业革命前的二氧化碳浓度为万分之 2.7，增加到目前的万分之 3.5）。但这微小的变化会导致大气温度的明显上升，这会改变整个人类的生存环境，其后果极难预料。如果在发现这种大气温度上升将产生不可容忍的后果之后，再来纠正，需要几百年的时间。为了人类生存的安全，国际上达成一致协议，要求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特别是因燃烧矿物燃料而产生的二氧化碳的排放。对发达国家而言，他们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是中国的 5 倍到 10 倍，基本上已经达到了饱和。因此预计今后全球排放量的增加都将来自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经济发展速度高，人口多的中国，于是中国在削减二氧化碳排放的国际协商中似乎成了众矢之的。但如果我们以人均排放量来计算，中国还远远比发达国家排得少。更何况当今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太高是过去工业化国家过度使用矿物燃料所造成的，中国对此并没有太多的责任。当然，这样的分析并不是说中国在今后的发展中可以毫无顾虑地大量排放二氧化碳，甚至和发达国家削减排放的活动对着干。我们应该配合全人类的共同努力，防止可能危及人类生存环境的温室气体在大气中的过度积累，分步骤地控制并进而削减各种温室气体的排放。作为第一步，应该在不影响经济发展的前提下通过能产生经济效益的节约能源、恢复植被、利用煤层气、发展天然气的勘探和生产等措施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同时也应准备在下一步牺牲效益的情况下最有效地开展此项活动。

在削减温室气体排放，控制破坏臭氧层的氟氯烃生产和使用中涉及到许多技术专利的转让问题。因为解决这些问题多半要靠技术上有新的突破。本来这些任务是全人类的共同责任，它远远超出了个人或企业谋利的考虑。然而也应该承认，一些企业和研究单位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研究出新的技术，既能减少有害气体的排放，又具有商业价值，他们的努力理应从市场上得到回报。专利制度就是保护知识产权的一种有效方法。如果没有专利制度来保护他们的市场利益，发明的技术随便被别人抄袭，将来还有谁会有兴趣从事这种研究呢。面临这样的两难处境，有关的国际协定就应对这一类的问题想出解决办法。例如，由国际组织购买专利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或者由国际组织来投资开发这一类技术。

这件事是一个很有趣的例子，由于历史、时间、起点、速度等一系列的错位，中国被逼到了一个很难堪的位置，无论是坚持排放还是遵循国际组织制定的排放份额都于中国是不平等、不利的。我们尽可能讲这种难堪局面的成因，但大气层污染程度是硬指标，最小安全程度的排放量也是硬指标，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向谁去讨平等？

“最好的书本就是现实生活。”

我们回过头来再看一下索罗斯和东南亚金融风波的最新进展。

1997年9月2日的《参考消息》刊登了一篇有关量子基金会官员否认索罗斯投机的报道，全文如下：

量子基金会首席战略家宣称索罗斯对林吉特动荡无任何责

任。德国《法兰克福汇报》9月20日报道题：“索罗斯对马来西亚货币动荡不负任何责任”

马哈蒂尔指责大投资家乔治·索罗斯对马来西亚的货币动荡负有责任。索罗斯基金管理委员会首席战略家斯提利·德鲁肯米勒驳斥了这种说法。他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说，更应为此负责的是那些放任信贷迅猛扩张的政客的官僚，是他们为剧烈波动准备了条件。

德鲁肯米勒指出，在今年1月份就有一位同行提醒他注意，泰国铢已到了要贬值的时候，因为泰国当时未收回贷款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很短时间内已由65%增长到135%。而马来西亚也像泰国一样有过一种“难以置信的繁荣”。因此量子基金会才在1月份卖空泰国铢（也就是采取一种期待泰国铢贬值的姿态）。拥有91亿美元资金的量子基金会是索罗斯投资帝国最大的基金会。这次投机已经被证明是正确的。

德鲁肯米勒还说，量子基金会在今年春季还把牌押在马来西亚林吉特贬值上。但后来人们意识到，林吉特将不会像泰国铢一样发展；此外人们也担心马来西亚政府采取限制措施。因此在7月中旬人们就结束了对林吉特贬值的投机并转而买回林吉特。德鲁肯米勒指出，与（马哈蒂尔的）指责完全相反，索罗斯基金会在马来西亚货币危机中不仅根本没有抛售，而且是买了林吉特，从而支持了该货币。

《华尔街日报》指出，由于索罗斯基金会并不是非得将其交易活动公诸于众，所以人们无法审查德鲁肯米勒的说法是否属实。撇开这个因素不计，以下事情是很有可能：这个世界闻名的投机家原先的卖空活动（即使后来改变了）被人仿效，从而导致了亚洲货币的不稳定。另一方面，货币投机家只有充分利用不平衡

（如由于行政当局干预造成的价格扭曲）才可能获得成功。许多经济学家持这样一种观点：投机活动因具有修正价格不平衡的倾向而对国民经济有益。

量子基金会官员肯定是在为自己的行径分辩，这用不着回避。根据我们在本书中做过的介绍和分析，东南亚金融危机的产生，东南亚国家内部经济结构失调才是根本原因，索罗斯能做的只是利用机会而已，他并没违反交易的原则，买进卖出，天经地义。在这件事上，你能空谈金融领域中的平等和公平吗？现实的力量比理论更有效，因为它能改变现实，而理论改变现实仅仅是一种可能，这是理论与现实的区别。

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说过：“关于政治经济学我们可以读到的最好的书本就是现实生活。”

这段精辟的论述可以做为这一章的结尾。

第三章

在天空织起的世界

跨国公司的“天”

在新兴的力量中，声名远扬和力量雄厚的是跨国公司，或者更通俗一点，叫作多国公司。

在过去 25 年中，一种不寻常的全球化生产，其基础不仅在于由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出口原料和制成品，而且是跨越国境线而组织生产。

跨国公司可以在这个国家进行研究工作，在另一个国家制造商品部件，在第三个国家把这些部件装配起来，在第四个国家出售制成品，在第五个国家存储剩余资金，等等。它可以有数十个子公司搞经营活动。自从 50 年代以来，这位全球竞赛中的新角色

的规模、重要性和政治势力，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今天，至少有一万家这样的公司，其中有两千家以上的公司在6个或更多主顾国家拥有子公司。

在382家销售额超过10亿美元的较大的工业企业中，足足有242家从销售额、资产、出口、盈利和雇员等方面衡量，含有25%或更多的“外国成分”。而经济学家们在如何对这些公司下一定义和进行评价（因而加以分类和计算）上，争执得非常厉害。这清楚表明，它在世界体系中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因素，是对民族国家的一个挑战。

只消看一看这些公司的规模，就足以帮助我们对它的了解。

早在1971年，它们拥有的短期流动资产已达2680亿美元。据美国参议院下设的国际贸易委员会称，这个数字是“世界所有国际货币机构一天的全部流动资产的两倍多”。作为比较，可以举联合国年度总预算为例，它还不到上述总额的1/268，或者仅占它的37%。

70年代初期，通用汽车公司的每年销售盈余，比比利时和瑞士的国民生产总值都大。埃克森公司独家拥有一支油轮队，其规模比原苏联拥有的要大一半。根据这样一些比较，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指出：“过去曾有大英帝国日不落之说。今天太阳在大英帝国是落下去了，但对数十个全球性公司帝国，包括美国的国际商业机器公司，尤利拉弗尔，西德的大众牌汽车公司和日本的日立等公司来说，它们的天空，太阳永远高照。”

跨国公司一般被认为是一种资本主义的发明。但事实上，原经互会国家也有50个“社会主义跨国公司”在活动，它们铺设管线，制造化学品和球轴承，开采煤炭和石棉，经营航运。此外，银行和金融机构——从莫斯科人民银行到黑海及波罗的海保险公司

——在苏黎世，伦敦，法兰克福和巴黎开展业务。另外，有 500 家设在西方，1973 年销售额超过 5 亿美元的私营跨国公司中，有整整 140 家是同一个或更多的经互会国家做了“重大商业交易”。

跨国公司不仅设在富国。拉丁美洲经济体系的 25 个国家最近提议在农业经营、低价住房及资本货物等方面建立它们“跨国公司的情报需要……与美国、法国或任何其他国家的情报需要并无多大不同。……确实，如果谈中央情报局，克格勃和它们的卫星机构之间的情报战而不去描述埃克森、大通曼哈顿、三菱、洛克希德、飞利浦及其他公司的情报机构所扮演的日益重要的角色，那将是不完全的。”

跨国公司有时同“本”国合作，有时则剥削它；有时执行它的政策，有时则利用它的政策来搞自己的一套，所以跨国公司既不是一切都好，也不是一切都坏。但是，由于它具有通过国界来回调动亿万美元的能力，拥有发展工艺技术和采取迅速行动的力量，它往往挫败和胜过民族国家的政策。

“这不只是一个或者甚至主要不是一个跨国公司，能否超特殊的法律和条例的问题。”休·斯蒂芬森在一份关于跨国公司对民族国家的影响的研究报告中写道：“那是因为我们整个思想结构和反应建立在……民族国家主权观念上，而国际公司则正在使这一观念变得无效。”

在全球权力体系中，跨国公司的兴起，削弱了民族国家的作用。这正好是在民族国家来自下面的离心力正冲击着它的薄弱环节而有解体危险之际。

跨国公司虽然是最为大家所熟知的，但不是全球舞台上唯一的新兴力量。例如，各公司的跨国工会组织的兴起，这似乎是跨国公司的反射的景象。还有那些越过国界而互相联结起来的宗教、

文化和种族运动的发展。我们看到一次反核运动，它在欧洲举行的每次示威都集合了来自几个国家的抗议者。我们还看到跨国政党组织的出现。例如，基督教民主党人和社会党人都在谈论把它们组成超越个别国家的“欧洲党”。这个动作因欧洲议会的成立而在加速进行。尤其是欧洲“绿色和平组织”的出现，使人们对这一点不再怀疑。

同时，与这些发展相平行的是，非政府的跨国协会急剧的兴起。这些团体致力于种种活动，从教育到海洋勘探，从体育到科学，从园艺到救灾。它们的范围从大洋洲足球同盟和拉丁美洲牙科联合会，到国际红十字会、国际中小商业企业联合会和国际女律师联合会。总而言之，这类“保护伞”组织或联合会，代表着许多国家数以百万计的会员和成千上万个分支机构。它反映了每一种可以想见的政治利益和非政治利益。

在1963年，大约有1300个这样的组织穿越国境线进行活动。到70年代中期，这个数字翻了一番，达到了2600个。到1985年，这个总数达到3500到4500个，即几乎每3天有一个新组织产生。

如果联合国是“世界组织”，这些较少见的团体形式，实际上是一种“第二世界组织”。它的总预算在1975年总计少于15亿美元，但这仅仅是它下属单位所控制的财力的一小部分。它还有自己的“行业联合会”——设立布鲁塞尔的国际协会联合会。它们彼此有垂直的联系，那些当地的、地区的、国家的和其他组织都集合在跨国组织之下。它们还通过联合体、工作组、组织之间的委员会和特别工作组的细密网眼，保持横向的联系。

根据国际协会联合会的一份研究报告，这些跨国组织联系非常频繁，1977年，在1857个这些团体之间，估计有五成2075次可以查证的相互关系和交错联系。这个数字还在急剧上升。确实，

有成千万次跨国性的会议、讨论会和学术座谈会，使这些不同团体的成员，获得了彼此接触的机会。

这个迅速发展的跨国网，尽管还相当不完善，但它进一步扩大了正在出现的新的世界体系的规模。然而即使这样，还不能勾画出这幅图景的全貌。

国家还是必须的吗？

随着国家本身被迫建立超国家组织，民族国家的作用进一步削弱了。民族国家竭力争取保持较多的主权和行动自由。但它正受到步步进逼，被迫接受对它独立自主的新限制。

例如，欧洲国家不是心甘情愿但又不可避免地建立共同市场，欧洲议会和欧洲货币体系，以及像欧洲核研究组织这样的专门机构。共同市场的税务专员对成员国家施加压力，要它们改变本国的征税政策。农业和工业政策一度曾使伦敦巴黎叫板，但现在由布鲁塞尔定夺。欧洲议会的成员实际上不顾他们民族政策的反对，而强使欧洲经济共同体的预算增加了 8.4 亿美元。共同体成员共同抵制英国的“疯牛肉”出口为这种趋势添了一点幽默材料。

共同市场也是权力落到一个超国家组织的最早的例证，但不是唯一的。事实上，我们看到这类政策之间的组织，三个或更多国家的集团或财团正在激增。它们的范围从世界气象组织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到国际咖啡组织和拉丁美洲自由贸易协会，更不要说石油输出国组织了。今天需要这样的机构来协调全球的运输、交通、专利，以及从大米到橡胶等许多其他方面的工作。因此，政府间组织也翻了一番，从 1960 年的 139 个迅速上升到 1996 年的 462 个。

在这些国际组织中，最有权势的也许要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了，康德苏和沃尔芬森就像古代的帝王一样指点属下的“诸侯”该如何如何。民族国家通过这些政府间组织，在国家一级保持最大决定性控制的同时，还试图对付大于全国性的问题。然而，慢慢地，随着更多的决定被转称到这些大于国家组织的实体（或受其约束），就发生了重心稳步的转移。

从跨国公司的兴起，到跨国协会的激增，再到所有这些政府间组织的建立，我们看到一系列的发展，都朝着同一方面前进。国家越来越不能采取独立的行动，它正在丧失许多主权。

这是一种新的多层次的全球性竞赛，在这一竞赛中，不只是国家参加，而且还有公司和工会，有政治、种族和文化团体，有跨国协会和超国家机构参加，它们都是竞赛场上的竞技者。

民族国家的萎缩，反映了一种新型的全球经济的问世，这种经济从第三次浪潮开始冲击时起，就已经出现。对于国家规模的经济来说，民族国家曾是必要的政治容器。今天这些容器不仅已经有了漏洞，而且被它自身的成就摆弄得过时了。首先，地区性经济在它的内部成长，已经达到一度可与国家经济联合的规模。其次，民族国家使之兴旺的世界经济，已经爆炸性的膨胀，而且出现了奇怪的新形态。

例如，新的全球经济是被大的跨国公司控制的。它由一个以电子速度进行活动的网状的银行和金融业提供服务。它增长繁殖着金钱和存款，没有一个国家能加以管理。它向跨国通货发展，这种通货不是单一的“世界货币”，而是各种通货或“变相货币”，每一种都是以各国货币或商品的“市场计划”为基础。它被资源供给者和使用者之间的世界规模的冲突所破坏。它举债的规模，达到了迄今为止不可想象的地步。它是一种混合经济，由私营资本

企业和社会主义企业组成的联合公司并肩工作，第三次浪潮促使那些拥有比国家利益更大的利益的集团的纷纷兴起。这些集团形成正在出现的全球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这种意识形态，有时叫做“全球意识”。

具有这种意识的，有跨国公司的经理，蓄长发的环境保护运动者，金融家，革命家，知识分子，诗人和画家，至于三边委员会（一个研究机构，成员包括日本、西欧和北美的企业界、政界、科学界和出版界等人士约 250 名，其基本成员是这些国家的跨国公司的董事长和董事）成员就更不必说了。一位声名显赫的美国四星上将甚至要我们相信，“民族国家已经寿终正寝了”。全球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远远不止为一个有限的集团服务。正如爱国主义主张为整个国家说话一样，全球主义主张为全世界说话。因此它的出现，被看作是一种进化的必然——朝着把天体也包括在内的“宇宙意识”靠近一步。

因此，简而言之，从各方面看，即从经济、政治、到组织和意识形态，我们都感到第二次浪潮文明的支柱——民族国家，已遭到了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毁灭性打击。

当许多穷国正在竭力争取建立一个富强国家的历史性时刻（因为立国在过去是为进行卓有成效的工业化所必需的），那些超越工业主义的富国，却在削弱，（被别的东西）替代，国家的作用被贬低了。

由此可以预期，为了建立能够公正地代表国家消亡前后世界人民新的全球机构，将会因此发生斗争。

索罗斯和量子基金会与东南亚国家联盟的碰撞，就是一个区域性的开始。

尾章

金融家的“世界大战”

1996年，东盟第29届外长会议、第三次东盟地区论坛会议和东盟与对话国会议7月25日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闭幕。这次会议有三个明显特点：东盟成员不断扩大；东盟内部更加团结、坚持原则，用一个声音讲话；东盟在各个领域的合作日益加强和扩大。

东盟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区域性合作组织之一。近年来，随着世界多极化和区域化的发展，东盟的组织 and 影响也在不断扩大。在这次东盟大会上，中国、俄罗斯与印度这三个对本地区和平与安全有重大影响的大国，被接纳为东盟的全面对话伙伴国，使对话伙伴国由7个（美国、欧盟、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日本、韩国）发展到10个。它们成为东盟对话伙伴国后，无疑将使东盟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也使东盟能为维护本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

东盟为什么要这么做？

首先，从战略方面考虑，通过“大国平衡”外交，争取在未来亚太多极格局中占有“一极”的地位。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东盟将继续扩大组织范围，即吸收老挝、柬埔寨和缅甸，发展成为有 10 个国家的“大东盟”，增强自身的实力。大东盟形成后，10 国的土地面积约 452.4 万平方公里，人口约 4.5 亿，国民生产总值超过 4500 亿美元。总体实力虽不算强大，但发展潜力不可低估。

然后东盟期望以自我扩展为依托，推行纵横捭阖的“大国平衡”外交，增强美、日、中、俄、印 5 个大国在涉及本地区的事务中的影响。今年 4 月中旬，美日重新加强军事同盟，将美日安全条约的目标和范围，从日本本土扩大到“整个亚太地区”，并想把东盟外长会议、东盟地区论坛会议以及东盟与对话国会议纳入美日安全条约控制的轨道。如果这种设想变成现实，东盟就将在东盟三会中失去核心和主导作用，东盟接纳中、印、俄三国为“对话伙伴国”，希望在某种程度上制约美日咄咄逼人的攻势，从而有利于东盟利用大国之间的相互制约与平衡，在亚太事务中发挥重大的作用。

其次，从安全方面考虑，开展“大国平衡”外交，通过对话和谈判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谋求在地区安全问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东盟的前身是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于 1961 年 7 月 31 日在曼谷成立的东南亚联盟。1967 年 8 月，印度尼西亚、泰国、新加坡、菲律宾四国外长及马来西亚副总理在曼谷举行会议，发表了《曼谷宣言》，正式宣布成立东南亚国家联盟。同月，马、泰、菲三国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部长级会议，决定由东南亚国

家联盟代替东南亚联盟。

东盟是冷战时期的产物，在印度支那战争期间，轰炸“胡志明小道”的许多飞机就是从位于泰国境内的基地起飞的。随着冷战的结束，以及世界发展经济搞建设的一致呼声，东盟国家越来越注意从美国的影响下脱身出来。

近年来，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等东南亚地区资深政治家多次就美国的对外政策发表了批评性言论，有些谈话的语言非常严厉，显然美国人对此是不会高兴的。这次东南亚金融风波，美国政府的某些人肯定在暗中得意。

据外电报道，有说法认为索罗斯所以操纵这次金融风波，是他对东盟接纳缅甸为其成员国的报复。当年从匈牙利逃到美国的索罗斯，据说对所谓“极权政府”有着刻骨的仇恨。

当然，根据这些道听途说的报道来下结论是不负责任的，我们不能说美国政府指使索罗斯挑起这场危机是想杀杀东南亚国家的威风。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和推理是，如果在印度支那战争期间，处在战争边缘的泰国发生类似的金融危机，美国政府不会像今天这样不闻不问，他一定会动用自己影响力来控制索罗斯式的投机者。

显然，东南亚金融危机不可否认地有着一定的政治色彩。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多次提到了跨国公司（超级金融机构、金融组织）对今后世界历史发展将要造成的影响，索罗斯与东南亚金融危机显然开了个头，今后这种斗争将愈演愈烈。这就提醒人们，今后世界大战的形式也许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即不用冷兵器时代的刀枪剑戟，也不用热核武器时代的原子弹和氢弹，很有可能转变成一场信息战、情报战、电子战、贸易战、金融战争或生物武器战，这些战法的综合运用很可能造成一个国家自下而

上的混乱，这个国家的政府很有可能在这种局面无法控制时签订城下之盟。

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对已经发生的事实之间进一步相互作用结果的一种推测。

因此，为了国家的安全，社会的稳定和人民生活的平静，国家有必要在金融安全方面开展大规模的国民教育，即包括从业者，也包括非从业者。尤其是对一些敏感区域，如股票证券市场加强监管，教育人们理性投资，防止索罗斯式的人物兴风作浪。

令人非常沉重的是，人类往往要在事实降临之后才认可，谁也不愿承认自己现有的生活方式存在问题。真是那样的话，从索罗斯开始的这场金融战争将有可能陷我们的生活于动荡不安之中。

但愿不会这样，但愿!!

● 最新消息

索罗斯再次兴风作浪 台湾股、汇市一片大乱

据《羊城晚报》1997年10月19日报道，台北股市与汇市17日、18日连续两天发生大震荡，股价狂泻，两天重挫379点，新台币则因“中央银行”16日决定弃守28.60汇率后，大幅贬值，兑美元汇率跌至29.76元水平，创下1987年以来的新低，汇市成交金额也创下纪录，仅17日的成交额就超过7.6亿美元。

台北市场17日盛传国际金融炒家索罗斯属下的量子基金自上个星期便在新加坡证券市场放空台湾股市期货指数的消息。原本就对股市信心不足的投资者，在消息传出后，信心全面崩溃。10月16日，已经大幅下挫的台湾股市，最终下跌165点，闭市报收7832点。17日，再上演了一幕低开低走大跌行情。一天之内，指数大跌214点，报收于7618点。当股市受到重挫时，蒙受严重损失的散户投资者乱了阵脚，有些家庭主妇承受不了打击，禁不住在证券营业大厅和厕所内落泪……。

美国十大金融家投资准则

索罗斯演讲集

附录

索罗斯演讲集： 世界管理的作用

导 言

现在我百感交集。我在许多年后的任何时候回到母校都会非常地动情。但这次非常特别。我衣锦还乡，我富了，出名了，成了注意的中心。这同我的学生时代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我在LSE上学时并没出多少风头。学术上我不是特别聪明，学生活动我也没参与多少。也许我唯一特别的地方就是我曾经不得不勤工俭学，而那时其他人都享受奖学金，这是因为我不是英国公民。如果我的父母和我在一起的话，我或许还能拿到部分的奖学金，但由于我孤身一人，并没有拿到。

我正在写一本书，书名就叫“索罗斯看索罗斯”，我应该感到成功，但仍被相反的感觉所征服：我有一种奇异的谦卑。我称之

“奇异”是因为“谦逊”并不是我在公共面前表现出来的典型性格。我之所以有这种感觉是因为这本书不够成功，这与表面上看相反。我相信我有很重要的事要说。在我功成名就之前我曾经尝试着把它说出来，但没人理解。现在我有听众了，人们会听我说。你们就在这儿。但我担心我说的话是不是有意义。我必须修正。我知道它有意义，因为我一生都在实践它。它对我有意义，而且实践的结果，特别是近五年，已经令我相信，我不在骗自己。现在我担心我能不能使它对别的人有意义，我是不是能把我的观点用一种别人都能理解的方式表达出来。在这一点上我不得不担心。我的观点非常抽象，要问我的动机要比认同我观点的意义要来得容易一些。对我动机的怀疑是可以理解的。很少有人，特别是在生意场或公共事务上获得成功的人，对抽象观点表现出强烈的关注。但我还是要做。不仅如此，我还要继续发展，修正我的观点。这是我非常需要交流的一个理由。

我在学生时代形成了我所持理论的核心。60年代当我在生意上获得第一次成功后，我曾想把我的想法写成一本书，但我没能完成，因为我总在修订。我在这个无用的工作上至少花了6年的时间，直到有一天，我搞不懂前一天晚上我写的东西。我忙不过来了。那就是我把我的想法搁在一旁，回到生活的时候，也就是那时我开始慢慢成为量子基金的领导人。

我很幸运我能把抽象的理论运用到投资领域和实践中去。这使我在了解概念性框架时不断前进。我还不断检验我的理论，先是在金融市场实验室里，最近是在真实世界中。在过去的20年里，正如你们所知道的，我建立的基金会网络已经覆盖了25个国家。我的概念性框架指导着我，我必须说它很不错。我好像理解了这个过程，我比其他参与者进行得好一些，就像在金融市场中，我

大部分时间始终走在曲线的前头。但这次同金融市场相比，我不是为了钱，我甚至不是为了权力，我个人考虑，尽管我承认，权力有着很难拒绝的诱惑力。

对于我的理论，我信奉我刚才提到的概念性框架，它不仅是理解世界而且是改变世界的途径，因为理解和参与之间是密不可分的，这就是我说的核心。在这之上，我建立了我的框架。在理解和参与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我称之为“反射理论”。反射永远站在知识的对立面上。要获得关于某件事的知识，这件事必将是独立于你所知道的关于它的情况之外。不管你对自身位置的思考停在哪儿，你的想法和你所想的東西总是由一种双向反馈的机制连接起来的，我称这种机制为反射。

我们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我们试图忽略反射，在经济理论当中，特别是在同金融市场的关系中，反射被精心考虑了进去。

为了正确把握反射的情况，你必须放弃对知识的渴求；作为一个反射情况的参与者，你不能将你的视点仅仅建立在知识之上。这并不是说你必须放弃理解这个情况的努力，但为了正确理解，你必须明白，在其中起重要作用的思想，并不建立在知识之上，他们是对事实的诠释和歪曲。

我充分相信思想的力量，它使我认识到，歪曲、误解和错误在形成历史方向上起到的决定作用。我把它当作我最有价值的顿悟，错误在历史中的作用就像突变在物种演变中的作用一样。

我力图解释我的核心思想，弄得有点昏了。我想说的是，理解世界和改变世界，是相同进程的一部分。如果你仅仅着眼于改善你自身的情况，你没有必要去交流思想。事实上，你更善于把思想藏在心里，交流那些会引发你兴趣的东西。但我必须提到，我有更远大的目标，我一定要通过对世界的理解来改变世界。这有

点夸张和自大，并使我容易受挫。为了实现我的理想，仅有概念性框架还是不够的，我还必须交流，这就是我的问题所在。只要能把概念性框架仅用于个人使用，我能做得更好，不管是在金融市场还是在我的基金会工作上，但当我试着解释它时，我就麻烦了，让我奇异的自卑去死吧，我已经尽力去写书，现在我能做的就是祝我好运。

开放社会

我真应该就此停下来让你们去读本书，但你们是付了钱来听讲座的。所以还是让我们来谈一个现在我头脑中最重要的话题，就在我写书的时候还在考虑的话题，那就是开放社会的概念

“开放社会”是卡尔·波普尔在1904年在他的著作《开放社会和它的敌人》一书中首先出现的。在那本书里，波普尔说像乌托邦主义和极端主义那样的思想体系，表面上是相互抵触的，但你继续研究下去，就会发现他们有很多共同点，他们都宣称拥有绝对的真理，并且都想在社会上实现他们的蓝图。他把这些封闭社会教育同另一个不同的关于社会应当怎样组织的概念并列了起来。在开放社会的概念里，没有人享有对真理的垄断。它承认不同人有不同的观点，不同的兴趣，还要容许他们和平相处，容忍的精神与批评并行。

我接受波普尔的观点，还想发挥得更好，建立起了开放社会和封闭社会理论上的模型，每一个都有自己的长处和不足，一个的缺点恰好是另一个的长处，完美互补。比如，封闭社会能够给出最终答案。结果发现是错误的，但又要人们去接受这些答案，你不得不采取措施以求重新得到答案。相反，开放社会保证思想自

由，但另一方面，开放社会无法给人民提供确认，保证官方管理是正确的。哪种方法更好是一个个人喜好的问题，我完全倒向开放社会。实际上，我来到民主的英国，就是因为我向往生活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

智力发展

后来当我感到需要做比保证我家庭成员健康更多的事情时，我建立了一个基金会，我称之为“开放社会基金”。同时我继续发展我的概念性框架，我前头提到的反射理论，它包括对思考和实际关系的探索。

在探索的过程中，我有一个十分有趣的发现：有时候参与者的看法和事情的实际情况合理地相互接近，还有适当的机制使它们不致出线太远。但也有时候，参与者的想法与现实情况离得太远，并且没有走到一起的趋向。这些极不平衡的情况有两种，一个极端是缺少变化。合乎逻辑的统治是与合乎逻辑的社会条件结合在一起的。就算通过暴力他们也不会走到一起来。另一个极端是变化太多。事物的实际状态和人的看法没有一个是稳定可靠的，事物就会失控，我对这种不稳定性没有一个合适的名字，我叫它体制变革或革命，这个发现非常有用，特别是我在处理财政问题时，实际上，我是在近平衡和近革命的边缘挣得我大部分的钱的。但我用本身的二元构架也就是开放和封闭社会的构架来调和三分结构的时候我遇到了困难，我可以把近平稳情况同开放社会等同起来，把极端的死胡同封闭社会等同起来，但极度的变化又怎样，我也许可以称它为革命之上的制度变革，但还是与我的框架不符合。

我原想这是我个人的问题，应该我一人知道。但近来，我觉得它含有更多的客观意义。我也开始怀疑波普尔故意省略了一部分，当他列举自由社会的敌人时，只讲到意识形态上的封闭社会。还有一种意识形态，它对开放社会的存在是一种威胁，而且更具危险性，因为它通常不被认为是意识形态。你会惊奇地发现我指的是完美市场的教义，和整个思想的结合体，包括自由竞争、自由意志、地缘政治现实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

自由市场思想

理智期限理论、有效市场理论、随意发行理论，都是受到高度评价的科学的理论。但是它们都是建立在某种过时的宿命论的世界观点上的。具体地说在牛顿物理学之后，古典经济学都给自己定型，而且努力去决定平衡位置，为了做到这些，必须假造一种可能，或者它并不比现实世界强。具体地说，必须假定反射的现象。结果是，他的结论或许不适用于现实世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自从海森伯格提出不确定原则以来，现代物理学已经放弃了这种宿命论的方法。近一段时间，有一些物理学家，像齐瑞德尔和默瑞·盖尔曼，已经处在混乱理论的前沿，不确定性在人际事务中起到的作用要比在物理学中的作用更关键更重要。因为它在思考参与者圈子里是生来就有的，就像我们以前说过的那样，思考和参与同时的二元作用，为被我称之为“反射”的双向反馈机制提供了潜力，但这种可能性被奇怪地忽略了，当忽略了反射时，被推崇之极的科学理论用作政策规定的基础时，他们得出这样的结论：表面上具备科学上的确定性，但结果绝对错误，极端错误。在这方面，具体地说，不健全的金融市场会趋向平衡，但如果没

有我的反射理论，经验上的迹象，会有另外一种结果。关于对现实的影响，这些规定采用极端主义的办法有着截然相反的结果。相对于封闭社会，完美市场理论则走向另一个极端，对此我还没找到合适的词来称呼它，我暂且叫它多变性或不稳定性。这两个极端的思想形式是一样的。如果你听一听自由市场主义者的说法，他们严厉责备政府干涉的规范为低效、麻烦、曲解、总的来说，不够完美，从这儿他们得出结论，自由思想是完美的，不应有干涉。要认清争论中的谬误，你首先要承认完美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政策规范作用的事实，并不能保证及时就位。我们的理解总是不完美，我们思考出来的东西，对现实的理解和学院派管理注定有这样那样的瑕疵。如果我们想避免由于对完美的梦想而引起的谬论，我们必须学会接受不完美的现实。不完美和理解并不是怎么不好，它留下了大量改进和变革的机会，看看科学取得的成绩吧。坦白地说，我不希望处在现在的位置，包括极端主义思想的自由放任。如果我反过来被指责为极端主义的话，我会少点吃惊，因为当一个人正在处理抽象的目录和各种各样的主义时，很难避免步入不是这样就是那样的泥潭。我尽力躲过泥潭，但有可能我被指责为中庸或中庸主义。自由市场的不是——我当过对抗自由市场的支持者——我挑出两点：社会公正和不稳定性。我们先来看社会公正，因为这同我们论点没有多少关系。我可以同意在财富再分配上的要求是欠缺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不要要求。财富在所有者手里积累起来，如果没有一个再分配的机制的话，失衡情况会变得无法让人忍受。有人宣称财富是概括适者生存原理积累起来的，这早已被财富是代代相传的事实否定了。在任何情况下，将适者生存作为一个文明社会的指导原则是不太正确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建立在过时的进化理论之上，就像平衡理论是建立在过时的物

理观上一样。指导物种进化的原理是突变，而突变是以一种更加复杂的方式进行的。物种和周围环境是相互作用的。一个物种是另一个物种环境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双向反馈机制，同历史上的反射相似。也只有在历史上，这种机制不是由突变推动的而是由于误解。我之所以提到它，是因为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今天推动历史的误解之一。出于不稳定考虑，规范的缺乏和自由市场的运作，会导致均衡。但这个论点不够正确，金融市场的历史是激增和爆发的历史，而爆发并没能摧毁这个体制。只是因为中央银行的存在，而后者的作用就是防止这个体制崩溃。中央银行是作为一系列金融危机的结果在19世纪发展起来的。有些人争论说中央银行制度应该被废止了。我持反对态度：我坚持认为，我们的国际金融体制面临崩溃的危险，恰恰是因为没有足够的国际金融机构。我清楚地知道这一点。我近年来目睹的金融市场的全球化使我想起了在19世纪末，我们也有一个相似的，资本从一个中心到另一个中心的自由流动的时期。当我把这两个时期相比较，我发现上个世纪之交盛行的制度要比今天的制度更稳定。具体说来，我可以指出如今消失了的关于稳定性的两个因素：一个是全球性标准，今天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们都有货币封锁，他们像大地板块一样相互碰撞；另一种是帝国势力的存在，也就是英国，它对保留这种制度有着广泛的兴趣，因为它从中得到了巨大的财政利润。无论如何，这个制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就崩溃了。在保持稳定的两点因素失去的今天，崩溃的前景又有多大呢。世界秩序——我想多注意一点，一个稳定的世界秩序，因为它毕竟是我演讲的题目。苏联解体之前，我们是有过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它叫做冷战。两极各持一种相反的社会组织形式，被封锁在不共戴天的对抗中，但两者都知道他们必须尊重对方的致命利益，因为如果他们被卷入

一面战争，便会导致自己的毁灭，世界上所有的矛盾都包含在这一个大的矛盾之中。这个稳定的世界秩序崩溃了，还没有新的秩序取代它的位置，我们已面临着无序。导致情况如此危险的根源是，在自由放任思想影响下，我们甚至没有人认识到一个世界秩序的必要性。今天，美国是世界仅存的超极大国，但不再是国际金融贸易体制的主要受益人。它没有从中得到足够的金融利润来充当世界执法警察。由于缺乏一个帝国势力或是我们曾经有过的势力均衡，我们应该有一个国际机构，能够保持和平和秩序。我们的确有这个一个机构：联合国。但它令人失望地失败了。波斯尼亚对于联合国来说就是1939年的阿比西尼亚对于国际联盟一样。联合国的失败并不是它的失败，而是我们的失败，更具体一点是在安理会有三个常任理事国席位的西方民主国家的失败。联合国被设计成安理会有权将他的意志强加于任何地区，只要5个常任理事国同意。几乎就是在联合国成立之后，西方民主国家和苏联开始相互争吵，并且联合国变得软弱无力。但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联变得只想亲近西方，联合国才开始起作用，就像它原来设计的那样。这就是波斯尼亚冲突缓和的原因。这反映出西方民主国家在建设共同制度上的无能，联合国在世界最需要它的时候失败了。美国不想当世界警察，它必须同别人一起承担责任，但也不介意在联合国框架下运作。只有在北约的存在受到的威胁的时候，美国才在波斯尼亚采取了积极的姿态。我觉得使美国认为值得留在北约是有希望的。但我认为近来在波斯尼亚的行动不能证明保留北约的价值，因为西方阵营中的纷争比其他的都大。北约的任务需要得到重新定义。我认为允许联合国错乱地行事同样是一个错误。西方联盟急需提出一个共同战略，却不能够提出一个共同防务战略。战争被认为是政治的延伸，所以一个共同战线要比保守

的防卫更好理解。比如，防止种族和民族冲突的唯一途径就是帮助他们成为开放社会。我们正在做这个吗？比如，克罗地亚没有独立的媒体，贝尔格莱德就比萨格勒布好一些，既然克罗地亚已经取得了胜利，我们还准备给图季曼施压要他建立民主机构吗？除非我们给我们的思想一种意义深远的方式定位的话。现在进行的途径是地缘政治现实主义。每个国家都一心要捍卫自己的利益，这种情况是不可取的，因为它忽略了共同利益的存在。波斯尼亚并没有侵犯任何国家的利益，但它侵犯了他们的共同利益，合起来的利益。这种地缘政治现实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有着相同的智力基础。它将竞争美化成对合作的伤害，我相信这种论词是站不住脚的。我们必须决定我们代表什么，我相信我们应当站在开放社会一边。但是近年来的经历表明，我们有必要重新定义这个概念，它不应该只是同封闭社会或过分稳定的社会法则并列。基于这点考虑，今天占优势的自由意志思想对我们的文明具有更大的危险性。关于这个主题，我没有更多解说，但你们会在我的书中找到大部分答案。

1995.9

1996.4

索罗斯演讲集： 在布拉格的演讲

我非常高兴能受到邀请来到这儿给大家演讲。在我看来这次会议非常重要，这也是我来这儿的原因。想告诉你们国际互联网现在并且将来也会对世界的这个部分产生多重大的影响。

正如你们刚才听到的那样，我写信给我所有的基金会，也给你们的国家，要求宣传“开放社会”的概念。

我像往常一样给我所说的“开放社会”下定义，因为我认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解释，如果它没有被十分准确地定义的话。

曾经生活在封闭社会里的人或者对此有所了解的人大致会明白这个概念是什么意思。在一个更深更广的意义上说，其实就是民主，因为民主很容易就成为大多数人的专政，它如果走向极端，通过道德清洗，会成为制造封闭社会的工具。

但是开放社会不承认任何人具备真理的专有解释权，不承认有人对所有问题都有最终答案。因此你需要有一个社会来承认这

个事实，需要一个不是由政党来统治的政府。一个没有中央集权的社会。你需要法律的规范，需要得到尊重和保持个人利益和观点的机构。

所以我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国际互联网是一个开放社会的典范，就是这么看的，因为它基本上是自发形成的，由使用者统治，没有命令的限制。从任何方面说，它都是真正开放的。

我们建立的基金网其实也是一个开放社会的范例。它同国际互联网有很多相同的特征，我甚至不知道别人怎么称呼它，也不知道它准确的术语，因为在每个国家我们都有基金会，而他们或多或少都是独立运作的。那儿的人决定什么在先什么在后，没有人，包括我，知道将来会怎样。我认为这是开放社会的很重要的一个方向，那儿的很多事情都是自然而然发生发展的，并没有中央控制系统。

所以我认为在这个刚刚打开还不够开放的地区，国际互联网和交流是创造开放社会的极为重要的工具，我觉得这会使你们更加适应这个社会。新年在布拉格和其他中东欧国家，91年在俄罗斯。但这场变革未真正完成。

但是一个更新的思想，一个新的社会组织形式，一个关于社会应当如何组织的观念尚未形成。如果你回忆一下历史上的重大革命，总是封闭社会解体之后紧跟着新概念新思想的诞生。而这次就比较难。我认为很大一部分责任在于这个开放社会，也就是世界的其他部分，他们没有在开放社会中宣布它的任何伟大的概念，一个完整的核心需要普及的组织形式。

因此从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的转变相应地没有获得太多的支持。我想这种不彻底革命的教训在于这个开放的社会并没有一个格式的结构，而且生活在这个开放社会里的人不承认他们生活在

开放社会中。实际上这是一个更加复杂，更加高级的综合组织，在那儿有一群统治者在没有完整结构的情况下把他们的财富强加于指令。

进行转变是向上的一步，但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因为你们需要完善制度，还要促使人民去信任这些制度。实际上，在世界的这个部分，事情正在十分错误的方向上发展着，我不在谈论捷克共和国，它是我的基金会活动积极的地方。

但地区分裂也不会出现。现在已经有一个组织主题出现，而且已得到国家和民族承认，如果你想全社会有这个意识——近来我们创造了国家正处在民族主义危险之下的境地——民族主义的权力会导致冲突，对此我们不必看得太远。

让我们来看一下南斯拉夫，你能知道那儿发生了什么。当时最主要是不幸走错了道路，所以现在还要做许多事情去强化开放社会的思想。我觉得网络能提供很重要的工具和基础，但在很多情况下，它也通往那个方向。我之所以说它非常重要，并且认为它是我的基金会成员要做的首要事情之一就是要在这个地区用电脑进行尽可能自由而广泛的交流。

我们有很多问题，但在我继续向你们说明你们要干什么之前，我必须坦白，私下的坦白，——我自己是个电脑盲。事实上我根本不懂如何使用电脑。当我们起初在办公室购置了一台很强功效的微型数据处理电脑时，我想给我5岁的儿子露两手，但我不知道如何打开开关。你或许会问我，一个电脑盲，在今天，在这个时代，如何生活下去。我用一个刚跑进我脑子的古代犹太笑话来回答。

有个人在 Artovite 申请一个工作，也就是牧师的助手。我不知道确切地点，不管怎样他要找个工作，但没有成功，因为他不认

字也不会写。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他后来成了大富翁，而且拥有一家公司。于是就有银行家来对他说“你真应该带着你的公司走向公众，发行股票”他说：“可我不知道怎样去做。”“我一切都准备好了。你要做的只是签一下这个文件。”他又说：“很不幸的是我不会写字。”这下银行家说：“你，如此成功的人，竟然不会写字？真难以想象，如果你认字你会成就什么。”他回答说：“在 Kátovité 当牧师的助手。”

所以，不要期望我会懂那些我们将要在互联网上干的事情。但在我看来，基本上有 5 点我们要做，他们是：

- 提供国际联系（和国内联系）
- 终端使用者的接点
- 使用者设备
- 使用者培训
- 后者的内容，进入数据库途径的教学内容或其他

刚才讨论的时候，我想到了第 6 点，就是法律上的因素以保证电脑交流的真正自由。因为在那儿，被我们享有的交流自由是毫无保留的，所以我们要尽力使其有一个合法的基础。

有 5 个地区，我把注意力集中在培训和提装装备上。两者必须齐头并进，因为我们认为缺少装备的培训是没有多大用处的，反之亦然。我们还要具备一定的联系，缺了它就无法工作。但是我希望我们能帮助其他人即提供同投资者的接触，当然也包括当地政府。

我们最具前途的项目在前苏联，同国际科学基金会有关，你或许不知道这个机构，现在在那儿是保持其基础科学研究存在的重要机构。我想我们的投入有两点，一个是我们极其需要在我们的基金会内使用网络。这使得我们极其需要那样的交流，并且我

们不得不使用这种能力，而不是那种单个对单个的交流，不管是通过电话、传真还是信函。

我们很快就要同合作者联系上了，下一步是建立基础结构。

特别为了这个科学基金会，我们想通过电脑来管理这块土地。此时我们也想把电脑广泛使用，我们已经有了一个被我称之为多方工程的东西，它已超出科学的领域。我会使电脑可供使用，——电脑交际网络可供使用。——对整个社会、学校、大学、博物馆、图书馆、大众传媒等等。

在爱沙尼亚，我们在主要人口集中地建立了 36 个主节点，在市中心，培训和动员也将在一个精选出来的日子里有条不紊的展开。我们就要从那儿开始。我们还希望同别的投资者合作。我会将目光投向美国，在那儿副总统戈尔对打开电脑交流之门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而且欧盟也希望向那儿进行较大的投资。

当然我们正在同政府进行合作，在莫斯科建立了一个中枢系统，这早就有了进出。在其他国家，我们也完成很多。爱沙尼亚就是一个。我们进行了第一步，提供了一个教育网，用以联接爱沙尼亚和斯德哥尔摩。我相信现在爱沙尼亚的网络联络上一定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比如在罗马尼亚，我们提供了装备给学校，在那儿，我们发现已经有五到六个学校有接近电脑的机会。所以说，早就开始向目标迈进了。

我们拥有这项综合的项目，希望你们有通过网络参与的机会，为新兴技术国家作贡献，也希望你们信任网络，无论从国际上来说还是当地。我想你们知道，我将这个项目看得多重要，这不是一个纯技术问题。如果它在组织上具备更好的内容的话，那他本身就是一个开放社会的典范。谢谢大家。

1994. 6. 15

索罗斯演讲集： 对美国死亡问题的思考

做这个演讲，我感到有点为难。因为我并非死亡问题的专家，很多有关于我的“美国死亡工程”的人员都比我更有资格。但听听像我这样的平常人——包括商人、行动家、公共舞台上的演员——的想法，对于一些专业人员和学术专家却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当然，许多商人对学术权威也是极为尊重的，我便是一例。所以对待这些听众，我总有些不知所措。

我所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为什么要发起一个“美国死亡工程”，这有两点原因，一点比较抽象，另一点是私人原因。

抽象的原因来于对我赚钱和慈善活动的根本认识，我已经详尽地将此认识解释为一条尚未被正确理解的哲学理论。这个认识是：指导人们行动的各种看法与事情本身总存在着分歧。我将这种分歧称为参与者的偏见。因为参与者的行为推动了事件的形成，那么在参与者的偏见和他们所参与的事件之间，就有一个双向的

反馈机构，我称这个双向的反馈为反射，有时参与者的偏见很小，就有一种力量在促使参与者的看法和事实本身相互靠近。但其他时候，偏见会强大得无法被更正。相反，双项反馈机构会使偏见生效，并加强它的力量，直到情况变化无法继续，然后在加强自我的过程中，就会有一个逆转。

每个人在生命中都经历过一些不公平的事情，而我的经历尤为特别。我青少年时代住在匈牙利，受到纳粹的迫害；之后我接受了共产主义。到英国后，我受到了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的影响，开始进一步发展我的反射理论。当我进入金融市场后，我开始从事对增长和降级次序的专门研究，并取得了一定成绩。我赚的钱超过了个人所需，便创立了一个基金会，旨在建立一个开放的社会。不做过深的探讨，开放社会是建立在人们都根据不全面的认识行动，没有人掌握完全的真理和原则。一个能认识到我们也许不正确的社会，强于一个否认其领导者可能犯错的社会。

我建立基金会以试图打开封闭的社会，而且我已经完全投入到这场由一种不平衡状况转向另一种不平衡状况的革命运动中了。在过去的5年中我一直很忙，因为人们总是能在革命的热情中做许多平时不可能办到的事。但革命冷却后，我便开始考虑我做些什么来使我们的开放社会更加可行。因为根据我的理论，开放的社会也遭受着匮乏之苦。而如果要使开放的社会获得成功的话，我们必须认识并更正这一点。我集中于两个问题领域，都是错误观点在其中有着重要作用的，如果他们被更好地理解的话，问题也就不会这么严重了。

一个是今晚我将谈论的死亡问题；另一个则是关于麻醉药品问题，它们使治疗比病痛更糟。

由于我们不全面的理解，我们的行为总产生一些始料不及的

后果，它们并不比麻醉剂在战争中更显眼，如果将滥用药物也视为犯罪的话，我们已经制造了犯罪、腐败、暴力这些比滥用药物更具破坏性的东西。我希望麻醉品和犯罪的错误鉴定被更正，但不提倡毒品合法化。第三个我想有所作为的领域——但我还不知该怎么办——是由于过多使用电视广告而造成的对于我们选举进程的歪曲。这三个领域有一个共同点：歪曲和错误概念使问题恶化。

我选择死亡作为一个领域，是源于一些有关我双亲死亡的个人经历。我忠于他们，并深爱着他们。

我父亲于1963年在家中去世。他临终时病得很重。虽然他同意接受手术，但他并不很想生还，因为他担心病疼与手术的结合会侵犯乃至摧毁他作为一个人的自主性。不幸的是，这就是事实。手术后他的时间所剩无几。也许我还是免谈他的那段日子为好。他去世时我在他身旁，但我还是让他独自死去。我可以看见他，但我不在他的病床边。他死后的第二天我去上班，没有谈及我父亲的去世。可见，我有点排斥他的死亡，我自然更没有参与它。此后，我阅读了“库伯乐——罗斯”，懂得了如果我尝试参与它的话，我便还能与他保持联系。如果我早一点读了“库伯乐——罗斯”，我也许会握着他的手，因为我的确爱他，我只是不知道这会有所不同。我原谅了我自己，因为当时我并不清楚这些。

我母亲是在最近去世的。她参加了海姆洛克协会，有了一套自己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我问她是否需要我帮忙。我主动提出了，虽然我并不很想这样。但我会去帮助她，因为我觉得我对她负有这个责任。她的决定是，她不想独自死去。我很高兴她不想。她的决定使全家人有机会聚集起来，在她死亡时守在她身边，这次，一直到底我们都保持着良好联系。

她有了这个被库伯乐——罗斯描述成走进天堂之门的经历，而我陪伴了她。她说她担心会把我一块儿拽走，于是我向她一再肯定，我正安然处在这个世界上，她无需担心。对于我们大家来说，她的死亡是一次真实的经历，因为她的处理方式，也因为全家人——特别是我的孩子们——可以参与。

这两次个人经历使我认识到，我们需要更好地了解死亡经历。在我最初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中，我的朋友巴奇希娅·布莱姆帮助了我。她作为一个社会工作者，曾很专业地处理过死亡问题。她请来了参加“美国死亡工程”的设计者们，同时，她自己也是理事会顾问，其中还包括：哈佛生物学院的苏珊·布拉克，耶鲁法学院的罗伯特·伯特，希耐峰的罗伯特·巴特莱，乔治·华盛顿大学的乔恩·里，新泽西州人类研究部的维尔维特·米勒，哥伦比亚大学的大卫·罗斯曼，威廉·D·亚拜勒律师，纪念斯洛恩——凯特林癌症中心的病痛服务部主管兼“美国死亡工程”总监卡斯林·M·弗雷。

此项工程的任务是，促使人们更好地理解死亡经历和丧亲之痛，以便转换死亡文化氛围。为了达到这点，工程将支持研究中的先期工作、奖学金、人文学科和艺术，同时还有对护理、公共教育和公共政策方面供应的革新。在过去的三年中，我每年向此工程提供500万美元。理事会决定将钱分成两种用途：推行自身的一些计划，为补助申请提供可能。

第一个主要计划是，建立一批教职员奖学金。我们希望挖掘出一些杰出的教职员工和大夫，他们忠于工程的计划，并通过工作来支持计划，包括尝试新的护理死者的方式，寻找新方法来教护理人员照料临终者及其家属。那些具有两到三年工程评议员身份的并对死亡护理提出过重要观点的学者，将成为此项工程的学

术领导和榜样，以及未来健康护理人员的导师。每年，工程将选出十名学术教员。三年后，全国 1/4 的医科学校中将有一位领导和榜样。

在设立补助金方面，我们将覆盖有关死亡文化的所有方面，其中有：传染病学、人文地理、美国的死亡和丧亲历史；死亡及丧亲的物质的、情感的、精神的和存在的成份，对死者及其亲朋的新的服务输送模式；对普通大众和健康护理专业人员的不同教育课程；政府机构政策的形成。我个人希望实践所占比例将超过研究所占比例。

现在，让我们粗略地看一下我们将转化什么，和为什么要进行这种转化。我们将从一些小事着手，对我们这个工程的名称，我们进行了大量讨论，最终放弃了一些巧妙的婉辞，而选择了一个能直抒已见的名称，它甚至略显粗陋：“美国死亡工程”。在美国这个永远年轻的土地上，衰老是一件尴尬的事，死亡就是失败。死亡取代了性，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忌言。人们争相在电视讨论节目（脱口秀）中讨论他们性生活中最为隐秘的细节，却绝口不提死亡这个能以它的巨大使短暂的性快感变得渺小的东西。只有我们对暴力事件的关注冲破了这片寂静。残杀可以有，死亡却不行。

甚至于医生们——尤其是医生们——不愿意考虑死亡。最近发给内科医生的关于 HIV 传染的联邦政府手册上，没有表明艾滋病是一种致命的疾病。它建议说当病人生病时，还要照顾好他们的孩子，而对于病人的死亡，却未提到任何长期计划的需要。在本世纪初的医学书籍中对于人们死亡方式和减轻死亡痛苦的描述，要比今天大量关于治疗疾病的作品中的描述多得多。

对于治病而不是照料的强调，改变了医学的实践。人们的寿命有所延长，在疾病中残存四五年方才死去。但健康护理的账单

却随各种疾病增长。我们的成功还带来了一些出乎意料的后果。我们创造了一种医学文化，它过于专注于治病延年，而忽略了为这个生命中不可避免的阶段——死亡——提供帮助。各种高技术介入的进步加剧了医疗系统中的此项不足，它们欺骗医生和病人，使他们相信这个不可避免的事实将被无限期地延长。

死亡这个事实与参与者（死者、医生、家庭成员）的认识之间有很大距离，我们应使两者相结合。首先知道疾病的医生应该再次熟识他们的病人，他们必须认识到，如果单纯地治疗疾病、延长生命的话，他们就是抛弃了临终病人，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这样他们就再没什么可做的了。他们首先必须习惯于自己的死亡，才能正确地护理临终者。

有 80% 的人死在医院里，但对于所有的人来说，医院不是一个死亡的理想场所。医院是治疗严重疾病的地方，而死亡并非疾病，它不属于正式的医学门类，它没有可以对医院和医生进行偿还的 KRG。如果你去医院里等死，医生就会在你身上找到一些病来治，比如肺炎、脱水，否则他们不会接受你。他们将你挂在试管和机器中间，试图稳定一个并不稳的状况。对于可偿还的诊断的需要改变了现实，医生和护士的工作是延长生命，而不是帮助病人面对死亡。在这种外来的安排和极端情况下，平静地死去的愿望化为泡影。

在家庭这种熟悉的环境中更易获得一个平静的死亡，这种环境有助于安然舒适地按照惯例离开亲朋。我的父母都是在家里去世的，我母亲的情况是，我陪她到达了天堂之门，等她处于一个较好状态之后离开了她。她失去了意识，又徘徊了 7 到 10 天后方才离去。在此期间我不断地去看她，希望发现交流或意识的迹象，但并没有等到。在家中去世，因为我们雇了全天工作的护士来照

料她。我们并非没钱送她去医院。在那里，医疗的干预也许会使她在生死之间多逗留一会儿。仅是给她进食，过程就已经被不必要地延长了。

只有 20% 的人死在自己家里，或老人院、救济院中。救济院有一种缓解痛苦的护理，而这正是任何有关机构都应该为临终者提供的例行程序，适当的护理包括：对于痛苦或其他病症的控制，关注病人在心理和精神上的需要。为了提供这种护理，救济院雇佣了很多医生、护士、社会工作者，和丧亲问题顾问。遗憾的是，大部分临终病人并不能选择救济院提供的帮助，医疗护理的覆盖面是有限的。所以，许多救济院为临终者提供上门护理，将监管服务限制到每天 4 小时。这就要求有一个家庭成员不工作，并且身体好，愿意承担剩余时间里进行护理的责任。

根据这些观察，我们的建议就很显然了。

首先，最重要的是医生、护士、和其他健康问题的专家，需要接受更多的护理临终者的训练，特别是在减轻痛苦方面。健康问题专家还要为减轻伴随死亡而来的心理上、情感上和存在着的痛苦而接受培训。生理上的疼痛是人们对于死亡的最大恐惧。一个在痛苦中煎熬的垂死者，无法思考任何事，无法习惯死亡，无法有条理地回忆一生，也无法道别。所以，减轻病痛应该是首要问题。医生们常因为怕他们的病人对药品上瘾，而不给他们使用足够的药。

第二，医院应该为临终护理选择并发展一个全面的 DRG。仅是这一点的改变，就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需要解除当前医院护理垂死者的假象；需要解放医生和护士，使他们提供一种非机械的护理——比如关心临终者的简单动作，握住他们的手，倾听他们，安慰他们。

第三，我们应该尽可能地为重病患者提供救济服务，取消对入场权的限制，增加偿还规则。我们应该设立法律，在病人的愿望无可得知的情况下，允许其身边的亲人决定结束这依赖于医疗维持着的生命。政府应该从经济上帮助家庭成员，使他们能以最经济的方式在家里照料临终者。这些只是我们的工程对于今后几个月里有关死亡文化转换的探讨的几点建议。

所有这一切的花费有多少？我们是否能支付对临终者的正常护理？目前在美国，每年有 220 万人死去，而癌症和艾滋病死亡人数的增加以及育龄者年龄的老化，将使这个数字的增长超过人口增长。现今，每 8 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在 65 岁以上；30 到 40 年后，5 人中就有一人将属于这个年龄组。对于那些已有 65 岁的人来说，平均寿命年龄是男子 81 岁，女子 85 岁。人们担心老年人的死亡会花光国库里的资金，像其他所有的担忧一样，这份担忧只是基于一种不切实际却很普遍的想法，认为老年人和绝症患者将在死前消耗掉大量资源。

诚然，人们在生命的最后 6 个月中支出的医疗费用是其一生总数的一半，但 80 岁以上人的医疗支出则少于其他较小的年龄组。

积极的、延长生命的干预，比对死亡的正常护理要昂贵的多，虽然他们常常是违背病人意愿的。

这使我想起那个热门话题——医生帮助下的自杀和无痛苦致死术。这是有关死亡残废的唯一被广泛讨论的方面，它出现在电视里，公共论坛上，报纸的标语和严肃的新闻报导中。俄勒冈的选举人刚刚通过了一条法律，使它成为第一个禁止实行医生帮助下自杀的州。

作为海姆罗克协会会员的儿子，作为柏拉图·菲德拉斯的一

名读者，我对之表示赞同。但我想声明，我只代表我自己，而不代表“美国死亡工程”理事会。理事会的成员有着不同意见，而理事会作为一个整体，便需要避开这个问题，因为在打开这个潘多拉魔盒前，它仍有许多事要做。他们不去涉及医生帮助下的自杀和无痛苦致死术的讨论，而是去为临终者提供仁道的，富有同情心的护理，包括加强医生和病人的交流，以病人为中心的护理，医生对于放弃或坚持护理的更明智的判断，以及熟悉缓解性护理的原则和实践。

作为此工程的创建人，我尊重他们的判断。我相信个人自主权，我坚信人们应该决定自己的死亡。但我同样知道，无痛苦致死术的合法化会产生一些预料不到的后果，导致各种弊端。我们需对情况进行慎重的考虑，但我认为这并非此项工程的头等大事。即使无痛苦致死术被合法化了，也没有什么绝症患者会做这种选择。至少我母亲拒绝我的帮助。而且我很高兴她拒绝了。美国死亡工程关注的是大部分人，他们并不寻救医生帮助下的自杀，而且他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最后，我想谈谈我是如何接受我自己的死亡的，这是我在年轻时就经常思考的问题。我考虑了多年，鉴于我的想法和事实之间有分歧，我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对于自己的死亡我是无法接受的，因为那就完全否定了我的意识。也许只有当死亡真正降临时，它才能被接受，特别是在一个漫长生命的最后阶段。了解了认识与现实无法统一，就使得认识更容易被接受。我肯定如果此时此刻我就面对死亡的话，我不会觉得我的理论令人信服。但仅作为一种想法，我觉得它很具说服力，并能安慰人。我不知道当你第一次听说它时，你是否也有同样的感受。

当人们开始接受死亡，并认识到它是生命的一部分时，人们

便不再需要多余的医疗干涉和医生帮助下的自杀。这也正是我希望我们的努力能对死亡文化有所贡献的地方。

索罗斯演讲集： 失败的哲学家 东山再起

“失败的哲学家东山再起”引介

女士们、先生们：

自 1987 年开始，人文科学院就开始举办纪念柏图卡讲座系列，以此来纪念姜·柏图卡。他作为一个哲学家是前所未有的，作为一个人来说也是无比成功的。姜·柏图卡逝世于 1977 年，死之前还经受了兹考斯鲁维金地方警察的一次长时间的审讯。他不是一位英雄，更不是一位革命英雄，但是他坚信哲学应该为人类权益和社会自由作贡献。只要看到的权益受践踏他就挺身而出，全然不顾工作前途和个人安危。我希望他能够永垂不朽。

我们人文科学院从创立的第一天起就有着和柏图卡同样的信

念。这并不仅仅因为这个院的一些创立者从主义上和学术上说都从柏图卡那里获益非浅，也不仅仅我们崇拜这个人，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科学院是建立在，而且要继续建立在一个信仰基础上，那就是严肃的学问研究和学术交流需要和人类自由和社会进步紧密联系。正是如此，我们今天才邀请了乔治·索罗斯来为大家演讲。

乔治·索罗斯是一个用个人财富致力于人类自由和社会进步的人。他奔走操劳建立和护卫民主社会，尤其关心前苏联各国。那也是柏图卡先生的地方。他并不光是出于道义做这些事情，而是出于某种哲学信念。他将特别奉献给大家他的种种社会活动的哲学动因，这也将是他今天演讲的主要内容。谢谢你乔治。有请乔治·索罗斯。

人文科学院董事 克亚斯托夫·切尔斯基

失败的哲学家东山再起

我的哲学思想可以用一个短语概括，那就是：相信我们人类容易犯错误。这个短语的重要性就相当于断言、冥思、结论之于德斯卡茨，实际上这个短语的重要性更大。德斯卡茨只涉及到个人思考问题的情况，而我的短语对于我们生活的世界同样适用。错误概念和错误理解影响我们遇事的决策，从而影响到我们做事的效率。老犯错误对于人们社会生活的影响就好像基因突变对生物学的影响一样。

我想我需要强调一下，我只是在道出一个信念，一个言之成理的信念。当然这信念是符合哲学标准的，但它毕竟只是一个信念而已。我无法像德斯卡茨声称证明了他自己的存在一样证明我

的信念。相信我，我曾试着去证明它而且好几次都即将成功，但每一次最后我总是被自己编织的网缠绕住，因为说一个人能够证明自己是易犯错误的本来就是一个有点矛盾的逻辑，那么也就是说人不能证明人易犯错误是合情合理的，所以我心甘情愿把我的真理叫做一种信念。

这儿就有一种重要的暗示。它暗示着我们需要某种信念来引导我们的一生。我们不能只靠理性活着。理念有用，可也有不足，这个不足是什么将成为我今晚要问的主要问题。如果我们坚持待在理念的范围之内，我们将不足以对付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于我们易犯错误的信念将让我们走得更远。能走多远就是我今晚探索的主要问题，尽管我不得不告诉您们恐怕我们是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考虑一个最重要的观点，即对我们易犯错误的信念和对民主社会的信念之间究竟有何联系，这恐怕要等下次机会了。

对我来说，对我自己易犯错误的认识指导着我怎样赚钱又怎样花钱。但我并不是只为钱而活着，我之所以对钱加特看重是因为我意识到在我们这个社会里，有一种趋势，即套大钱的重要性，用钱衡量一切价值。我们以一个画家的作品价值多少来评价这个画家的优劣，以一个政治家能筹到的钱的多少来衡量他是否成功，政治家们也用同样的方法评价自己，我是首先承认了钱的重要性，然后才得以去作一个哲学家被承认。我们目的却是在于后者而不是前者。

这种统治世界的对金钱的偏爱就是我说的人们易犯错误的一个绝好例子。为了将易犯错误性这个概念翻译成可供操作的术语以阐明我的观点，我将声明：我们所有的思维结构，几个特例除外，都实际上是或潜在的并非十全十美，我说的思维结构指的是

我们思想上的产物，不论它们是藏在密处还是诉诸于外在世界的各种形式如金融市场，各类政体交融，联合国，国家之间政治和法律关系。躲藏在我们大脑中的思维结构囊括从感觉到语言各个方向，语言又可以进一步阐述一系列或不和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相关的信仰。

解释我们说的有瑕疵的思维结构就是来看看那些特例，也就是那些没有瑕疵的思维结构。我们能够，比如说，叙述一些或对或错的观点。这些论点没有瑕疵，我们只要保持依赖于正确的观点，我们就能获取知识，只有当我们脱离了这些“合理构造”的观点，我们的思维结构才沾上了瑕疵。我们应该审视一下哪些观点我们应该申诉。有一些观点是了不起的，因为它符合客观事实，还有一些观点，特别是在数学和逻辑的领域中，是通过一些法则从正确的观点推导过来的，我们最伟大的成就就是在自然科学领域，在这个领域里，我们用一些法则从正确的观点推导出另外一些命题。但是卡尔·波普尔指出，这些命题只能是猜想，不能被证明，他们的本质是虚假的，永远处在被怀疑的地位。

所有知识的一般特征就是总有可靠的检验它们的事实或法则，只有我们懂得怎样来检验，这些检验的手段之所以可信就是在于它们相对于它们将要检验的观点和运用它们来检验的人来说是独立的。

如果你把我们看作是努力地试图理解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的人，你会发现我们无法限制我们的思想使它们都服从于知识。我们在生活中必须作出决定，为了做决定就必须持有一些不一定符合知识的看法，不论我们是否认识到这些看法和知识之间的区别。我们必须求助于信念。这就是人类所处的境地。认识到人类所处的境地不一定符合知识——如果完全符合反倒会自相矛盾——但

是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系列的信念，比什么都更符合人类所处的境地的信念。至少，这就是我在阐述我关于人们易犯错误时所深信的。

我发现我看待世界的方式与众所公认的智慧的方式不一样，在大方向和小方向都不一样。让我们来着重指出大的方面。公认的智慧方式受自然科学成就的重大影响，在非社会事务的领域里和自然科学几乎别无二致。自然科学将事务当作一串事实。在社会事务方向这种看待事务的方式就会歪曲事务，因为它将注意力从我们思维结构的瑕疵上转移了，它忽视了处理事务的人们的不同观点和事务本身的实际情况的区别。在经济领域，这种谬误尤其明显，但是在更高领域这种谬误也时有出现。

但凡有思想的人参与的事务，因果的链子并不是牵连着事实和事实，而是从事实到理解，从理解到决定，从决定再到另外一套事实。当然，这两套被自然现象标志的事实之间也有着直接的联系，但是既然理解和事实中总有不可小视的距离，那么这联系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一些歪曲。

经济学理论尽量不去理会这个距离，它只关心供求与需要之间固定的关系。它对真理的诠释就是金融市场动态。但这不是真理。

通过对理解和真理的比较，我发现真理总是被人们的思想所反映的——我把它叫做认识作用，真理又总是被人们的决定所影响的——我把它叫作参考作用。我进一步发现这两种作用在相反地运动。它们有时部分重叠，人们只对受他们决定影响的事物进行探索，这些事物与自然科学中研究的事物有着不一样的结构。它们需要给予不同的考虑，我管它们叫反射事物，我断言这种的反射性带给思索的人和被思索的实际事务一种不确定因素。

我对于发展我有关反射的理论有相当困难，但我没有必要在这里对它进行讨论。我要说的是在社会事务中存在着一种自然现象中不曾有的不确定因素，自然现象中也不无不确定因素——尤其在量子力学中。但我说的不确定因素不一样，它非但影响事物本身，还影响与事物相联的理论。

海森伯格创立了不确定原理，而且在那个原理之上，量子力学待以定出数据性的概念，这些概念有着预见和阐释的力量，量子力学指出量子现象的观察影响它们的行为，但是量子力学自己，或由量子力学引发的其他理论，并没有影响量子力学的行为。这个现象为判断理论的时效性提供了一个标准，比如说现在我发表一个预测股市行情的理论，那么它就会影响股市行情，这就产生了一种与量子力学不一样的不确定性。它会影响判断理论真实性和时效性的标准。这就意味着一个正确的理论可能是错的，而一个错误的理论又可能是正确的。

这和我们真理的定义如何统一呢？似乎我们不能光凭错和对两个概念，逻辑学家认为不存在对和错的言论是没有意义的。我绝不同意这种看法。能影响它们指向的事物的理论绝不是无意义的。它们可以改变这个世界。它们证明了意识能改变物质的主观能动性。我们必须针对这一点来调整我们对这一真理的概念。我建议我们需要三种概念：对、错和反射。反射的言论的价值就在于它的不确定性。我们可以找到另外一些有着不确定性价值的言论，但我们可以不需要它们。但我们不可以缺少反射的言论。我对这个命题的深刻意义不需要再强调了。我们关于真理是什么的理解对我们来说比什么都更基础、更重要。

逻辑实证论是一种狂热支持自然科学的哲学，它把自然科学原理引导到一种逻辑结论。我认为这太偏激了。它钳制了意识作

用物质的主观能动性。逻辑实证论作为一个典型指出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是怎样取决于自然科学的。让我们需要彻底修正我们对世界的看法。这就是我为什么提倡引进三个判断真理的范畴——反射的原因。

让我举例指出引进反射这个概念含有多大的不同。当前有一种广泛的信仰存在叫做“市场的神奇力量”，这是基于政府调控不得人心的信仰。如果你引进反射这个概念，你就会立即发现政府调控的失败并不能证明自由市场就是完美无缺的。当然反过来也是，两种方式都有缺陷。两者之间的选择就是反射主义。

反射的言论缺乏一种判断真理的独立标准。它的真理标准是确定的，但绝不是没有意义。我们在应付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时少不了它们，它们也不仅仅是一种现实的反射，它们主观能动地构造着我们这个世界。肯定在我们的思维之外有另一种存在，一种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但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言论都是属于那种存在的，构成那种存在的一部分，我们有时会有一种印象那就是思维和存在是属于彼此独立又极为相似的两个世界的。我们并且可以从两个世界中找到一种联系，那就是思维反映着存在。这种印象对于科学手段和公理比如像数学和逻辑是很适用的，但不适用于活着，思考着的人类。

卡尔·库帕成功地显示了科学方法是怎样服从于推绎逻辑的规则。他的推绎逻辑的科学法则惊人的简明。这种法则由三种阐述组成。特种起始条件，特种结束条件，一般适应条件，这三种阐述可以三种不同的方式结合：一般条件加起始条件等于预测，加结束条件等于解释，起始条件加结束条件等于对一段条件的检验。预测和解释可以颠倒，一般条件没有时间性。

反射理论对科学方法适用于社会人文现象提出质疑，库帕认

为研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和标准是同一套的，他管这叫做方法整体性教条，我对这个教条颇存怀疑。我把这种怀疑体现在我的书名上了：《金融炼金术》（The Alchemy of Finance），我在这本书里提出：“社会科学”是一种不适当的表达，那些加入了人们不完全正确的理解的事件不能用一般的法则来解释或预测。我觉得现在我有点言之过激了，就像那些逻辑实证论学者一样，只是和他们在方向上正好相反罢了。遵从方法整体性教条，我们可以在社会现象中用一些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标准并且在特定的适用范围能产生一些有价值的结果。我们只要牢记，这适用范围不包括，从定义上来说，那些不完全正确的理解在其中起了决定作用的那些事件。比如说，当经济理论其中一些不完全正确的东西导致的结果被剔除，它作为一种假设结构是适合此类的。只有当我们把这些理论用于实际社会时，歪曲方会产生。这在金融市场中是很显而易见的。理性预测和高效市场理论产生了很多误导。

对付人类社会中一些不确定的方法之一就是我们将我们既有的知识、经验和判断力应用到它们不曾涉及的领域。在教学领域也是如此，我们无论在多么复杂的情况下都不能遮盖我们眼球上的盲点。

近年来，自然科学中一种与库帕理论背道而驰的理论悄然兴起。它常被称作复杂科学、或演变系统理论，或混乱理论，它研究开放的、演变的系统。它不求得到肯定的解释或预测，只求创造模型或拟态。电脑技术的发展为此创造了可能性。

我相信这种方法更适用于社会现象而不是分析科学。但是现在我发现我们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区别认识得还不够。电脑模型关心的是人类的演变。为了研究思想和现实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我们要求这些模型里包含模型创造者，这种模型创造者的

模型里，又包含他们的模型也包含模型创造者的模型创造者，这样一层层无限包含下去，据我所知，还没有哪种电脑模型是这个样子的。这种模型的无限循环网必须有个终结，如果它被实际地运用的话。在任何情况下，模型太大太复杂就无法反映现实。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了人们对事物理解生来就是不完美的。

以上就是我一堂讲座可以囊括的。我只能根据现实生活的情况向你们介绍我的哲学的主要思想。

当你认识到人们的观点和事物的状况中存在不符，这种不符本身就成了一个很可研究的领域，有时候观念和现实之间的距离并不大，人们也在尽量减少这种差距。我把这叫做动态平稳状态。也有时候观念和事实相去太远，根本没有走到一起的趋势，我把这叫做失衡状态。在失衡状态下有时观念和事实在不断变化，这叫动力平衡，有时它们一丝不变而只是相去很远。

我对失衡状态作了特别研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在我 14 岁时，我就亲身经历过它们。当时我是一个小犹太男孩，开始在匈牙利受纳粹统治，后来又受苏联控制，我在伦敦研究了它们，在卡尔·库帕的影响下，我形成了一些指导我赚钱和花钱的观点。

我没有更多的时间来解释人类的易犯错误性是怎样使得民主社会成为一个我们值得为之奋斗的目标的，尽管这才是我真正想要阐述的观点。至于赚钱问题，我最好还是保密。但是要想有所作为的话，光信仰民主社会是不够的。只有当人们相信民主社会是一个可以达到的目标，民主社会才能在全球盛行。可这偏偏是当前西方民主国家失败的地方——你们看看波斯尼亚的局势——这也是我作为一个哲学家和一个社会活动家失败的地方。

1995 年 4 月

索罗斯演讲集：

给美国参、众两院的信

这封信是写给对电讯不正当法案进行表决的参、众两院委员会的，索罗斯先生以一个普通公民的身份写这封信，并不代表任何组织的观点。

1995 年 11 月 10 日

议员先生们：

我写信要说的是，我对这周即将投票表决的审查国际互联网的提案有反对意见，我指的是埃克松电讯交流不正当法案和其他相关法规。在我看来，这样的审查会使得其他国家从政治意义上对国际互联网交流进行限制。

法案的支持者显然认为，通过互联网到达青少年那里的色情信息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只有先进行修正取出污秽，才是我们应尽的义务，我两点都不同意，网络审查的提议人关于网络色情的报告言过其实了。

然而更重要的是适用于新的传播技术的第一重过滤和言论自由保护必须建立。互联网络上的交流不应比电话和邮件受到更多的审查限制。这不仅单单从公众方面考虑，全世界都在注视着我们这个榜样，看我们言论自由和建立的原则是否适用于新的技术。如果我们认为审查是可以接近的话，那么世界上的追随者肯定也会一样做，他们借口美国对言论自由的限制为他们的审查事实进行辩护。在很多国家，向民主的转变得到了新技术如传真机、电子邮件的帮助。如果美国反而来带头限制通过这些新技术的言论岂不是很可笑？

父母可以通过“智能微软界面”和相似手段使他们的孩子免受互联网带来的侵蚀（在我看来，这被政治目的夸大了），而不是通过对传输内容本身的限制，在任何情况下，互联网络都是跨地区的，企图控制它注定是没有希望的。一个国家的审查限制只会使传播资源流向另一个国家。

我希望你们投票反对审查互联网的企图。什么东西能到达孩子的手里，取决于他的父母，这不需政府的审查。

你真城的

乔治·索罗斯

索罗斯演讲集： 面向开放社会

我在过去的 5 年中，对中欧、东欧和前苏联倾注了大量时间与精力，因为我相信这一地区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将会决定世界历史的进程。

我在 1979 年建立了“开放社会基金会”，并于 1980 年在我的祖国匈牙利开始了第一次地方性的活动，但随着苏联解体愈演愈烈，我不断投身于这一工作中去，现在这一互相联网的基金会已在 20 多个国家建立，帮助促进了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的转变，我在 1979 年捐助的资金是 300 万美元，而在 1993 年是 30 亿美元。然而花费的钱的数量并非此项工作功效的最好明证，有一些最好的项目花钱最少。

在 1989 年，有过一段非常的光彩，人们从非民主的政体下解脱出来，呼吸到了新鲜的空气，我们可以利用那一时刻，展开向开放社会的转变工作，那是一个诱人的契机，我把全部的精力投

入到这一工作中。但现在我必须承认这一时刻已经过去，任何快速转变的机会都已不复存在。当一个封闭社会解体时，它并不自动走向一个开放社会，因为相对封闭社会而言，开放社会是更先进、更有经验的组织形式。自由并非指没有镇压。一个自由的社会需要制度保护自由，最重要的是需要人民相信制度。制度本身也要善于应变。因为不像封闭社会，只认同一种观点——统治者的观点。开放社会必须允许人们表达不同的见解和利益，简而言之，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的转换是向前向上迈了一步。它不可能没有外部帮助，只通过发动革命便一蹴而就，我试图给予这样的帮助。但是在自由世界里，开放社会的政府并非有同样的动机。政府对于东欧有着善意和良好的愿望，但不知怎的，并未付诸于有效行动。无论在欧洲，还是在美国，政府工作总是典型的缺乏远见和理解力。

把美国对苏联解体和纳粹垮台的不同反应做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它还是颇有远见，且慷慨大方的，它参与实施马歇尔计划，这一计划带来了奇迹，它不仅提供了帮助，它还提供了欧洲国家可以共同合作的体制。它不仅派遣技术专家去传授知识，它还允许大量的欧洲人来到美国，实施自己的抱负和计划。我们好像忘记了那些积极的行动。当苏联解体时，并未有大规模的政治支持。“马歇尔计划”成了一个肮脏的字眼。

苏联政体的瓦解并未把它引向一个新兴的开放社会。而且，谁也不能保证在激烈的革命进程中，所未取得的能在更为缓慢和费力的过程中取得。恰恰相反只要一个模式一出现，它一定是朝着相反的方向。封闭社会的瓦解带来了一种大规模的对全部普遍观念的摒弃。原先属于苏联的众多国家也在它们各自的历史中寻找一条组织原则，当然也有例外。但是迫在眉睫的是民族身份问题，

而非诸如民主人权、法制或开放社会这样普遍概念。相对于民主和开放社会这样抽象的观念，真实或想象的民族感伤更容易发动社会。

这也产生了一个很危险的境遇，因为民族悲伤能够并用来建立一个或多或少的封闭社会，因为需要利用失望至极的人的盲从来带动集中全社会，激发人们斗争意志。如果没有的话，必须造出一个来。希特勒就是这么做的。他把犹太人看作日耳曼人的敌人，他在这个时代有众多效仿者。有些国家的领导人曾是持不同政见者，看一看南斯拉夫的米洛舍维奇，克罗地亚的图季曼，斯洛伐克的麦斯亚，乌克兰的克拉夫丘克，让我们把这些他们在其鼎盛时期能够获得的民众与倾向西方的民主政府必须于苏联、波兰、保加利亚竞争才能得到的有限的群众基础相比。

在这一情况下，最近共产党在匈牙利、波兰等国家取得的选举胜利不难理解。总体上，有一些力图改革的共产党人想尽可能远离斯大林主义，它们的重新出现成为了民主范围内、可令人欢心鼓舞的延伸。我对于去年匈牙利选举的结果颇为满意。全民选举摒弃了民族主义战线。社会党与自由民主党人联盟，在精心规划和宣传的改革基础上形成统一。这一切预示着一个灿烂的未来，不幸的是，政府无力贯彻改革计划，它珍视社会稳定胜于一切，且不愿意为改革而采取强硬手段。对于波兰，改革更为不幸，正当政府开始要走入正轨时，1990年进行的大刀阔斧的改革即将初见成效时便被击垮了。但是改革的步伐却不可扭转，结果波兰成为欧洲在经济和精神方面最有生机的国家，可能发生的最糟情况是它变革的劲头不会那么足。但无论如何，她再不会回到原有构架中去。真正的危险是以民族主义“独裁者”自居的人。他们在一个完全有利于他们的天地里自由嬉戏。用真实或想象的民族创伤

来动员全社会，这比国家改革，开放社会这样的抽象观点更为容易。建立一个开放社会是一个建设性的过程。民族冲突十分容易就能够瓦解它的根基。以前南斯拉夫为例。这个国家向西方开放了20年以上，它已具备了开放社会所需的人材资源。1990年货币改革在波黑与南斯拉夫同时施行。南斯拉夫付于改革的实施更为充足。它有一批在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改革初期，也比波兰实际上成功得多。然后米罗舍维奇在竞选运动中搜刮空了国库，这导致了货币价格的不稳定。南斯拉夫向开放社会转变的尝试也以失败告终。

现在我们有一个更贴切的例子——希腊，这个国家是欧盟和北约的成员，它完全溶于国际氛围，然而马其顿的签字很容易就激起全国民众的怨恨。希腊的扩张使它北方弱小的邻居马其顿共和国成为了希腊领土完整的一个重大威胁。必须承认有一小部分马其顿人怀有梦想，而这些是建立在过去遭受民族创伤之上。但是马其顿政府诚挚地想建立一个多民族的民主国家，它除了不放弃自己的身份之外，愿意做出任何的牺牲。但是希腊公众瞄准的是马其顿的极端主义分子，而不是马其顿政府，这一事件在希腊国内被赋予政治目的。

同时，马其顿的经济已经因为对于南斯拉夫的制裁而受到重创，又在希腊对其的禁运下，进一步瓦解，铁路从南往北延伸，马其顿在两端被切断，其结果是依靠铁路运输的重工业几乎完全停滞，经济危机威胁着政治稳定，多民族的民族阵线罗斯拉唯克马其顿和阿尔巴尼亚两方面极端主义分子的威胁，在禁运的重荷下，它将轻而易举地分裂，如果马其顿分裂，将会有第三次巴尔干半岛战争。

东欧局势很令人担忧，如果我开始一个新的项目，我将计划

一个短期活动。但很可惜，我错了。我想到《圣经》中的一句——40年在荒野，波兰和匈牙利这两个显示争取开放社会的战役并未失效。但是我们担心的是，它需要很长的时间和外部帮助。

对自由的疑惑

开放社会允许人们使用自己的创造能力。自由带来繁荣。但是，我一直意识到，开放社会这一概念，有其致命弱点，生活在开放社会中的人，甚至没有意识到他们就在那里，更不用说把它作为值得为此献身的目标。一方面说，自由如同空气，只有当人被剥夺了自由的时候，才会努力去争取，当它在那儿时，人们总是认为理所当然，但是在另一方面，自由又不尽相同，如果你不珍惜它，不保护它，它将会消失。

如果从1989年，东欧的革命事件中有任何可以学到的东西的话，那就是自由并不仅仅意味着没有镇压。一个封闭社会的瓦解，并不能自觉地创造一个开放社会。问题在于人们并未吸取这一教训。当苏联解体时，西方社会毫不犹豫地宣称，这是一个自由世界的胜利，但是我们没有任何想要在那个地区建立一个自由开放社会的意愿。

什么地方出了错，我认为我们自由的观点改变了。在二战中，我们愿意为所提出的自由的观点去奋斗，去做出牺牲。但渐渐这种观念失去了光彩，另一种观念取而代之。这一观点明确指出对于自由的追求并不是对外政策的有效目标，这个观点是“现实主义”，它坚持国家必须追逐由其地理位置所决定的自身利益，而道德、精神上的考虑退居其次，这种想法对于宣传颇为有用——动员国内外民众——但如果你相信自己的宣传，就会遇到很多麻烦。

国际关系中现实主义相联系的是“放任政策”的观点。这一观点在 80 年代又复苏了，它认为对于自身利益顺利的追逐将会带来资源最合理的配置，这就是指导我们对苏联解体所作工作的两个主要概念，但令人遗憾的是，它们仍不能解决我们所面临的问题。

只要我们还在生死激烈交锋中，我们便能看清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世界是秩序稳定的，因为任何一方都有能力摧毁另一方，即任何一方都不敢冒着全面爆发的战争的危险，我们就自己的敌人而言，我们可以称自己为“自由世界的领导者”，但是现苏联内部的解体使我们丢失了认同感，美国固然想成为自由世界的霸主和领导者，但美国人不知道这些词的含义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是否应该支持这个世界，因为我们开始相信我们的生活是建立在对自身利益的追逐上的，是以现实主义和放任政策的原则为例的。

在某种意义上，当前的形势是史无前例的。过去的和平与稳定是由帝国主义强权、权力平衡或两者结合在一起来维系的，现在我们没有了这些。美国没有能力或兴趣，像 19 世纪大不列颠一样控制世界。大不列颠从自由贸易中获利丰厚，完全有理由维持其巨大的海军舰队。然而美国已不是自由贸易的受益者，也无力充当“世界警察”这一角色。我们必须依靠共同行动，但我们并不完全清楚是什么共同利益，其结果是一个危险的权力真空。有些人期望联合国能填补它。但联合国并不比组成它的成员国好多少。联合国的管理机构只关心自己的存亡，而不是我们人类文明的存亡。国际组织从未能够维持和平。人们没有理由相信现在的局势会有什么不同。联合国参与波黑和索马里的战斗，所遭受到的灾难已足以证明这一点。

出路

做些什么？我建议宣布把创建、维护开放的经济社会做为对外政策的一个目标。我把前苏联及其加盟共和国做为一个主要目标。我把前苏联与其他国家区分开是因为苏联体制已无可挽回地消失了，这将会对历史和我们的未来产生深远影响。在世界其他部分，促进开放社会是众多目标之一，我认为核问题应居于其后，怎样在世界其他部分建立开放社会，并与其政治目标协调起来，这是个人的判断，更确切地说，是错误的判断。促进中国更加开放，是一个可行的目标，但怎样最好地去做，仍值得探讨。自从我们的政府放弃撤回最惠国待遇，而选择了贸易，我们必须保证观点和信息的流动，随着资本一起流动。要求日本打开国内市场也是一个可行的政治目标，但我们尚未找到着手行动的正确途径。在海地，武装干涉不可避免，建立一个开放社会，是它自觉的目标。行动成功与否，必须经过那个标准来衡量，上次美国占领海地时，它训练了一批在美国军队撤离海地仍能镇压海地的民众的武装力量，开放社会是大致可以描述成民主的组织形式，但是，开放社会的概念更为广泛，它不仅是一个民选政府，同时还应是一个每个都能充分表达自己观念的社会，这一观点依赖于一个强大的人民社会和法律制度，政府是民选出来的这还不够的，它还必须尊重少数人和他们的观点，这一点对每一个国家都是同样重要的。

新的体制将允许我们解释自己——说我们拥护什么，而不是我们的敌人是谁。它提供了一种视点，这一视点很遗憾目前没有。一方面，它告诉我们封闭主义对我们是一个具大威胁，另一方面，塞、克、穆三方面的内战，是公民和民族两个概念的争斗，而公

民这一概念输净了。如果我们清楚了这点，我们的表现将有所不同。

自由像空气，人们只有被剥夺了自由后才会努力去争取。

我们没有很多时间恢复我们的判断力，苏联解体是一个历史事件，那些直接受影响的人总会意识到他们经历了一场革命，但我们都会间接受到影响，因为苏联的解体意味着冷战时期的稳定的世界秩序的完结——只是我们没有意识到，当我们共同的安全机构瓦解时，我们仍若无其事，联合国受辱，北约解散武装，除非我们认识到世界秩序被破坏掉，我们将会面临混乱的世界。大西洋沿岸国家的解散可与苏联解体相比。

不论是好是坏，新世界秩序必须建立在联合国基础上，因为美国不愿也无力扮演“世界警察”，它也不能远离世界。它也没有其他共同安全防御机构来取代它。联合国或好或坏像西方七国一样，享受着安理会的否决权。在冷战时期，它因为西方政权与苏联的对抗而僵化无力，在波黑——斯洛文尼亚灾难中，它因为西方民主国——美、英、法不统一而蒙辱，联合国要想维系下去，只有开放社会这一概念才能提供一个统一原则，包括共同的价值取向，对和平稳定人力物力资本观念自由流动的共同渴望。创立维护开放社会不是对外政策的唯一目标，但对于转轨国家的经验教训，须给予高度重视。

一旦这一原则被接受，一项因俄罗斯和前苏联国家建设性的承诺随之而来。它的目标是帮助向开放的经济社会的转换，其中包括从国际金融组织、贸易投资中取得的帮助。人们期待俄罗斯将在安理会中同样富有建设性，把它转换成共同安全防御的有效机构，必须承认在前苏联或其周边也有很多冲突。这些冲突和将怎样解决与其相关的社会特点息息相关。现实主义将成为那些社

会内部进程的结果和决定因素。比如，乌克兰的政治经济崩溃实际上保证了俄国作为一个帝国主义强权重新出现。相反乌克兰作为一个运转良好，注重利润的民主国家也将推动俄国向相同方向前进，幸运的是西方七国首脑在1994年元月那不勒斯高级会谈中认识到了乌克兰的重要性，并赞助了40亿美元帮助乌克兰，使它能够重新开始实施一项经济改革。乌克兰新当选总统决心抓住这一生命线。他开始了一个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这是自苏联解体后，第一次促进经济改革的国际帮助。这说明如果创造、维护开放社会的工作能上升到一个明确的目的，是能够取得预期目标。

美国十大金融家投资准则：

乔治·索罗斯

乔治·索罗斯是当今世界上最神奇、最伟大的金融投资人。1969年，他创建了量子基金会，以400万美元起家，经过数十年在金融界的艰苦奋斗，他终于成为了全世界金融界叱咤风云的顶尖人物。如今，他已拥有高达25亿美元以上的个人资产，他所控制的财产有180亿美元，而受他影响的国际资本有多少恐怕只有上帝才能知道。他是当今世界唯一一名以个人财力打败国家银行的金融界的“长胜将军”，他的金融投资诀窍是全世界金融投机家的“圣经”。

乔治·索罗斯最著名的投资理论为弹性理论和反转点运用原理。

乔治·索罗斯金融投资诀窍为：

一、预测的事情常常会出差错：在转折点时，事情常常会 and 流行的意见相反，这点并不容易察觉。换句话说，你知道终将有

事情发生，不过除非你能预测出发生的时间，否则对你也没多大好处。

对此，索罗斯以投资人的身份评论说：“如果你确定日元可能会升值，而且有借来的10亿美元资本可供操作。下一季或下一年日元可能会再贬值，但你随时都有可能被洗出场。因此对于今天或明天而言，主宰走势的力量仍是短期的供需，而供需会受到新闻、政府当局采取的措施以及动量的影响。这就是老投资人的格言：“趋势是你的朋友。”不过由于你很难抓住确实的反转时机，要从趋势上获利，尤其是使用融资时，风险变得很高。

二、对于进行融资操作的人而言，反向思考十分有风险，但这却是投资人的标志。索罗斯正确地观察到凡投资人都持有其他货币资产。换句话说，你所拥有的东西最终一定要保存在某个地方，这就好比你会住在别的地方一样。大多数的投资人，其实许多基金的经理也一样，他们从不下要在哪里的决定，他们只是把钱放起来。如果你在苏黎世这样还可行，不过把钱放在南美的小国就不太妙了吧。对一个爱国者而言，把钱存在祖国以外的地方需要一番挣扎，而美元或美国股票也并非一直是最佳选择。所以索罗斯说，你必须选择立场，不决定本身也是一种决定。“有时候，我也挺羡慕那些无知的基金经理会，”索罗斯客气地表示：“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面临的是存在的选择。”

三、乔治·索罗斯通过自身投资经验，曾总结说：“我的方法之所以有效，并不是我能做出正确预测，而是我有调整错误的空间。我的预测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我持续不断地预测不会成功的事。或许是因为市场会影响他们所预测的事件，而反射过程使得预言的结果不能发生。其实结果是在过程中就决定了。乔治·索罗斯坚信反面思考。他认为大多数基金经理人常犯错误。他们的

地位越有影响力，就越没有能力作出正确决定。

不过，无论如何，市场形成事件。如果处在自身否定预言的环境下，也许能够反其道而行，把握住成功的机会。索罗斯承认市场的确能预测到结果，但是行政当局如何采取行动预防之，是市场趋势的条件。这就是说，与只设法了解的科学态度是不同的，正如索罗斯的《金融炼金术》中所追求的是不断改变。改变能够拯救投资者。

四、“我们现在还是处于一个自我增强和最终自我毁灭的循环中，即 80 年代兴起的购并狂潮中。”索罗斯这样说。

市场玩家都不能抑止经济过热，虽然他们都很清楚这场景气将崩溃。想要完全置身事外几乎是不可能的，也不建议如此作，由于现代经济彼此环环相扣，藏身之处决找不到，所以对投机者而言最正确的策略就是搭上列车赚取利润，试着在它崩溃之前脱身，使损失降到最低程度。

美国十大金融家投资准则：

洛夫·温格

洛夫·温格与所有成功的巨富一样，他是凭着自己的能力和诚恳，加上忘我的工作，才由很普通的职员成为艾抗基金会总裁。洛夫·温格获得麻省理工学院工业管理的学士和硕士学位。洛夫·温格总是说，管理非科学，而是一种建立于“心理学、常识和善意的知识。管理的原则不会变，你只是试着让别人朝你要的方向工作。你要确定你的方向能理解，而你失败时，试着把错误推到别人身上。洛夫·温格 1977 年 2 月出任基金总裁，从创设日期到 1988 年底，不计算纳税，年复利成长率 17%，温格经营的艾抗基金会近 20 年时间，他运用自己独特的运营手段，使该基金一跃成为全美 5% 内的知名基金。

洛夫·温格的金融投资诀窍为：

一、温格将法人投资组合经理人面临的问题与斑马相比，他把投资者进行心理剖析，他说：

“投资人都想图利，希望比同行表现得更好，而斑马则希望有嫩草可吃。再者，投资者都不喜欢风险，怕因此亏本，斑马则怕被狮子吃掉：还有一点，投资者都一窝风集体行动，彼此有一样的想法，而且聚集在一起，牢不可分，斑马的行动也是如此。”

温格进一步阐述：“如果你是一匹斑马，跟着群体生活，那么最重要的决定就是在群体中站立位置，当你自认为很安全时，只有站在马群外围最有优势，因为那里的草才新鲜，站在中间位置的斑马只能见到被吃得差不多或遭到践踏的草。”

“可是，当有狮子接近时，外面的斑马容易变成狮子的美餐，而马群中间的斑马虽然饿得瘦巴巴的，但至少还活着。”

二、温格是个“由下而上”的投资者，他先寻找最吸引他的市场，然后对这个范围内的投资情况进行分析。他称之为鲁宾斯坦原则。温格举例说：要不是某类股票都有赚头，不然就是都没有搞头。鲁宾斯坦有一次在伦敦担任钢琴比赛评审时，大会要求他打分范围是1到20。赛后，赞助人看到他给数10个参赛者的成绩，大多数都是零分，仅有几个是满分，没有其他分数。有人问鲁宾斯坦为什么评分如此极端，他回答很简单，他们不是能弹钢琴的，就是不能弹钢琴的。”

温格认为，在观察趋势的时候，你应该留心正反面的投资观点，就好像《福尔摩斯》的侦探故事中所写的“会咬人的狗都不叫。”比如在1987年到1988年冬季，没有任何石油短缺的报导，这就表示能源供给相当充足，但它绝不是头版新闻，新闻总是喜欢报道坏消息，但是油料便宜对航空业却是大有利处。对汽车旅馆和狄斯尼乐园也有好处。

温格解释说：“同样，例如印度一年一度的洪水泛滥：季风每年都会降临，而导致数千名灾民因水灾而无家可归，然而，这经

常意味着季风一定会来。人们等灾后还会重返家园。如果洪水不来可能才是真新闻。”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看到“印度水灾使数千名灾民无家可归”的新闻，就表示今年雨季没来，你就可以考虑黄豆期货了。

为了确保投资安全，必须先从不同角度全面分析了解企业的情况，尽可能地选择这样一些企业进行投资：基础扎实，资金较雄厚，有持久发展趋势，企业规模大中型，经营管理水平先进，产品专利性强，商标知名度高，有较强的生产能力和市场竞争优势，企业资产分配合理，流动资金与流动负债保持合理的比率，盈利率高，有丰富的原料来源和广泛的市场。

美国十大金融家投资准则：

沃伦·巴菲特

沃伦·巴菲特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人。1956 年他将 100 美元投入股市，40 年间创造了超过 120 亿美元的财富，在投资领域成为无人能比的美国首富，被美国著名的基金经理人彼得·林奇誉为“历史上最优秀的投资者”。1997 年，《福布斯》杂志编列一份美国最富有的人物的排行榜，榜上除了麦伦、杜邦、皮龙、洛克菲勒等几大家族外，还有 69 个人，他们各自拥有价值都在 10 亿美元以上的财产。其中名列榜首的就是巴菲特。他拥有净值 210 亿美元的财产。

沃伦·巴菲特金融投资诀窍为：

一、沃伦·巴菲特之所以取得伟大的成功，就是因为他的精明和一整套简洁易行的定律及策略。投资者要赚钱，首先要头脑清楚，理性而不受情绪左右也十分重要。然而投资领域的确是个不理性的市场，是情绪的聚积场所，各式各样的人的喜、怒、哀、

乐、兴奋、抑郁大量汇集激荡，于是多数人的投资结果者事与愿违。

事实上，投资获利的判断基础十分简单，那就是判断买卖时机，以及买什么。沃伦·巴菲特所谓的独特投资策略，就是以常识或一般知识为基础，坚守某些定律，进行投资持久战。“你投资的企业，即使在傻瓜的管理下，也应该能正常运转，因为总有一天，这个傻瓜也会明白的。”

二、根据对沃伦·巴菲特的观察，投资的成功与否并非取决于你了解的有多少，而是在于你能否老老实实承认自己不知道的东西。投资人并不需要做对很多事情，重要的是要能不犯重大的过错，在沃伦·巴菲特的经验中，以一些平凡的方法就能得到平均以上的投资成果，而主要是投资者如何把一些平凡的事，做得极不平凡。

其次，稳定的经营史决定着一个企业的发展前景。沃伦·巴菲特从不对复杂的企业报有兴趣。对于那些正因面临难题而苦恼，或者因为先前的计划失败，而打算彻底改变营运方向的企业，他也是敬而远之。根据沃伦·巴菲特的经验，报酬率高的公司，通常是那些长期以来都持续提供同样商品和服务的企业，彻底改变公司的本质，会增加犯下重大错误的可能。

三、沃伦·巴菲特用来评估经营效益和经营绩效的财务定律，都是以典型的巴菲特式原理为基础的。他不太重视年度的营运绩效，而把焦点放在每4年或5年的平均值上。他指出，创造经营收益所需时间，通常不大可能与行星绕太阳一周的时间相吻合。他对于那些用以捏造辉煌业绩的会计手法更感到不耐烦。

“投资者必须有能力控制那些会影响营业盈余的各种不寻常因素。”巴菲特排除了所有的资本利润和损失，以及其他任何可能

增加或减少营业盈余的不寻常项目。他正努力设法独立划分出企业各种特定的年度绩效。他希望了解拥有特定资金可供运用的情况下，管理阶层能为公司创造多少营业收益。他说，这是判定经营绩效最好的一个依据。

四、沃伦·巴菲特指出，所有简捷的投资测试方式如高的或低的本益比、价格，都不足以决定一个投资人是否真的购买了值得购买的企业，和的确以获取价值为目的，来操作他的投资。无论企业能不能成长，在盈余上显示出的是起伏不定或者是稳定的状态，或拥有相对于目前盈余与账面价值过高或过低的价格，投资者当以折现后现金流量最便宜的公司，作为投资决策的根据。

美国十大金融家投资准则：

彼得·林奇

彼得·林奇是当今美国，乃至全球最出色的受聘投资组合经理人，是麦哲伦 100 万共同基金的创始人。彼得·林奇在其数十年的职业金融投资生涯中，特别是他于 1977 年接管并扩展麦哲伦基金以来，不仅使麦哲伦基金成为最庞大的共同基金，使其资产由 200 万美元增长到 84 亿美元。惊人的成就，使林奇蜚声金融界。美国最有名的《时代》周刊称他为“第一理财家”。《幸福》杂志则称誉他为“金融投资领域一位超级投资巨星。”

彼得·林奇的金融投资诀窍为：

一、林奇投资技巧的本质就是“流畅”，任投资组合随其构想轻易地变动。如果市场上出现新机会，他会立刻采取行动，不浪费时间做太多的分析，在作这种抉择时，还必须具备由经验得来的正确判断力。如果林奇发现市场上缺乏效率，他会立刻行动，由于林奇像帆船竞赛的船长一样，随时会因为风向稍微转变而更改

航向，他的投资组合永远都在变动。许多投资在基金内的寿命只有一两个月，而整个名单平均每年至少会周转一次。

二、林奇经过自己的实践得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操作方法。他坦率而直觉地排斥许多被誉为成功捷径的投资公式。许多信托公司喜欢采用经济概观和生产配置的方法以取缔知识和技术，而林奇却避免使用这种方法。他对经济与市场的分析也同样不信任。

总之，林奇不相信现代投资组合理论。这个理论实质上意味着投资人不需要了解所投资的公司，而是把公司分类为几个种类加以操作。对他最具吸引力的是抓住转变，即他要在公司财务状况好转之前进行部分投资，当转变真的到来时，就大举买进。

三、林奇身为一个成功的投资人，他很注意人际交往，尤其是在找盟友方面。他认为盟友能交换构想互享其利。林奇举例说：“如果我送你十元钱，我们俩人加起来还只有十元钱。如果我告诉你一个构想，我们俩人就各自拥有一个构想。”而那些买方投资经理是林奇有利构想的最佳来源。

四、林奇认为，当一名消费者考虑买一项重要的家庭用品，譬如烤箱，他会仔细研究。他会询问买过类似产品的朋友，并阅读消费者报告。同样，如果他想买一栋房子，他会延请建筑商检查屋子的水电设施，另外，他也会留意附近学校制度是否完善。但是，同样的人若参与投资，却往往只根据小道消息，完全忽略了研究。

而个别投资人在某些方面仍比专业人士有更大的优势。因为他没有时间压力，可以仔细思考，等待最好的时机。就如同他在选购房子一般。如果要他每个星期或每个月都投资，他会疯的。

美国十大金融家投资准则：

米瑟拉·雷克莱

一个周薪 100 多美元的职员，生活水准还不错，但是要在毫无经济基础的前提下，在 10 年内创造出 10 亿美元的财富，听起来简直是痴人说梦，但米瑟拉·雷克莱却把这种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变为现实。1941 年，25 岁的雷克莱携家人来到美国时，连维持基本生活的费用都很成问题。可当他 42 岁的时候，他不仅靠白手起家创造了 10 亿美元的财富，并且把自己的经验写出来，荣获俄亥俄大学的财政学硕士头衔：

米瑟拉·雷克莱的金融投资诀窍为：

一、雷克莱所收购的公司，也常采用以静制动的投资技巧，他看准一家公司，并不立刻进行购进，而是静观其势，以静制动。这种投资人具有较好的忍耐等待功夫，以静制动法教会投资人看行情趋势出现的上窜下跳，此起彼伏，投资人处乱不惊，毫不为之动容，这种以静制动法往往会像埋伏战一样漂亮取胜。

二、雷克莱的成功，首先就在于他遐想，有决心。当有人说他10余年间从普通雇员成为10亿美元大富翁“简直幸运之至”的时候，他总结出了颇富哲理和说明力的经验之谈：

什么叫幸运？我相信，任何像我一样地工作，像我一样有“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决心，都可以有我这样的成就。问题是，大多数人在小有成就之后就把身心松懈下来，当然更大的幸运也就远离了他们。

雷克莱指出，由1亿美元的企业，发展成10亿美元的企业，比赤手空拳创造1亿美元要容易得多。大多数人之所以对比较容易的事情反而做不到，主要的原因是他们太容易满足了。只有饥渴的人，才会有争取食物的强烈欲念；只有爱钱的人，才能积下财富，这跟幸运是毫下相干的两回事。

三、战争术语中的所谓“消耗技巧”，是指敌对双方实力大致旗鼓相当，或是双方不愿正面冲突，以免死伤太多，而采取的对峙策略。雷克莱认为，投资操作的进出过程，恰似两军阵前的对峙，因此，当对方暂时不愿过分积极冲突时，也就产生了投资上的“消耗”技巧。一方若稍有退却的话，则必将给另一方以可乘之机，只有较占优势的一方猛烈出击时，才会大获全胜。

四、任何事物都有产生、发展到衰落的过程，企业也是如此，投资价值也是限时间而变化的，在工商企业循环增长的过程中，这个新企业的兴起，或那个旧公司破产，过去领先的企业，后来成为摇摇欲坠的企业，这样都是极为正常的情况。

投资中，如果对那些走向没落的行业或企业投资仍抱残守缺，势必遭到损失。因此，雷克莱指出，对投资者而言，要学会当机立断，忍痛割爱，不要紧握今天面临破产企业的投资不放，更重要的是要有预见性，不把希望寄托在无把握的企业重振上。

美国十大金融家投资准则：

杰姆·罗杰斯

60年代，杰姆·罗杰斯还是一个来自阿拉巴马州的穷小子，60年代末期，他创建了斯洪基金，从1969年12月31日到1980年12月31日，经过20年时间，斯诺基金增长了3365%。杰姆·罗杰斯蜚声经济界而成为华尔街头号投资人，作为世界富豪之一的杰姆·罗杰斯，所采取的科学投资方式就是：

他将赌注押在整个国家上。他所持的观点是一个国家的发展比一般预期乐观，便在其他国家还没有，甚至还不了解这项投资可行之前，先下赌注。由于他极其注重国际风云变化，就形成了一种超前洞察的能力，这种潜能的发挥，使他在许多国家的投资得到亿万美金的回报。

杰姆·罗杰斯的金融投资诀窍为：

一、罗杰斯认为投资者最重要的事就是培养和发展独立思考的能力。他说：“我总是发现自己埋头苦读很有用处。我并不聪明，

因此，与别人讨论，总是搞乱我的思维。对我而言，我习惯于一个人静坐、阅读并且将事情理出头绪来，这可能会出现一些奇怪的念头，不管它们怎样荒诞离奇。我发现如果我只按照自己所理解的行事，既容易又有利可图，而不是要别人告诉我该怎么做。”

的确，罗杰斯就是这样特立独行的人。他从来没有靠内线消息赚过钱，包括合法合理的信息。罗杰斯认为那些内线消息十有八九是错误的，或者消息本身就是子虚乌有的。于是，他曾诚恳地忠告那些投资者，“如果那些消息是公司总裁告诉你的，或许你只会赔一半的钱，如果是董事长告诉你的，那你一定会把钱赔光。对那些所谓的内线消息，最好的方法是退避三舍，敬而远之。”

二、罗杰斯重要法则之一就是，绝不赔钱。如果你不了解事实，就别玩。干脆把钱放到货币市场基金或买些国库券。然后你就可以放松地到海边去玩，看电影或下棋，爱做什么就做什么。

“然后，你终于发现好机会来临。就可以把钱全部从基金中抽出，将钱投资于你所认为有潜力的事情上，保持三四年甚至十年不动。”

“因为你比其他人了解状况，你清楚何时脱手最好。这时取回你的钱重新存入货币市场基金，等待下次投资机会的降临。如此周而复始，就赚得！”

“所以我的忠告就是绝不赔钱。做自己熟悉的事，等到发现大好机会时才投钱下去。”

三、从事国际投资时，罗杰斯把赌注押在整个国家上，在国内投资时，他便赌在整个事业上，他首先发展出整体投资概念，罗杰斯只看长期重大的转变，而忽略一般的起伏。他认为，要找到别人不知道或未发现的观念和改变。

四、罗杰斯很会计试算表：它们是他的主要分析工具。“几千

张试算表、一大堆数字，”也不用电脑，用手计算一切。他以前请了几个助手帮他做这些工作，现在缩减一位。他不使用任何电脑资料库，因为他不确定可靠程度。他说没有资讯总比资讯错误要好。如果基本资料有误，所有的资料都会跟着错下去，很可能导致错误的结论。特别一提的是，我们不应该相信一些杂志的二手数字，如史坦普、价值线，或者经纪商的报告。最保险的作法是直接去查年度报告表或者证券交易所所发布的详细 10K 表。

美国十大金融家投资准则：

约翰·奈夫

约翰·奈夫是“市盈率”的创始人，这位于 1931 年出生在俄州的美国人，幼年饱受穷困的煎熬。在灰暗的生活中，他发誓要通过奋斗成为最富有的美国人。1964 年，约翰·奈夫成为温莎基金的投资组合经理人。奈夫经营温莎基金 24 年，直到 1988 年，温莎基金的复利报酬为 14.3%。每年奈夫经营基金表现几乎都名列所有基金排名的前百分之五。这充分显示出奈夫的理财能力，远非一般人能相比的了。许多年来，他所掌管的温莎基金一直被列为数十亿美元基金，在 1988 年底，它所累积的 60 亿美元资产已经使其成为全美最大的资产与收益基金之一。他是当今最出色的追求“价值”的基金代理人。被人们誉为“低本益比射手”。

约翰·奈夫的金融投资诀窍为：

一、奈夫的投资技巧较为保守，因此在市场景气时，奈夫管理基金的表现可能会比市场略差，但是在景气低迷之际，基金的

获利却不会比市场衰退的快，这点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他指出管理庞大投资组合经理工作的重要，好的经理动作快，特别在听到消息时立刻抛出。

二、奈夫敢把大量鸡蛋放在少数几个蓝子的主要原因是他的赌局风险不高。

那么，奈夫的投资理念是：买最便宜的东西，若不幸失误，损失也不会太大。

事实上，奈夫多年经营的温莎基金，其投资组合的本益比大约低于市场平均本益比的三分之一，而平均股利率则超出 2%。故此，他被人们誉为“低本益比射手”。与本杰明·葛兰姆不同的是，奈夫注意公司的潜质，他认为要选择公司，首先价格便宜，其次公司质优。他对自己选择的公司坚持下列几项原则：

1. 良好的资产负债表。
2. 满意的现金流量。
3. 股东权益报酬率要高出平均值。
4. 有能力的管理阶层。
5. 要有满意的长期成长远景。
6. 有一项极具吸引力的产品或服务。

三、投资人应该在股票完全发挥其获得潜力之前卖出，就必须让下一位买主有足够的理由购买其手中的股票。要想做到这一步，投资人就要有足够的耐心。

这也是奈夫投资股票生涯多年来一直恪守的一个原则。即如果他的持股无法充分发挥其获利潜力，则他就会耐心等下去。在这方面，他和想在一两年内就有结果，不然就退出的那些“价值”买家想法不同。只要这家公司经营远景不错，股价比投资组合其他股票的股价便宜，奈夫会持有数年。直到达到完全发挥其

获利潜力，他才肯出手。

四、投资要重视思想的独特性与管理严密性并使之相结合，计划一项投资交易时，必须建立一个明确的目标，风险资本是一种贪婪的事业，经过努力后，我们获得的数额不像投掷标枪那样毫无目标。

美国十大金融家投资准则：

迈克·史坦哈特

迈克·史坦哈特被公认为当今全美策略交易大师，他共经营三个基金。单从这个誉称中，就可以断定他是个头脑灵活而且智慧超群的人。

迈克·史坦哈特在 20 多年的投资生涯中，可以说是相当的成功。比如说，在 1967 年，他的公司刚起步时，就投资 10000 美元到他的基金中，那么，20 年后，你就拥有 100 多万美元。要是以年复利率计算，在扣除他收取的费用之后，净报酬率竟高达 20%。这个数据足以说明，作为基金经理人的迈克·史坦哈特，绝对是一位投资奇才。

迈克·史坦哈特的金融投资诀窍为：

一、史坦哈特认为随机应变的投资组合是较为上策的投资策略，它是投资者根据投资走向变化而灵活调整证券组合的投资策略。当判定投资走向看好时，则将资金大部分投放在投资上，如

果认为投资走向看跌时，则将大部分资金转入买公债等风险较小的证券。

随机应变型的投资组合策略具有机动灵活，能适应市场变动的特点，是一种较为投资者推崇的投资组合策略。

二、如何正确衡量投资消息，史坦哈特的做法是：

1. 收集所有可能影响投资行情的消息。
2. 将各种消息按正确的、反面的性质分类。
3. 再按消息的重要性，安排其主次顺序。例如分为极重要消息、重要消息、普通消息、不确定消息 5 种。
4. 将所有消息的正负系数加总，以确定所有消息的综合利弊影响。

三、史坦哈特就是纯粹的投资者，而且在经大多数时候，二三项投资赚最多的钱。由于他在市场上非常活跃，他会面对无数的投资机会，而且被迫要注意所有市场动向。也就是说，他会挑选。

四、史坦哈特坚信，“抑制市场震荡的历史因素已经失去功能，像投资组合保险、程式交易、市场国际化、投资机构增加等都会让情势一发不可收拾。专家以前要有记录本才能创造市场，这是他们的角色，现他们的资本已经不足做这样的事。他们现在只能促进市场。”

而最糟的是，经纪商并没有增资以回应市场的成长，所以他其实并不能建立仓位。由于佣金，有许多公司已经逐步放弃创造市场的功能。这与许多人所期望的情形相反，理论上是希望法人机构可以稳定市场。结果完全不是如此，他们都是一窝蜂乱搞。在这种情况下，永远要告诫自己：要清醒投资，要清醒投资。

美国十大金融家投资准则：

乔治·麦可利斯

乔治·麦可利斯出生在布鲁塞尔，由于麦可利斯的家族是犹太人，所以麦可利斯幼年过得是一种坎坷动荡的流亡生活：这种生活促使麦可利斯早熟。1977年麦可利斯出任基金及其母公司——第一太平洋顾问公司的总裁。自麦可利斯成为总裁开始，从1977年到1987年，复利年报酬率是109%，在所有封闭型基金中，其表现名列前茅，麦可利斯在10年的时间里，使基金成为众多金融界人士羡慕的“金钱皇宫”。

乔治·麦可利斯金融投资诀窍为：

一、麦可利斯说自己所做的事容易通过机械方式加以说明，并认为自己所购买的公司有以下几种特点：

首先，它们都是高利润的企业：一般而言这些企业都有高股东权益报酬率和高资产报酬率，而且高股东权益报酬率应能延续。其次，这些企业的获利能力并不会受限于产业景气循环。其二，这

些企业的成功都有可确认的理由。

二、麦可利斯从不盲目随从，他认为在投资时，投资总额中不容许被亏损殆尽的那部分金额为保本金额。这不是投资人用于投资的总金额的本钱。麦可利斯还称之为“停止损失点”的基本金额。这个基本金额因人而异，不同投资人确定的保本数额差别会很大。市场上，风险与效益成正比，因此，保本是必须的。

麦可利斯指出，保本投资关键不在于买进时机的选择，其目的主要适宜于在选择卖出时供决策。故此，获利卖出点或者停止损失点的制定才是保本投资的关键。

三、麦可利斯说：“我不相信期货、选择权、避险、保险，以及一大堆由创意家提倡且迅速涌到市场的金融工具。我看到很多人在投资这一行时吃了大亏。”

麦可利斯认为，这些投资者一方面是因为太聪明，也可以说是太笨，要么，他们过分地贪婪，才导致适得其反结局。这些投资期货、选择权等的投资者总是被需要花时间和精力去理解的新观念所吸引诱惑，只看到皮毛还不能深入就下海。

四、一旦市场崩溃，价格会陷入混沌和错乱。你如何将每一笔的现金流量倒推回它的现值，毕竟它们有不同的付款规定等，更何况市场里绝大多数的人根本搞不清楚差别？如果真的市场崩盘，在天下大乱的情况下，第一要镇定，第二要分析，第三要决策，第四要永远记住前三条。

美国十大金融家投资准则：

亨利·比特

亨利·比特是一位极其独特的股票大师，他有着非凡的见识，总是能找到猎物的踪迹，然后耐心等待，寻找出击的时刻；他把握机会总是恰到好处，而且下手极其准确，很少有失手的时候。

在华尔街，比特自己拥有一家规模很大的交易商行，并且还建了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作为自己的办公室。他就在那里指挥着手下的雇员，做大宗的股票生意。吃进吐出之间，仅是经手的佣金就达几百万美元。

比特也因此成了华尔街上风云人物，金融界巨头，股票市场最杰出的经纪人。

亨利·比特金融投资诀窍为：

一、希望大多数投资者都要以理性的眼光来投资，不要以赌徒的目光来投资，否则一定会赔钱。

目前，许多投资者赢得起输不起。一旦遇到跌价，就有人到

交易所去吵闹，这是很正常的。但是比特认为，这种投资者注定只能失败，因为他们缺乏最起码的耐性。

二、股市即人生，只是更大喜大悲，更剑拔弩张。要忍耐，要果断，不贪心，敢梦想，顺势而为，及时收手，静如处子，动似脱兔，得意泰然，失意淡然，其中蕴含的“大道”，又岂是“分析”、“技术”所可道尽。

三、苦熬苦煎的投资人，都有一种共同的心得体会，不断换作，这并不比等待报酬多，人们往往就因为忍受不了这种寂寞冷落才让赚钱机会到了门口时，没有开门却走失了。

蹲守不力，转而去追涨，就像提了枪去找猎物一样，两腿受苦是必然的，到头来，还是连只鸟也遇不到。或者是追涨半天，赚小的，失大的，套牢时连成本也收不回来，得不偿失。

四、比特经过多年的操作，认为一位出色的投资人应具备以下几个基本条件。

1. 渊博的知识
2. 丰富的市场经验
3. 正派的经营作风
4. 果断的性格
5. 良好的心理素质